

目 录

(一)

- 光明日报在章伯鈞、儲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間
所犯錯誤的檢查……………光明日报編輯部 (1)
- 关于“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負責制”报道錯誤的檢查
……………光明日报編輯部 (19)
- 讀者对光明日报刊登“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負責制”的錯誤报道
的批判…………… (21)
- 希望光明日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林茵 (22)
- 徹底檢查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責任……………高天 (26)
- 光明日报編輯部为什么不檢查 6 月 7 日的座談会……………大純 (29)
- “早春”前后……………費孝通 (33)
- 会外之音……………范朴齋 (37)
- 大胆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光明日报社論 (41)
- 春天的感应……………文冰 (44)
- 关于“六經注我”的談話……………文冰 (51)
- 政治待遇与書齋生活……………文冰 (56)
- 武汉書簡……………文冰 (62)
- “四顧無知己比鄰若天涯”……………文冰 (66)

第一朵“迎春花”	殷毅 (73)
附：“迎春花”掩盖下的“第一槍”	李刚 (77)
中国人民大学象个教条主义大蜂窝	徐颖 (82)
是蜜蜂，不是苍蝇	張友鸞 (86)
附：張友鸞的文章是“苍蝇”不是“蜜蜂”	黃卓明 (91)
知識分子聞“放”之初	光明日报記者 (96)
为“放”而爭	光明日报記者 (101)
何所惧，何所不惧	光明日报記者 (104)

(三)

武汉知識界的“鳴”“放”密云不雨，許多知識分子 希望领导大胆放手	(109)
沈陽文教部門“鳴”“放”空气比較稀薄，問題在于 党群关系不正常	(110)
南京的鳴放在下層阻碍不少，轟开局面，还看领导， 民主党派人士在本报座談会上热烈發言	(111)
推倒牆填平溝改善党群关系	(114)
武汉市教授專家在本报座談会上暢談。填平党群鴻溝 时机已屆，希望高教部下决心克服官僚主义	(116)
北京师大领导不肯大胆的“放”，教授們提出尖銳批判評	(119)
中共统战部、清华大学党委会、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談会 討論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負責制問題，民主党派提出要确定民 主党派基層組織在学校的地位和作用	(121)
研究清华大学中共和民主党派基層組織关系問題的座談会繼續 举行，討論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作用	(125)
附：高等学校中党与民主党派怎样合作共事	(129)
北京航空学院官气十足，在党群之間有一座“万里長城”， 連日举行座談不少教授尙有顧慮	(134)
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負責制，加强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领导	

機構·····	(136)
附：陈望道和楊西光說：复旦大学沒有取消党委負責制·····	(137)
陈望道談加强校务委员会問題，复旦大学党委制并未取消·····	(138)
清华大学教授尙未做到开怀暢談，有些教授的發言中漏出 清华大学存在不少問題·····	(139)
附：清华園里的百余教授开怀暢談，不應該用搞运动的方法 办教育·····	(141)
北京大学开辟“民主牆”，一边努力學習，一边提出不少意見， 帮助整風·····	(145)
首都各大学大字报的綜合报道·····	(147)
西安各民主党派討論毛主席講話，对發揮民主党派作用提出 很多意見·····	(150)
坚决相信共产党大胆揭露矛盾，有人怕报复要农工民主党派 撐腰，專家教授在农工民主党座談会上提出很多意見·····	(152)

(四)

武汉知識界談党群关系問題·····	(157)
武汉地区一部分教授在本报座談会上說：請高等教育部听听 我們的声音·····	(170)
貫徹“鳴”和“放”的方針，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 主觀主义·····	(180)
加强互相監督，开展民主生活，改进党群关系·····	(193)

(五)

標題·····	(215)
---------	-------

光明日报在章伯鈞、儲安平篡改政治方向 期間所犯錯誤的檢查

光明日报編輯部

我們在反对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章伯鈞、儲安平篡改本報政治方向舉行的同時，對編輯部工作進行了檢查。正如6月14日人民日報編輯部寫的“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文章中對本報所作的批評，在儲安平實際掌握編輯業務的這短暫的一段時間內，即是从5月到6月上旬期間，本報的基本政治方向變成了資產階級報紙的方向。

儲安平是4月1日到職的。頭三個星期，他是在編輯部“了解情況”。4月19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決定光明日報完全由民主黨派獨立自主來辦，並撤銷黨組。儲安平從這個時候開始實際掌握編輯業務，並且按照章羅聯盟的政治陰謀，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在報紙上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並不準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道。八年來鑄決站在社會主義旗幟下的衷心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張民主黨派報紙——光明日報，就這樣地被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攫為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宣傳工具。

我們不能不憤怒地來控訴章伯鈞、儲安平把我們的報紙拉出了社會主義軌道、作為他們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工具的罪行。

章羅聯盟企圖篡改本報政治方向，同文匯報相呼應，為他們的政治陰謀進行煽惑鼓動，早就有了打算。在黨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後，章伯鈞對本報即表示分外的關心。去年夏天，章伯鈞已有若干活動。儲安平擔任總編輯以後，章伯鈞對報社工作空前地“積極”起來。他曾幾次來到報社，與儲安平有所策劃。儲安平也口口聲聲說章社長對這有指示，對那有意見。儲安平也時常用信件、電話、面談等方

式，向章伯鈞彙報工作。他們之間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可是把報社最高管理機關——社務委員會完全撤開，迄儲安平辭職前，沒有召開過一次會議。

根據已經揭露的材料，章伯鈞曾提出這樣一些意見：一、他認為本報過去帶頭橫排，現在可以帶頭直排。這是他反對文字改革一套活動中的一個部分。二、他要報紙多報道民主黨派負責人的活動。實質上，就是要我們替他作宣傳，抬高他的地位，作為政治陰謀的資本。三、他主張多登資本主義國家通訊社的新聞，多反映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黨的活動。儲安平對這些意見，竭力支持。章伯鈞在5月中旬曾特地來報社通知儲安平，說這樣的熱鬧還要繼續一年半載，主張趕快把所有的專刊都停掉，騰出版面來作反黨的宣傳。在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的前夕，他打電話給儲安平，說章乃器批評光明日報在“收”了，這樣來為儲安平的反黨宣傳打氣。至於進一步控制本報作為章羅聯盟的宣傳工具，章伯鈞最近已經承認：關於光明日報的整個改組，要等到摸清情況後再說。可見他們是大有計劃的。

為了篡改本報的政治方向，儲安平來到報社後，進行了不少的活動。首先，他宣傳了章羅聯盟的辦報主張。他認為，今天的報紙，應該回頭來向解放前國民黨地區的舊報紙學習；向文匯報學習。他否認報紙有指導工作、推動工作的作用。他把我們報紙八年來所發表的社論，一口否定；他認為那些社論不是歌功頌德的，就是教條主義的。他主張要寫社論，就要寫他所謂的“批評性”的、起“監督”作用的社論。而他又認為這樣的社論不好寫，因為本報是各民主黨派聯合主辦的，“婆婆”太多。所以，在我國政治生活如此重要的時期里，對黨的整風、對國內重大問題，除掉在5月4日發表了一篇有嚴重錯誤的社論外，他不但不去組織社論，就是已經寫好的關於共青團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社論，也加以挑剔、不准刊登。在新聞報道上，他的方針實際上就是“只管揭露，抹殺成績”八個大字。他曾公開說：“我們的任務是揭露，解決問題是共產黨的事。”他主張只要是事實，什麼新聞都可以登。他喜歡搶新聞，喜歡“獨家新聞”，喜歡內幕新聞。他要我們的編輯、記者不怕颯颯。他說，報紙和共產黨、人民政府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即是有些新聞，揭

紙要登，党和政府不要登。他主張在国际报道方面要用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訊社的消息，而且要不加分析地直接采用。他还要多多报道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他說目前各报的国际新聞編排得很不好，不适合知識分子的口味，并以費孝通的意見为代表。在干部中間，儲安平还以“了解情况”、“走群众路綫”为名，用各种面孔和手段，兜售他的資产階級办报路綫，并摸編輯部的底。在这期間，儲安平不仅要看他認為重要稿件的小样，而且有些稿子由他亲自約来或亲自处理；重要采訪工作，他故意摆脱总編室主任或部主任党员負責同志，亲自指揮。

在这期間，由于儲安平执行章罗联盟的政治陰謀，我們的報紙攻击党对文教事業的領導；歪曲党的政策，挑撥党和知識分子的关系，散布对党的不滿情緒；鼓吹絕對民主和个人主义的自由；煽动大学生鬧事；歪曲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夸大人民內部矛盾，否定成績，把新中国塗成一片漆黑；宣傳資产階級新聞观点和作風。在編排方法上，着意渲染，加强了惡劣的宣傳效果。

編輯部的工作同志，在这一段时期里，在采訪、編輯工作上，也有不少人犯了相当严重的錯誤。对于这些錯誤，我們正在严肃認真地进行檢查。

感謝党及时向我們發出了警号，指示我們从錯誤中清醒过来，和全国人民一道向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把我們的報紙轉回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感謝广大的讀者，及时向我們提出了批評。我們收到大量的讀者来信，指出宣傳上的許多錯誤。有不少讀者，还亲自到报社来提意見。有的讀者来报社要向儲安平說理。讀者的批評，對我們的工作檢查有很大的幫助，我們誠懇接受，并在这里致謝，不再分別函复了。

· 处处点火的九大城市座談会

儲安平抓彙务的第一步，就是派出記者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談会，处处点火，打乱整風步驟。煽动人民对党不滿，把正在蓬蓬勃勃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塗成一片漆黑，妄圖达到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九大城市座談会是儲安平亲自指揮的一个大規模的陰謀活动。他在章伯鈞的支持下，既不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系，也沒有向各民主党派中央請示，就作了布置。在記者出發前，儲安平面授机宜，指示記者，要找有代表性的、素來有不滿情緒而又敢于說話的人参加座談。有一个記者曾經向儲請示，如果有些人虽有代表性而“無事可鳴”，有些人虽“敢于鳴放”而却没有什么代表性又怎么办？儲安平肯定地指示，邀請后者。这就充分表明了他是企圖利用那些心怀不滿的人，利用知識分子落后的一面來为章罗联盟的陰謀打先鋒。儲安平还怕这些人有“顧慮”，要記者在邀請之前，分別登門拜訪，煽動这些人大大鳴大放。完全撇开当地中共党委，他只叫記者和民主党派地方組織联系。有些地方，儲安平还亲自写信与当地的右派分子直接联系，或者指明要記者找那些右派分子，找那些人就某些問題鳴放。例如复旦大学的王恒守，是上海第一个提出取銷高等学校党委負責制、主張所謂“教授治校”的右派分子，儲安平就指示駐上海記者一定要邀王恒守参加座談（按：駐上海記者沒有接受这个指示）。这种布置，显然是为了集中力量对党对政府进行攻击。

从5月初起，在短短一个月里，見报的座談紀錄就有十一次，占了十二个整版，約有十三万字。除了座談紀錄而外，組織座談会的記者还拍發了近二十个專电，写了十几篇通訊，一直到6月5日見报的青島座談会紀錄始告結束。在这一段時間里，我們的报纸，为資產阶级右派分子提供了講壇，發出了大量的荒謬言論，对党进行了惡毒的攻击，在各地造成了極坏的影响。

从我們編輯部工作人員來說，在这些座談会的报道工作中，也暴露出許多問題。

座談会的組織和报道，各地情况有所不同。最惡劣的如沈陽，主持这个工作的本报党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甚至采取了向中共省委書記“將軍”的办法，用对立的態度提出难题，例如什么“这里鳴放不起来有历史根源，你的看法怎样？”等等。另一記者殷毅还写了鼓吹“自發鳴放”的題为“第一朵迎春花”的通訊。又如在武汉有一个座談会，这个会如何召开，邀那些人参加，是和右派分子馬哲民商議的。我們的記

者在那里还一連举行了三个座談会。主持这一工作的學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还說：“这次到武汉是儲安平首次亲自布置工作，要做好！”潘文彬还写了兩篇通訊：“武汉書簡”和“四顧無知己，比鄰若天涯”，強調所謂“春風不渡武胜关”和党与知識分子关系不正常。广州座談会开过以后，主持工作的記者，竟然还有“不滿足”之感，認為談得不够“尖銳”，在儲安平所謂“依靠民主党派”的指示下，西安、蘭州的座談会，几乎为右派分子所操縱。青島座談会是由記者鍾光貴主动要求举行的（儲安平原来也有此打算）。这个座談会由右派分子徐一貫主持，并听任徐一貫的操縱，多邀右派分子参加。鍾光貴在报道座談会的消息的“專訊”上，也大量摘录了徐一貫的反动的具有煽动性的發言。主持南京座談会的記者，推說時間来不及，竟不願把纪录給党委统战部看。总之，按照儲安平的指示，要撇开党来“帮助党整風”。只是上海座談会，对当地党委领导的鳴放，起了些协调作用。

到各地的記者按照儲安平的指示，下車伊始，不等开会就發回專电：这里沒动，那里不放。5月8日就登了兩条消息：“武汉知識界的鳴放密云不雨”，“山东文教界認為领导对鳴放支持不够”，5日，“沈陽文教部門鳴放空气稀薄”，6日，“西安有些高等学校沒有貫徹鳴放的精神”，8日“南京鳴放空气不甚濃厚”。这些接連出現的專电，总起来是一句話，党不放，我們要他放。座談会的消息，也在当天用專电拍回，而專电的內容，把最具有煽动性的、強調“春寒”“春迟”，“深溝高牆”的所謂“警句”，集中地、突出地摘录下来；或者以記者自己的口吻加以誇張；或者假用所謂“有些人說”把記者与發言人的“共鳴”之点，加以渲染。如5月11日的沈陽專电：“有些党员，还該糾正‘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和傲然‘鶴立雞群’的气势。”5月10日武汉專电：“大家認為……甚至一般党员都自視為統治者、改造者、把党外知識分子看作被統治者、被改造者，以至在党群之間挖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鴻溝……”。但是，我們这次檢查武汉座談会的發言纪录，并沒有所謂“統治者、被統治者”字样。这更是無中生有了。如5月15日南京專电：“大家認為南京还是早春气候，有人認為，在基层还被严寒封鎖”。座談会消息的标题，更是以“推牆填溝”，“轟开局面”，“顧

處處重重”等等煽動性詞句來形容黨群關係一團糟。在編排座談會紀錄時，也把每個發言人的最壞的詞句，集中扼要地編成黑字小插題，極盡挑撥煽動之能事。如5月11日發表的西安座談會紀錄小插題有“三個大老虎，變成三個大妖魔”（按：即指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5月17日發表的武漢座談會紀錄的小插題有：“武漢大學的黨群之間有一座銅牆鐵壁，這是有些黨員的特權階級作風築成的銅牆鐵壁……”；5月14日發表的瀋陽座談會紀錄的小插題有：“民主黨派組織，在高等學校里像‘花瓶’，是擺樣子的……”等等。類似這樣的小插題，多得不勝枚舉。在刪節座談會發言紀錄時，也大都把正面的意見刪掉。

由於我們的記者編輯中，有的同志政治認識模糊、立場不穩，在儲安平執行章羅聯盟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活動中，受了儲安平的指使，不自覺地成了處處點火的執行者。個別的人，甚至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站在一個立場，在若干問題上，迎合附和者有之，興風作浪者亦有之。我們對這方面的問題將作進一步的深入檢查。

歪曲宣傳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企圖把民主黨派 引向資產階級的政治方向

章伯鈞在向社會上販賣他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同時，以他社長的地位也把什麼“兩院制”，“民主黨派大有可為”的荒謬主張，來影響我們的編輯部。儲安平來到報社以後，更把章伯鈞的陰謀在宣傳工作中具體化。他們離開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治基礎——社會主義，來歪曲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他們在宣傳民主黨派的活動的時候，竭力誇張民主黨派在國家事務中的作用。大肆強調對共產黨的“監督”，企圖煽動民主黨派篡奪和對抗黨的領導。儲安平說光明日報過去宣傳民主黨派教育成員和改造成員思想的作用，是把“民主黨派在群眾和黨之間的橋樑作用，變成了一座獨木橋。”因此，他非常強調所謂“雙軌”的宣傳方針，說是要着重宣傳民主黨派代表群眾利益監督共產黨。對於民主黨派的重要任務——思想政治工作，儲安平很不感興趣，而是意在言外地認為只有民主黨派是代表知識分子群眾的利益，因而要代表他們監督共產黨。這就是把共產黨描繪成一個脫離知識分子群眾的黨，并

把党和知識分子对立起来。企圖把知識分子抓到自己的手里，把民主党派由党的助手变为党的对手和敌手。这是儲安平一再宣傳光明日报要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的主要的組成部分。

在儲安平宣傳方針的指导下，本报对民主党派性質、任务的宣傳，出現了一系列的、严重的政治錯誤。

首先，在这一段时期的許多新聞报道和座談会發言中，把叫囂民主党派不受重視、沒有發揮作用以及民主人士有职無权等等，用显著的地位登在报上，企圖在讀者中造成“党天下”的印象。对于报道有些民主党派基層組織不受重視，發揮作用不够，以及对某些担任政府领导工作的非党人士的职权尊重不够，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但是，我們却夸大了这些个别現象，得出普遍性的結論；甚至在某些报道中，还歪曲了事实。这样，就挑撥了民主党派和党的关系，更为惡劣的是企圖煽动民主党派反对共产党。在这一段时期，極少甚至沒有正确地宣傳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極少甚至沒有正确地报道民主党派在中共领导下所發揮了的作用。

第二，5月8日第一版，刊載了西安各民主党派討論如何發揮民主党派作用的新聞中，認為民主党派过去的工作是：“只站在党的立場，沒有站在群众的立場上。因为只站在一面，就不能很好地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見和要求……”这是把党和知識分子群众对立起来，肯定共产党是脫离群众的。这条新聞，宣傳了只有民主党派能代表知識分子群众的謬論。

第三，在大鳴大放和幫助中共整風的初期，大量报道了民主党派为某些人向党进攻“撐腰”。如5月27日第二版刊登的农工民主党座談会的新聞，6月1日二版刊登的民进北京市委的會議新聞，6月3日二版刊登的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的會議新聞中，竟說：民主党派成員和所联系的群众，如因为“鳴放”和幫助共产党整風遭到打击，民主党派一定大力“撐腰”。不但新聞中如此写，而且用一号字的大标题，触目惊心地标了出来。由新聞写作的邏輯来看，給了讀者这样一种印象：有些人幫助共产党整風，可能会受到党员的报复。如遇这种事情，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呢？避而不談。只着重突出地宣傳民主党派要出来“保鏢”、“撐腰”。

鮮明地摆出一付面孔：共产党不管知識分子群众，甚而会打击他們；只有民主党派是保护他們的“正当利益”。把民主党派放在共产党“敌手”地位，而且只有民主党派的作法正确，共产党是会給知識分子打击报复的。就这样的惡毒地詆譭了共产党。

第四，更为錯誤的，循着这样的“宣傳”路綫，發展到6月9日，刊登了章罗联盟所搞的反动的科学綱領全文，更严重的是組織了“短評”。提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并說这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监督的具体的新的方式方法，認為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是惡毒地挑撥了科学家和共产党的关系，露骨地說：只有民主党派是保护科学家的，不要跟共产党走。

第五，不顧中共整風的計劃和步驟，三次报道民主促进会召开的中小学教师座談会；5月16日而还以整整一版的篇幅，刊載了一个中學教师的座談会紀录，而在刊登这些报道和座談会紀录的时候，有的采用了惡劣的詞句，以煽起中小学教师对党的不滿。

第六，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談会和工商界座談会結束之后，本报党派部有的負責同志拟了四个問題，在儲安平支持下准备向李維汉部長“將軍”。其中有这样的問法：“能不能說這兩次座談会的鳴放是敞开的？”“在您看来，所揭露出来的人民內部矛盾，是意料所及呢，还是大吃一惊呢？”等等。这次“將軍”的企圖虽然沒有实现，但也可以看出他們在民主党派报道工作上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場和态度。

另外，更其惡劣、严重的是：本报工作人員謝捷在全国人民开始反击右派之后，她还企圖通过采訪农工民主党一个座談会的新聞，別有用心地詆譭反右派斗争。农工民主党在6月11日举行了一个座談会，謝捷集中写了这个会上反对反批評的意見，如說什么“現在是不是用圍剿王蒙的方法来圍剿儲安平和葛佩琦呢？”和“必須考慮到不要阻碍了鳴放”以及“反批評不恰当，就会引起不平”等等（这个別有用心报道，沒有見报）。

这一系列的宣傳报道，說明了一个事实，这一时期的本报对民主党派的宣傳报道，是在資产階級右派野心分子的指使下，歪曲了長期共存。

互相監督方針，企圖把民主黨派引向資產階級的政治方向，要把民主黨派變成共產黨的手和敵手。

歪曲黨的政策，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

5月4日，本報發表了題為“大膽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社論（本報學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執筆，經儲安平親自串閱同意）。這篇社論是本報利用社論形式，向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進行煽動的一篇具有綱領性的文章。

社論中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和“五四運動”相提並論，顯然是原則性的錯誤。“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是人民內部的自由在藝術工作和科學工作領域中的表現”（陸定一）。一個是對敵人的革命運動，一個是人民內部的自由問題。而這篇社論却號召“繼承和發揚五四的文化革命運動的傳統”，把敵我的界限混淆了。不僅如此，社論還把這個政策說成是“波瀾更為壯闊、規模更為宏偉的文化革命運動”和“思想革命運動”，更是对黨的這個政策精神的歪曲。

社論一再說這個政策是為了反對教條主義思想和機會主義思想。但是對於反機會主義思想的這一點，說的不明不白，特別是跟資產階級思想進行鬥爭這一任務，文內根本沒有談到。

社論第二段開頭，是從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在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談起的，彷彿這篇社論是根據毛主席講話的精神來論述的。但是，讀了全文以後，就會發現，這篇社論並沒有正確地根據毛主席講話的精神來闡釋問題，而只是在盡“吹鼓手”的煽動作用。如鑄鐵第三段的末句說：“……體會中央的方針政策的精神，不要作寒蟲，而要鼓起力量，迎接春天。”這就不僅歪曲了中央的政策精神，而且，很顯然是和費孝通這個右派的“吹鼓手”相共鳴，唱同樣的反調。

如果把這篇社論作為一個綱領來檢查本報在這段期間發表的反動報道和文章，那麼，歪曲黨的政策，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我們在這方面的錯誤是最多最大的。在這一系列的宣傳中，着重誇張黨群關係的不正常；其實質就是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煽動知識分子對黨的不

滿。

我們在这里只舉出几篇專論和通訊來作一些檢查。

本報先後發表了費孝通的“早春前後”和范朴齋的“會外之音”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都是執行章羅聯盟拉攏知識分子的陰謀，向知識界做煽動宣傳，極盡挑撥黨和知識分子關係之能事的。在前一篇文章里，費孝通主張要用“互相監督”來揭開“蓋子”，甚至提出“沖開”蓋子。在後一篇文章里，范朴齋惡毒地攻擊了黨員和積極分子，並進一步煽動知識分子要在“鳴”“放”中把“肚子裏的悶氣”“發泄”出來。而這兩篇文章，正是在所謂“春暖花開時節”，亦即毒草滋長的時候，由儲安平親自約來或親自處理的。

為什麼儲安平對於這些反動言論大為欣賞呢？儲安平曾主張光明日報要成為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的講壇。他就是組織、刊載這種反動言論，來盡到他所謂的“監督”的責任。

本報記者所寫的一些通訊中，有不少是有嚴重錯誤的。這裡舉出兩篇。一篇是記者文冰所寫的題為“四顧無知己，比鄰若天涯”的武漢通訊。這一篇通訊充滿了某些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以個別概括一般地渲染了黨對知識分子的不尊重、不信任，把今天廣大知識分子的面貌全部歪曲。這在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上，起了煽動作用。這篇文章的寫法，對於錯誤的意見，完全沒有分析和批判，也沒有發言人的姓名，作者的思想感情與發言人完全取得共鳴。

另一篇，是記者丘林所寫的武漢通訊，報道右派分子馬哲民談武漢為什麼“鳴”不起來的問題。馬哲民對思想改造運動和肅反運動，破口大罵，惡劣透頂。記者不分是非，加以報道。通訊中這樣寫道：“馬哲民教授說：像這樣的苦水和牢騷不讓他們傾吐出來，要他們‘爭鳴’別的問題是很難有真實的興趣和感情的。”全篇談話都是貫穿著惡意和煽動。記者竟然全部有聞必錄；替馬哲民的謬論作了宣傳。

反對黨領導高等教育

章羅聯盟中的一項陰謀，是鼓動高等學校的教授起來反對黨委負責制。儲安平執行了這個陰謀。在這期間，本報發表了不少報道，煽動大

学教授对党不满，反对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引起广泛的恶劣影响。

章罗联盟这个阴谋蓄意已久，他们利用“民盟中央工作简报”（内部刊物，载于5月10日出版的第15期）大胆歪曲最高领导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预先散布谣言，说什么高等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可以考虑加以改变。本报有关同志，在思想上受到影响，竟认为高校中的党委负责制，迟早要取消。本报从5月7日在第一版发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清华大学党委会、民盟、九三学社等召开座谈会的一个报道中，就强调了对高校党委负责制不满的片面意见，并标出了“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的大字标题，做了第一版的头条新闻。此后在若干报道中，一再加以渲染，制造反对党委负责制的舆论，混淆了是非。

在这方面的错误报道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这个报道。这个失实的错误报道，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各地读者纷纷来信反映，有些学校已经因这条消息的煽动，引起了混乱现象。许多读者提出质问，并要求作检查和公开答复。本报已于7月5日就这个错误，发表了检查报告。现在值得在这里着重指明的，是储安平对这个错误始终不肯承认。他不肯发表承认错误的更正消息，反而布置记者去访问陈望道先生，写出了6月5日刊出的消息，如我们在检查报告中所说的，意图掩饰错误。而尤为恶劣的是，他看到人民日报发表复旦大学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的时候，一再和有关同志推敲人民日报为什么要发这条消息，要和人民日报对抗，并在本报部主任会议上说什么“人民日报硬说我们错了”的话，要大家回到各部去传达，以挑拨本报工作人员与人民日报的关系。处理这条消息的，是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他在思想上早就认为高等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毛病”很多，迟早要取消。因而，他对这一稿件，不管其是否可靠，不加核对，也不考虑发表后的政治影响，当作好新闻要记者立即写出。当人民日报指出错误以后，潘文彬仍然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不愿党员同志的忠告，亲自访问了陈望道先生，并派记者访问了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其他人士，意图掩饰错误。尽管结果仍然证明报道是错误的，最后还是按照储安平的意图，写出那样一个似更正非更正，实质上是和人民日报对抗的报道。

更加混淆了是非。这說明了發表这条失实消息的錯誤，原因并不簡單，而是在潘文彬的思想中，对于党领导高等学校，有着錯誤的看法，从而与儲安平有了共鳴。

章罗联盟为了陰謀取消高等学校党委負責制，曾在若干高等学校內，处处点火。方式之一，是叫囂所謂“民主办校”。6月4日，本报报道了北京师大在右派分子陶大鏞主持下召开的座談会的情况，为右派分子張目。此外，“九大城市座談会”中的武汉和广州两个座談会的报道，在高等教育問題上，強調了否定教学改革成績的宣傳。尤为严重的是，在6月12日本报發表的“青島三位学者談鳴和爭”一个报道中，仍然把右派分子陆佩如有关高校党委負責制的荒謬意見發表了出来。

不仅如此，还对于有些大学的整風工作做了歪曲事实、一口否定成績的报道。本报記者徐穎所写的“中国人民大学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一篇报道，就是显著的例子。这篇报道激起了中国人民大学数千同学和教工人員的抗議。

这篇报道，否定了人大几年来全部的成就。認度人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学工作像毒蜂一样在散布毒素，对党员同志竟以最惡毒的詞句来謾罵。对座談会中片面的錯誤意見加以誇張，对正面的善意的批評，只是輕描淡写的一笔帶过。尤为恶劣的是，竟把报道中最坏的形容詞擲出，做了一个聳人听聞的反动标题。这篇报道，从头到尾只顧引用最坏的形容詞来謾罵这所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實質上，一方面是利用反教条主义的口号，来毀謗学习和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障地；另一方面是在党能不能领导高等学校这一問題上，作了“否定”的宣傳。

还有一些报道和文章，对有些学校的整風，起了破坏作用。例如5月9日發表了一篇批評北京师范大学“不肯大胆的放”的报道，說：“外面雷声震耳，师大無風無雨”。实际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会已經組織举行而且在准备有步驟地繼續組織教师座談会，希望听取教师們的意見。这条报道的發表，就与該校的右派分子起了呼应作用，助长了該校右派分子的囂張气焰。繼之于5月22日又發表了該校中文系教授、右派分子穆木天的文章“我的呼吁”。这篇文章以莫須有的事，向該校党委会进行了惡毒的攻击，这就火上加油，使該校右派分子的气焰更高，有

派分子的荒謬言論一度非常猖獗，打亂了該校的整風步驟。

煽動大學生鬧事

到基層点火，到大学中点火，是章罗联盟和其他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陰謀活动。儲安平利用光明日报，在大学生中点了火。在他的直接指揮之下，5月26日發表了“北大开辟‘民主牆’”的报道。儲安平跑到北大看了大字报，回来就通知本报学校教育部立即报道。总編室主任一再向儲提出，这样报道一定会起煽动作用，扰乱整風步驟，对人民不利。但是他完全不理。他說：“是事实就要报道”。爭論到最后，他断然地站起来說，要“考驗考驗”，一定要即日見报。总編室的意見也向学校教育部提出，有关同志說，“学生压力太大，不报道不行了。”“群众已經跑在前面了”报纸落后了！”这个报道是由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亲自执笔的，他說要尽量向健康方向引导，強調不誤學習帮助整風。但是，尽管他“煞費苦心”，一点也不能避免这个报道的强烈的煽动作用和恶劣后果。

“北大开辟‘民主牆’”报道見报的第二天，儲安平在到清华大学和錢偉長談話之后，又指揮学校教育部报道清华大学学生的鳴放。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和一些記者写出了清华等九大学学生鳴放的报道。儲安平要立即發表。总編室主任提出坚决反对，發生了兩天的兩次大爭論，第二次潘文彬在場，他也提出“部里的同志都主張發表”。經過这样劇烈的斗争以后，潘文彬始推故把这报道拖了下来沒有發表。

在北大民主牆的报道中，突出地反映了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領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民主集中制的陰謀。諸如“出席团代大会的代表如何产生”“选拔留学生由党团员包办”，“畢業生分配工作对党员分配好的崗位”，“把政治課改为选修”，“取消学校中的党委負責制”等等。这些意見，有的是歪曲事实，有的是对党的惡毒进攻。

在报道中，有着“据聞江隆基副校長也表示欢迎”的語句。这样的报道方式，正符合了右派分子篡改本报政治方向的办报方針。右派分子所采用的惡毒手段之一是向党“將軍”，而这样的报道就正好符合了这个要求，向北大党領導將了一軍。同时又等于向各地学生暗示（也可以

說是明告)：“党欢迎这样做，可以大搞”。这是十分明显的錯誤。

北大开辟“民主牆”的报道發表以后，在不少地方的大学里起了煽动作用，这个报道向那些学校的右派分子散播了对党进攻的惡毒方法，使得許多大学生受了迷惑，在那些学校里造成混乱。这里，也不能不指出，当时在章罗联盟控制下的两个报纸——文匯报和光明日报，在这个反动宣傳上是相互呼应的。本报發表这个报道之后，文匯报接連發表了北大学生鳴放的报道。只是在本报内部进行了斗争之后，本报在这方面进一步的煽动才被制止了。

宣傳資產階級办报观点

大家知道，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为了遂行其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陰謀，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傳播資產階級办报观点的謬論，夺取新聞界的領導权。儲安平在本报一方面坚决貫徹他的資產階級办报路綫，一方面对于宣傳資產階級办报观点的报道和文章，特別感到兴趣。而部分記者和編輯，同儲安平有着不同程度的共鳴，因而也在报道上和組織上犯了錯誤。

在这一段期間里，我們發表了首都記者座談会的报道，突出地表現了新聞記者應該是“無冕之王”的思想感情；又會發表了第一次新聞工作座談会的几个报道，突出地宣傳了这次座談会对新中国新聞工作全部否定的荒謬論点。

关于第一次新聞工作座談会的报道，錯誤是严重的。在有关工作同志与右派分子共鳴的基础上，強調地宣傳了“老报人慷慨陈詞”，渲染了反动統治时期的中国旧报傳統；傳播了許多含有毒素的資產階級办报观点。例如，在5月17日發表了題为“三大主义阻碍了新聞事業的發展”的报道，文中說：“三座大山限制了新聞自由”，要党“开放綠灯”，有害地宣傳了資產階級新聞自由。尤其严重的是，主持这个采訪工作的記者主动向張友聲索取了“是蜜蜂，不是蒼蠅”的發言稿，而这篇文章所宣傳的正好是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夺取新聞界領導权的企圖而立言，也正好为右派分子把本报办成为一張反对派的报纸、和党报“唱对台戏”的陰謀，作了宣傳，因此，儲安平大加“賞識”，亲自处理發表。

反动的编排手法

在備安平反动的办报方針的指导和影响下，本报編輯工作人員采取了一系列反动編排手法，使得其源出于意罗联盟的“黑云”，籠罩了这一时期的整个版面，对党在八年来領導六亿人民建設新中国的偉大成就的真相，起了遮天蔽日的作用。

林茵同志在解放軍报所發表的“希望光明日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对本报所提出的批評是正确的。在这一段時間里，主要的錯誤，除了林茵同志所指出的：通过对新聞內容的取舍、通过对新聞标题的加工和制造假新聞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假借“不願發表姓名”的方式，發抒記者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新聞內容的取舍方面，誠如林茵同志所指出的，是采用了兩种方法：一种是只刊載适合右派观点的新聞，不刊載和右派观点相反的新聞。只报憂不报喜，只談缺点不談成績。在刊登各方面帮助党整風的會議新聞中，有許多标题都是直接引用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动論点，或摘取有些發言中比較偏激的言詞作成的。如5月16日当作一版头条处理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談会新聞，就作了个“批評‘三大主义’和‘四大偏差’”的主题。其实，在这个座談会上提到所謂“四大偏差”的只有一人。另一种方法是片面地报道各种座談会的新聞，只报道适合右派口味的發言和意見，不报道不适合他們口味的發言和意見，有的以“摘其所要”的态度，对不适合口味的發言和意見任意删削，甚至有的时候顛倒是非，把少数人的意見說成是多数人的意見，把多数人的意見說成是个別人的意見。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可以說，九大城市座談会的报道是集这类錯誤之大成。

又如林茵同志所提出：“在利用新聞标题来宣傳右派观点方面，光明日报作得更为出色。”“許多标题是抽取發言人的个别較偏激的言詞写成的，有的适合右派分子口味的發言就用極鮮明、肯定的标题，不适合他們口味的發言就用很模糊的标题。”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的領導，特別抓住了宗派主义这一“要害”进攻，強調所謂“党群关系”，而我們的新聞标题也跟着突出和夸大了这一点，几乎用尽了“高牆深溝”“密云不雨”等極其夸張的詞彙。5月21日發表北京航空学院鳴放座談

會的新聞，竟篡改了發言人的原話，標上了“在黨群之間有一座‘萬里長城’”的標題。甚至還有“堅決相信共產黨大膽揭露矛盾，有人害怕報復要農工民主黨掌腰”這樣的符合右派分子反黨陰謀的標題。在5月15日人民日報刊出題為“清華園教授開懷暢談”的新聞後四天，本報竟發表了挑釁性的報道，並且作了“清華大學教授尙未開懷暢談”的標題，企圖抵消人民日報的正確報道。這就符合了儲安平的和黨報“唱對台戲”的辦報方針。這些新聞都是以三欄以上的大字標題分別在一、二版顯著刊載的，從而就更為擴大了它的惡劣影響。

還有一種反動編排手法，就是突出反面論調，縮小正面意見。編輯在選稿和標題上，惟恐反面意見不突出。例如關於中共中央統戰部座談會的報道，一些右派分子發言中的最反動的部分，都被概括出來放在標題上，獨有對革命前輩何香凝忠告右派分子的正面意見，卻採取了迴避態度，只是作了一個“何香凝書面發言”這樣輕描淡寫的標題。在處理工商界座談會的報道上，也有突出的例子。例如對李康年所謂“定息二十年”的建議，版面上不但一再出現“認為給二十年定息才是贖買到底”之類的標題，並且在一版還報道了一個上海居民支持李康年的建議的來信。對於工商界其他右派分子如董少臣、畢鳴岐等，也被當作正面人物處理，見之于標題的是“關於撤出公方代表的建議，董少臣重新加以解釋”“畢鳴岐對千家駒的意見展開論爭”。

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做好社會主義報紙的工作

我們以沉痛的心情，對編輯工作進行了檢查以後，認為章伯鈞、儲安平篡改本報政治方向這一嚴重罪行，是屬於章羅聯盟政治陰謀的組成部分，已由各民主黨派中央向章伯鈞、儲安平追究政治責任，並將作出嚴肅的處理。對於前面所述一系列的反動宣傳，從我們編輯部工作同志來說，也犯了不同性質的、不同程度的錯誤。

應該指出，在儲安平開始抓業務以後，特別是黨的整風運動開始以後，儲安平的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面目日漸暴露出來，在有些問題上編輯部同志同他開始進行鬥爭。在儲安平指揮組織九大城市座談會的過程中，有的同志就提出過不同的意見，而儲安平不予採納。又如發表“北

“大開辟民主牆”報道的時候，也曾提出反對意見，更遭到了他粗暴的拒絕。在發表了這個報道以後，儲安平還要發表北京九個大學學生鳴放的報道。並且，搬出錢偉長右派分子這個臭招牌，說錢偉長主張報紙應當組織中小學教師和工程技術人員的鳴放座談會。為此，總編室主任同他接連進行了兩次堅決的說理的鬥爭。北京九個大學學生鳴放的報道因此壓了下來，組織中小學校教師座談會的計劃也沒有布置下去。正是在這之後不久，儲安平猖狂地發表了“黨天下”的謬論，從而使編輯部的同志們大為清醒過來。

可是，另一方面，儲安平執行章羅聯盟改變光明日報的政治方向的陰謀，在這一段時期，還是達到了目的。

現在檢查起來，我們主觀認識上有些什麼問題呢？編輯部同志對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對於鳴放的政策，都沒有來得及進行認真的學習，理解得很不深刻或很不全面。而儲安平對於黨的方針政策則一律視為教條主義，根本否定。他在布置工作的時候只強調大膽揭露。許多記者、編輯同志在進行工作的時候，思想認識上很模糊。我們報紙在這一時期里，版面上一片“春寒”，記者和編者把章羅聯盟的“吹鼓手”們所煽起的這類毒化氣氛的情緒，用自己的口吻寫進報道，寫上標題。不分是非，不分香花和毒草，只是一股勁地鼓吹大鳴大放。許多同志在檢查這一時期的工作中發現，當時完全迷失了方向，感到痛心。

還必須嚴肅地提出來的是，在我們編輯部同志中，竟然出現了這樣幾個人：他們在暗雲翻滾的那些日子裡，倒向右轉，伙同儲安平一氣，“合作”得很好。他們或者在思想上與右派起共鳴，熱心“揭露”，大唱反調；或者在採訪工作中用“有人說”、“據說”等方式，抒發自己的牢騷和不滿，甚至無中生有，暗放冷箭；或者在編輯部內和儲安平互相唱和，共同策劃。這就使編輯部一時竟邪氣上升，迷亂了不少人的眼睛，使得不少同志做了右派反動宣傳的工具。

回顧我們在這一段時期所犯的錯誤，暴露出我們編輯部的大部分同志身上所有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的嚴重性，表現了思想立場的模糊和動搖，在某些問題上或者在某些時候不能分清是非，因而犯了大量的不同情況的錯誤。

光明日报自1949年6月16日创刊以来，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1954年，中国共产党应民主党派的要求，派了共产党员来担任总编辑和副总编辑，两年多来本报全体工作同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出了成绩。储安平来担任总编辑以后，党员负责同志们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使他在很短时间内做到有职有权，顺利地开展工作，而他就很快地利令智昏起来，偷天换日地利用鸣放政策和党的整风，篡改了报纸的政治方向。我们的不少同志也就是在离开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犯了一系列的错误的。

根据这一惨痛的教训，我们要庄严地指出：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一定犯错误。作为各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是一张革命的社会主义报纸。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现在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来办这张报纸，是为了各民主党派中央更好地运用这张报纸，使这张报纸更好地起它应有的作用，进一步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我们就要更好地争取和接受党的领导。我们全体同志宣誓要忠心接受党的领导；并要求党对这张报纸加强领导、监督和帮助。

我们通过检查自己工作上的错误，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如果不彻底进行思想改造，不把根本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不同工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末，知识分子必然要犯错误。我们编辑部同志中，大部分是从旧社会来的，一部分是青年学生。几年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来，我们在党的直接教育下，虽然提高了政治认识，但是在我们的头脑里还有很多资产阶级的东西，思想立场的锻炼还很不够，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的情况也不一样。因此，在当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煽起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风黑浪时，编辑部工作人员中间，竟有个人表示狂热的支持，也有不少的人在思想上起了共鸣，更多的人受了蒙蔽，迷失了方向，混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做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论者的俘虏，或多或少犯了一些错误。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进行检查、批判的。

过去的错误是无法挽回了，我们的任务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从错误中进行学习，利用自己的切身经验，来教育自己。

本报政治方向一度被右派分子篡改的事件，经过全体工作人员严肃的批判以后，特别是经过这次检查工作以后，“立场是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中这一段话，对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勉励和支持。我们将继续努力，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批判我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坚持发扬人民报纸的光荣传统，以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我们报纸办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报纸。人民日报社论同时指出，本报在编排技巧上“略嫌不足”，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我们将努力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学习其他报纸生动活泼的经验，弥补自己的缺陷。

我们热诚地期待读者进一步地给予帮助。

(光明日报7月15日第1、3版)

关于“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报道 错误的检查

光明日报编辑部

6月2日，本报在第一版上刊登“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一稿，6月5日又在第一版刊登“陈望道谈加强校务委员会问题”一稿，这两个报道，是在右派分子篡改本报政治方向期间，本报发表的许多错误的煽动性的报道中一个突出的事例。

第一个报道是不真实的。复旦大学加强了校务委员会，但党委制并未取消。储安平看过这条稿子以后特别重视，指定登在第一版的显著地位。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真实报道并指出光明日报的错误后，储安平立即亲自布置工作，硬要把这一报道说成没有失实，表示要和人民日报作斗争。他亲自指挥记者再度访问陈望道先生，访问参加那次座谈

会的其他人士，并打电报給他在上海的朋友了解情况，更要向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新华社提出要求：不要广播人民日报的报道。最后在儲家里审稿，由儲亲自加上了“陈望道談加强校务委员会問題”的标题，于6月5日，刊出第二个报道。这个报道实质上不是更正錯誤，而是企圖利用陈望道先生的談話来掩飾錯誤，造成一个似更正非更正而又無法再更正的局面的报道。这就更加混淆了是非。当第二个报道發稿时，总編室值班的負責同志，看出这条稿子的錯誤，但因这条稿子是总編輯儲安平亲自处理和决定的，不能加以修改，不得已临时加上了一个副題“复旦大学党委制并未取消”，也未能从根本上糾正第一次的錯誤报道。右派分子發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的时候，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制，是右派分子企圖夺取党对文教事業领导权的一个重大步驟。这就是儲安平为什么特別喜欢这个失实的报道，并且紧紧抓住这个失实的报道，来向党进攻的原因。

造成这个政治上的錯誤的原因，还由于直接采訪与处理这个报道的同志，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新聞观点与思想立場的模糊。在右派分子篡改本报政治方向的时候，他是竭力企圖利用編輯記者中的资产阶级新聞观点的。儲安平来到本报以后，一再宣傳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和作风，強調“充分揭露”，強調搶新聞，強調独家新聞。在儲安平这样錯誤方針的鼓动和影响之下，負責这一报道采訪工作的同志摘取片言只字，不加核对就写出了这一条根本不是事实的“新聞”。这样做的时候，沒有認識到这样的錯誤报道的政治影响，只顧搶“独家新聞”，違背了新聞真實性的原則。当儲安平布置第二个报道的采訪工作时，有关工作同志仍然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反而不顧总編室和其他同志的劝阻，听从儲安平的指揮，再度訪問了陈望道先生，并訪問了参加那次座談会的其他人士。結果仍然証明自己的报道是錯誤的。尽管如此，最后还是符合了儲安平的意圖，写出那样的更加混淆是非的报道。这显然是十分危险的錯誤。

在这两个报道發表后，我們接到全国各地讀者来信几十封，指出錯誤的严重性，并給以严厉的批評。这給予我們檢查工作以極大的帮助。我們在这里向这些同志致謝。

通过对这一錯誤报道的檢查，使我們进一步認識到，在右派分子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期間，我們工作中暴露出来的資產階級新聞观点的严重性及危害性。这种观点如果不坚决糾正，它将会給我們的工作帶來莫大的損害。这是我們对这一錯誤报道严肃地作了檢查后所获得的一大教訓，我們当以此教訓鞭策自己，在党的领导下，真正办好这一張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的报纸。

現在我們正在檢查本报政治方向被篡改期間的錯誤，誠懇地要求讀者給以批評和幫助。

讀者对光明日报刊登“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負責制” 的錯誤报道的批評

本报在右派分子一度篡改政治方向期間，于6月2日刊載了“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負責制”、6月5日刊載了“陈望道談复旦大学加强校务委员会問題”的报道。这个失实的和錯誤的报道，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各地讀者紛紛来信反映，由于这条采訪失实的消息在部分高等学校中所引起的混乱現象，并提出質問，要求作檢查和公开答复。本报除已作出檢查外，認为讀者在来信中所提出的意見和批評是正确的，現在特將讀者来信摘要發表如下：

武汉水利学院学生聶天慧等八人来信說，这条不真实的消息，在武汉产生了严重后果，武汉大学一部分学生，曾經以此为根据，要求該校馬上取消党委制。武昌刘文才等五人来信，也揭發了武大学生根据报纸要求“向复旦学习”的事实。中南政法学院李明政等十二人来信指出：光明日报在高等学校讀者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負責制”这条失实的消息，在讀者中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对此感到十分遺憾。他們說，作为光明日报的讀者，有責任，也有权利向本报提出真摯懇切的批評。江西师范学院易至崗来信說，人民群众是非常喜爱自己的报纸的，这种喜爱是建筑在“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基础上的。但是作为人民的报纸的光明日报竟刊登了“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負責制”这一不真实的消息，这就很难理解。来信并質問：不知道刊載这条失实的消息用意何在，希望本报公开檢查，以免丧失报纸在群众中的威

信。东北人民大学朱胜谦、赵凤彬来信说，看到“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大部分同学感到惊讶，并一致认为这是实际上取消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众议纷纷，引起不良影响，他们说：我们一直在等待贵报对这一错误的报道作公开说明。但是，遗憾的是：贵报在6月5日刊载了记者再度关于这一问题的报道，只是说“本报所刊新闻与陈望道校长的谈话有些出入”而不直接承认这条消息的错误和由于错误的消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来信并认为：这种消息的刊出是别有用心。西安建筑工程学院顾鸣来信质问道：“为什么这样重要的消息不询问陈望道校长的意见就马马虎虎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刊载呢？这条消息，内容是荒谬的，是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是和储安平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分不开的。”江西干部文化学校陶文治来信说：“有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就有复旦取消党委制的新闻相呼应，配合得真巧妙，目的无非是希望其他各校向复旦效尤，向储安平所指的方向前进。”兰州大学孙白筠提出三点质问：1、刊登不符事实的报道为什么不道歉？不公开检讨？2、这样一种牵涉到制度问题的消息，为什么不核对？3、为什么不大胆承认错误而要扭扭捏捏地再度访问陈望道，是否企图混淆舆论视听？东北人民大学石志刚等四人来信表示遗憾地说：“我们认为新闻自由，决不是有‘捕风捉影’的自由，这种不符事实的消息是有损光明日报信誉的”。哈尔滨外国语学院“鸣与争”快报编辑部来信说：“这样重要的消息竟会报道错了。并且在发表这条消息时放在最醒目的地方，但是所谓更正的消息，却写得含糊其词轻描淡写的不负责任，这不能不叫人怀疑你们这样作的用意何在。”（光明日报7月5日第3版）

希望光明日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林 茵

自从我们党开始整风以来，光明日报用许多篇幅报道了各地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批评和意见，揭发了不少问题，起到了帮助我们党整风的作用。我读了也感到很有益处。

但是，当我仔细阅读反复回味光明日报的一些报道的时候，常常感

到它在帮助党整風的态度上是有問題的，有借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傾向。具体地說，經過編輯的“加工潤色”以后，合乎右派分子口味的东西突出了，不合乎右派分子口味的东西淹沒了，給讀者的印象是絕大多數民主人士都是右派，他們都反对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不願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了。我覺得，光明日报似乎已經为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所利用，沒有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的报纸。作为光明日报的一个老讀者，不能不給光明日报提一点意見和希望。

根据我的观察，右派分子利用光明日报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对新聞內容的取舍，二是通过对新聞标题的加工，三是制造假新聞。

在新聞內容的取舍方面，我發現光明日报采用了两种方法：

一种是只刊载适合右派观点的新聞，不刊载和右派观点相反的新聞。如5月23日新华社所發广州市合营企业工人座談反对撤出公方代表与定息二十年的新聞，5月27日新华社所發民建全国工商改造輔導座談会上民建副主任委員李燭華的講話（內容是反对定息二十年，要求工商業者一面帮助党整風一面加强自我改造，并要求他們跟着共产党走，逐步树立社会主义思想）的新聞，光明日报都未刊载。甚至北京师范大学校長陈垣認為不能取消学校中党委制的意見，虽然該报記者約他写去，也未發表（見6月11日人民日报三版陈垣的發言）。

另一种方法是片面地报道各种座談会的新聞，只报道适合右派口味的發言和意見，不报道不适合他們口味的發言和意見，而且有的时候顛倒是非，把少数人的意見說成是多数人的意見，把多数人的意見說成是个別人的意見。如5月14日光明日报第一版的头条新聞“在民建中央和民建北京市委召开的會議上工商業者对有关資產階級政策的几个問題發表意見”，就和新华社5月13日所發新聞稿有很大出入。其中，不仅是只报道了“关于定息二十年的爭論”，沒有报道“关于贖买从那一年算起”、“指定專業銀行發放利息”、“建議改公私合营的牌子为地方国营”等言論，使讀者不能窺見工商業者的思想全貌；即在关于定息二十年的爭論的报道中也是竭尽歪曲之能事，把个別人贊成定息二十年（这在該报道中可以看出）写成“会上有不少人贊成李康年的意見”，把多

數人不贊成定息二十年（从該報道中也可以看出）写成“有幾位的發言，不贊成二十年定息”。再如許廣平在中共中央婦委和全國婦聯黨組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的後一部分，在我看來是非常正確也是極其重要的。她說：“目前有人說：三反、五反、肅反是共產黨整我們，現在我們整共產黨，因此，只要提反面意見，不提正面意見。有人說：周建人和李毅在統戰部召開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發言，正面意見多了，是過右了。我看不對。共產黨整風，是為了搞好工作。搞好工作，對全國人民有好处，不是誰報復誰的問題。有人說：要加強法制，我認為加強法制是對的，但是不能說我們沒有法，我們要的是社會主義的法，不是資本主義的法，有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的法，要資本主義的法，所以才大談其法。我認為：只提壞的，不提好的，反而擴大了‘牆’‘溝’，非黨人士要是真正跟黨走，就沒有‘牆’、‘溝’，否則就有。還有人主張取消學校中的黨委制，我認為沒有大公無私的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堪設想的。……”（見人民日報6月4日第二版）但是，光明日報的報道（6月4日一版）把這一部分完全刪去了，並且連簡單透露一下這種意思的字句都沒有。很显然，光明日報編輯部是想用這種片面報道，來使讀者相信，許廣平和右派之間，好像是沒有什麼原則區別的。

他們這樣片面地報道新聞，和右派分子所說的“只提缺點不提優點，才符合整風精神”不正是完全一致的嗎！

在利用新聞標題來宣傳右派觀點方面，光明日報作得更為出色。只要翻一翻近一個月來的光明日報，就可以發現，許多標題是抽取發言人的個別較偏激的言詞寫成的，有的適合右派分子口味的發言就用極鮮明、肯定的標題，不適合他們口味的發言就用很模糊的標題。這樣的例子很多，我只舉一個例子，以見一斑。如前述5月14日光明日報第一版頭條新聞中，贊成二十年定息的發言，小標題是“認為給二十年定息才是贖買到底”，這多麼鮮明而肯定呵！可是，反對二十年定息的幾個發言，小標題却是：“經濟和政治上的得失”、“一個尖銳的反對意見”、“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問題”，這又是多麼含糊呵！

在製造假新聞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6月2日關於復旦大學取消黨

委制的报道，消息中还居然說这个事情是复旦大学校長陈望道說的。这种假造新聞显然是別有用心的。人民日报揭露以后，光明日报才更正，而且沒有作任何檢討。我真替光明日报擔憂，我怀疑光明日报上报道的許多民主人士在各种座談会上的發言，有沒有同样被歪曲的地方。

以上这些，說明光明日报近来确实是处在右派的影响下，散布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毒素。

最近，看到光明日报編輯部同人为了維護光明日报的政治威信，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向总編輯儲安平的错误进行了激烈批評的消息，我很兴奋。看来，他們中的絕大多数人是竭力想摆脱右派的影响，使光明日报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的报纸的。

但是，从最近几天（到写这篇文章的时间——6月13日止）的光明日报来看，右派的影响仍然很大。如盧郁文收到恐吓信（6月7日公布的新聞），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各个报纸都表示極为憤慨，但是光明日报除了在6月9日第二版的次要地位發表了一則“民革领导人痛斥匿名信”的簡單新聞外，迄今一直未表示态度。又如从6月8日起，各报都刊載了許多觉悟的工人、农民对反社会主义言論的反击，光明日报却除了在6月10日刊載了新华社所發的鞍鋼、天津工人起来应战的兩則新聞（而且放在次要地位）以外，迄今也未表示态度。再如6月10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刊載的“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談会”的报道，仍然表现了片面取舍的手法。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我看到民盟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員吳晗在会上強調指出“要站在人民的立場来帮助党整風，不利于人民的言論，我們是不能同意的”、“凡是不要党领导、拒絕党领导，都是錯誤”、“帮助党整風，是为了向社会主义方向迈进，凡是違反这个方向，都是錯誤的”等，光明日报却輕描淡写地几笔帶过去了。許多教授在会上也都強調指出应有这种帮助党整風的态度，光明日报則根本沒有提及。此外，吳晗在座談会上說：“我对于章伯鈞、罗隆基、儲安平的意見，完全不同意。”但是，光明日报在报道中却刪去了章伯鈞和罗隆基的名字，并把“完全不同意”改为“對他們某些論点，我根本不同意”。吳晗所指出的，他們的意見所以是錯誤的，是“因为他們的意見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光明日报也避而不提，只籠

統地說：“這種言論，應該批判，應該與他爭辯。”同時，光明日報還比較詳細地報道了個別人對儲安平“黨天下”說法的辯解，而對於批評儲安平的意見，則用“還有好幾位在發言中，都表示不同意儲安平的‘黨天下’的說法”簡單一句輕輕帶過。這些，不是明顯地表現了：直到最近，光明日報仍然在右派的影响之下嗎？

光明日報是社會主義民主黨派的報紙，不是少數右派分子的報紙。我很同情光明日報編輯部同人的處境，希望光明日報能早日擺脫右派分子的影响，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

（解放軍報6月15日第4版）

徹底檢查篡改光明日報政治方向的責任

高天

右派分子篡奪光明日報

光明日報前一個時間內曾被右派分子所篡奪，離開社會主義軌道，走上資產階級的政治方向。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政治問題。

儲安平是有一套辦報的方針、路線的。這就是反社會主義的方針、路線，和他的“黨天下”謬論完全一致，而和社會主義的民主黨派的方針路線是完全背謬的。

本年4月到6月初，他在光明日報工作，宣傳和貫徹他的辦報主張，這就使光明日報在這一個時間內離開了社會主義的軌道，走上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方向。

他一到報社就宣傳向解放前的舊報紙學習，向文匯報學習。他否定人民報紙的指導作用、教育作用，否定人民報紙宣傳黨和政府的政策的任務。他說，黨和政府同報紙之間存在着根本矛盾，就是報紙要登、黨和政府不許登。報紙要“代表”群眾，就和政府有矛盾。他把報紙同黨和政府對立起來，把群眾同黨和政府對立起來。他說，光明日報過去“教育多了，代表少了，”他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求記者們去“坐滿

發掘人民生活（如物價）中的問題”，從政治上進行“監督”。

他強調民主黨派報紙和黨報的不同，不顧它們之間의 共同利益、共同立場，不顧社會主義的共同基礎。他說，光明日報要成為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的講壇，就要主動組織推動他們對共產黨發言。前一時期，他要去報道和“推動”基層的鳴放，就堅持說“我們和黨報不同”，我們根據黨的政策精神，向他反復說明整風是有領導有步驟進行的道理，反對這樣做。他很不滿意，說：“教條主義就是這樣的，陳其邁就是這樣的！”

他說，光明日報過去的社論，不是教條主義的，就是歌功頌德、講共產黨好話的。”他反對這種社論，但是，他又認為他所謂的“代表”“監督”的社論不能寫，因為民主黨派有八個，是八個婆婆，各民主黨派的中委有幾百個，是幾百個婆婆。要寫他那樣的評論，只有個人署名。他否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共同立場，也否認各民主黨派的共同立場。這是露骨的挑撥和誣蔑。

他不承認黨對報紙宣傳的領導。有人問他，宣傳上的重要問題是不是要和中共中央宣傳部聯繫，他說，我們民主黨派報紙用不着。在寫肅反具體問題的報道和推動基層“鳴放”的報道時，他是不管黨的領導，不管黨的方針政策的。在發了基層“鳴放”的一次消息之後，群眾非常不滿，但他還要堅持繼續報道。有人說，這是在鼓動“大民主”。我們請他考慮這樣報道對社會主義、對國家人民有利不利的問題，他說：“是事實我就要發表！”

黨對光明日報要民主黨派獨立自主去辦，他大加歪曲。他說：“這句話說的好，我倒要看看怎樣護我獨立自主，我要看到什麼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進。我要碰，要扛一扛風浪，要看到底會碰到多少暗礁”他所謂的“暗礁”，就是指的我們根據黨的政策、社會主義利益向他提出的不同意見。

他在國際宣傳上，主張直接用資本主義國家的電訊，採用資本主義國家報刊的評論，多登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黨的消息，少登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消息。這種做法和我們的國際宣傳方針正相違背，對我們的外交鬥爭和國際團結將產生很壞的影響。

在民主黨派和社會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宣傳上，他採取的是“只管揭露”的方針。他說“揭露是我們的目的，分析和解決問題是共產黨的事。”在這種方針的指導下，他派記者到九個城市組織座談會，“推動鳴放”。他的指示是“要找意見多而又敢說話的人”，這樣組織的結果，發表了十幾萬字的座談記錄，登了十幾個整版。給人的印象是把新中國塗得一團漆黑。無怪乎有人說，光明日報這樣做是處處點火，擾亂整風步驟。在我們發現了問題向他提出不要繼續亂搞時，他不予理會。

在光明日報登了批駁錯誤言論的文章的那幾天，他說，“這幾天我們鬆了。”他對這些文章很不滿意，立即提出要考慮記者能不能直接約稿的問題，並且決定所有的文章，都要先送他審閱。他對取消學校黨委制的說法特別感到興趣，甚至消息登錯了也不承認，反而要制止新華社廣播指出這個錯誤的新聞。

他常說，“我們跑到人民日報前面了”，現在看得很清楚，那時光明日報“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儲安平這種方針和做法，是得到社長章伯鈞同意的。儲安平說他和羅隆基談過光明日報的問題，談到怎樣“監督”、肅反問題和十二個副總理的問題。很明顯，對於他的辦報方針和他在统战部座談會上的發言，章伯鈞和羅隆基要負嚴重責任。

這裡補充一點事實。羅隆基向他推薦陳新桂到光明日報工作，說陳新桂在民盟“理論”是最高級的。他打算找陳新桂到光明日報主持評論工作。陳新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大家都知道了的。這個打算如果實現，光明日報就要更加徹底的成為右派分子的工具。

章、羅等右派野心分子篡奪光明日報的野心是十分明白的。

有的同志質問儲安平，要把光明日報帶到那裡去？大家反對把光明日報從社會主義軌道上拉開。同志們要求討論光明日報的方針問題。他說，方針是領導決定的，不要大家討論。同志們多次要求召開社委會來討論方針問題，他也不理。他的這個方針是領導決定的，決定這個方針的就是社長章伯鈞。

我們要問，是誰把光明日報帶到背離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政治方向？他們的目的何在？我們要求民盟中央徹底檢查，追究政治責任！

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民盟的右派野心分子，利用民盟联系高级知识分子的条件，提出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几百万民主党派成员和党派退出学校等种种荒谬主张，企图割断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联系，挑拨破坏党同知识分子的团结，这样来反对党的领导。用心十分险恶。

我们应该认清，反右派的斗争，决不是什么思想问题，而是政治立场问题，是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

民盟是有着反右派斗争的光荣传统的。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民盟曾在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当中，从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一定要响应盟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我们一定要在全盟展开反右派的斗争，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给这些右派野心分子以坚决的打击，坚定不移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光明日报 6月19日 4版)

光明日报编辑部

为什么不检查6月7日的座谈会

大 纯

光明日报编者按 大纯同志对本报检查工作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我们诚恳接受。

关于6月8日见报的设计人员座谈会的报道，是和章罗联盟在科学工作上向党进攻的阴谋分不开的。储安平在和右派分子钱伟长商量之后，回来就布置召开产业部门工程技术人員座谈会。他原来的计划要按部门召开，座谈纪录全文发表。经有关工作同志的反对，才改变了办法，邀请冶金、机械、石油、电力四方面的设计人员、研究人员、部局和厂矿的工程师，开了四次座谈会，用新闻形式发表。除设计人员座谈会见报外，其余三个座谈会的报道经编辑

部压下，沒有發表。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備安平等右派分子想在工程技术界点火的野心。

備安平布置的这个座谈会报道的發表，是本报政治方向被篡改期間的一个重要錯誤。最近本报編輯部对此已作了檢查，但在本月15日發表的檢查报告中，由于編写的疏忽沒有列入，这里特向讀者补充彙报，并向大純同志致謝。

6月上旬，北京举行了一个重要會議，就是国家建設委员会、国家計划委员会和国家經濟委员会联合召开的全国設計會議。全国一百多个設計院的九百多名設計工程师、总工程师、設計院負責干部出席了會議。国务院兩位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亲自指导大会的进行。这个大会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的設計工作，解决設計工作中一些重大的方針問題，为执行第二个五年計划作好准备。这个大会的本身，就是一个偉大的成績。旧中国那朝那代有过一百多个設計院？有过十二万多的勘测設計人員？那年那月召开过这样大的設計會議？关心祖国社会主义建設的人們，不能不关心这个會議，不能不为召开这样的會議而欢欣鼓舞。

但是，人們料想不到，一部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也特別关心这个重要的大会。不过他們的关心和全国人民所关心的完全不同。他們不是关心我国設計工作在極短期間的成就，不是关心如何开好这次設計會議，如何准备第二个五年計划，而是关心如何否定設計工作的成績，如何在設計人員中点火，抵消这个設計會議的作用。于是与全国設計會議平行的一个會議在北京召开了。

6月7日，正是全国設計會議胜利閉幕的这一天，当时充当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喉舌和尖兵的光明日报編輯部在萃华樓和設下山珍海味的同时，設下了一个陰謀詭計。他們召集的設計工作座谈会开始了。会上一片否定我国設計工作成績，煽动設計人員对領導不滿，对國家不滿的狂言滔滔而出。

这个陰謀，在6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揭開了。这一天光明日报在第一版用了一千七百字报道了有九百多人参加的、开了一星期以上的、討論了重大設計方針問題的、兩位副总理講話的全国設計會議，同时却用了一倍以上三千七百字报道他們自己召开的只有一小撮沒有代表性的設

計人員參加的座談會。

當然，我們不應當完全以報道字數的多寡來評價一個會議。現在我們來看看會議的內容。

在全國設計會議上大家一致肯定幾年來我們設計工作成績是主要的，基本的。指出否認這些成績，就是否定全國人民辛勤勞動的結果。可是這個基本內容，在光明日報的標題上完全沒有表示出來，甚至連全國設計會議的字樣，都沒有出現在他們的標題上，這是他們對全國設計會議的報道。他們盡量使人感覺不到中國召開了這樣一個大的重要的會議。

他們對自己座談會的報道，使用了另外一種手法，盡量使人感覺我國的設計工作全是錯誤，而毫無成績。他們用大字標題標着“設計工作脫離實際，變化太大”，又用小標題標着“設計工作為什麼脫離了中國實際”“設計方案多變，造成嚴重浪費”“黑色冶金設計院機構擁腫人浮于事”等等。

他們大量報導歪曲事實，一筆抹煞設計工作成績的言論和煽動設計人員對領導不滿的言論。在他們座談會的報導中，對設計工作的成績只字不提，他們用“設計工作脫離中國實際，設計工作變化太多太大，以致造成大量工時的浪費，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國家建設”來抵消全國設計會議“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的估計。在全國設計會議上，大家肯定了幾年來在設計上我們向蘇聯學習是完全正確的，正由於向蘇聯學習了設計的本領，現在我們有許多工程，已經可以自己設計了。而設計座談會却用“過去學習蘇聯是教條主義的，是照搬過來的”，“所以產生教條主義，責任在於領導”，“領導外行居多，又沒有很好地和內行結合，沒有說清楚應該怎樣學”，“不教條就完不成任務”，來全盤否定向蘇聯學習的成績。

這個座談會是針對冶金工業部設計工作開火的。他們極盡歪曲和挑撥之能事，說什麼“冶金工業部領導上從來沒有向設計人員談過根據我們國家情況，應該按什麼標準來進行設計”；“化學工業部的化工設計院所作的初步設計，沒有一個有用”，“撫順鋼廠搞了六次設計，現在連項目也取消了”；設計上的“錯誤”是因為共產黨的宗派主義，沒有“很早就把有經驗的技術人員吸收來參加領導”。企圖用這些謊言，挑

起設計人員對領導的不滿，配合他們在全國範圍所進行的以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為借口的推翻共產黨對技術部門領導的陰謀。

他們對黑色冶金設計力量的迅速成長這一個值得高興的事情是仇恨的。故意誇大黑色冶金設計院組織機構上的個別缺點，把它渲染成“機構臃腫人浮于事”“黑色冶金設計院有四、五個處，四十多個科，設計院有處，是天下奇聞，非生產設計人員占了60%（其實那里的非生產人員不到40%，目前還正在實行精簡——作者注）。說起來很吓人，也很丟人”。

值得注意的是6月6日章伯鈞召開了北京六教授會議，他們在會議上一致認為“天下要大亂了”，6月7日就召開了設計座談會，向設計部門點火，人們完全有理由懷疑這不是偶合，而是一個有計劃的陰謀。

6月13日新華社發出了我國設計水平迅速提高的新聞稿，各大報都有登載，這本來是光明日報檢討錯誤的時機，但光明日報却不予刊登。

報上刊登了光明日報檢查在章伯鈞、儲安平篡奪政治方向期間所犯錯誤的一篇文章，這種檢查人們期待已久，可是對設計人員座談會却只字未有提到，好像沒有召開過這個座談會似的。

光明日報在全國設計會議正舉行的當兒所召開的座談會的目的是極不光明的。我認為這是右派分子儲安平所部署反黨反社會主義總陰謀的一個部分，它的目的就是和全國設計會議唱對台，企圖利用這個會議上一些右派分子的言論，否定全國設計工作的成績，抵消全國設計會議的作用，向全國設計人員點火，煽動他們起來反對共產黨領導，以此達到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奪取技術部門的領導權的目的。

雖然這個座談會（儘管右派分子在宣傳技術上下了功夫）在全國設計會議正氣的壓力下，沒有起到它散發毒素的作用，雖然右派分子的陰謀並未得逞，但右派分子的用心是陰險的。右派分子召開了設計座談會，告訴我們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反黨活動是無孔不入的。他們對對刻刻尋找機會來實現他們卑鄙醜惡的目的。光明日報應當公開揭露右派分子召開設計座談會的詭計。廣大設計人員應從這件事情中吸取教訓，動員起來投入反右派的鬥爭中，徹底打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的陰謀。

（光明日報7月22日第3版）

“早春”前后

費孝通

寒 暖 之 間

4月17日离京，24日下乡，5月15日回到苏州。路上和乡間，不容易看到北京和上海的报纸。到了城里才坐下补看。在这一叠旧报里，也有不少提到了我3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早春天气”。文章早已过时，回想起关于“早春”一文前后的一些瑣事，倒也頗有意思。

2月初从西南回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头彙报，談我离京半年中在各地看到有关知識分子問題的情况。我提到了两个盖子的話：

“百家爭鳴”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是冒起来了，表示在对科学研究的要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等“互相監督”来揭。这个盖子一揭开，开出来的是知識分子对政治的積極性，他們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極情緒。但是，我接着說，第一个盖子开得还不够敞，許多领导同志不大热心。第二个盖子似乎还没有揭，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我是主張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

大約过了一个星期，民盟的文教委员会又召开了一个座談会来討論我这个彙报，希望比較全面地来估計一下当前知識分子的情况。在这个会上我用了“春寒”兩字。但一經討論，我感觉到“春寒”兩字用得还是不妥当，因为这样說，沒有把知識分子冒出来的積極性托出来。春意是主要的，加上了个寒字，未免走了拍。于是想到“早春”兩字。“早”是个正面的字眼，和过去黄昏思想对得上，刚好道出了这个轉机。

有人从我这篇文章里感到寒意，認为是吹冷風，其实細細看去，我在这个溫度問題上是用过心思的。比如我起初想引用李清照的“乍暖还寒”一語，后来一想，这句詞，基本上是寒，暖是虛的。因此，我不直引，改了一字，写成“乍暖乍寒”，一字之改，提高暖的地位。当时，我嘴上也屢次念到“滿園春色关不住”的句子，念来念去总觉得还是用

不上。

后来有人说，暖寒是同一天气的不同感受，于是牵出了感受者的体质问题，一若寒暖的感觉可以当温度表来测验进步和落后的程度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得这样深，推论也没有这样远。我想到的只是那两个盖子“盖住”和“揭开”的矛盾。其实就是现在大家已用惯了的“收”“放”问题，“收”“放”用到“天气”上，也就成了“寒”和“暖”了。

回想起二、三月间，“收、放”“盖、揭”“寒、暖”确是插得进两个“乍”字的。不说别的，就是我这“早春”一文就“收、放”了好几次。

民盟的两次会鼓励我为知识分子说说话，所以决定写这篇文章。2月中，初稿已经写成，但是文章提出的问题分量不轻，没有勇气送出去。反复修改了几次，又复写了好几份，分送给民盟的朋友们研究提意见。大约是2月底，我正想发稿时，来了一位朋友，和我说：“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不妥当。”原来这位朋友听到了一个传达文艺方针的报告，说是毛主席批判了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小说，赞成陈其通的短论，他又加了一句：“我看形势是要收了”。潘光旦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一听我转述了那位朋友的话，就说：“这可怪了。我在城里也听到有人说起毛主席召集过一次谈话，不是收，而是放呀。”这一下我们弄糊涂了。

过一天，又遇见了一个杂志社的记者，谈起了另外一个正在外地采访的朋友。他说：“寄回来的文章，口径不对，暴露太多。现在不准这样写了，必须考虑后果，百家争鸣出了问题了。”我因为手上就有着这篇可能会出问题的文章，所以特别关心。追问他：“谁说的。”回答是“传达下来的。”

虽然这阵冷风是没有根据的，是阵空谷来风，但却吹冻了我的“早春”。

有几位看了我底稿，而且又肯定不是收，而是放的朋友，又一再鼓励我把文章送出去，甚至使出了激将法。我夹在寒暖之间，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结果是又从头改了一遍。在这种心情下改写实际是磨角。有

人說我写得过分含蓄，不懂詩詞的人，还是少裝作假斯文的好。我听了只好苦笑。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扩大會議上講話的那天上午，我把“早春”送出去了。那天因为有外宾来參觀，要我招待，我又不知道毛主席要講話，所以沒有进城开会。晚上潘光旦先生听了講話回来，兴冲冲地来找我，揭开了謎底。

下一天一早起来拿出底稿，把后半篇重写了一道。从修正稿送去，到文章見报，又是两个多星期。原因說是被政协会發言挤后了。不管怎样，当这篇收收放放的“早春”出世，早春确是已过了时了。

有些朋友为我惋惜，說早一个月發表多及时？天气变了，不是个馬后炮了么？又有些朋友为我告幸，說早一个月泄露了春光，怕耽待不了，說不定会被閹割一陣。我想迟乎早乎都不是偶然的，即反映了天气，也反映了体質，我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識分子罢了，話是想說的，勇气是有限的。

三 个 問 題

朋友們看到了这篇文章，很多是同意我的，还有些人觉得沒有說暢，有点遺憾。关于这些我在这里不多說了。要說的是不同的意見，归納起来大概不出乎下面一些問題。

第一个問題：“天气說对了沒有？”不同的意見是說我沒有摸准或是摸錯了。有些說早春天气是曾經有过的，只是已經过去了，未免說得迟了点，不合于四月份的情况。这是由于我这篇文章压了一个時間，我指的原是过去半年的天气。我很同意四月初已不能再說是早春天气了。但是也有人認為早春天气的說法是錯誤的。知識分子解放时就已經到了春天。如果最近半年还是早春天气，前几年是什么天气呢？这不是明明暗射思想改造是冬天么？这又不是有意要否定思想改造的成績么？再往下說，問題更大了。因此早春天气的說法根本就不对头。說得輕一些也該自己檢查檢查这是什么思想。

从这里引出了第二个問題：“天气呢还是草木？”百花开不了，是由于天气不够暖，还是由于草木本身体質不健全？反对提早春天气的朋友們認為：自从解放以来，天气一直是明朗的，溫暖的。党对知識分子

政策早已确定了，而且一直是貫徹了的。明朗的天气，花不开出来，自然是草木有问题：腐朽了，蛀蚀了。自己不成器，还要怨天；说得明白些，知识分子要發揮积极性关键是在自我改造，不应当去批評领导。

这种看法和我的意見是有出入的。关键是在对知识分子的估計。我認为在1956年的下半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显著上升的，那是由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貫徹的結果。但是上升了的积极性要体现出来，就要求創造許多条件，而这些条件跟不上要求，表現出了领导落后于群众。党和知识分子之間存在着内部矛盾突出了。这种矛盾不及时解决，已經上升的积极性也就难于持久，有可能轉化为消极情緒。这就是我所想以早春天气来作比喻的实际。

知识分子是不是应当繼續进行自我改造呢？我对此是肯定的，并没有怀疑。但是在当前的情况里，要解决上述的内部矛盾却不能單單強調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内部矛盾的解决固然必須双方共同努力，但是以每一段时期來說，按当时情况的特点，也必然有主要的一方面。和事佬式的兩边規劝，听来似乎是很公平，很全面，但事实上是推动不了矛盾發展，因而也不能帮助矛盾的解决。以当前知识分子問題來說，我認为，多要求领导党檢查貫徹政策中存在的缺点是做得对的。我提出“早春天气”的确是有意識地強調了天气这一方面，而没有多談草木本身的問題，我想这样写法也是有理由的。

没有多談草木本身的問題并不是等于說草木本身已沒有問題。我同意：天气尽管好，如果草木体質不健全，还是开不出花，結不出果来的。我不同意：中国那些旧知识分子都是腐朽了的，都被虫蛀蚀坏了的。但是說他們都很健旺，那也不能。先天不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提出了第三个問題：整風已經开始，天气是在轉暖了。花开是不是有保証呢？早春天气一过，草木本身的問題也一定会逐步提出来的，提出来的就是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培养問題了。

在这个問題上，有不少朋友因为我提到了有人要求“一間房，兩本書，靜靜地做做功課”，認为我是在支持“兩耳不聞天下事”，进而批評我不应当重業務、輕政治。这正如有人因为我說了今后教書要有些真才实学才吃得开，而說我留恋于教条主义一样，叫人辯白都难出口。

“一間房，兩本書”和“兩耳不聞天下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房里不一定沒有報紙和收音机，書本上講的又为什么不能是天下事呢？“靜靜地”一語是不是又惹起了反感？是不是一靜就不能成为積極分子了？是不是要表示关心天下事，要表示政治上的積極性，必須天天熱熱鬧鬧地开会，激昂慷慨地發言么？是不是这种热度，这种劲率才是評德的标准么？我看安靜一下，把緊張的空气緩和一些，多讀讀書，才是墾土施肥的工作。为了开花結果，不做做这些基本建設是不成的。

避免糾纏，敞开来談，还是这个老問題：知識分子要求提高業務是政治積極性提高的表現呢，还是下降的表現？提高業務和提高政治是互相排斥的呢，还是互相助長的？一个有專門知識的人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示他的政治覺悟才是正常的？——对于这些問題的看法，現在許多朋友中还是不一致的。我的看法是这样：現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已进入了細致的观点和方法問題，不通过實踐是搞不通的，實踐就是各人的学术思想工作，那就是業務。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要求于知識分子的，已不是空口宣傳，而是在具体的崗位工作上用專門的有效的知識来服务于人民了。这又是業務。通过業務来改造，通过業務来服务，其中無处沒有政治，而也必須有了政治才能这样做。因此，当我說到“一間房，兩本書”的时候，我肯定是積極性的表示，其中就有政治，並沒有脫离。但是在一個認為業務和政治原是兩回事的人，一听到別人談業務就会推想到一定不是政治了，于是有点恐慌，好像那些要求提高業務的人全是开倒車，用手按耳，不聞天下事了。这是不是对現在的知識分子估計又太低了些了？

“早春”之后，來日方長，暫時說到這里为止吧。（写于洞庭东、西山。）

会 外 之 音

范 朴 齋

最近到处都在大鳴大放，不仅在座談会上談，就是朋友私人往还之間，也談开了。各地报上所刊在鳴放中揭露的一些情况，人民日报社論已經認為“觸目惊心”，但据我所知，一些严重事例还没有被揭露的也

还不少。这些年来的知識分子，尽管党的政策是团结、是保护，而他們許多人却魂魄不安的在过日子，确是事实。

从苏轼的策論談起

朋友們談到許多具体事例之后，有人断断续续地背誦了一段苏轼的策論：“……莫若結天下之心。……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苟不得其心，而欲繼之以区区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万里無敢后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听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于非常，……天下莫与同其患……”。这位朋友接着說：这是封建时代的話，引用并不恰当，但其中有的道理，似乎仍可“借鑒”。执行党的团结知識分子政策的同志們，如果只是憑“名”与“勢”来团结知識分子，那就不易贏得其心！但有些党员同志們对中国知識分子缺乏客观認識，一切憑主观办事，經常盛气凌人，官僚架子特大，甚至当众辱人，使人望而生畏。更糟糕的是，一些自愛自好之士，既不願卑鄙承迎，党员同志又不虛心交友，只依靠另一些，看来并不相称的人作亲信。这些受信任的人中，有的正是这些对大家所揭露的“百依百順”，“不帶腦袋”只会“揣摩”“鼻上抹粉”“專做小报告”……等所謂“積極分子”。党员同志不但自己有宗派情緒，还在群众中無端替人划些圈子，制造出宗派来。而这些所謂“積極分子”有的人实在是在临解放时才加工赶讀了几本小册子，强記一些术语名詞，看見党员同志摸出香烟时，就老远擦燃火柴送上去……，是憑这一套靠攏的。有的党中同志似也很愛这一套，因而偏信偏听，長了这些人的势焰，当其被封或者自封为“忠实助手”之后，他所临时才强記熟的一些术语名詞立刻轉化成为“帽子”或者“棍子”，这一下裝模做样，作威作福，“助手变成‘打手’”，見人都打。据說这就是为党做工作，对非党人士团结教育改造。他們即使在和人私下閑談时，也常常摆起非常可怕的面孔，你剛一張口，他就把筆記簿拿出来像要录

口供似的，記下來，人不知他記得對不對。我也遇過不止一個這樣的人。我對付這樣的人的辦法很簡單，他一打開簿子，我就立刻閉口。他說：“你說下去呀”。我指着他手中的簿子笑着說：“我怕那個，請你把那玩藝兒收了，我再說。”私人閑談，何苦搞這一套？曾有朋友這樣說：“這些傢伙好像把每個人都看成特務似的，真可厭”從近來報上反映出的情形看，這類人並不少。但我以為這些人並不是責，因為他們不是製造風氣而只是跟着風向跑的人，真正製造風氣的人還是黨的同志，責任該由黨的同志負。

中國知識分子的氣質

中國的知識分子由於受了中國傳統的薰染，大都有相同的氣質。他們除了學術修養之外，最重人品，自尊心很強，直與他們的生命相聯繫。他們講究立身作人之道，一生是在追求一個安身立命之所。這個“道”和“所”，自然是一些格言教條，對不對，是另一問題，但這些格言教條倒真能作用於他們的思想 and 行動，因為他們講“躬行實踐”。甚至付出很高乃至生命代價也終身守之不渝，這叫作有“守”。也叫作有“品”，比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安貧樂道”……之類，他們安心於這些道理的基礎上，他們可以“視富貴如浮雲”，只“求其心之所安”，要這樣，他們才感到生活不空虛，活得有價值。他們有是非之心，他們不做自己認為不應做的事，他們“糞土王侯”當然更不會趨炎附勢。他們一言一行總有一個道理在背後支配着，這就是他們的一套作人之“道”因此，他們很“固執”，而他們是“擇善固執”，根本還在“擇善”，當然，他們所認為的“善”是不是善，可以重新估計。他們並不堅持錯誤，只要有所認識，就能改過。因為他們在“擇善固執”的同時，也最能“克己復理”。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教育改造，之所以不須壓服而可說服，正因為他們有這樣的品質性格。但是，當他們對道理還沒有弄明白的時候，他們很難放棄他們之所守，因此，在初解放時，他們與前面所說的“積極分子”那類人不相同，他們不會在一個早晨就靠攏了黨。這時，黨的一些同志對他們並無較深的了解，往往容易把他們看成“落後分子”，甚至說他們有“抵觸情緒”。加以那些“積極分子”又顯示威風，右手持棍棒，左手拿帽子，去向這些人進

行“團結、改造”，几年来的“團結”几乎把这些人越“团”越远。而这些人中經過学习，倒真正也有一些进步，但同志們對他們又往往估計不够，未从客觀發展看問題，依然抱持成見，这就使他們想靠也靠不攏。在一个較長時間內，这些人精神上几乎是受到蹂躪。首先，對他們的过去，否定得太多，这也是“劣根性”，那也是“劣根性”，一無是处。比如有人說“富貴不淫……”总算不錯吧，偏有人說：“这是小資產階級的硬骨头，算不得什么”。又如有人說：旧知識分子絕大多数是愛國的，这本是引用毛主席的話，但有人偏要追說：“問題是在愛什么样的國”。这样分析也不錯，但对知識分子的愛國，也必定轉个灣給他一点否定，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自己进步，这对知識分子來說，是最伤感情了。虽然他們所“守”的东西值得批判的也真不少，既要改造，也必然对过去有应被否定的东西，但人格的修养，与思想方法的改造，和对政治經濟制度的認識，并不是一件事。無論什么都一律否定，这在知識分子中也是不心服的。有人說“一系列的運動、改造，有的人把人性也改掉了”，这豈是我們改造思想的目的？但他們不敢分辯，說道理也說不通，只好忍守。許多人由此逐漸产生了消極情緒，这也錯那也錯，感到人格喪失，見人低頭，还有什么生活意趣呢？那些做知識分子工作的黨員同志以勢凌人，对中国知識分子的氣質缺乏認識。他們把每一個人都看作是毫無渣滓透明徹底的“政治人”，把一個复杂細致的工作簡單化了！只从物質待遇上去求團結，忽視了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方面。我們以為，在整風中，黨員同志們（包括積極分子）好好想一下过去，从已提出來的一些事例中進而探索其原因所在，从根本地方下手改正，才能解決問題，倒不是頭痛醫頭足痛醫足作些枝節改正就算解決問題。

弄小嫌、明大義、辨是非、別好惡

尽管过去对待知識分子缺乏了解，對他們的帮助用了不适当的方法，伤过情感，是不是就已造成很大的矛盾呢？不！这又是知識分子自己的作人之“道”中有一条道理把自己約束住了，那就是“弄小嫌明大義”。中国知識分子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負，他們見到这些年来國家真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很感动，他們确能明是非別好惡。有的人尽管受了委屈而愛國熱情倒反而增加了，原因即在此。

当然，这并不是說，人們永远受委屈，永远把气悶在肚子里，而一無抵触滯緒。今天全国鳴放，使大家發泄一番，把肚子里的悶气吐了，将会更主动地發揮出他們的热情和潜力，使国家事务得到更多的好处。否則郁塞更久，問題更大。我們知道啞子打人格外手重，就因他平时一肚子悶气罵不出来。既然郁悶很久，一旦傾吐，难免感情激动，說得尖銳一些，这也是情理中应有之事，毫不足怪，更不足惧。也有人在發泄了悶气之后，又会冷靜地考虑到：“整風整得太厉害了，是不是会伤了領導同志的威望，將來怎么办事呢？”又說：“我觉得使黨員同志太难堪，也不好，值得考虑”，說这样話的人，“見其远者大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作人之道在他們腦子中起作用。这些时有人在公开場合中說話似乎还很保留，这也不必理解为他們“世故”或还有“顧慮”，他們說話之所以比較保留，也还是他們的作人之道在起作用，認為“睚眦必報”是可耻的，他們不屑計較自己的事，而“不为己甚”“忠恕待人”又是他們持躬之道。

至于拆牆填溝，已見到許多說法，事实上非党人士的鳴放，結合着党內的整風，已經就是在兩面拆牆兩方填溝了，問題是在这一股風过去以后，不要再筑牆挖溝，这倒是須要双方努力的。

大胆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紀念五四运动三十八周年

光明日报社論

在三十八年前的今天，覺醒的中国人民醞釀积蓄，以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文化革命开始，展开了新型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时光并没有空过，回顧三十八年前后的情况，中国人民的脚步是迈得多远了！人民民主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全国人民正在热情高漲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

今年的“五四”，正是全国知識界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和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后，在广泛地热烈地討論着进一步貫徹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问题。到处都听到知识界的声浪，到处都看到知识界的活跃，到处都可以感到知识界的脉搏的跳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了当前知识界思想和生活的主题。这是“五四”而后，较之五四运动波澜更为壮阔、规模更为宏伟的文化革命运动，是反对教条主义思想，反对机会主义思想，创造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

知识界纪念“五四”，应当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传统，大力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拿出比“五四”而后反对帝国主义的买办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更加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来反对教条主义思想，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教条主义进行斗争；来反对机会主义思想，清除自己头脑中的机会主义思想残余，对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应当以宏伟的气魄，清醒的头脑，知所识别的兼容并包的精神，批判应当批判的，肯定应当肯定的，学习可以学习的，消化可以消化的，进而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以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开花结实，大放光彩。把这一较之五四运动更为宏伟的文化革命运动推向前进。

不要有所顾虑，不要有所犹豫，不要由于怕犯错误而趑趄不前。我们批判，我们肯定，是为着学习、为着消化、为着创造、为着建设、为着推动和完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运动，为着建立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崭新的文化。一句话，为着社会主义，为着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定要大胆地贯彻这个方针，要大胆地放、要大胆地鸣。这样，才能反掉自己头脑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和机会主义思想，才能反掉整个知识界的教条主义思想和机会主义思想，才能扫清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上的障碍，才能使知识界头脑清醒，眼界开阔，有所兴起。歌德在一首诗中说过——

善良的人在自己的朦胧的憧憬里，
也常常会露出一条康庄大道来。

我们的知识界不是在朦胧的憧憬里，我们有着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几

年来已經受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社会主义的空气的熏陶，康庄大道——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經被指引出来了，而且已經走上了这条大道。只要去其顧慮和犹豫，切实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就能使知識界面貌一新，更加有力，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健步馳驅。

現在有些負有领导責任的同志，还有顧慮。他們的顧慮是怕方針政策掌握不住。既怕“左”，把事情搞坏；又怕右，会要受到上下兩方的批評和責难。怕走得太前、太突出；又怕落在后面，赶不上客觀形势的發展。在目前的情况下，“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能否順利开展，关键在于领导。如果負有领导責任的同志有着这种怕“左”怕右、怕前怕后的思想，是不足以言成事的。他們本来是怕犯錯誤才采取这种态度，却不知道这样已經犯了一个最大的錯誤——使“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开展不起来。我們希望有着这种思想顧慮的同志，赶快丢掉这种思想顧慮。只有使知識界放起来，鳴起来，才能談得上放得好，鳴得好。未有把蓓蕾捆綁起来而能开花結实者也。我們希望負有领导責任的同志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講話，为天下倡，把知識界鼓舞起来。

現在还有些知識分子有顧慮。他們的顧慮是怕自己放起来，鳴起来，以后挨整。这种顧慮实在是多余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目的很明确，并不是为着要整人，而是为着要批判教条主义思想和机会主义思想，而批判的目的，又是为着进行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为着發揮知識界的力量，为着學習，为着創造。如果知識界存在着这种怕挨整的多余的毫無必要的顧慮，那就是自己用一条繩子把自己的思想束縛起来了，那就只有使自身的力量衰退以至萎謝。我們希望有着这种怕挨整的思想顧慮的同志，赶快把这种既躍躍欲試而又瞻前顧后的暮生气味丢掉，切实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講話，体会中央的方針政策的精神，不要作寒虫，而要鼓起力量，迎接春天。

我們認為，要放得好，鳴得好，达到“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目的，負有领导責任的同志，是要大胆放手，把知識界的力量和勇气鼓舞起来，然后順其流而加以引导。使百川匯于海，大家为着一个目的，清除思想上的障碍，創造和建設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使我国的文化科学事業繁荣起来。而知識界則应当实事求是，不要有所顧慮，也不要情緒波

动，各抒所见，各尽其力，要求自己，帮助别人，使学有所进，事有所成，毋负于这个方针，毋负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毋负于自己肩头上的责任。

纪念“五四”，我们希望知识界继承“五四”的精神，来推动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异采纷呈，知识有所附丽，附丽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在世界上大放光彩。（光明日报5月4日第1版）

春天的感应

光明日报记者 文 冰

在这些日子里，虽然是春天来的较迟的北京，也到处一片春光了。有一天上午，记者和一位朋友因事到北京大学。我们坐在汤用彤副校长的房里。汤老先生卧病经年，他斜倚在床栏上和我们一起谈着话。从窗子里望出去，这天是雨后新晴，一抹阳光，照着带雨盛开的桃花，反映室内，春光四壁。记者听着汤先生娓娓的谈话，望着窗外的景色，心里不住地想起这时候的南方——“闻道巴山里，春船正好行。”想着这时候的南方，一定是群莺乱飞，杂花生树了。可是，眼前的事实，汤先生的谈话，却又把记者从春天的冥想中拉了回来。有一位学者说得好：人的活动的事实比自然的景色更吸引人。在这些日子里，在知识分子中间，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包括诗人在内，关心自然的季序的迟早的，恐怕是很少吧。因为大家都在为另一个季节——思想的季节，为一篇报告所激动。这篇报告，成了知识分子的共同的生活的主题。大家在谈论，在为之而思索。有许多打算，有许多积蓄需要抒发，真是山泉滚滚，你无论走到哪里，团体集会，老友相逢，你都会听到这个题目。有一位先生看到这种景况，他引述了杜甫的两句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说这个题目所以如此吸引人，“所以如此之令人兴奋”，是因为“是时候”。去年提出这个方针，正是时候；今年毛主席的讲话，又正是时候。他几次用“正是时候！正是时候！”的叠句来加重他这个在他

看来是一語道破的意見。是的——

清明节，雨晴天，

得意正当年。

确实正是时候。無論抒發怎樣的意見，比如有的先生还有着春寒之感；有的先生說要放就大放，不要再有什么清規戒律；有的先生還希望更多的創造條件。無論抒發怎樣的意見，大家都是一致擁護毛主席的講話，熱情嚮往這個方針的貫徹實行。從記者這些天來接觸到的一些先生們的談話看來，這位先生的“正是時候”的說法，確是說明了他的，也是許多知識分子的心情，他們的內心的感懷，他們的要求，他們的希望，他們所以如次興奮，笑語相告，熱烈論爭，自己想抒發意見，也想听听老朋友的高見的道理。

× × ×

湯用彤先生就是在和我們談着這個話題。他說他的身體已經大好了，他已能讀些書，每天都看報紙。他讀了人民日報的社論（是指4月10日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社論），非常興奮。“很好，很好”。他說：“去年提出這個方針，我就寫了一篇文章表示擁護。現在毛主席提出還要放，還要繼續放手，我雖然不能出門，與外界接觸較少，但有時老朋友來訪，也在談着這個問題，也同樣興奮”。他談到報紙上反映的春暖與春寒之爭，說知識分子是不無顧慮的，不過那是過去的事了，至少很快就要成為過去的事了。他的看法，去年提出這個方針，對知識分子給了很大的鼓舞。鼓舞，就是解除知識分子的顧慮。今年，毛主席的講話，是更大的鼓舞，那麼，還有顧慮的，或者是由於種種原因引起了新的顧慮的就可進一步把顧慮解除了。他以他自己為例——他寫有一些關於哲學史的論文，早就有朋友勸他編為一集，交付出版，可是他有顧慮，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過去，知識分子心中有顧慮，是不願意說出來的，因為你說或是你表示有顧慮，“落后分子”的帽子就扣到你頭上來了，非得超過自己的心願和勇氣突出地表示積極一番，這頂帽子是難望摔掉的。所以有什麼事要推脫，總得找一個借口。“我也找到了一個借口”。湯先生想起過去的事，他笑了。他的借口是這些論文還得研究研究，這樣便把這件事推脫過去了。自從去年提出百

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才決計整理出版。他覺得，在學術上，在國家生活上，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說出來，是無所用其顧慮的。

談到所謂“顧慮”問題，有的先生是沒有顧慮的；有的先生說“我們還有顧慮”，有的先生口里不談，談起的話，也說沒有什麼顧慮，其實心里是有顧慮。記者和一位先生談到這個問題，他很有風趣地，對此作了生動的，在記者看來是比較深刻的分析。他說，毛主席的講話，帶來的是思想上的春天。去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提出，是春雷初動，接着幾場霖雨，百草含芽，一片初春景象。而後由於種種的，內在和外在的原因，在有些人中間，有過一些思想上的波動，好像春天很快便過去了。知識分子是敏感的，害怕傷風感冒，也容易患傷風感冒。今年毛主席的講話，才真使人感到陽光普照，真正的春天來了。這個思想上的春天，不僅是對知識分子而言。它波瀾壯闊，及於國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就知識界來說，當然，感應是一致的，不過一致之中，又各有其不同的感應。“這是無怪其然的”。他說。他引述了諺爾維修斯的這几句话：“我們看見小的、大的、直的、彎的橡樹，但是沒有看見和別的橡樹絕對相同的橡樹”。就同是橡樹，對於季節的感應，基本上當然是一致的，而一致之中，當然也有其不同。何況在知識界來說，並不是橡樹所可比擬，而是一片森林。一片森林，和風甘雨，冬去春來，難道在一致的感應之中會沒有不同之點么。春天來了，草木茁長，廣大的知識界對毛主席的講話是歡喜的，歡迎的，熱烈地擁護的。而有着不同的感受，也是自然的。

“為什麼有些先生还有着顧慮呢？”對於記者提出的這個問題，他說，顧慮也不是一掃帚就可掃除的”。百花齊放，並不是一時一刻一齊開放，仍然有個先後次序，這是事物的差異，這存在於他們的胎胚里，也存在於他們的發展里。然而只要春天來了，百花終究是要開放的，樹木終究是要長出綠葉子來的。前邊說的一致之中的不同的感受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他說他所聽到有一位摩爾根學派的專家，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後，一直在猶疑，他認為“放一放”，然後便會“收一收”，結果不免是“整一整”而“放一放”的目的就是為着要“整一整”。他的想法是“我又何必冒這個頭呢。”直到這次听了

毛主席的講話，我才想到自己的想法是“錯了，錯了。”他說他是“既感且愧”。對於這種想法——這種“放”“收”“整”的顧慮，決不能拿它來資為談助，“啊！居然還會有這種想法！”用這種態度來對待是不對的，必須用嚴肅的態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因為事實上存在着這種想法，而且有着這種想法并不止一個兩個人，而且還是高級知識分子。同時，在另一方面，不是也還有人確有“放—放”然後“整—整”的思想麼，毛主席所批評的教條主義者不就是這樣想的麼。聽說陳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發表以後，有些地方的文聯已把它作為指針，檢查工作，可見是有它的代表性了。要是照着教條主義者的想法和作法，那麼這種顧慮便不是多餘的，而是幸而有此一着，否則便要吃不了，兜着走了。知識分子要看的是事實，只有事實最能說服人。在“既感且愧”的心情中，才能漸次把顧慮掃除而奮勇有為了。意識形態的問題，從來沒有用壓制的辦法可以解決的；鼓勵、事實的鼓勵是最有力量的鼓勵。

這位先生分析了顧慮的來由。他說顧慮之來，有外在的原因，有內在的原因。起先，當然是由於外在的原因所引起的，而後，當外在的原因減弱作用，那麼，顧慮的存在便是內在的原因要負責了。在過去，知識分子怕“整”，而事實上是有着“整”的事實在。在當時的情況下，所謂此時也，此地也，“整”是有它的積極作用的，它的積極作用大過它所生的消極作用，這也是人所公認的。這裡且不說它。但這個“整”產生的副作用，便是使知識分子存在着“顧慮”。這是說，知識分子的顧慮，起初是由於外在的原因引起的。去年，中共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總理發表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接着，中央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又一次明確了要貫徹這個方針；今年，毛主席的講話更是把話說得明白，不是要收，而是要放，不是放得夠了，而是放得不够。這樣一步又一步鼓舞知識分子，希望知識分子解除顧慮，而有些先生仍有顧慮的話，那就不是什麼外在的原因，而是應當反求諸己。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領導方面還是要注意，要創造條件；可是，知識分子同樣應當努力，只有自己才能解除自己的顧慮。

×

×

×

在这里，記者要記述一下另一位教授的意見。这位教授的意見：“放”与“鳴”在北京是沒有問題的，北京得風气之先。自然季序的春天，北京比江南求得迟些；而思想上的春天，北京总是發軔之地。所以，問題在于地方。地方看北京，当然是合乎“規律”的。可是，看了之后又怎样呢？他說，西南有一位大学教授来到北京，参加了一个座談会，在这次会上，一些教授們各抒己見，談了一些問題。在北京的知識界看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会。可是这位来自西南地区的教授却感慨系之，說他在西南不但沒有参加过这样的会，也沒有听到开过这样的会。可見地方的風气还有待开放。說到顧慮，地方的知識界可能顧慮更多些。春光普照，毛主席的声音当然会遍达全国，無論村乡僻壤，春風当然都会要吹到的。“春風不度玉門关”，那是詩人一时的感怀，不会是事实。可是“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問題，关键在于一層一層的領導，地方的領導应当不是等待春風，而是起積極作用，蔚成風气。不要使地方的知識界看見北京这么熱鬧，而地方呢，却有着“春归何处，寂寞無行路”之感。

对于这个意見，当时在座的一位先生說：“为什么地方的知識界要等待呢？这是地方的知識界和地方的領導共同的責任。春天来了，既然地方春天的气息不濃，为什么知識界要徒自怀着“春归何处”之感，而沒有仁人志士出而爭取呢？”說到仁人志士之舉，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一天，記者去訪問一位教授，在他的客厅里，已經坐着几位先生在談着这个話題。其中有一位先生說，他在一次集会上，听到一位教授說，要放就要大放，过去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給人的印象太深了，知識分子还有顧慮。对于这个意見，他說他是“不敢苟同”的。在座的一人問：“您把您的不敢苟同的意見在会上說了么？”他說：“我沒有說。”“您为什么不說呢？”他笑着說：“我還沒有学会斗争，在我身上，知識分子的余气未尽，我还要學習。”他的話引起了一片笑声。他說，这不是可笑的問題，要是笑，那是会心的笑。在座的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習慣于堂下私議，而不習慣于抗声爭論。要是抗声爭論，“啊，你这个積極分子！”这个“啊”和过去“啊”，你这个落后分

子”的眼光，同样是“夏日可畏”。如何不畏，則尚待努力。所以，私下談談是可以的，至于指名道姓或面对面的論爭，則尚有待也。

依照他的看法（他說这是“千秋公論”），“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提出，有它的物質基础。这个基础是几年的建設事業的开展，而在思想方面的主要之点就是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使知識分子淨身沐浴了一次，照了照鏡子，面向馬克思主义了。而总起来說就是“时間”。單說在思想基础上，要是沒有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这个方針是提不出来的，提出来了也就会“不是时候”。說現在要放，意思之間，以前的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都是錯了。“現在要放，为什么以前要进行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呢？既然以前进行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是对的，是正确的，为什么現在又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呢？”这个邏輯悬在空中是对的，把它放在地上，放在事实的天平上，它就不成为邏輯了。現在要放而且能放，就是說，有放的要求，而且有放的可能，正是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的功劳。沒有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就是要放也不能放，沒有放的条件，沒有放的思想基础。沒有春天，也就沒有秋天。或者是：沒有过去，也就沒有現在。因果关系是要弄清楚的。誠哉，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产生过副作用，可是無論什么事情都难保其沒有副作用。不能由于它产生过副作用，便否定它的積極的主要的作用。而且，它所产生的所謂副作用，是使知識分子有了顧慮，可是，知識分子本身也是要負責任的。这位先生笑着说，他的这个意見，是会引起有的先生，比如那位教授的反感的。不过，他認為，那位教授敢于在会上提出这个意見，說自己还有顧慮，就証明了他已經沒有顧慮。他真有顧慮的話，是不会在集会上說的。这也說明了真正的春天已經来到了，不过，他对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还有反感而已。有不少知識分子对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有过程度不同的反感，因为改造过程是一次痛苦的过程。可是时間会漸次把这些反感消除的。这位教授的反感，时間也会把它消除的。那时候也就会欢喜，达到大家一致的結論——其实他現在已經达到了这个結論，不过他因为欢喜而在冲激。

×

×

×

够了一——不过，关于“顧慮”問題，記者还要用一点篇幅来补述下一位老教授的意見。

記者把有些先生們的意見告訴了这位老教授。这位老教授說，知識分子是在不断改造中。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是改造，“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对知識分子說来也是改造，不过是不同方式的改造，是深入一步的改造。特別对教条主义者是一次改造，所以，教条主义者叫起来了，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个过程中，問題总是会有的，意見也总是会有的。在我們这个时期——过渡时期，知識分子听到“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方面欢喜，一方面仍有顧慮，是很自然的。毛主席的講話，对知識分子是很大的鼓舞，可以解除人們的許多顧慮。但是，有些顧慮，有些思想問題，只有在不断的改造中，在“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开展中，慢慢地来解决。所以，“顧慮”問題，虽然不是大問題，仍然是一个問題，不能強調它，但也不可忽視它。

这位老教授認為，把思想改造的过程仅說成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还不够，它同时也是一个欢喜的过程。过去的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可以比作用热水洗瘡疥；“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則可比作女同志們生孩子，这中間有痛苦，但更多的則是快感和私心的欢喜。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叫叫是不可能的，讓大家叫叫有好处，这不是痛苦的呼喚，而是衷心欢喜的呼喚。他說，說沒有顧慮，并不一定沒有顧慮，說自己有顧慮的，并不一定有顧慮；默尔息乎的，也可能有些人沒有什麼顧慮，也可能有些人有很大的顧慮。这里有“認識”問題，还有人的“性格”問題。而知識分子的性格，也在不断改造中。知識分子，一方面不願过于冒头，怕冒了头挨“整”，这就是所謂不願“鋒芒太露”。可是另一方面，又不願落在后面，坐不了冷板凳；落在后面，是会有美人迟暮的伤感的，是会有牢騷的。这就是知識分子的一般的性格，也就是知識分子有顧慮而又有所謂“反感”的原因之一。这个性格，是在不断的改造中的。事实，和事实所由形成的風气，会慢慢地解除知識分子的顧慮，連同改造知識分子的性格。使知識分子成为新型的知識分子，“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貫徹实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

×

×

記者要附注一下：作為一篇報紙上的報道，它是太長了。可是——
眾鳥鳴茂林，
綠草延高岡。

從記者這些天來所聽到一些先生們的意見，一鱗半爪的對“春天的感應”的探索，還只寫出其中的一部分。其餘的部分，只好留待下回了。

關於“六經注我”的談話

光明日報記者 文 冰

這看來好像是一個雜文題目，不過記者寫的不是雜文，而是一篇報道，一鱗半爪地記述從一些知識分子中間聽來的意見——由“百家爭鳴”這個話題引發出來的他們的心情。

×

×

×

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後不久，記者在一次座談會上，聽到一位教授談到學術文化方面的教條主義風氣，他慨乎言之“六經注我之風太盛，充斥市廛”。他說，陸象山有言：“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注腳”。這是古之六經注我派的理論根據和治學方法。而今之六經注我派是遠遠望不到這一步的。原因何在？在於今之六經注我派對“學苟知本”這個“本”字理解不同，把它看成是“本本主義”或“一本主義”甚至是“半本主義”的“本”了。他這番話的意思是指某些“類祭”之作，即一半是引文，另一半是引文的翻版——也算是詮釋，也算是發揮，總之是在引文中翻跟斗——的文章。他說，這樣的文章，一方面是用引文證明自己的意見的正確，一方面是用自己的意見證明引文的正確，其實是什麼也沒有說明，抓著“引文”做文章而已。“好處”是文章後面拖著一條用六號字排的尾巴，注明引文的出處，以示作者博覽群籍，“無一語無來歷”。

幾個月過去了。前幾天，記者見到這位教授，談及這段關於“六經注我”的舊話，他笑了。他說那也是一時的感興之言，不過，這幾個月

来，这样的文章到底少见。一則是作者不願写也不敢写，二則是市場問題，不太受欢迎了。他談及过去的情况。在旧知識分子中間，在开始学习馬克思主义的时候，“教条”并不是一頂不好的帽子。那时候，有些先生听見人家称他为“教条”，是受寵若惊而私心窃喜的。因为自己以为到底有了一点点“馬列”，受到重視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这也說明了知識分子誠心想学习馬克思主义，希望自己的头腦中有点点“馬列”。可是后来相習成風，加上一則稍許說了几句不合某些同志的預定意圖的話，就有被批評为立場不穩的危險，二則自己也确实时时刻刻在担心自己的立場是不是穩。于是，有些人要說話，要写文章，只有一个保險办法：教条一番。有时候自己要参加論究一个什么问题，为着保險，便把經典著作搬出来，寻找一段切題的“引文”。找到了，才一块石头落地，安心了。这样便造成教条主义的風气。現在，誰也不願戴这頂帽子了，从前那种“私心窃喜”的心情是沒有了。可是，这并不等于教条主义思想在人們的头腦中不存在了。在以往，在某些学术問題的論爭上有过这样的事：論爭的双方都各自从同一經典著作的不同地方，或是从同一权威作者的不同著作，引述一段話来論証自己的意見的正确，駁斥对方的意見的不正确。結果，把讀者連同作者在內弄得糊里糊塗，好像是同一經典著作的作者或同一权威作者自己在駁斥自己。这是有意搬“教条”，不諱言“教条”时的情况。現在在有些学术問題的論爭中，仍有着类似的情况，双方不涉及实际問題的內容，双方都搬出經典著作或权威著作中的某一段話，好像在实际問題上的意見的分歧，只是对这一段話的理解不同。爭来爭去，結果是一場空中大战。这是大家已經諱言“教条”不願被指为“教条”，可是却不自覺地落入了教条主义的窠臼。这次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講話，听了毛主席对教条主义的批評，非常高兴，觉得在認識上又开了一次眼界。可是在高兴之中，又有一些惶恐。教条主义是唯心的。自己原本有着唯心思想，为着要批判自己的唯心思想，才去学“馬列”，不料学来了一套“教条”，而教条主义又是唯心的，感到这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誰也不願意来这么一个“否定之否定”。但是不願意是一回事，而教条主义思想的存在又是一回事，不能由于不願意它就会不存在。不

少的人都感到自己頭腦中多多少少有些教條主義思想。現在要从教條主義的繩子上解放下來，可是如何解放呢，從何着手呢？這是不少知識分子在思索的問題，在高兴之中的惶恐而又急焦的心情。

×

×

×

這位教授提出了一個問題，即為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怎樣批判和克服自己的頭腦中的教條主義思想，不落入教條主義的窠臼。

可是，記者在另外兩位先生那里，聽到他們談到對教條主義的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這樣提出的：當時座上有人談到——為什麼人類在某一時期，文化會那麼發達，那麼光輝燦爛；而在另一時期卻又那樣暗淡無光，不但沒有創造新的知識，連前人積蓄的文化寶庫中的東西在他們手中也失去了光采。當時有一位先生說，離開具體的歷史事實是不能論究這個問題的，要从概念上來探討，那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關係問題。“不過”，他說，“要是就事論事的話，那麼，教條主義是發展文化的最可怕的阻力。教條主義不但不能創造新的知識，前人的知識在他們手里也會變得暗淡無光。”他的看法：人們頭腦中的教條主義思想那還好辦些，最可怕的是教條主義“面孔”。他說他和幾位朋友談過這個問題，有位朋友認為教條主義在有的知識分子說來是一對拐棍，有了這對拐棍還能將就着走兩步，丟掉這對拐棍是一步也不能行了。現在的苦惱是靠這對拐棍走路要受到批評，丟開這對拐棍卻又邁不開步。當時有另一位朋友笑着說，健康的人是決不願意靠着一對拐棍來走路的，因為久而久之，會變成殘廢。所以現在的办法是只有狠心丟掉這對拐棍，學習用腳走路，開始可能翻幾個跟斗，終久就會學到獨立行步。他引述了這段談話後，依照他的看法，知識分子是在努力要丟掉這對拐棍的，可是必須給知識分子創造丟掉拐棍的條件，這中間最主要的是希望一些教條主義的“方面人物”能夠改造過來。因為他們一向自認為唯一正確，而且有一定的群眾基礎；他們的工作方法是要求大家亦步亦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後，提倡獨立思考，自由論爭，這與他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合的，他們擔心大家獨立行步，豈不會各自縱橫，天下大亂。於是，有的人是用眼色表示了不滿，有的人便叫起來了。無論是用眼色或是叫起來，都會加重知識分子在開展“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中的顾虑，阻碍知识分子丢拐棍，反对自己的头脑中的教条主义思想。

座中的另一位先生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不过他对这个问题作了有趣的分析。他说信仰唯物论与信仰宗教不同，信仰宗教靠虔诚的皈依，而信仰唯物论则靠认识，对具体的真理的认识。如果只是希望自己也同样要求人家重复前人的语言，而自己却没有语言而且也不准人家有自己的语言，这样的“唯物论者”又有什么用处呢。靠教条主义的“脸孔”是不能使人信服做好工作的。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只是历史中的所谓“佳话”。半部论语是治不了天下的，赵普也决不至于只懂半部论语而且死扣这半部论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就是对教条主义同时也是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斗自己的，也斗人家的。因为“放”与“鸣”，是要求不要徒然去重复前人的语言，而要有自己的语言，这就要求学，要求思，要老老实实地学，要切切实实地思。这样一来，教条主义的市場自然就会缩小了。当然，大家诚心希望以后所谓教条主义的“脸孔”不会再出现了，就是再有，也没有什么关系。毛主席的讲话说得很明白，足以解除知识分子的顾虑。再要摆“脸孔”，是与中央的方针政策相抵触的，中央是不会允许的；而所谓“群众基础”也会慢慢地失去的。这样，“上下交征”，“脸孔”就会“危矣”。所以，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教条主义思想，也不必有什么惶恐的心理，对教条主义的“脸孔”也不必再有什么顾虑。

×

×

×

有一天，记者去访问了一位高等学校的系主任，谈到这个问题，他拉长着声音说：“教条主义总是有的嘛！顾虑也总是有的嘛！”他谈到他最近见到一位在南方任教的朋友，那位朋友认为去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在江南地区看来，是报纸上说得多，实际上做得少；风是有一点点，但风力不大，不足以震荡原来的空气。他说起当地一个医学院的教授，由于讲课超出了教案的范围，结果受了很大的批评，这样，当然大家只好“发言如读报，讲课是念书”了。他希望听了这次毛主席的讲话后，能够“春风吹绿江南岸”。这位系主任的意见：过去教书，几个人用一个教案，不能逾越范围，这是过去的事。过

去不这样作，也有困难。现在再这样作，便不对了。不能老拿过去的事来衡量现在的事。因为去年到底是去年，今年到底是今年。一切要看现在。各单位的领导人，应当了解知识分子的心情。知识分子是有顾虑的，这就应当帮助知识分子解除顾虑，丢掉教条主义思想。领导人对于有人说了不合己意的话，写了不合己意的文章，应当鼓舞大家讨论，特别是要尽量鼓舞这位说话或写文章的人尽量发表意见。当批评的自然要批评，但不要摆“脸孔”。如果稍不洽意，便表示不满，是会把人吓着的。而且还可能有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人出来，那就更吓人了。这对“放”与“鸣”，对自己，对说话的人，对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人，都没有好处。因为说话的人以及还没有说话的人，包括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人在内，并不是因为你正确而信服的，而是习惯于把你的意见当作“官方”意见了。“官方”，不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名词，它是与我们的社会制度，与党的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不过——”，这位系主任又补述了另外一方面的意见。他说各单位的领导人也有他的困难。不说话不行；说了话，大家又习惯于缄默，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可是不说话，说话也只是说说“完全同意”、“我没有意见”之类的话，这又怎么办？还有，有些单位的领导人，存在有教条主义思想，习惯于单纯地依靠自己的政治地位来领导工作，现在开展百家争鸣，他们认为他们的领导工作不好做了，认为“涝岁蛙鸣”，没有人听他们的话了。在思想上没有完全打通之前，他们是会有情绪的。人谁能保证没有“情绪”呢。这位系主任说，前一项是“事实上的困难”，后一项是“情绪上的困难”。知识分子应当看到这种情况，不要老是提旧事，“过去如何如何”，“不开放”，“我有顾虑我只好教条一番”。而应当以己之心度人，体会一下领导人的心情。有人要求各方面的领导人先从教条主义的绳子上解放下来，自己才能丢掉教条主义，这只是要求，事实上，恐怕是要上上下下大家伸出手来，从互助互爱出发，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才能跳出教条主义的圈子。

×

×

×

知识分子对教条主义——无论是对自己的，还是对别人的，都是抱着强烈的反感的。有些人谈到自己在过去写的有教条气味的文章，私心

是有些难过的。不过，比较起来，对别人的所谓教条主义“脸孔”，反感更深一些。这恐怕也是人情之所难免。有一位先生说，他也知道，要反掉自己头脑中的教条主义，就不能单靠记忆而要靠思索，不能依赖别人的大脑而要认识自己也有一个大脑。他说，“马克思传”的作者弗·梅林说自己非常厌恶“粗暴的思想家”，“他们因为要歌颂可敬的伏尔太而说只有一本正经的可厌的文体才是可以容许的文体”。这位先生认为这种“粗暴的思想家”和不知道自己有大脑的懒汉至少是同样可怕。大家对教条主义的反感，应当说这是好现象。这正说明了知识界思想上的跃进。思想在斗争中，心情是不免会激动的。这里所记，前面说过，不过是就记者所闻的一鳞半爪而已。

(光明日报4月20日第1、2版)

政治待遇与书斋生活

光明日报记者 文 冰

有些先生的意见：政治待遇与书斋生活发生了矛盾。

有一天，记者去访问了一位教授，刚一坐下，他就声明他现在不做零星生意了（意思是不给报刊写命题文章）。他说，现在知识分子需要的是“时间”。而他，不但不能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连六分之一的时间也从来没有保证过。所以，他决心对自己宣布几条清规戒律，使自己有一点点书斋生活，能坐下来读点书，做点工夫。记者一边听着他的谈话，一边想起昨天有位先生说的同样意思的话。那位先生在谈话中引述了几句“哈姆雷特”，大意是——“说话闪闪爍爍，非常玄妙，有意思又没有意思。可是这样的东拉西扯，倒也会引人注意，真以为话里有什么深意。”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样的时代风习是已经过去了。真理要求具体。百家争鸣决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来鸣，百家争鸣会把这种东拉西扯的风习推得更远，送进坟墓。要是谁还敢“说话闪闪爍爍，非

常玄妙，有意思又沒有意思”，会被噓下台去。因为百家爭鳴要的不是戏台上的紅臉黑臉，要的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的真真實實的角色。所以，現在大家出冷汗的是，感到要有時間有条件做學問。——这样的话，知識分子希望安靜的書齋生活的心情，当天記者又在另一个地方听到。

当天，記者又去訪問了一位哲學教授。他在回答了記者的詢問——哲學討論會開過之後哲學界的打算怎樣？接着便談起他和一些朋友听了毛主席的講話之後的感奮心情。他說。哲學上的爭鳴，無論過去是研究黑格爾的也好，研究康德的也好，對馬赫哲學、對維也納學派有着深湛研究的先生也好，決沒有人挺身而出，說自己是唯心主義者，是代表黑格爾學派或康德學派來爭鳴，決沒有這樣的“仁人志士”了。這種情況，在過去幾年，也許可以說是由於政治上的風力，現在則是由於認識。這是好現象。在哲學上的爭鳴，大家的主觀願望既然都是唯物論者，天下一家，那麼，留下的只是如何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來批判唯心主義的問題。然而，要做到這一步，就得一方面下工夫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方面同樣下工夫研究唯心主義各學派。現在，無論對新康德學派，對新黑格爾學派，對邏輯實証主義，光說一句“腐朽透頂”，誰也知道除了說明自己淺薄而外，是解決不了問題，批判它不倒的。所以——他說，听了毛主席的講話後，他和一些朋友首先想到的是他們的書齋，是那些新買來的和那些過去購置的幾年沒有摸過而塵封已久的書籍。他深致慨嘆地說：“問題就是時間”。

× × ×

為什麼沒有時間呢？這是一個老早就叫開了的問題，有的說是業務工作太重，有的說是社會活動太多。有一位先生對此作了他的分析。依照他的看法，不是業務工作太重，而是業務工作中的煩瑣主義占去了知識分子的許多時間；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幾年來的“政治待遇”把知識分子拉出了書齋；使人野了心，即使有時間坐在書齋里也坐不住，兩眼不是看着書本，而是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他認為這也是一種條件反射。他認為孟夫子說得很對：“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現在，知識分子要努力去“求其放心”。

这位先生笑着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爱好。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对政治是有着热烈的爱好的，知识分子的老祖宗孔老先生一生就非常热中于政治。他奔走于陈蔡郑卫之间，以至被郑人嘲笑为“累累若丧家之犬”。他常常吹牛皮，说“其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他常常“估之哉！估之哉”希望有人用他。他希望“得其时则驾”，想坐着汽车投入于热烈的政治生活。结果没有人用他他就发起牢骚“乘桴浮于海”了。这位先生说，过去的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本来就是做官，“学而优则仕”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过去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去做学问。一种是做足了官告老归田、或是做官不得意不得不归田，这才拿起书本来做他的名山事业。一种则是不幸而官运不通，只好做个山林隐逸之士，干他的“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千秋工作。他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关心政治生活和从前的知识分子热中于做官，谁也知道有着原则上的不同。可是，他说，他每每想到自己，总觉得在自己的思想深处，还有着孔老先生的余气，照照镜子，还有着孔老先生的影子。他也知道，坐下来，好好地做出点成绩，同样是为人民事业服务。然而，外在的影响和自己身体中的这种孔老先生的余气，总使自己在书斋中坐不下来。他认为，没有时间，应当到这中间去找找原因。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先生谈到他自己，谈他的社会活动是太多一些，常常这里开会、那里开会，几年来没有时间去亲自己的本行。他说西南有一所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当年在巴黎留学的时候，一篇论文得了两个博士学位，这几年由于忙于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拿出这篇论文来自己也看不懂了。说他虽然还没有到这位副教授的地步，可是也相去不远。夜深人静，有时候不免有些怅然于怀。可是，他说：“羡慕我的却大有人在。”他遇到一位老朋友，他称道这位老朋友社会活动较少，可以安心地坐在书斋里做点事情。不料这位老朋友回答说他也流光空过，没有做什么事情，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在政治上不受重视，心情很寥落，书也读不进去。他说他是“一失”，而这位老朋友是“两失之矣”。他认为这是一个矛盾，是知识分子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变革中思想上的一个很大的矛盾。感到社会

活动太多而向往于書齋生活，是好現象；在書齋里坐不住而希望参加社会活动，也是好現象。他听了毛主席的講話后，首先想到的是他和他的这位老朋友的两不同的心情。他希望在“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开展中，会把这个矛盾解决。

有一天下午，記者坐在一位老教授的書房里，和他談及这个問題。这位老教授是一个很有風趣的人。他久久地望着窗外照壁上的陽光，沒有說話。后来，他忽然笑着說，知識分子的心情是复杂的，是敏感的，热也热不得，冷也冷不得。現在一方面是要調节一下空气，一方面是知識分子应当鍛煉一下自己的体力。他說，在蒋介石統治时代，許多先生把自己关在書齋里，不願以清白之身在烏七八糟的宦海中浮沉，用沉默对当时的統治者表示了最大的蔑視。这在当时，書齋中人自視很高，非常珍視他的傲骨，認為足以“風世”。在朋輩之間，也是尊重这种态度，互相予以鼓励的。魯迅先生在“出关”中會借用老子的口，說他（老子）的脚是走流沙的，而孔丘的脚是走朝廷的。这些書齋中人对于那些离开書齋跑朝廷的脚色，誰也沒有半点羨慕之意，談起来不是为之太息便是翻着白眼。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空气不同了。由于外面的空气的震蕩和自身的要求，知識分子走出了書齋，热心参加各項学习，参加各項政治运动，要求或希冀各項政治待遇——学习、参加会议、听报告，热情向往于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这是非常好的現象。社会活动較少的人，在書齋里坐不住，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治待遇，無論他的出發点怎样，这都是非常好的現象。这說明社会不同了，知識分子的心情和看法完全不同了。不过，在有些領導方面的某些举措上有着缺点，造成了一种風气，影响了有些知識分子对政治待遇的看法和态度，使政治待遇与書齋生活对立起来了。使得有些先生天天忙于开会、忙于听报告和作报告，他們的書齋是塵封三尺，失去了主人的眷顧，也失去了生气。同时，又使得有的社会活动較少的人，却又怀着“独自倚欄干”之感，望着窗外的斜陽而自嘆在政治上沒有受到重視。对在政治上活动較多的朋友是怀着自卑的心情，对同样的政治活动較少的朋友則又相对無言，心里默默地在想——“我們又怎样呢？”他們的書齋同样受到主人的冷落。

这位老教授說着說着自己也笑了。他說他說的兩方面都只是少數的人。他說这是知識分子的心情，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心理状态。他，由于年齡，由于自己的經驗，是能深深地体会这种心理的。他說，自从去年知識分子問題和“向科学进军”提出來后，大家便叫开了，說沒有時間，“時間”成了一個問題。其实，業務工作太多以致沒有時間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在高等学校，在科学研究机关，業務工作是会要推动你去讀書，去做研究的。叫着沒有時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非業務性的活动太多，还有就是这种渴望政治待遇的心理——一种心理战，使社会活动較多的或較少的人同样在書齋里安不下來。他笑着說，現在有的先生嚷着社会活动太多，开会太多，占去了他們的時間。其实也只是嚷嚷而已。有的先生是“此中乐不思蜀”，已經养成了在書齋里坐不住的習慣。要是真的减少他們的社會活动，减少他們的开会、听报告和作报告的任务，他們倒会感到一时四肢無所着落，甚至会感到受到冷淡了，时时会尖起耳朵听着門外的足音——是不是送开会通知的來了。所以，他認為，現在是要調節一下空气，讓有些先生有時間也有心情走进書齋，安下心来鑽鑽學問，使書齋由于耐心坐書齋的人受到重視而受到重視，这，領導方面要作些努力，而有些先生也要努力，努力改变这种条件反射。

×

×

×

問題怎样解决？記者听到一位女教授說了一些在記者看来是頗为中肯的意見。她說，時間，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要的就是時間。我国春秋时代醞釀蓄积在文化学术上开出燦爛的花，是几百年的事情。我們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也不是一年兩年的事，而是整整一代的事。然而要在这一偉大的时代在学术文化上开花結实，那就靠一代一代的知識分子，到書齋里去，到實驗室里去。沒有耕耘，任是怎样肥沃的土地也不会有收获的。知識分子不要辜負了这个偉大的时代，不要讓我們的后人責怪我們努力不够，而要讓他們羡慕我們，對我們怀着緬懷感激的心情。她認為，这几年来，知識分子並沒有完全脱离書齋生活，这几年我国学术界的活躍，知識界的嶄新面貌的呈現和科学上的許多成就，就是証明。而且也就是知識分子热心参加政治生活的閃光。同时，过去几

年，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外边热火朝天，知識分子当然在書齋里坐不住的，也不应当安坐書齋而不問外面的廢兴。它把知識分子的書齋的門打开了，放进了新鮮的空气，把知識分子——就算是拉吧——拉出了書齋，这不是很好嗎。这是时代，是时代的要求，是时代对知識分子的要求，也是知識分子感染于时代在自身中激起的要求。这是知識分子在偉大时代变革中的一次洗礼。現在“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提出，也就是由于有了这个洗礼。当然——她說，社会活动占去了知識分子不少做學問的时间，而且使其中有的人在書齋的日子太少，有的人还产生了不安于書齋的寂寞心理，也是事实。由于在“政治待遇”的某些举措上以及观念上有着缺点，以及知識分子的旧習未能尽除，助長了有的知識分子的虛荣心和患得患失的心理，也是事实。現在，情况不同了，要求也不同了，应当从观念上也从某些办法上改变一下了。

不过，这位女教授認為，現在，并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的政治热情够了，关心政治生活够了，应当說，对有些知識分子說来，还是很不够的。她說，現在应当进行兩条战綫上的斗争，一方面是要采取一些举措，鼓舞知識分子的書齋生活，在政治上尊重他們的工作，重視他們的成就，减少他們的社会活动，給他們創造書齋生活的条件——工作上的条件和观念上的条件。另一方面要反对“不問政治”的傾向，不是走进書齋就可不問政治了，而是把書齋的門关上后，不能把心的門也一同关上。知識是为政治服务的。要把政治生活与書齋生活結合起来，使書齋生活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主要部分；正像工人的車間、农民的农作成他們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主要部分一样。她笑着說，希望改变办法，更重要的是改变观念，使有的先生不致天天圈在社会活动中，不但書齋冷落，而且弄得夫人“含情無語倚西楼”，自怨不該做了一个“專家夫人”；也不致有人感到在政治上不受重視，連書也讀不进去了。她說，这也是一种思想改造。

这篇报道，在这里打止了。根据这些先生的意見，是要改变观念。然而，怎样改变观念呢？有位先生說，这也不难，只要用事实去提倡。因为这是一种社会現象，掌握它的是人，是我們自己。

（光明日报4月25日第1、2版）

武 汉 書 簡

光明日报記者 文 冰

記者來武漢的時候，原來有一個主觀主義的主意，也想寫一篇“武漢知識界在激動中”或是“激動中的武漢知識界”，到了這裡，却怎樣也寫不出來。有人說，春風不度武勝關。有人說，春風已度武勝關。還有一種激情之論，說春風已繞過了武勝關，又吹到別地去了。到底度了還是沒有度，是不是繞到別處去了？有一位教授說，那只有春風自己知道。

武漢的知識界是不是在激動中呢？看起來是在激動的，有各種的會，有各種的發言，報紙上有各種的文章。但是有一位先生認為，激動的話，也是近幾天的事情，也還是開始，也還是在表面上，而且也還是在部分人之中。他說，在十來天以前，武漢的知識界還在東望上海，北望京華，為京滬兩地的激動而激動，為此地的不激動而激動，都還在“待時”。他說到在二十多天以前他和武漢一位在宣傳方面負責任的同志的談話，當時他問到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北京上海那麼熱鬧，武漢地區到底怎樣，為什麼不用一把勁推動起來，得到的回答是：“你急什麼，難道這比排隊買豬肉還重要！”這位先生說，我們的領導做事非常注重計劃性，首先必須把工作排排隊，然後一件一件依次來。百花齊放的問題，看來至少是要排在買豬肉的問題的後面。如果這幾天武漢知識界已經激動起來了的話，那就是買豬肉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另外有一位先生告訴記者的一位同事，說他在二十多天以前，也曾和一位負責同志談過這個問題，那位同志說，放總是要放的，不過，應當如何放才合式，放起來意見太多又怎麼辦，到時候又怎樣收——他正在考慮這些問題。這位先生認為這是思想問題。現在，這個思想問題真正解決了沒有？誰也不敢斷言。這就是“只有春風自己知道”的意思。

這樣說來，武漢知識界是不是真正在激動中，好像是要問春風，是

要看春風如何而定。

×

×

×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还是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記者觉得有一位老教授的分析很有一些意思，很值得听听。他說，武汉知識界是在激动中，不过有两种激动，一种是外冷内热；一种内冷外热。在群众方面，是外冷内热，心里早就在激动了，可是还没有表现出来。好比一个灌满热水的热水瓶，你不揭盖，当然看不出它里面激动到什么程度。你揭开一点点，它就冒出一点点热气，你多揭开一点，它就多冒出一一点热气。你把它倒出来，它就会热气大放了。当然，怕烫手的话，是不会愿意去倒出来的。至于内冷外热的，那就是各单位的领导方面。他說，这也許是以群众之心，度领导之腹，总之他有这么一个看法。在领导方面看来，这是中央提出来的方针，毛主席说了要放，而且要大放而特放，有些地方又放起来了，身为领导，不热起来是不行的，所以便热起来了。其实，内面是不那么热心的。这好比一个热水瓶装满了冰棒，放在六月天的太阳底下，外面的热是受了外力的影响。所以，他认为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目前情况下，还是“一杯之水，分而饮之，其味各别。”群众与有些领导的感受和心情是各有不同的。他說，長江大桥已经合拢了，群众和领导也应当像長江大桥一样，合拢起来，以同样的心情来看待这个问题，那时候，才真正是百花齐放、众卉纷陈的时候，才真正是武汉知識界激动的时候。

有一位搞艺术的先生說的话，虽然语言和喻譬的方法不一样，而内容几乎完全和这位老教授的话相同。他的话，是記者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到的。他說，有人說春風吹到了武汉，他不同意，他連一点風尾子也沒有感到。他认为现在是有些领导方面在走过場，虽然組織了一些人帮腔，但大多数的群众还是坐在台下，抱着一腔热情却又木然無动于衷。这是因为走过場終是走过場，自己沒有真正浸沉于艺术之中，为艺术所化。——他指明說，他所說的艺术，是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样，当然不但不能化台下的，連帮腔的也还不免有些吞吞吐吐，羞羞答答。有人說领导方面是导演，要把群众的思想感情引导到台上去。这就要导演自己有这个思想感情，真正为艺术所化，才能使台上台

下打成一片，走入一个共同的境界。现在却还看不出这种现象，还是在走过场。所以，他认为，虽然立夏已过，可是春风还没有吹到武汉。

× × ×

近几天来，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领导同志，邀请知识界开了许多次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大家说了许多从前不肯说的话，提了不少意见。报纸上“大胆地放、大胆地鸣”的鼓动性的标题也出现了。为什么有些先生还有这样的感受，认为知识界还没有激动起来，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少呢？上面所记述的这些先生的看法，当然可以寻思。但除了这个之外，记者连日在采访的接触中，感到至少还有两个摸得着的原因。

一个是表面的原因，就是风还只是在水面掠过，没有把潏蓄已久的池水搅动起来。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领导同志已经带头劲起来了，可是深入下去，拿武汉地区的高等学校来说，有些学校就还平静无事，一片太平景象。好像外边热火朝天，那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记者到东湖区去访问一位高等学校的教授，谈完了话后，记者问到他们学校开展“鸣放”的情况，他笑着说：“此间尚无动静。”他说，要是说春风吹到了武汉的话，那么春风还在武汉城里，吹不到东湖。他们学校的领导同志还是像从前一样，整天坐在楼上，没有“到民间来”。记者问：难道教授们没有感染到外面的空气，没有这个要求。他说，要求白要求。大家已经有了凡事由领导带头布置的习惯。群众不热而领导热的事，一次动员报告，大家也只好热起来，坐下来漫谈体会一番。群众热而领导不热，那就只有放在心里热热而已，毫无办法。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是来打破这种习惯，不过不是一时的事。

还有一个是比较深远一点的原因，那就是条件反射问题。据一位教授告诉记者，武汉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而后的历次运动中，受震撼是比较厉害一些。这个印象是一时不易褪色的，所以顾虑多一些，是必然的事。他说，他虽然在历次运动中都不是对象，头上没有吹过什么风雨，但是也一样的有条件反射，把别人的每一件事都拿来当作“人生的”经验教训，甚至对老婆说话都比以前慎重，话到嘴边又咽住了，害怕那个连老婆也被发动起来了的六亲不认的时候。还有，有些学校的

領導同志，在歷次運動中，年深月久養成了一種家長作風，不但在黨群之間挖下了一條鴻溝，而且利用和引發了有些人的不健康的心理，在群眾與群眾之間也挖下了一條鴻溝，以這些鴻溝作為辦事和對付知識分子的办法。南湖有一所高等學校，對凡是平日在各項事件上同領導意見一致的教授，都給以不同的待遇，吃飯有工友拿菜拿飯，早晚和飯后有工友送茶送水。據說有一位教授一向享受這種待遇，有一天因為工作同領導發生了一點小小的爭執，第二天，這種待遇便取消了。而且，還把部分教授劃為“落后分子”，這些“落后分子”在學校中是一個孤島，得不到半點人情上的溫暖，處處遇到的是白眼。在飯廳中吃飯的時候，“落后分子”拿着飯菜到桌上去，正在桌上吃飯的“非落后分子”都紛紛移到別的桌上去吃，表示與“落后分子”坐不同席。把這件事告訴記者的這位教授開玩笑說：這樣的事情是還有的，如果記者同志把這些材料搜集起來，可以寫一篇很好的“武漢生活場景”或是“外省散記”。他說，知識分子本來是又麻木又敏感的，這幾年來變得更麻木而又更敏感了。要改變這種條件反射，不是講講道理可以辦到的，須要下一番工夫。他認為有些先生說春風沒有吹到武漢，不完全是外面的原因，而是自己這顆種子受過凍，一點點風還吹不暖它，發不出芽來。

× × ×

從北方來的人，到東湖區走走，看到山光水色，一片暮春時節景象，才真正感到是到了江南。不過，自然的景色是一回事，而知識界的心理又是一回事。有一位教授說，這裡有山有水，自然的景色很好，可是知識界卻感到非常沉悶。要把這種沉悶空氣打破，使知識界真正激動起來，首先是領導方面自己要真正激動起來。對於知識界，現在要的不是邏輯，不是講道理，邏輯的力量大家都已從毛主席的講話中感受到了。邏輯的力量用得着的還是領導自身這一方面。對於武漢的知識界，現在要重視的，要特別重視的，是“心理”，是其來有自的而表現於此時此地的心理。

看來，武漢的知識界還是在激動中，接觸所及，在人們的心里，處處有着“山雨欲來”的景象，不過還有待於春風的催發。

“四顧無知己 比鄰若天涯”

光明日報記者 文 冰

伐木丁丁

鳥鳴嚶嚶

——詩經

求友的聲音

記者來武漢的第三天——4月30日，在一次大學教授座談“鳴放”問題的會上，聽到中南政法學院一位教授談到知識分子沒有朋友的問題。這位教授以低沉的聲音念着他的發言稿。他說，在從前，知識分子是“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他們愛朋友，他們希望有朋友。而且，每個人都有二三知己，即所謂“通家之好”的朋友。這樣的朋友，工作之暇，你到我家走走，我到你家坐坐，隨便談談“思想、山水、人物”，談談生活，談談家人生計，談談過去的夢和對未來的憧憬，談談自己的工作和學問上的心得與打算，談談國家大事——彼此的看法和見解。總之，可以無所顧慮、隨心所欲地談談心裏的話。這中間有爭論，有批評，有友情的慰安，有歡喜，也有所得。可是這幾年來，“友道”這一項已從知識分子的生活中抹去了。黨提倡思想見面，這是好的。但是在知識分子中，真正能以思想見面的又有幾人？在朋友之間，本來可以思想見面的，也不“見面”了。所謂思想見面，變成彼此學會了說幾句干巴巴的“原則性”的話。這樣的話，言者自覺是在不得不爾的裝腔作勢，說過之後，回想起來，對自己的說話每每懷着難言的愧悔，深恨自己假話的那種心情和那副嘴臉；而听者也深感厭味至極而又莫可奈何。這樣一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日來日遠了，新朋友當然是不會有了，找不到了；老朋友呢，也變成了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昔日的知己，現在見面若不相識，連哼哼哈哈也有所顧慮了。他說，這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和生活改造又有什么好處呢？這對“百花齊放、百

家爭鳴”又有什么好处呢？

关于这个问题，早些时候，有人曾以“五倫之中無朋友”为題提出來过。后来有人批判了它，說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調，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在这次座谈会后的第二天晚上，記者去訪問武汉医学院的一位教授，他对記者談了三个問題：第一个問題，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人民内部总是不断的会有矛盾的；第二个問題，人民内部的矛盾，由于有些领导人員处理不当，矛盾更加深了；第三便是这个问题。他很不同意那种批判。他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这句话是一頂八寸三分的帽子，是有些人对待知識分子的法宝，也是有些知識分子自我批判的常用的語言，这頂帽子，好像戴在任何一个知識分子的头上，都很合式。于是便胡戴乱戴，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位教授是一个很容易激动的人，不像常見的一般自然科学家那样持重。他說着話，时而霍然地站起来，又坐下；把他的桌灯开开，又拍囉一下关上。他說：你不要以为搞社会科学的人，文学家，艺术家，才会談这个问题；以为我們搞自然科学的人都是木腦壳，除了实验室和老婆孩子之外，什么也不在意了。他說：“生活！生活呀！記者先生。”他說他是自上海同济医学院合并調到汉口來的，去年暑期，他到上海去，原想在上海会見到从前的一些朋友，談談別后的生活与心情。可是不料走到沙漠上去了，大家見了都很冷淡，沒有往日的那种情趣，談不上勁，彼此都感到很别扭，使得他再也不敢去找他們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他說他理解而又不理解。他認為，总而言之，統而言之，这不是什么思想水平的提高。

求而無应

华中师范学院有一位教授，有一天和記者在珞珈山后一条小徑上走着，他說到党群关系問題，說到“牆”的問題。他說，把話說全一些，应当說是党员和群众的关系問題。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并不下于共产党员。他听到一位教師說，他（那位教師）每次渡江看見正在建造中的長江大桥，总要想到，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这样的桥是建不起来的，就是建得起来，也不知几人贪污，几人中飽，几人發了大財，耗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錢，才建得起来。他說，这就是群众拥护共产党、热

爱共产党的心情。而共产党也是一向走群众路线，是要群众的。可是表现在有些党员身上，就不是那样了。在学校中，共产党员也一样是人，一样只有四肢五官，并没有三头六臂。共产党员衣服上并没有写明“我是党员”的标志。然而他的脸孔上的“党性”却是一望而知，特别是年青党员。更可怕的是那些快要转正的预备党员。在学校中，党员是只和党员有说有笑，见了群众就冷冰冰的。有时候，他们正在谈着话，见到非党的人来了，马上就把手收起，现出一付凛然不可犯的样子。这对知识分子说来是最使人难堪的。他说起清朝时候他们乡下有一个大官“衣锦还乡”的故事。那个大官“衣锦还乡”了，乡下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官，大家都围着去看。这个大官对老百姓大声说：“有什么看的，我和你们一样是人。我和你们，只是这里不同。（他拍拍肚皮。）我肚子里装的是书，你们肚子里装的是大粪。”他笑着说，现在有些党员对待群众，是不是也有这个大官对老百姓的看法呢，以为我和你们一样是人，只是脑子不同，我脑子里装的是马列主义，你们脑子里装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等等肮脏思想。或是我是一张白纸，而你们呢，是社会经历不单纯，历史复杂。他说，这样的想法是有的，这就使得他们不亲近群众，群众也不敢亲近他们。

他说，在旧社会，他算是比较进步的，到了新社会，常常感到自己不行，自己落后了。但这种感觉，每每见到有些对人冷冰冰的党员时更是强烈，而强烈之中，又有着一种不服气的思想。他也曾试着想去接近党员，怀着嚶嚶求友之念，这当然不能求之于青年同志之中，年龄的距离是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距离的一个重大因素，“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他要的正是这种通过生活的和由于生活接近而产生的思想感情上的逻辑力量。可是在年龄和生活经历不相上下的党员同志之中，他并没有获得这种力量的支持，不要说是希望建立深厚的友情，就连接近的愿望也被事实吹散而不敢萌动。他说知识分子有着一种一时难以克服的性格上的弱点，非常珍视自己，心里尽管有自卑情绪，可是外表上总希望自己不卑不亢，你既不愿下交，我也就不敢高攀了。有好几次，党员同志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和三句话就想打发你走开的语言，使他久久不能自释，自卑和不服气的思想更加抬头了。他不同意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感

情或情調的說法，他說：“希望和共產黨員做知心的朋友，難道不是熱愛共產黨、擁護共產黨、對黨懷着一片赤心、希望靠近共產黨么！這難道不是可嘉的、值得鼓勵的么！而共產黨員在群眾中有朋友，不是更能聯繫群眾而擴大波瀾么！這難道不是好事，這樣的黨員難道不是好黨員么！”他說他知道不少教師有这样的願望，不少教師有過这样的經歷，不少教師怀着这样的想法。他聽到有一位教師說，共產黨員一見到非黨的人，他的“原則性”，他的“思想水平”，他的“党性”，就一齐擺出來了。他們對群眾的思想教育就是布置政治學習和作大報告，他們的聯繫群眾就是個別談話了解思想情況，甚至是依靠積極分子、听彙報來了解思想情況。如果有黨員來找你，那不是他出了問題便是你出了問題，如果支部書記找你，就一定是你出了什么事，凶多吉少了。他說，這話听來雖然好像有情緒，然而却是笑語。“枝頭小鳥亦朋友。”黨員不願也好像不可以在群眾中有朋友，群眾想在黨員中找到知心的朋友，此道之難，是難于上青天了。

“問題還不止此。”他說。不但在黨員中找不到朋友，就連多年相處，可以談談話的人，也可以說得上是老朋友的人吧，一旦入了黨，情況也就變了，他也不大願意與你接近了，談話也變了調子了。有些臉嫩嫩的，感到剛入黨便突然變一付態度，不太習慣，也怕老朋友背地里罵他，然而又似乎不能不變，因為他是黨員了，於是見了面便非常尷尬。他說，有一次他聽到他的一个說得上是老朋友的人入了黨，他是一則以喜，一方面又有些爽然若失，感到自己又失去了一個可以談談話的朋友了。他說，這是一種觀念，他寄望於這次整風能夠改變這種觀念，改變黨員的也改變群眾的對友誼的“認識論”。

寂寞的心情

武漢大學有一位教授，是記者的家鄉人。有一天，記者去看他，談到家鄉情況，談到一些彼此認識的親戚故舊，記者問他，在武漢大學，还有什么家鄉人在這兒么。他笑着說：有一位，但他是黨員，他是不太理我們的。後來談到一些別的事情，又轉到這個話題上。他說，照理說，家鄉人見了面，總會感覺親切一些，又在一起工作，朝夕可以相見，應當是有着進一步做做朋友的條件，可以談談話的。然而因為他是黨員，

見了面，他便正襟危坐，無話可說；偶然相遇，笑一笑打个招呼，那笑，也好像是很勉強的，从臉上挤出来的笑，当然会使人不敢亲近，热不起来了，他說，他总感到党员缺乏“人情味”，可是，党章上几曾有这么一条，党员不能与非党的人交朋友，党员不能有人情味呢！

有一位美术教授說得更有趣。他說，他是不但在党员中沒有朋友，他也不敢希冀去与党员做朋友，而連同是“群众”的朋友，也在这几次运动中搞得干干净净了。好像大家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一提高，彼此便不認人了。他說，从前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現在呢，是“四顧無知己，比鄰若天涯，”河水不干井水，互不往来，大家都閉美自守了。他对記者朗誦了他描述自己的心情的——

从此我沉默，
像一枝山花，
寂寂地开，
寂寂地謝。
从此我沉默。

他說，百花齐放，他是要在深山萑谷之中自开自放了。

这种感受，不仅存在于中年以上的教师中間，在青年教师中間，也同样存在。武汉大学有一位老教授，他是湖北省政协的委員，去年他和几位政协委员分途視察了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等四所高等学校，四份視察报告中都反映了非党团员的一个相同的意見，他們与党团员的青年教师中間有一条不是看不見的，而是非常明显的界限。不但党团员不和他們做朋友，把他們看作“化外之人”，原来在一个学校一个班上多年同学，感情本来不坏，只要有人一旦入了党、入了团，他們的友情就發生了突然的变化，一刀兩断，对他們疏而远之了。他們对这种今非昔比的“奥伏突变”，非常反感。他們問：难道党是这样教育人的么！难道团是这样教育人的么！这位老教授在一次座談会上談到这件事情，他說，这种情况是帶有普遍性的，这种意見也是帶有普遍性的。据記者的接触，确实是帶有普遍性，在学生中間就已經开始在培养这种風气了。記者有一天到武汉大学去，看見一堵牆上張貼着許多个班級的学生討論“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琳琅滿目的大字报。其中有好几张大字报

上提到，为什么党团员同学对非党团员同学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只与党团员同学亲近而不与非党团员亲近。为什么党团员同学对党团员同学便叫“同志”，对非党团员同学便不叫“同志”而只叫“同学”，“同学”本是一个好称号，但是这样有意識地分得清清楚楚，听来就刺耳了。难道非党团员同学就不是党团员同学的同志么，连做同志的資格也取銷了么？

在这里，記者还要补述一下前面說到的那位华中师范学院教授的教授的一点意見。他說，他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員，有些黨員是有宗派主义情緒，民主党派的成員也有些人是有宗派主义情緒的。民主党派成員中有些人对共产党員那种“慷慨不犯”的神色，对他們那种鶴立之而鷄視之的样子，抱着反感，这固然是有些共产党員有缺点，对党的政策，对黨員在群众中的作用，对知識分子的估計不正确。但是有些人的这种情緒之中，深入挖掘下去，也是有些宗派主义情緒的。这种宗派主义情緒，有的是由于有些黨員的宗派主义情緒引發出来的，是力学上的反作用；有的則是由于自卑和知識分子性格上的自高而产生的。另外，有些無党派的人对民主党派的成員也不滿意，認為他們也一样是高不可攀的。他說，这种情况，在高等学校还少見，在中等学校里就很显著了。他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接触到不少年齡較大的無党派的中学教师，他們对此就有深深的感受。他們說，民主党派的人和共产党員一样难亲近，他們自視比無党派的人又高一等。这位教授会心地笑着說：“問題复杂着嫩！”

离群索居的原因

为什么“友道”这一項会从知識分子的生活中抹去呢？特別是在有些知識分子之間，为什么昔日的老朋友也不来往了呢？这个問題，記者从中南財經学院一位教授的口中找到了一些解答。据說中南財經学院是过去搞运动搞得最热火的一所学校，也許这位教授的話有它“一定的”代表性。

他說，几年来的几次运动，有很大的收获，对知識分子說来，起了很大的教育、改造作用，这是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承認的。但是，也产生了不少的副作用。“友道終絕”便是副作用之一。他引用了刘季孫

的“广絕交論”中的兩句話：“草虫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他說，朋友之道，应当有求有應，而現在是有求無應（指對黨員而言），或是徒自心里有求而又各不敢應（指在非黨的人士之間）。為什麼呢？因為朋友中間講求的是個“信”字，而現在已經失去這個“信”字了。黨員不相信非黨的知識分子。在有些知識分子之間，又互不相信，你不知道我將來會不會出什麼問題，我也不知道你將來會不會出什麼問題，為着避免麻煩，圍個干淨，那就不如閉門家里坐，與外界不通聲氣，可以少担些心，什麼事也惹不到自己頭上。這樣，當然談不到什麼“友道”。他笑着說，中央一再說過，“言者無罪，聞之者足戒”。可是在下面，就不是這樣的，特別是運動來了，更不是這樣的，而是“言者有罪”了。為着查“怪話”，往往因為曾經偶然說過一句連自己也記不起來了的不相干的話，把它當作“怪話”，或是把你說的話截頭去尾，只抓攬中間的某一句，認為“怪話”，結果在大民主的風暴之中，你百口莫辯，惹出一個大麻煩。和朋友來往，總不能相看兩不厭，彼此不開口。一開口，說不定便會受到“是非只為多開口”的教訓。那就不如不要什麼朋友不朋友，遠者不通信，近者不來往；來了信不回信，听了話不答腔；小組發言，照念發言提綱，私人相對，互不開口。大家把生活圈子尽可能弄狹一些，把生活弄得簡單化一些，學會做一個謹願君子。

他認為在過去與幾個朋友來來往往，還有一個令人耽心的地方。批評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的作風，這還沒有什麼要緊，可以經受得起。最可怕的是說你搞小集團、小宗派，這樣，問題就大了。他說，因為沒有朋友，有人感到生活寂寞，這只是一面；有人却以此自慰，因為可以心安理得，社會關係不複雜了。所以，知識分子的“友道終絕”，是外在的原因轉化為知識分子心理上的原因。由於風氣所屆，把人間的友情這一項否定了。

兩位老教授的意見

最後，記者想記述一下兩位年已古稀的老教授的意見。他們到了爐火純青之年，所以說話也有爐火純青之味，他們說，這幾年來，在有些知識分子之間，不太來往，而現在又有着嚶嚶求友的聲音，這是不足為奇的現象。“大變革嘛！”在社會大變革的時候，閉門寡交，明哲自

保，是自古已然的。何況這一次大變革，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的。在短時間內，分不清敵友，因而寡絕交誼，這原是以社會的敵友為私人的敵友，這種心理難道能說不是好現象嗎？現在，客觀形勢不同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分清了，知識分子發出需要朋友的声音，這就不用說是好現象了。他們認為這也是“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的問題。

他們說，“信”是首先要認識對方，不認識對方是“信”不起來的。因為社會大變革，一時分不清敵友，當然很難“信”。而且，“信”是在建立在“義”字上面的，所以古稱“信義”。“義”，在從前，它的含義比較狹小。現在的“義”，毫無疑問就是社會主義。在這樣一個“大義”之下，“信”的建立是會更鞏固。經過這樣一次（指的是鳴放和鑿風），相信會能看到新社會的新友誼的出現。在朋友之間，會坦率談心，會話家常，會談生活，會吊喪問疾，會彼此關懷，會有人情味，會有不吝批評的諍友。會能重溫到“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那種情味了。“不過”，他說，黨員與非黨的人做知心的朋友，却還不是說說能夠做到的，因為除了風氣的轉變外，更重要的，是通過生活而來的思想水平的提高，一句話，能体味黨性和宗派情緒是兩回事。而這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光明日報 5 月 22 日第 2、3 版）

第一朵迎春花

——記東北工學院機械系教師鳴放前後

光明日報記者 殷 毅

潛藏的激流

4 月中旬，沈陽市高等院校傳達了毛主席的講話。它給知識界帶來了春的信息。

可是，正像殘冬里偶而括過一陣東風，大地依然是一片沉寂。

真的這麼沉寂嗎？據此間一位熟悉知識界氣候的人士說：“未必盡

然。”

記者和知識界多方接觸以後，才隱約察覺到沉寂的另一面。它像一條流速緩慢得幾乎靜止的河流，表面上難以察覺它在運動，而河面下的卻潛藏着急流。

只要你注意觀察，在很多場合可以獲得這樣的印象。在集會上，有的人旁敲側擊、轉彎抹角的表達一個意思；有的人欲言又止，但從他激動的神情里，似乎能觸覺到他在想些什麼。在書齋里，人們促膝談心，滔滔不絕，和場面上又是兩個樣子。這些，在在使人感覺到，毛主席的講話確實給知識界帶來了無畏的鼓舞、激情和希望，欲鳴欲放的情緒，在增漲着，擴張着。只是領導上“按兵不動”，只是外界空氣冷了一些，才使人有沉寂之感，和“春來何遲”的嘆息。

要放的不放，不要放的動員放

在東北工學院，開出了沈陽第一朵迎春花。

東北工學院，和沈陽其他高等學校，多共同之處，少特殊之點。把東工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動向，看成沈陽知識界的縮影，也未始不可。

東工教師听了毛主席講話的傳達以後，要求鳴放的心情是很迫切的。但是，像其他高等院校一樣，講話傳達過後，再也沒有什麼動靜了。可是，人們思想境界里的春光是鎖不住的。有些教師三五相約，關起房門來鳴放。北京、上海的報紙，像磁石般的吸引着大家，人們爭先閱讀，互相傳誦。有位教師說：“北京、上海的報紙給我們很大鼓舞。雖然他鄉春色，適足以慰念春之渴。”

大家在背地里興奮、激動之餘，不免又感慨又疑慮：為何彼處春暖，此地秋涼？

就在這時，院領導布置學習了，規定以學生為重點，教師鳴放慢慢再說。

當時是這樣布置的：

從5月8日起，學生停課一週，號召教師在自願原則下參與指導學生學習；至於教師的學習，慢慢再說。作出這樣的決定，據說是依據以下兩點理由：一、學生人數比教師多，照顧多數，鳴放自然應該以學生為重點；二、通過教師指導學生學習，改善一下師生關係。

在布置學習的會議上，當時就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貫徹中央指示的精神，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鳴放重點在教師而不在學生。布置下去以後，教師們意見紛紛。對於這些意見，領導上充耳不聞，仍按老一套辦事：決定么，就得貫徹。

想不到被領導上認為要求先“放”的學生，有些也不願意把他們作重點。隔五個星期就要大考了，本學期已經因“流感”停課一周，再停課一周鳴放，大考前的復習時間更短了。有些學生為功課著急，哪有心鳴放。學習布置下去以後，有的學生向領導上提出這樣的問題：“學習毛主席講話期間，午睡時間能不能做功課？”學生不想學，領導上有辦法：動員。5月6日，開了一個動員大會。

有位教師評論領導上的措施說：“要求放的不讓放，不要求放的動員放，真是‘倒行逆施’。”

自發的鳴放

教師們提出一連串問號：為何我們的學習布置和北京、上海不一樣？為何如此本末倒置？是否不要我們鳴放？領導上是否想“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問題提上去了，却如石沉大海，渺無音訊。

平日被捆綁得謹小慎微的教師，這時竟耐不住了。就在同學開始學習的時候，機械系部分沒有參與指導學生學習的教師，自發地組織了三個小組進行學習。顯然，有一股偉大的動力在推動着他們。

自發地組織學習，不能說顧慮都沒有了。特別是參加這三個組學習的黨員教師，在會上一言不發，態度冷淡，就更加引起非黨教師的疑慮：院領導支持我們嗎？是否還像以前一樣，“放”過以後再給我們算總賬？

明擺着，這些疑慮不解除，會是開不下去的。大家商定請院黨委書記來參加座談，請他表明一下領導上的態度。

院黨委書記來了，也講話了，但是沒有正面的明確的答复大家的要求。

教師們於是激動起來，八十二個人聯名寫信給中共沈陽市委第一書記焦若愚，要求支持和幫助。他們在信中寫道：“我們學習毛主席的講

話，兩天來進行得十分熱烈。但我們缺乏支持，尚處在群眾自發狀態。院領導遠落在群眾的後面，沒有下定決心，……”

焦若愚支持他們鳴放，10日、11日親自參加他們的座談會。就在這個時候，東北工學院走在其他院校之先，突然沸騰起來，劃破了沈陽知識界的沉寂。

預兆春暖

東北工學院機械系教師自發鳴放，還有一段小插曲：

10日座談會散會以後，有個傳說，權威方面認為自發鳴放是鬧“中民主”。座談會主席團成員在興奮之餘，聽到這些流言，真如冷水澆頭，涼了半截。當即開會檢查。會上空氣沉重、緊張，誰也不想講話。大家在痛苦地思索着始料所不及的嚴重後果。

中共沈陽市委第一書記立即批判這種流言、給他們撐腰，認為他們鳴放是健康的、正確的。這才解除了他們的顧慮，出現了11日大鳴大放的局面。

現在看來，機械系教師鳴放，不僅是健康、正確，而且產生了廣泛的積極的影響。

機械系主任王銘勛教授說：“在我們東工說，這是‘星星之火’，它喚起了人們壓抑着的情緒和希望。”

這樣的估計可能是恰當的。11日，很多外系教師參加座談以後，激動地表示：東工還是有希望的，我們回去一定也大鳴大放！

13日起，各系都鳴起來，放起來了。

但是，它的影響還不止在官牆之內。當報紙上發表消息以後，在全市高等院校裏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好像一塊石頭投入平靜的池水，激起了翻滾的浪花。

各校的教師們紛紛要求鳴放。沈陽農學院副教授張信达說：“聽到東工的消息，大家都躍躍欲試。”藥學院副教授劉德儀說：“我們希望東工的風吹到藥學院來！”

事實上，這陣風已經吹到了各高等院校。本星期內，各校都先後動起來了。現在，沈陽高等院校再也不似冬日之沉寂，而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春日風光。（光明日報5月24日第3版）

揭穿右派分子殷毅在沈陽工学院点火陰謀 “迎春花”掩盖下的“第一槍”

沈陽日报記者 李 剛

在东北工学院机械系里，以陈尙炯为首的民盟右派集团在今年5月上旬掀起一股反党歪風，吹倒了南湖里的春水。这件事当时曾引起沈陽知識界的注目。东北工学院經過近两个月的反右派斗争，已經揭开这一層騙人的紗幕真相大白了。

鮮花耶？毒草耶？

光明日报5月25日發表一篇署名“本报記者殷毅”写的通訊，对东北工学院机械系的鳴放活动倍加贊揚，把它叫作“第一朵迎春花”。这个結論，当时并没有为东北工学院全部教师所接受，不少的人不但不叫它“香花”，反而叫它“毒草”；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叫它“香花”，机械系右派集团就利用这朵“迎春花”欺騙了一些善良人。教师之間好像頓時失去了共同的語言。但是，經過反复的辯論和尖銳的斗争，几乎全部教师的看法一致了，机械系右派集团的成員，也不得不認輸。做为这个右派集团的头目之一的陈尙炯，就說这是一棵“毒草”。

这棵“毒草”是民盟沈陽市委右派分子早在半年以前撒下的，陈尙炯在7月25日交代了陈彥之1956年12月17日对全市新盟員所作的傳達报告，陈尙炯說这是灌輸右派思想的一課，陈尙炯承認自己有着內在的毒素，接受了这顆有毒的种子，以后又受到陈彥之的日熏月染，特别是接受了章罗联盟的反党綱領之后，便出土發芽成了“毒草”。也难怪備安平和陈彥之派遣的“使者”殷毅、吳从枋如此“灌溉施肥”。

“迎春花”原是“第一槍”

根据机械系民盟右派分子所交代的材料証明：殷毅帶着備安平面授的机宜，本想从沈陽赶到長春去点火，可是他从盟市委右派分子那里發現了这棵难得的“毒草”，便临时改变去長春放火的計劃，退了早已买

好的車票，和吳从枋一起在5月10日趕到东北工学院。“第一朵迎春花”就是殷毅和吳从枋合作写出来的。

吳从枋說：“这是全国的創举，中共沈陽市委和沈陽日报不支持，就別相信他們，光明日报和盟市委支持你們。”这篇文章原来是一颗冲锋陷陣的烟幕彈，掩护着机械系右派集团投出了第一枝毒槍。吳从枋在第一篇草稿里贊揚机械系的鳴放是“刺出沈陽知識分子鳴放的第一槍”而且是“可貴的一槍”。但是他在第二篇草稿中又改为“沈陽第一朵迎春花”，把这支槍遮盖得首尾不露了。也許殷毅（或備安平）認為吳从枋对这一槍的估价太低，索性改为“第一朵迎春花”發表在章罗联盟把持下的全国性报纸——光明日报上。如今，右派分子在群众中点起来的怒火已經把这朵“迎春花”燒成塵芥，塗了毒的槍已人人可見了。

一陣陰森的歪風

陈尚炯平日里住在科南宿舍的一角，常常为了在新社会里得不到他所說的“友情”而自嘆“孤独”，但是在春假之前却一反常态，曾數次趕到盟市委去。他和岳从風、王裕生等民盟右派分子的接触也頻繁起来，他們在4月16日鳴放前的一次民盟小組会上，討論了肃反、知識分子政策和民盟的地位等問題，把內心深处的怨恨都傾泄在小組会上，他們研究了如何把它放出去，排了專題，分了工。他們还密謀利用春假熊岳旅行的机会在盟內鳴放，統一右派思想。王裕生也根据陈彥之“落后的也要發展”的指示制定了大發展的計劃，扩大盟內右派力量，还准备發展所有的超齡团员和大部分党外高級知識分子，以扩大声势。他們对机械系的党员、团员的政治思想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并在他們認為合適的对象当中做了許多工作。歪風在机械系里已經慢慢地刮起来，造成了“山雨欲来風滿楼”的形势。

4月29日，盟市委召开扩大會議，陈彥之在会上發出了章罗联盟在沈陽点火的号召。他对鳴放的解釋是“这里鳴来那里放”，并号召盟員尽量在“自己家的报纸”——光明日报上發表任何意見。这次會議在沈陽市刮起了一阵陰森的歪風，再加上光明日报兩名記者从備安平鄰縣带来的火种，真是風助火势，火借風威，对东北工学院來說，使那些“平日被束縛得謹小慎微的”右派先生（摘自第一朵迎春花）“感到有一顆

偉大的動力”，这股動力“喚起了”他們“壓抑着的情緒和希望”（右派分子王銘勳語）。

潛藏的激流

東北工學院的教師和學生們，在優美的環境里學習着用和風細雨的方式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這如果和暴風雨時期解決敵我矛盾比較起來，真好像“一條流速緩慢”的“河流”。但是在一般人“觸覺”不到的河面下，却潛藏着由民盟右派先生們翻滾所掀起來的“激流”。

東北工學院黨委布置學習之後，陳尚炯非常敏感地抓住時機，推薦他中意的幾個人當了小組長掌握學習，並通過學習，對材力、理力、另件等教研室教師的思想情況摸了底。陳尚炯、岳從風、王裕生，還有共青團員、系工會副主席郭福純頻頻交談，一致認為時機成熟，決定展開活動，創造條件，奪取領導權。

民盟右派分子在機械系展開了“地下活動”。他們“三五相約”在科南宿舍的密室里，在南湖公園的林蔭深處或人迹稀少的小徑上，滔滔不絕地交談着心靈深處的聲音，這和他們在學習座談會上“旁敲側擊、轉彎抹角”（摘自第一朵迎春花）的發言完全不同。陳尚炯把這個階段叫做訓練幹部、統一思想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以前，陳尚炯、岳從風、王裕生對郭福純進行了更多的工作。4月29日，陳尚炯聽了陳彥之指示的第二天，突然找到郭福純，他斷定學校里的鳴放搞不起來，說黨委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並告訴他在即將到來的大風浪里，如何從肅反和宗派主義方面向黨委“將軍”還把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推薦給郭福純。

郭和黨內右派分子崔甫曾在南湖公園暢談大民主和肅反問題，他還問過右派分子余大偉：“一旦搞起來大民主你怕不怕。”教研室的學習小組也在他們的策動下，按照大民主的需要逐步擴大到小組聯合會、以至全系的聯合鳴放大會。到此，右派集團的思想基礎已逐步統一，組織聯繫也逐漸加強，幾股“潛藏着的激流”（摘自第一朵迎春花）匯集起來，涌現在平靜的河面上，就出現了一個漩渦。

“前台”與“后台”

這是機械系全系的一次聯合鳴放會。

5月11日上午，接着前一天的座談會繼續鳴放，中共沈陽市委第一書記焦若愚也應邀參加。

當天早晨，大會主席王德智透露給民盟小組長王裕生一個消息：聽說機械系黨支部要在會上聲明支持鳴放。王裕生聽了之後，堅決要求把他的發言排在黨支部代表的前面，他說民盟決不作黨的“尾巴”。

王德智掌握發言順序費盡了苦心，先遞條子的黨員不能發言，陳尙炯沒遞條子卻繼王裕生之後發了言。陳尙炯污蔑市委不支持鳴放，向焦書記“將軍”。

接着，郭福純嗷嗷大哭，楊嶽霖和余大偉等右派分子也連哭帶叫地起哄。被他們拉來“助威”的工藝系反黨頭子許冶同，歪曲事實污蔑肅反，在會上叫“屈”喊“冤”；許冶同右派集團的“副將”王格，也大叫“哪里有我們的祖國，到處是鎮壓”。

右派分子的丑態真是原形畢露。

串演這一幕群丑放毒大戲演並不是偶然的，我們走進幕後，就會發現誰是後台老板。

就在策動八十二名教師請願的當天晚上，陳尙炯、岳從風、郭福純聚集在一起，研究焦書記來了以後講些什麼，陳尙炯決定“對焦書記放硬的”，別人也按專題作了準備。第二天，殷毅和吳從枋聞訊趕來指揮。殷毅對他們說：“我走過全國不少地方，最難過的是黨委這一關。”吳從枋也下令“首先突破黨委這一關”“爭取鳴放領導權”。

陳尙炯等根據實際情況提出了行動口號：“打破黨委，民盟出頭”。

殷毅和吳從枋參與了這次鳴放的幕後指揮，參加了座談會，還贊揚了王裕生的發言，前臺後台的真相了如指掌，可是，他們硬要在“第一朵迎春花”里說它是“自發的鳴放”，除了說他們別有用心，還能說甚麼呢！

“計日而待”的“花”“果”

吳從枋在“第一朵迎春花”的草稿里，把機械系右派分子的反黨活動看成“一棵可貴的種籽”，認為“它的成長壯大，開花結果”“可以計日而待”。

在向焦書記“將軍”的當天中午，吳從枋就召集機械系民盟成員講

話，要求把鳴放引向爭取民主黨派的平等獨立和如何辦校，以便爭奪領導權。

在13日的機械系鳴放會上，右派分子污蔑黨委已“陷于癱瘓狀態”，表示不信任，楊嶽霖也提議成立站在黨、行政之上的非常委員會。14日中午，在陳尙炯的書齋里又開了一次秘密會議，終於改選了中心組，排除了堅持貫徹黨委指示的共產黨員。改選後的中心組再沒有原則上的分歧了。民盟右派分子支撐着黨市委候補委員、機械系主任王銘勛這杆大旗迷惑群眾，王銘勛也為了實現個人野心，甘心作掩護右派集團的金字招牌。於是，以民盟右派為核心的反黨集團脫胎成型了。

浪花里的泡沫

“第一朵迎春花”把機械系右派集團看成“一塊石頭”，盟市委右派分子也確想把它投入“平靜的池水”（按：影射其他高等學校），“激起”“翻滾的浪花”。吳從枋在5月29日對王裕生暴露了這個意圖。他說：“陳主委（按：指陳彥之）下決心大干了，盟市委已成立了工作組，領導南湖地區高等學校聯合鳴放”，並要求王裕生總結經驗向外推廣。民盟內部刊物“遼寧工作簡訊”果然介紹了機械系的鳴放經驗，盟市委右派分子也夾持這個經驗到其他高等學校去煽風點火。

吳從枋在6月1日曾指示陳尙炯：“有些事情盟應該出頭”，“黨委撤出學校勢在必行”。人民日報“這是為什麼？”社論發表之後，陳彥之仍利令智昏地認為時機成熟，準備在6月13日召開盟市委擴大會議，向黨提出具體方案攤牌。大有“收拾殘局，舍我其誰”的氣概。

從這個陰謀來透視東北工學院，原來陳彥之把機械系右派集團當作一個據點，一面具體指揮它奪取全院領導權，一面用它來推動南湖地區以及全市的反黨活動，以便貫徹章羅聯盟的綱領，實現“以盟代黨”的目的。陳彥之的錯誤估計真是一脈相承，和章伯鈞召開的六教授會議對目前形勢的錯誤估計一模一樣，實在是過于天真了。

平靜的河面，的確被他們激起了翻滾的浪花，不過，他們的野心和鴻圖也變成了浪花里飛濺出來的泡沫，只是在空氣里增多了一些水分而已。

（原載沈陽日報，轉自光明日報8月4日第4版）

“中国人民大学

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

光明日报记者 徐颖

“中国人民大学在过去任何一个运动中，都是最先进的，这次‘鸣’‘放’却落在人后了。”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许多教授都提出这种批评。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早在4月中旬就开始了。但是直到5月中旬几次的讨论，都还是在理论上兜圈子，发言不外乎是“矛盾如何转化”、“矛盾的几种表现形式”等等，有人甚至从矛盾扯到宇宙的秘密，而对学校内部矛盾的具体问题，却半点也没有接触到。

这种情况遭到许多教授的批评。因此，从5月16日到24日，学校党委才先后召开了四次会议，开始扭转这种情况，鼓励大家揭发学校内部矛盾问题。有的教授说，这四次会，虽然有的人还没有大“放”，但是，所揭发出来的许多问题，却是人民大学的病根。

教条主义到处散布毒素

许多教授抨击了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新闻系许孟雄教授说：人民大学不像个学校，倒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培养出来的蜂不是去采蜜的，却是去散布毒素的，并且散布的很广。他说，学习任何外国先进的东西都是对的，但是必须注意到外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特定的历史背景，搬到中国来，就必须把这些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可是我们的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只是学着背些条文，却没有教他们注意联系实际。而更严重的是，学校领导把背条文背的最熟的人，看成是优秀学生、积极分子，于是，教条主义者便成了天之骄子，这对青年教师，对青年学生，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说人民大学有功的话，就是散布了教条主义，这种“功”继续下去，就会变成“罪”了。

农业经济系郑林庄教授说：克服教条主义在人民大学是个很重要的

問題。解放初期，由于大家不懂馬列主义，書不能教；后来学了点馬列主义，会引用馬恩列斯的几句话之后，書能教了，也吃得开了。于是我們在这里的这些旧知識分子便自以为是有了馬列主义了，其实只是一腦子的教条主义。可怕的是，現在我們对这种情况变得心安理得，習以为常，看不出自己也有教条主义。因此，克服起来就很困难。

財政系項冲教授的發言提到，学校里很多人只注意学习苏联，却不注意其他国家的經驗。今年曾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到了中国，非常热情地把一份有关函授方面的材料送給人民大学，表示願意建立关系，交流經驗。但是，学校有关方面的同志却对它長期不理睬，对別人送的材料連看也不看。

有的教师在發言中指出，这种教条主义帶來的后果，是使人們看輕了学术研究。新聞系汪同祖教授說：我們的許多东西都是現买現卖的，因此，有些人把学术看成是輕而易举的事，似乎只要請个專家来講一講，然后抱着他的講义背一背，突击一下就可以了。对研究学术的艰苦和困难都估計的太低了。这种情况就使得学校的学术空气很稀薄，形成了政治第一、学术第二的观念。

对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也有人有着不同的看法。計劃統計系楊学通教授認為：檢查我們的工作，不要尽翻旧賬。人民大学从無到有，过去“搬搬”、“套套”，是可以原諒的。当然，如果今天再“搬”再“套”，就不應該了。我們不要矯枉过正。我們学校有教条主义，但是說我們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是教条主义的“淵藪”，这是不公平的。

方針不定、前途不明

俄文系夏認吾教授說，人民大学建校七年，直到今天，方針还没有确定下来，究竟要把人民大学办成什么性質的一所大学，一直不明确。最初說，要办成像莫斯科大学那样，后来又說要办成理論性的大学，后来又說要办成綜合性的大学，現在又說要办成以財經为主的大学。究竟怎样，大家都不清楚。因为方針、性質不明确，給工作帶來了很大的損失。首先是招生标准不明确。本来作为一所大学，就應該按大学生的标准来招生，但是現在我校招收的学生是程度不齐的，而且不齐的情况說

來驚人。程度高的有具有多年教學經驗的教授；低的有連初中程度都不如的幹部。這些程度低的学生，別說學外文，連中文基礎也沒有。這怎么能要求提高教學質量呢？有人說，人民大學的信譽在逐漸下降，我看很大原因是由於方針不明確，一些學生成績不好所造成的。

余肇池教授在發言中提出，方針不定，前途不明，是人民大學的病源之一。他說，人民大學幾年以來發展畸形，學校究竟往什麼方向發展，大家不清楚。學校辦有本科，又有夜大學，又有函授。函授四處伸展，甚至連上海那個有幾百個可以教財經學科的人的地方，人民大學的財經函授也伸了去。這樣做，必然會影響學校的教學業務。

趙承信教授也說，人民大學發展方針搖擺不定，造成許多損失。為什麼搖擺不定，造成了多大損失，學校當局應當研究一下，計算一下。新聞系教員劉憶煊則說：學校方針不明確，到底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材也就不夠明確。有的系，百分之七十多是理論課，只有百分之二十多是專業課。將來這些學生是否能掌握一定的專業知識，擔負起國家交給他們的任務，很值得懷疑。

有些黨員以“老子”自居

有些教授在發言中批評了學校中的宗派主義情緒，認為有些共產黨員以“老子”自居，輕視舊知識分子，使一些舊知識分子的力量長期不能發揮出來。

侯大乾講師認為：人民大學在黨群關係上有牆有溝，有一個關起來的門。黨員和非黨人士見面只說說“今天天氣不錯啊”之類的話，彼此不談知心話。他說，有些黨員領導同志不尊重老教師，甚至有的黨員公開對老教師講：我們革命打游擊的時候，你們還不過是個資產階級的學者罷了。輕視之意溢於言表，使人非常難堪。學校領導上在處理一些問題時，也多是強調政治條件，忽視才學。選拔幹部，是先黨員而後群眾，甚至為了照顧一些黨員，硬把一些不夠條件的黨員塞進教研室去作教員，給教學工作造成很多困難。有些黨員經常隨便給別人亂扣帽子，有的非黨人員把愛人叫做“太太”，也給扣上資產階級思想的帽子。黨員多是站在群眾頭上看群眾，居功自傲。

郎朗天副教授提到，人民大學許多老教師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主

要是由于宗派主义。有些共产党员有种情绪，以为天下是老子打的，讓你們非党人士来享受不合算。

赵承信教授說，許多老教授長期不被重視，他們的科学知識也沒有得到重視。在中共中央舉行了关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以后，才开始扭轉这种情况，但是很多人的專長还是沒有被發覺。比如擅長社会調查的李景汉老先生的才能，就不是人民大學發覺的，而是人民日報發覺的。他們打聽到三十年前李老先生在燕京大學時曾帶了一批學生作过社会調查，于是請他作一次北京近郊农村調查，發表了他写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現在李老先生精神很愉快，要繼續做社会調查。可是从前李先生是不被重視的，他在原中央財經學院劳动專修科工作时，已經六十多岁，還要讓他就行学紡織，使得他很苦悶，在养病的时候，覺得前途無望，曾把精神寄托在文艺小說上。

楊學通教授在一次會上也談到：有職無权的問題，在人民大學也存在。有事，不是大家商量，而是黨員事先商量好了交人照办。如人事調動就是如此。有一次，他看到布告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教研室有人調動了。

先天不足却自我陶醉

中国历史教研室郑昌淦講師說，几年来人民大學以“第一流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學”自居，空喊“理論联系实际，苏联經驗与中国实际相結合”的办学方針，满足于老一套的“基本上有成績，但也有缺点”的公式，因而看不到学校中存在的問題在哪里。尽人皆知，中国人民大學的問題是很多的，就是因为校長們本身有驕傲情緒，自我陶醉，以致許多淹在底下，得不到解决。学校領導干部很少和教授接近，虽然每逢开会时，校長有时也和教授握握手，但是“握手未言欢，見面沒見心”。他說，人民大學的領導上習慣于用行政命令办事，只看見“到群众中去”，很少看到“从群众中来”。

郑林庄教授說：人民大學几年来有成績，現在要向前發展，就出現了許多矛盾。主要的問題在于“先天不足”，如教師、設備，以至領導等都有很多問題。开始办的时候，有了一点成績，于是产生了优越感，但是，現在向前發展有了困难，自卑感又逐漸露头，領導上應該注意这

个問題。

哲学系林万和副教授認為，过去人民大学被估价很高，但是現在校外对人民大学的估价却很低了。應該說，校外的人是溫度表，別人的估計是準確的。如果說过去成績是基本的，現在則缺点是基本的了。

(光明日报 5 月 23 日第 3 版)

是 蜜 蜂，不 是 蒼 蠅

張 友 靈

應該得到信任和尊重

从最近一些被揭發的事實看来，新聞工作者的地位，顯然沒有得到各方面的重視。許多人對新聞工作者不信任，而更多的人却是对新聞工作者不尊重。新聞工作者在进行工作中，常常得到的是阻力而不是支持。

如果新聞工作者本身存在着“特權思想”，要求“見官大一級”，這是新聞工作者自己的錯誤。但是，事實所告訴我們的却并非如此，事實只是某一些人对新聞工作者加以輕視，硬要看作是“逢人低三等”。

有人說，走到什么地方，都遇到新聞記者，討厭得好像嗡嗡嗡的一群蒼蠅。這些話，早二十年，早三十年，旧社会里的新聞記者是不斷听过的；沒有想到，今天还听到这样的說話。

這句話也有一半是對的，新聞記者走到那里誠然都是嗡嗡嗡的一群。如果缺少这嗡嗡嗡的一群，我們就会感觉到缺少很多东西，我們必然詫异这个社会的無声無息。

但是，另一半的話却不对。新聞記者在今天，應該不是蒼蠅，而是蜜蜂。尽管蒼蠅和蜜蜂同样是嗡嗡嗡的一群，所發生的作用却大不相同。蜜蜂不仅为人类釀造蜜和蠟，而且在百花齐放之时，还要它傳花授粉。用討厭蒼蠅的态度来討厭蜜蜂，我們應該憐憫这些人的無知。也还另有一些人，他們之討厭蜜蜂，并非不知蜜蜂有那些好处，只是因为蜜

鋒有刺。

听張黎群同志說，“中国青年报”因为登了“白司長来了之后”这篇新聞，引起了些麻煩，于是有人說，“中国青年报”在“闖禍”。可能就算闖了禍吧，这种禍該不該闖呢？如果“中国青年报”不闖那个禍，不登那一篇新聞，那末，白司長走了，黃司長又来了；黃司長走了，藍司長又来了；白司長今天走到这里，明天又走到那里，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不必报纸登新聞，麻煩也要發生的。那时恐怕更使人伤腦筋吧？从这一角度看，“中国青年报”那个禍还是闖得好的。我們的报纸，对于那样的禍，應該去闖，而不應該迴避。

在旧社会里，有一句話說的是：“記者不坐牢，不是好記者；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天今当然情况不同，沒有那种事了。我們面对那些主观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改一改那兩句口号吧，我們可以說：“記者不討厭，不是好記者；報館不闖禍，不是好報館。”不过應該指出，我并不希望这两句話作为俏皮話加以流傳；我只是想借这两句話，在那“三座山”还没有消灭干净的时期，能够成为新聞工作者彼此互相勉勵的話。

我們有理由、有必要，讓那些主观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正視新聞工作者应有的社会地位，对新聞工作者加以信任和尊重。今天的新聞工作者，一般說来，都是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新聞工作者在进行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工人在从事劳动，是一个公务人員在执行公务。誰要对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加以阻撓，就是破坏劳动、妨碍公务。我們需要时常用这些道理去教育那些糊塗的人。使用“記者証”只是一种制度，一种方法。如果那种人对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缺乏認識，沒有扭轉思想、矯正看法，“記者証”有时也会流于形式的。我們應該把教育那些糊塗的人，列入自己的課額之內，細致的，花費一点時間，批評，斗争，不到新聞工作者获得应有的、适当的社会地位，决不休止！当然，在那“三座山”崩潰之后，新聞工作者必然会大吉大利、事事如意的，我們的錦綉前程，已經是遙遙在望了！

做讀者的良友

报纸出現在讀者的面前，可以有兩種姿态；或者說，有兩種身份。

一种是，扳起面孔，正襟危坐的严师；一种是，和颜悦色，无所不谈的良友。

有些人，是不大理解此中的奥妙的，他们认为，报纸只应该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他们理想，把一份报纸交给读者手里，等于给读者上十堂政治课；从第一版第一条起，到末一版末一条止，最好都是正面向读者进行教育，理论、理论、再加理论。今天的报纸，分量重得压坏人，读者得一面喘着气、一面去死钻硬啃。他们完全不管，读者会不会得到“消化不良”的病症。

去年报纸有些改变，略略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文章，有点和读者谈天而不是一味教训的倾向。这使得那些善心的人们“怒焉憂之”，觉得这是嬉皮笑脸，有欠尊严，会招致报纸在群众中丧失威信，影响了宣传鼓动的作用。

应该指出，这完全是过虑。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报纸应该有益和有趣，我觉得这话还是对的。只是，我们对于有益的“益”、有趣的“趣”，立场观点和资产阶级大不相同而已。我们要供给读者以知识和趣味，适应读者的需要。只要软中有硬，不妨软些、软些、更软些。能够如此，就能够和读者结成朋友。有些报纸这样做了，销路打开了，说明它结交的朋友日渐增多了。

报纸的社论，是代表报社的看法和意见的。说得有道理，写得有说服力，读者自然会同意你。否则，我们就应该倾听读者的意见。如果读者的意见正确，我们不妨修正自己的看法。今天大大小小的报纸，所有社论，都好像是“社训”，只许读者接受、服从，不许读者吭气。我认为这种态度是值得考虑的。

能够做老师的，降身做朋友，我们至少认为他是在师友之间，对之不失尊敬之心。反之，只够做朋友，却硬要去做老师，就必然很尴尬，不但摆不起老师的架子，连朋友都会交不到的。“南京人报”解放后复刊，编辑部里大家说，应该学“新华日报”；因为“新华日报”是学“人民日报”，而“人民日报”却是学“真理报”的。“新华日报”和“人民日报”是不是那样学的，我不知道；“南京人报”在主观上却是那样学的。学的结果，很显然，“人民日报”有理论，“新华日报”阐释

發揮了那些理論，到了“南京人報”却只剩下渣滓教條了。“南京人報”除了把直報頭改為橫報頭，那是學像了；其餘，那里像哩。這樣，讀者不要這個“老師”，紛紛“退學”；報紙沒有了讀者，只好停辦。“南京人報”停辦，當然也還有別的因素；但這一因素却很重要。這對我說，是個慘痛的教訓；今天也應該轉達給同行的朋友們。

我覺得，嚴師有一位也就行了，我們認“人民日報”做老師吧，至於良友却是愈多愈好。而且應該注意到每一階層的人們，都能有良友。現在我建議，最好能在北京辦一份通俗的報紙。過去，北京報紙史上，有“時事白話報”、“群強報”、小“實報”這些通俗報紙，適合於文化水平低的成年人閱讀。一個黃包車工人，停下車來，就拿着一份報看。這說明，那些報紙銷行的廣泛。解放後，一直沒有這種性質的報紙，未免是個缺點。

報道新聞是主要任務

報紙，我們也稱它做新聞紙。新聞在報紙上應該占有頭等地位，報道新聞乃是報紙的天職，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是，從今天報紙上所刊載新聞和論文的數量對比上看，新聞的比重實在太少了。而那些很少的新聞，還得不到它在報紙上應有的地位。報紙把最優越，最能使人注意的地位，用來刊登一些論文和談話；最近發生的、讀者極為關心的新聞，卻被壓縮，被擠得排在報紙的角落上。每有一次什麼大會，會上的總結報告，往往各報以不怕千篇一律的“勇氣”，刊登連篇累牘的“明日黃花”。這些東西登多了，新聞自然會被擠掉了。

既然叫做新聞，顧名思義，其中當然含有強烈的時間要求。某些人認為，要迅速刊登新聞，就得“搶”；而“搶新聞”乃是資本主義報紙的經營方式。“搶新聞”這三個字的解釋，可能指時間上讓新聞見報過早，也可能指記者與記者業務間的競爭。那麼，我們反問一句：社會主義式的報紙，是不是應該把新聞壓在“倉庫”里等發了霉然後才刊登呢？是不是記者在採訪新聞時應該彼此供讓，說“您先請，我遲兩天登，沒關係”呢？

在我們的新聞工作中，也還存在着新聞的真實性問題。我們當然沒有資產階級報紙上那種攔情捏造，無事生非的“新聞”，也很少見“客

里空”式的人物。但是，有时却不免有由于科学知識的不足，造成判断的錯誤，因而影响了新聞的真实性。虽然这种現象并不太多，但不是沒有，我們應該注意。

这几年来，不容諱言，一般的新聞稿件，写得那么公式化，好像有一个套子。“新聞八股”是由来已久的，如今又加上了“党八股”。这两种規格，把文章細住了。應該打破这些魔障。

反对报纸橫排

对于目前报纸紙面編排的技术，我認为，是頗欠考究的。

最主要的是，民族語言文字的特征，在今天的报纸上，沒有得到重視；而且显然也沒有打算予以重視。这就使得报纸紙面为之减色，削弱了刺激作用，也降低了报纸在宣傳鼓动方面所能够得到的更高效果。

首先，我表示反对报纸的橫排。

我們民族的文字是直写的，上下貫串，一气呵成，改为橫写，实在沒有什么好处。說橫写合乎科学原理，对于眼睛有好处；怎么汉字已有几千年历史，我們的眼睛也并没有什么退化呢？說看得快，从来不見有人做出可靠的科学实验报告，說，“我看直写文字十分鐘只看多少；改为橫写，我多看了多少。”也許有人說，这是为未来拉丁化准备条件。是不是准能拉丁化，在那一天才能拉丁化，現在很难說。即便說，能，我們的报纸又何妨在拉丁化时再开始橫排呢？

我之反对报纸橫排，基本的原因，是認为橫排之后，紙面錯濶、变濶的变化少了，組版困难，影响了报纸的生动活潑。

我們即使不要求报纸全改橫排为直排，也应该要求有些报纸橫排、直排，能够自由竞赛。

对于目前报纸的不重視标题，我也想作一点建議。

我們知道，标题对于紙面起着很大的調节作用，控制了文字与空白处的适当停勻；它向讀者指出新聞的要点；它刺激讀者把新聞讀下去。这些道理，原来簡單，可惜目前报纸，大都沒有注意。标题“刻板”，極少有刺激性，今年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明年还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年年都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

我們民族文字是方塊字，每一个字都有平上去入的音节。因此，念

得能順口的，最好是句子采用奇數的數字，五個字、七個字或九個字。注意每一個字的音節，注意它在那一句中的平仄調和。目前報紙標題是不管這一些鈞；有時候，還像故意要拗折一下，把原來順口的詩句，改得不順口，簡直使人不能了解。這些地方，都希望今後能得到注意。

張友鸞的文章是“蒼蠅”，不是“蜜蜂”

——評張友鸞的“是蜜蜂，不是蒼蠅”

黃卓明

5月28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張友鸞的“是蜜蜂，不是蒼蠅”一篇文章，也就是他在第一次新聞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稿的摘要。這篇文章是十分有害鈞，而且正好是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奪取新聞陣地的陰謀立言。因而就這篇文章的本身說來，是“蒼蠅”，不是“蜜蜂”，它散布了有毒的細菌。

張友鸞首先把新聞記者說成是“逢人低三等”。在他看來，現在的“新聞工作者的地位，顯然沒有得到各方面的重視。許多人對新聞工作者不信任，而更多的人都是對新聞工作者不尊重。”所以張友鸞就站出來講話了：新聞工作者“應該得到信任和尊重。”張友鸞竟要為我們今天的記者爭取“社會地位”。我們知道：在階級社會里，是沒有甚么抽象的個人的，不屬於這一階級，便必然屬於另一階級；新聞記者絕不例外。資產階級報紙的性質是由它的社會地位——奴才地位所決定的，從而在資產階級報紙工作的新聞記者，他們的社會地位是和資產階級報紙的社會地位一致的。拿舊社會的“報人”來說，大多數是反動統治者的奴才，他們忠實地為反動統治者服務，從事着奴役人民的欺騙性的宣傳。當然這並不是說，在舊社會的“報人”中，沒有出現反對反動統治、追求光明的；而這些人很多是因為“觸犯”反動統治者而被迫害，被捕被殺，這在歷史上有過不少的事例。同時，我們也總不會忘記：在新中國成立前，無產階級報紙在解放區和“國統區”是有着如何鮮明的對

比。革命的报纸在解放区有着出版自由，而在“国统区”，例如重庆的《新华日报》和北京的《解放三日刊》，则是倍遭反动统治者的多方迫害。这些事实就明显地说明了报纸是阶级性极为强烈的政治工具，而记者本身就是阶级的战士。如所周知，在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新闻记者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是党的宣传员，就是党联系群众的有力助手。这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民报纸的基本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一致的。报纸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我们的社会基础是社会主义，在这样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社会存在中，一切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报纸总是看作自己的喉舌，看作自己的良师益友的。新闻记者受着党和人民的信任，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因为，报纸和广大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新闻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张友鸾所形容的我们今天记者绝对不是真实的客观形象，他是歪曲和丑化了我们的记者的形象。我们不禁要问，张友鸾把我们今天的记者描绘成那样的自卑，动机又是怎样的呢？答复只能有一个：就是煽动记者的反党情绪。

尤其严重的是，张友鸾在作了这样的煽动之后，紧接着提出了口号：“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闹祸，不是好报馆”。向谁“闹祸”呢，这自然是指的要向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闹祸”，因为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其他的“闹祸”对象。既然如此，我们就不禁要问：张友鸾为什么要以“闹祸”来作为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人民报纸，只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社会主义的方向。右派分子篡夺新闻阵地的阴谋，就是要使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办成反对派的报纸，来和党报唱“对台戏”的。他们所采用的手段之一，是“处处点火”；而“点火”和“闹祸”，在实质上是同义语。张友鸾用“闹祸”来作为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不仅是为右派分子篡夺新闻阵地的阴谋喝彩，而且是在煽动一些思想不健康的人走上歧途。我们不能不这样说：张友鸾的用心是恶毒的。他不遗余力地煽动着：记者要“争取社会地位”，要向党“闹祸”，挑拨新闻工作者和党的对立，挑拨报纸和党的对立。

就張文的全文看來，這是張友鸞在報紙工作上向党進攻的“頭陣”。而在第二段里，他就正面提出了他的資產階級右派的辦報觀點和方針。我們且來看一下，張友鸞的筆鋒是怎樣地急轉直下的。他惡毒攻擊我們今天的報紙是“居高臨下，發號施令”；“所有社論，都好像是‘社訓’，”說甚么“只許讀者接受、服從，不許讀者爭氣”。既然說是“發號施令”，是“社訓”，那不是誣蔑我們今天的報紙是站在群眾之上，又是甚么！我們今天的報紙是站在群眾之中的，也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張友鸞為甚么要如此的歪曲事實呢？意圖很明顯，他是在為他的所謂報紙要“做讀者的良友”也者樹立“論據”。張友鸞提出了一個荒謬主張，說甚么要把報紙區分為“嚴師”和“良友”兩種類型。他說：“嚴師有一位也就行了，我們認‘人民日報’做老師吧，至於良友却是愈多愈好。而且應該注意到每一階層的人們，都能有良友。”這明顯地是在進一步煽動一些報紙和人民日報對立。也就是說，人民日報代表黨中央，其他報紙代表人民群眾，把黨和人民對立起來。他還舉出解放前的“小實報”等報紙為例，來論證他的所謂“良友”的謬論。張友鸞完全歪曲了報紙的性質和作用。在他看來，報紙可以有黨報，但認為黨報並不適合社會需要，因而認為還必須辦一些適合讀者和社会需要的報紙。這樣的推斷是肯定的，因為張友鸞是把黨和人民對立起來的。這樣，張友鸞就根本混淆了資產階級報紙和社會主義報紙的原則區別，否定了報紙的階級性。前已提到，我們今天的報紙，儘管在相互之間可以有着不同的特色，但基本方向，即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是一致的。報紙和人民的關係，既是嚴師，也是良友。人民把在黨領導下的人民報紙看成是黨的喉舌，也是自己的喉舌，是代表自己利益的宣傳工具。張友鸞故意把報紙說成有兩種關係，就是有意地降低黨報的威信和作用。因此張友鸞在報紙工作上進攻黨的領導，而所採取的陰險手法，是挑撥黨和人民的對立，挑撥新聞工作者和黨的對立。必須指出，這正好是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要把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篡改成為反對派的報紙，來和黨報唱“對台戲”的陰謀，作了煽動性的宣傳，也就是因為這樣，所以這篇文章獲得了右派分子儲安平的特殊“賞識”，親自處理在光明日報發表。

在張文里，还采取了一种手法，就是誣蔑我們報紙的宣傳內容。他說：“今天的報紙，分量重得压坏人，讀者一面喘着气，一面去死鑽硬啃。”是的，我們的報紙是在尽力宣傳馬列主义，十分兴奋和满怀信心地报道着新中国的各方面的建設成就。但是，对于这些，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广大人民，是絕對不会“喘着气”的。而且，广大人民为了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学习党的政策，为了学习工作經驗，为了学习階級斗争的知識，大家是自觉地願意鑽，願意啃的。我們今天的報紙，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是有鉄的事实作証的。依据1956年6月国家統計局所發表的公报，1955年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報紙共計265种，全年發行总份数比較1954年增加了14%。而1954年的全年發行总份数是17亿1485万份。这就是說，1955年的全年發行总份数是19亿5493万份。計算下来，平均每种報紙的日發行量近兩万份。再据今年7月12日新华社报道，以1956年和解放前文化事業發展水平最高的一年——1936年比較，報紙印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还只是平均数字。張友鸞應該記得，解放前的旧報紙，除了个别報紙曾經在一个短時間里日發行数超过十萬份以外，極少数報紙是几萬份，絕大多數的報紙是几千份，甚至几百份。而我們今天的報紙，好几种全国性報紙的日發行数都是几十萬份。这不就是鉄的事实，說明广大人民是欢迎自己的報紙嗎？这些事实就完全粉碎了張友鸞所說的我們今天的報紙不受讀者欢迎的謊言。我們不禁要問：張友鸞硬說讀者“喘着气”，用心何在？而这样的謬論，就又正好是和右派分子儲安平之流誣蔑解放后報紙一無是处如出一轍。

張友鸞這篇文章在誣蔑我們今天的報紙，进攻党的領導之后，緊接着，又以“报道新聞是主要任务”为掩护，放出一支毒箭。說我們的報紙“新聞的比重实在太少了”，說我們不懂得“搶新聞”。这种提法，本来是屬於資產階級新聞观点的問題。但在張文里，却不这么簡單。他是以誣蔑我們今天的報紙“不是讀者的良友”作为在報紙工作上进攻党的領導的主力，而以“爭取記者的社会地位”打头陣，說我們不懂得“搶新聞”作后应，構成一个全面进攻的陣勢的。

这个惡毒进攻的陰謀，总起来說，具体内容，不外以下兩点：第一是反抗和取消党对報紙的領導，实际上是要把報紙变成資產階級右派的

宣傳武器，他所採取的惡毒手法是挑撥人民和黨的對立。第二是取消社會主義報紙的階級性和党性，他所採取的惡毒手法是挑撥新聞工作者和黨的對立。所謂“新聞太少”，要“搶新聞”也者，在張文里也正是向黨進攻的一支毒箭。甚么是新聞，這是無產階級辦報原則和資產階級辦報原則的根本分歧之一。社會主義的報紙是集體的宣傳者、鼓動者和組織者。宣傳鼓動些甚么，組織廣大人民做些甚么，是有着最廣泛的報道範圍的。但是，我們的報道工作是有一個標準的，這個標準就是毛主席指出的六項政治標準。因而我們認為，新聞的“搶先”問題，是一個帶政治性的問題，不是純技術性的問題，該不該“搶先”，搶誰的先，要從六項政治標準出發來考慮。張友鸞在這問題上的主張，剛好和社會主義辦報原則相違背。

綜上所述，足見張友鸞的文章是十分有害的，而且是集資產階級辦報觀點之大成，他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報紙工作上進攻黨的領導充當了“急先鋒”。

在新聞工作中，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我的感受是深刻的。我是光明日報的一個工作人員，面對光明日報一度被右派分子篡改政治方向這一事實，深刻地認識到：在世界上存在着階級區分的時期，報紙就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如果我們放棄了這個武器，資產階級就要利用這個武器。在光明日報的歷史上是有着這樣一段沉痛的教訓的。民主黨派主辦的報紙，可以辦得不和黨報一模一樣，應有自己的特色，但基本方向，毫無疑問，應當是和黨報一致的。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報紙是社會主義經濟即在公有制基礎的計劃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和資本主義國家報紙是無政府狀態的和集團競爭的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從報紙的歷史發展來看，也完全說明報紙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它是屬於上層建築範疇的，反映自己的基礎，並積極地為建成和鞏固自己的基礎而服務。

這是不移之論。而張友鸞的文章就是要動搖社會主義報紙的根本，所以說，他的文章是“蒼蠅”，而不是“蜜蜂”，或者說，是披着“蜜蜂”的外衣，實際上是像“蒼蠅”一樣惡毒地散布着含有毒素的細菌！

知識分子聞“放”之初

光明日報記者

以中上層知識分子為主要組織對象的幾個民主黨派，從3月下旬到4月初，分別召開了全國性的會議。和各地知識分子有廣泛聯繫的幾百位代表，都曾熱烈地討論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在中共中央宣傳會議上的兩次講話。反映出各方面的意見，內容豐富，發人深省。

我們旁聽了一系列的小組和大會討論，訪問了一些教授專家，僅就見聞所及，分篇加以報道。

“春寒”與“春暖”之爭

有人在小組會上說：听了毛主席的講話錄音之後，知道中央的政策是貫徹“放”的方針。自己的心情“既興奮又感到心里緊”。感想頗多，當晚未能入睡。

是不是多數的人都興奮？“心里緊”又是為了什麼？我就這兩個問題，向一位相處較久的老教授請教。

他回答：“說自己興奮的人很多。但也有人沒有這種表示，我就是其中之一。社工部有兩句詩，‘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涌’，對我這類的人，是很好的寫照。表面靜，心里涌。

“為什麼‘心里緊’，各人的心理狀態不同。有人說：現在的環境，對老知識分子，還不能暢所欲言。耳聞佳音，眼觀現實，中間還有距離，因而，油然而生‘心里緊’的感觸。我的想法不同。中央的政策措施，是體貼到做學問人的甘苦。瞻望前程，任重而道遠，心中焉得不緊。”

由會議的反映來看，因“任重道遠”而“心里緊”的人，占相當的數量。對目前妨礙“放”的障礙，幾乎是一致表示不滿。然而，是不是因此而“心里緊”，却有兩種基本相反的意見，並且展開了爭論。

爭論是體現在對具體事例的理解中，舉其中的一件事來說明吧。

在几个会议上，都有人提到费孝通先生最近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认为确实是代表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情，摸到了部分脉搏。有人说：现在的环境，还不能使人畅所欲言，自由论争的风气尚未形成。妨碍扩大民主和妨碍百家争鸣的有形无形障碍，还是重重叠叠。另一面，中央提出“放”的方针，春暖花开的季节又必然会来到。因此，对现在的现实处境，喻之为“早春”。而在早春的环境中，知识分子是春寒的心情。

早春天气的譬喻，没有人反对。是不是知识分子都感到是“春寒”，却有很大的争论。有人说：春寒仍袭人，不慎会感冒。有人说：早春天气，四肢舒展，春意盎然。

一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过较大震动的教授说：“思想改造的初期，勉强接受改造，不能没有痛苦，当时的感觉，是寒冬的凛冽。经过这一阶段之后，我始终再没有寒冷的感觉了。现在虽然是早春，我有早春喜悦的心情。”

这位教授，提出一个譬喻说：“早春的早晨虽然寒冷，辛勤垦植的园丁会出汗。漫步而沉思，油然而生感，期望早日春暖花开，而便于自己整枝折叶工作的人，当然会有春寒之感。”

早春天气，有“春寒”和“春暖”的两种感觉。这是会议上的争论之一。

“礼贤下士”和“尽其在我”

第二个争论，是对知识分子的估价和安排在什么地位上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两个方面。

由领导工作的角度来看，“放”的关键问题，在于领导的提倡，在于负责领导工作者大力创造环境。要这样做，首先要纠正某些人以“落后”二字概括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

对于知识分子的估价，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很多人在发言中，都是用社会主义建设所采取的态度作为衡量的尺度。而不同意某些人仅以爱国主义这一尺度来衡量知识分子。并认为，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采取不同程度的积极态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很重要的力量之一。

为什么要分析这个问题呢？有人说：这是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解除“放”的障碍的重要出发点之一。有人所以怕“放”，怕出“乱子”，或是和知识分子的团结上存在着隔阂，原因虽多，其中对知识分子的情况和作用，估计不足，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各地区来的代表，都反映了许多具体事例，证明许多地区对于“放”的方针，貫徹得很不够。敢于“鳴”和敢于“放”者，往往遭受到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包抄”“圍剿”和扣帽子的现象，仍然是时有所闻。这就使得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瞻前顧后，不敢“鳴”“放”。很多人同意罗隆基先生在政协发言中所說：“这种现象对国家思想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妨碍的。这种现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認真检查，主动努力，来切实纠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还有人补充說，不仅是教条主义，可能还有不同程度的宗派情緒。

这些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沒有爭論。而由另一角度出发，即是由知识分子本身这一角度出发，却有很多的爭論。

爭論的一方說：老知识分子是有許多特点，敏感、多慮。而且一有隔阂，很难消除。他們的基本态度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人说：目前知识分子需要的是温暖。因为有些人經過了一系列的風暴之后，体力較弱，若再遇風，容易“倒伏”。

也有人引用罗隆基先生在政协的發言說：“老知识分子，有中国旧社会中的‘士’的一套傳統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若能受到‘礼賢下士’‘三顧茅廬’的知遇，必肯鞠躬尽瘁。罗隆基先生說得明白，不是希望用‘礼賢下士’‘三顧茅廬’的旧方式来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而是說：今天批評、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与‘下’是有矛盾的。如何統一这个矛盾，鼓起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就靠领导干部的主动努力了。”

有人用实际事例証明，老教授的心理是：“校長来看我是礼賢下士，我找校長是向上逢迎。”

爭論的另一方是認为这样說，只看到高级知识分子复杂心理状态中自衛的一面，并且是孤立的夸大了这一面。一位化学專家說：“我若仅

是如此，豈不是太落后了。”

有人說：高級知識分子，對簡單生硬的方式，是很不滿意的。對許多不滿意的事，習慣於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表達的方式，基本上有兩種，一是“漠然而冷眼視之”；一是“直言上達”，敢爭敢叫，敢干敢鬥。

有人解釋了“漠然而冷眼視之”的態度說：“在每次運動之後，被刺傷了感情的人，絕大多數是對許多事情漠然而冷眼視之的。但是，多數人的另一面表現，卻往往是埋頭治學，或是埋頭教書。一般說，在工作上、治學上、都比運動前要好些。有人解釋說，這只是寄懷遣興的行為，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為埋頭治學或是教好學生，就是對社會主義的貢獻，也就是對社會主義採取了不同程度的積極態度。若不是積極態度，他會躺下不干的，或是數數衍衍，以度時光。”

“士為知己者死”，高級知識分子的“士”是一方，“知己者”是另一方。現在的問題，“知己者”是指什麼。許多人不同意“知己者”是指領導幹部，而認為是指祖國和社會主義。今天的知識分子，愛祖國之心是無可懷疑，也無人否認的。對社會主義的態度呢，絕大多數是接受社會主義的，並且有些人是已經熱愛社會主義。若是承認此點，那麼，“士”已有了“知己者”。對個別人的不滿，是不牽涉“士”對整個工作的態度。不然，工農知識分子聯盟，就無根據了。至於那一位懷着“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心情，那只是具體人的問題，而不能因此概括為知識分子的問題。

因此，有人說：站在知識分子本身的角度，一面要求領導幹部主動努力，創造“放”的條件，另一面也要採取主動的態度。既然是工農和知識分子聯盟中的一個方面，就必需有主人翁的態度。主人翁是要採取“盡其在我”的積極態度的。

今天的需要

今天，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需要什么？

一種答案是：需要照顧、信任、重視和大天地的溫暖。大天地是指家庭這個小天地以外的天地而言。

再一種答案是：需要創造各種條件，使他們能傾吐對國家建設的各

种具体意見。特別着重的是“具体意見”。解釋是：一般概括性的意見，知識分子已經听够和說够了；一般性質的爭論和學習，知識分子也不滿足了。

还有一种意見是：溫暖是需要，單純溫暖也有問題；發表意見很重要，幫助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很重要。

这三种意見，最后的討論點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問題。大家都認為應該學。如何理解這一問題，却其說不一了。主要的意見有兩種。有人說：“知識分子是要求進步的，對學習政治理論的重要性也知道。但是，上夜校，听報告，一般質量太差，實際上解決不了問題。不如給他一間房子、兩本書，為他創造小天地，听其自學。”另一種意見是：“關門讀書，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與工农結合，多接觸，吸收一些工农的感情。”

“吸收工农的感情”的問題，由表面上看，似乎是大家一致的。實際上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是有所不同。舉一個例子來說。參加討論的人都是高級知識分子，都了解高級知識分子的心理，也都承認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是細緻的工作。因為不少的高級知識分子是“敏感”而“多疑”。如何對待這“敏感多疑”呢？有人說：“你既知他敏感，就應該小心相待；你既知他多疑，就應該使他不疑。要給以充分的照顧和尊重，要給以溫暖，再也冷不得了。”

不同意的人說：“我們既然是高級知識分子，站在本身的立場上又如何辦呢？為什麼我們要多疑，為什麼我們要敏感。不由本身出發來由根本上減少多疑和敏感，易地而處，你是領導幹部，想也無法周全地照顧吧；正己而責人，雙方要求，才能共同進步。責人而不正己，是舍本逐末。”

(光明日報4月9日1版)

为“放”而爭

光明日报記者

在几个民主党派中央召开的會議上，对于为什么要“放”，“放”的范围和步骤等問題，爭論很多。有些問題，已獲得共同的認識：有些爭論，仍悬而未决，有待来日。

繼往开来

要貫徹执行“放”的方針，就必須了解“放”的意義。

为什么“放”？一位搞戏剧工作的人說：“这是为了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学术問題的百家爭鳴。”

很多人認為这种理解太狭窄了。由边疆来的一位老先至說：“这是承先啓后，繼往开来的大方針。不但有利于現在，而且謀福于子孙。”

經過兩天的討論，有人綜合了許多人的意見，認為正确的貫徹“放”的方針，將产生八个偉大的作用。（1）今后对工作的討論和爭論，必然日漸加多。众人之智，是为上駟之馬。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將會做得更好。（2）人民民主生活，將日漸扩大，并且会活潑而健康的發展。

（3）將会有效的培养自由爭論的風气和互相批評、互相學習的習慣。

（4）在爭論中煅煉自己，提高別人。从而促进人的思維活动，發揚人民的聰明才智。（5）对于資產階級思想，有了深入批判的可能，从而幫助人們自覺地进行自我改造。（6）对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造成了穷途末路的形势。（7）艺术和学术的昌盛繁荣，可期日而待。（8）总结这一工作經驗，是又一次丰富革命的理論宝库。

有人說：“为什么‘放’，是要由積極的意義来看的。不然，就会偏頗。”不少人是聞“放”而心花怒放了。

但是，估价不尽如此，因而爭論不少。

不同的理解

人总不免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問題。一个师范学院教授，听了一

些人的發言之后，慨然而嘆：“在北京可以暢所欲言，希望春風能渡玉門關，我們那里也能如此就好了。由此看來，所以要‘放’，是因為過去太緊了。也可以說，為了糾偏吧！”

這個意見，引起了不同的爭論。一個人說：“理解政策，不能由個人的遭遇出發。境遇不順利的人，就會有‘春光雖好，終是他鄉之色’的感情。正因為有問題，所以中央又一次提出‘放’的方針。‘放’是一種手段，是為了促使春風渡玉門。”

類似這樣的意見，引起了“放”是目的，還是手段之爭。

認為“放”是目的的人，解釋是：“放”是為了揭露矛盾，辨別是非，解決矛盾，得到真理。如何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呢？首先是要為‘放’創造條件，再即是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後兩者才是手段，用以達到前者的目的。”

認為“放”是手段的人說：“‘放’是手段，是為了達到擴大民主，繁榮學術的目的。若不如此解釋，豈不是為‘放’而‘放’了。”

還有人說：“你們這些話都不對。‘放’是手段，爭論也是手段，教育也是手段，一切都是手段。若問目的，是‘明辨是非，統一認識’。不如此，不能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

爭論深入，得到較多人同意的意見是：“放”既是手段，又是目的。通過“放”，可以達到繁榮學術和發揚民主的目的。“放”是手段了。為了要“放”又必需為“放”創造條件。所以要創造條件，又是為了達到“放”的目的。

雖然爭論告一段落，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對於“為什麼要‘放’”的理解，還是存在着分歧的意見。

何處是邊沿

“要‘放’就應該大放。做到無所不‘放’，才能真正放得開。”這是一種論調。

什麼叫大放呢？指的是一切問題都可以在報刊上公開討論。具體的意見是：“學術的討論，當然是無所不能談。政策問題，除了軍事、外交之外，其他有關文教、財經、政法等政策，都是可以在報刊上爭論的。事實上不是已經有很多的政策問題，在報刊上進行爭論嗎？”持有

这种主张的人，还补充说：“不过，政策的讨论和学术的讨论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在辩论的过程中，政策还必须执行，不能因有不同的意见而中止。”

反对的人说：“在报刊上公开讨论，一定会引起一部人的思想混乱，对政策的执行，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消极作用。有意见，可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以及采用个人提意见等等方式来解决。没有必要在报刊上公开讨论。”

这个意见又遭到反问：“任何工作都和政策密切相联，政策不能在报刊上讨论，现实问题都不能在报刊上讨论了。这是和‘放’的精神相违背的。”

在这个问题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如何办？有人提了一个意见：“那些可以在报刊上公开讨论，那些不宜于讨论，无法一一规定。只有以对政治负责的态度，在实际讨论中逐步明确吧！”

为 开 路 设 想

如何为“放”开路，是许多人所关心的问题。

有人说：“要使大家能迅速的放得开，最好能找出大胆放手的典型事例，用典型推动全局。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有任何摆手摇头的表示。”

理论上通了，实行时也不会不发生问题。因此，有这样一种主张：“不要多在理论上讨论了，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动。为‘放’开路，鼓励大家做，是当前第一要着。”

如何鼓励大家去貫徹“放”的方针。有人说，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用一年半载的时间，尽可能发表大家的意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言尔志。在这一段期间内，不要“交锋”，不要争论。这样，就可以逐渐畅所欲言。第二步是，在畅所欲言的基础上，再相互讨论。这是培养风气，培养习惯的好办法。

有人不同意说：“发表的意見，不会都是正确的。一年半载沒有争论，沒有批評，必然会使一些謬种流傳，遺害匪淺。”

主张先“放”后“争”的人说：“现在‘放’的障碍主要是有顾虑，說穿了，即是有人怕。因此，开放之初，一争就放不出来了。不如先选

成風氣，養成習慣為上策。”

另有一些不同意的人說：“顧慮固然有，更重要的是教條主義和不民主的作風在作祟。要掃除這種障礙，只有把教條主義和不民主的作風都揭露出來，公之于世，才能使它無用武之地。不爭論，就揭露不出來，或是揭露得不透底。不爭就‘放’不透，爭是有助於‘放’，而不是有阻于‘放’的。”也有人說：“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意見不一致時，就是爭論，只是在形式上沒有正面交鋒而已。因此，只‘放’不‘爭’，在事實是不存在的。”

爭論和批評，批評和反批評，如何運用得恰當，是有待于我們學習的。

（光明日報4月10日1版）

何所懼，何所不懼

光明日報記者

“山高路遠坑深”

在幾個民主黨派中央所召開的會議上，小組討論會里，有幾個問題引起了普遍的爭論。

一次小組會議上，一位詩人朗誦四月號“解放軍文藝”雜誌上的四句詩：“請听，這是1935年彭德懷同志強攻臘子口時，向最高統帥部彙報，毛主席復電的四句詩：‘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共產黨和毛主席現在鼓舞大家，放手努力工作，正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好而又要求好，猶如‘山高路遠’；工作的進程中，問題夾着問題，問題推着問題，成批而來，猶如進程中的‘深坑’。所以說，現在是一個動蕩的時代，需要大家力爭上流。而我們說，高級知識分子顧慮多，不敢勇進。怕這怕那，對困難不敢‘橫刀立馬’，沒有無畏的精神。我看，是個人主義在作祟。”

散會後，有人說：詩人由詩人的氣質出發，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問題在那里呢？据記者的了解，問題有三个：（1）有那些障碍，主要的障碍是什么？（2）誰来排除障碍，如何排除障碍？（3）有些知識分子为什么缺少無所畏懼的精神？

对这三个問題的爭論是很多的。

畏 惧 的 由 来

不能無所畏懼，表現在行动上：既不开朗，更不豪迈。

“不能这样說，”一位老教授不同意。“高級知識分子，各种积累很多。大河水長漫悠悠，‘小河水長似箭流’。这是自然的道理。畏懼的心理，不能單純用动作的开朗与否，来衡量的。”

为什么畏懼呢？解釋很多。但是，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解釋是：有些人的政治和業務水平落后于客觀的要求。对某些問題，看不准，不知道應該如何办。畏懼是由知識不够而發生的。另一种解釋是：运动的副作用，以及对待高級知識分子的生硬的方式、乱扣帽子所造成的。

有人說：“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所謂心，是思想活动，是复杂的思想活动。必須細致的体貼人。目前，有些知識分子，好像是一棵剛由其他園地移植到社会主义園地的小树，不習慣，而且信心不高。在这样情況下，只有扶植它，鼓励它，多加肥料。”

“另一位說，即使是批評，也不能教条主义的批評。而要学习毛主席的方法，把批評和鼓励結合在一起。”

从这些意見开始，向一端發展，形成了強調：“要使知識分子無所畏懼，問題在于領導。”并且列举了一些事实，說明对待知識分子的工作，是有偏差的。

一位曾在某大学担任过理学院院長的老先生，听了这些意見之后，对記者講了一个故事，提了一个問題。他說：“有一天，我的女兒非常苦惱。原因是組織晚会，漏發了一位先生的請帖。受到領導的批評，并責令去解釋致歉。結果，这位先生說：我不是計較這張請帖，而是你們太看不起我了。我对女兒說：誰叫你做事粗心，当然應該批評。女兒說：漏發學生的票，学生也会叫，但是，不会这样难办。你知道别人对高級知識分子的議論嗎？高級知識分子有本領，脾气大，刺兒头，真难办。”

这位老先生又說：“我有一位多年的老友，他本身是高級知識分子，很了解高級知識分子。他說笑話：和高級知識分子發生了什麼糾纏，很困難解決。好有一比，像似豆腐掉在灰里，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

老先生問：“為什麼我們要給別人這樣難辦的印象呢？至少，自己也不能說沒有問題吧。一個人，要善於自處，也要善於為別人設想。反過來，一切由自己的角度出發，當然是合不滿意，也會患得患失，從而生出畏懼的情緒。這種人，給他戴上一頂個人主義的帽子，想還合適。”

問題擺得比較明确了。在別人是改進工作，在自己是改造思想。兩者結合，才能很好的貫徹共產黨提出的“放”的方針。

認為政治和業務水平落后於實際，是產生畏懼原因的人說：“水平不夠，必需提高。如何提高，首先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

改造思想要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水平要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人反對這種說法，但是有人產生了顧慮。

產生的顧慮是：在“放”的時候，正面提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不是妨礙了“放”。理由有三：（1）要循循善誘地勸大家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正面提出，是不策略的。而且學習是各人自覺的事情。等他在治學和工作中，碰了釘子，感到需要，他會自動學習，何煩為他操心。（2）既要提高業務，又要提高思想，時間精力有限，都抓，一樣也抓不好。不如分步進行。現在要以提高業務為主，以備爭鳴。（3）教條主義是當前的主要障礙。學得不好，很容易只學到一些教條，反而拘束自己。要學得好，又非短時期可能達到。不如等批判了教條主義之後，弄清那是教條，那些非教條，再學可以不走彎路。

有人對這些意見加以分析說：“不能強迫一個唯心主義者學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他的自由。但是，你若是自認是唯物主義者，自認多少知道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或是願意學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就須要抓緊時間、擠出時間來學。請由這几点考慮：你既是青年的教師，又擁護或是同意社會主義，有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責任。作為先生，焉能不學。一知半解，或是耳聞的記問之學，更容易犯教條主義，不如潛心學一下為好。即使是談個人的修養，修養的准繩，是社會主義的道德，又

不能不学。”

直率的人說：要免于畏懼，就要改造思想，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是重要的問題之一。

箭 射 向 那 里

更多人学习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改变了中国的思想界面貌，許多問題，也易于解决。

以教条主义这个問題来談吧，有人說：“从今之后，教条主义是吃不开了。但是，为什么教条主义有时能吓唬人呢？被吓唬的人，大部分是因为無知，小部分是虽知不对，但是沒有反抗的武器。在这样的天地里，教条主义就唯我独尊了。它就起了阻塞民主生活、压制百家爭鳴的作用。”

参加會議的人，多数是贊同这种意見，并且認为反对教条主义，是产除“放”的障碍的当务之急。

从这里，又衍生另一个問題。即是对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來說，对民主党派來說，是反对教条主义为主呢？还是以反对机会主义、反对資产階級思想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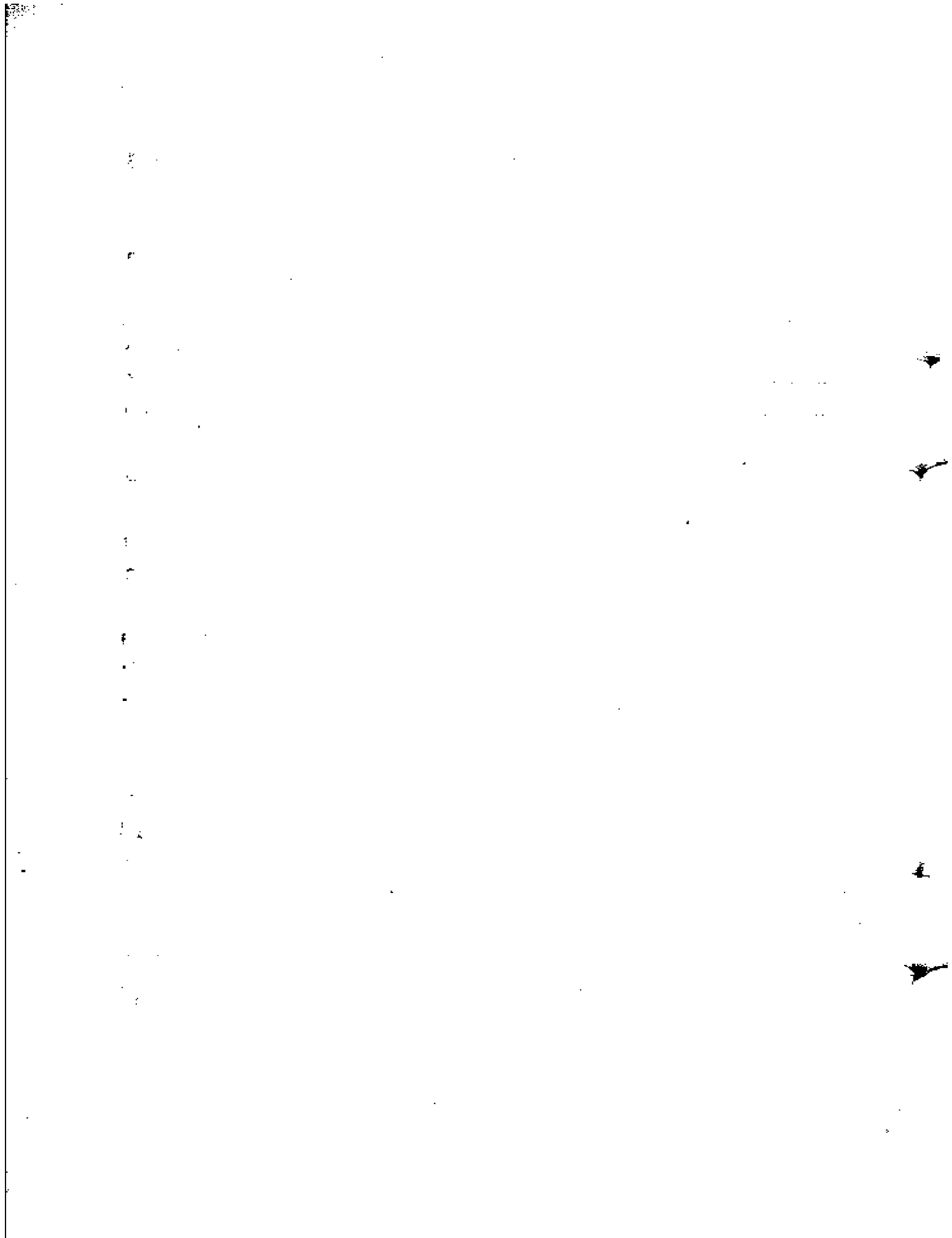
答案有三种。有人說：在全国范围内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个别任务服从总任务。第二种意見是：改造思想，是我們的任务，当然是要以反对机会主义和資产階級思想为主。第三种意見是：以各地、各个部門、各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主要反对什么。

結果，第三个答案，获得多数票。

有人有这样一种意見：教条主义肯定一切，妨碍爭鳴；机会主义否定一切，也同样是妨碍爭鳴；資产階級思想，阻碍人进步，破坏团结，也同样是在各方面起了坏的作用。这些，都要反对。誰来反对呢？誰来扫除这些障碍呢？国家大事，匹夫有责；个人的思想，主要在于自我改造。这样說，并不是把責任平分。要扫除障碍，必需大家动手。

了解社会發展的規律，才能無所畏懼。無所畏懼的人，是永远和障碍作斗争的。無所畏懼的人，是敢說、敢爭、敢写，又不乱說，乱爭、乱写。

（光明日报 4 月 11 日 1 版）



武汉知識界的“鳴”“放”密云不雨

許多知識分子希望領導大胆放手

本報武漢2日專電 武漢知識界的“鳴”“放”尚在密云未雨中。最近中共湖北省委已檢查了全省學習毛主席的講話的情況。4月28日中共武漢市委書記、市政協主席李爾重在政協會上的報告中，又着重指出了“鳴”“放”不夠的問題。但據記者連日在採訪中了解，知識界以及有些領導同志仍然顧慮很多。很多知識分子希望領導方面大胆放手，打破此種沉悶空氣。

中南財經學院院長、民盟武漢市委主委馬哲民談到這個問題時，對李爾重的講話表示非常歡迎，認為武漢知識界的“鳴”“放”不開，主要是領導方面存有顧慮。有一位不願發表姓名的高級知識分子告訴記者，他曾和一位負責同志談及推動“鳴”“放”問題，那位負責同志顧慮重重說，他正在考慮到底要放到什麼程度，放後大家會有一些怎樣的意見，以及放後又如何收等等問題。他們學校的黨委書記則認為，黨組織過去在工作上也有一些缺點和錯誤，一旦鳴放讓大家都抖出來，深恐由此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受到損害，因而不敢放手。

武漢大學教授唐長孺說，要想“鳴”“放”得以開展，必須領導方面表示有此決心，否則知識分子顧慮很多。一時很難消除，他說，知識分子顧慮不是怕批評，而是怕有組織的粗暴的批評。華中師範學院院長楊東蓀認為領導方面和知識界雙方對學術上的爭論和政治上的爭論還沒有分清，因此對於“鳴”“放”不僅知識界有顧慮，領導方面也感到有壓力。華中師範學院教授、作曲家陸華柏說此間音樂界鳴放不開，重要原因是領導上不肯放手，甚至起到了阻撓作用。他說，在武漢，西洋音樂的演奏會就得不到支持，甚至受到白眼和冷淡。這次中央樂團有幾位同志來武漢演奏，就有一個署名職級為部長的人寫信斥責他們演奏節目單上西洋樂曲太多。陸華柏認為這種情況存在下去是永遠也鳴放不開

的。

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王家楫認為民主黨派在“鳴”“放”問題上應當負起責任。過去武漢各民主黨派組織在這方面工作做得不多，現在如果再躊躇不前，那就不對了。

目前，武漢大學、湖北醫學院等校已開始學習毛主席的講話，準備組織座談討論。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準備在5月間舉行宣傳工作會議，許多知識分子對這個會議寄予很大的期望，切盼雨過天晴早見開朗。

（5、3、第一版）

沈陽文教部門“鳴”“放”空氣比較稀薄 問題在於黨群關係不正常

本報沈陽4日專電 從北京來的人，特別感到沈陽“鳴”和“放”的空氣是比較稀薄的。記者不止一次提出“為什麼”的問題向這里的高級知識分子詢問。有一位教授這樣回答：“你不能從北京來看沈陽，而要从沈陽來看北京”。這句意味深長的話，直到接觸較多才理解到。所謂要从沈陽看北京，就是要了解在沈陽文教部門的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是不同於北京的情況的，而且還有它的歷史根源。因此，和高級知識分子晤談中，首先觸及的總是黨群關係問題。

在一次座談會上聽到一位教師發言，他用非肯定語氣說：我們學校里總務科（指黨員）分給黨員教師的房子一律朝南，非黨教師就不一定是朝南的。又一次和一位老教授閑談：學校要他搬到三層樓的宿舍去住，搬家那天，許多書箱卸在樓下，他年老體弱，請總務科的一位同志幫忙把箱子搬上去。這位同志說：“你把箱子打開，把書化整為零，几本几本拿，不就拿得動了嗎？”這些看來是小事，而且是過去的事，為什麼還耿耿於懷呢？問題是在黨群關係沒有搞好，在他們想，只能用一滴水來反映太陽了。

党群关系不正常具体表现在那里呢？许多人认为，主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尊重不够，理解不够。东北工学院老教授许治同说：有些党员看到我们这些老教授，总认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只有“敬而远之”。如果真能敬也吧了，实际是“敬则未必”，“远却有之”。东北财经学院老教授赵鸿鑫说：古语说：“士别三日，刮目相待”。难道旧知识分子经过历次运动锻炼，能说没有或多或少的进步吗？可是有些方面的党的领导看不到这些，始终认为旧知识分子是定了“型”的。沈阳医学院老教授李佩琳更说了耐人寻味的話：“难道人的进步只有从头髮上来看吗？”

这里大专学校流行着一首打油诗：“党群誰使隔高牆，民主原来未發揚，深坐室内听彙报，偏听偏信事堪伤。”这当然不是多数人的心情。絕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听了毛主席的講話，都是兴奋感动。但对基层貫徹得怎样，尚在犹豫、观望。在目前說、基础是放手不够的，主要是顾虑怕放出乱子来：知識界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放会更团结，放的过程，也就是把隔在党和非党之间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堵牆拆除的过程。可是，这里大专学校虽然学习了毛主席的講話，都还未展开深入討論，有的学校还没有作这种布置，还是顾虑重重。人们认为，学校党领导已到进一步采取具体措施的时候了。

(5、5、第一版)

南京的鳴放在下層阻碍不少

轟 开 局 面 还 看 領 导

民主党派人士在本报座談会上热烈發言

本报南京14日專电 各民主党派江苏省和南京市地方組織的負責人和部分民主党派成員，13日在本报举行的座談会上，本着帮助共产党开展整風的精神揭露了党群关系中存在的不少問題。發言人情緒热烈。在講到某些具体情节和警句时，一再关照记录把它們全部記下。

春天何姗姗来迟

大家認為目前南京还是早春气候。有人認為：在基層則还被严寒封鎖，有春天何姗姗来迟的感觉。有人說，各民主党派在省市的地方組織已动起来，但走到前头，其他方面配合不上。群众一方面急于要放，一方面怀有顧慮。有人說，在大学里，平时敢提意見的“炮手”，在肃反中，大都“解除武装”。有人認為，南京鳴放沒有轟开，是由于領導上支持不力，下面的阻碍不少。南京师范学院最近公布关于毛主席講話的學習計劃，最后一項列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对鳴放阻碍極大。正在召开的省人民代表大会會議有些領導同志談起工作成績，振振有詞，說到缺点，則輕描淡写。不久前省政協會議上，有人批評执行宗教政策中的缺点，馬上就有人針對發言加以批判。有人指責中共党报新华日报仍摆着一付“衛道者”的面孔，喜欢刊登批判性的东西。工商界更是顧慮重重，战战兢兢。毛主席的講話至今还没有在南京市工商界傳達。名翻譯家高植（民盟盟員）打比喻說，風箏放的高低，要看綫的長短。綫愈長放的愈高，綫愈短放的愈低。收音机声音高低，决定于音量控制。增大音量則声音高，减小音量則声音低。总之，轟开局面还看領導。

对知識分子尊重信任不够

民进江苏省委及南京市委主委吳貽芳，分析党和知識分子关系不正常，主要是有些黨員对知識分子不够信任，不够尊重。举例說，有个中学校長收到一封写给学校負責同志的信，正要拆开，在一旁的黨員副校長馬上斥責收發人員，說这封信应交給他。吳貽芳說，在学校工作的有些黨員，对業務不够了解，不求鑽研，而又不肯接受懂業務人的意見，对知識分子腦力劳动的成果不重視。九三学社南京分社主委高觉敷說，非党同志在高等院校做行政工作很苦悶，有些問題何时决定，怎样决定，都無权过問。有些問題，党内已經决定了，交党外院校長来貫徹，有意見也不好提。南京师范学院討論科学研究方向問題时，学校党委会說，这是个方針問題，要由党委会来研究。問：要院長何用？說：我們决定了，由你們去貫徹。高觉敷說，这样如何能發揮党外力量。南京体育学校校長陳凌（民进會員）說，我这个校長是个泥菩薩。学校里好多事情我不知道，党支書是办公室主任，他决定了就算了，只是出布告用我的名

字。責任要負，權却不多。管理學校福利費的人事干事，是黨員。福利費只補助黨團員，非黨非團的教職員得不到補助。校長批准了也無效。他可以批個“福利費無多，不予補助”。而他自己申請補助，自己批准。群眾意見很多，却說校長是官僚主義。南京農學院顧問鄒樹文（民革黨員），談到對知識分子不信任，還表現在過分保密上。內部刊物可供科學研究的，門外人根本看不到。有些地方“夫子之牆千仞”，“侯門深似海”你進不去，進去了也要不到材料。

脫離群眾的作風嚴重

南京師範學院教授吳奔星（九三社員）嚴格批評了在高等學校工作的某些黨員脫離群眾的作風。他說，他們不論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似乎都在代表黨。一舉一動，甚至一個表情，都好像具有原則性、思想性。群眾深恐接近了他，一言不慎，就得罪了他。得罪了他，就得罪了黨。他們對教師的教學成績和學術水平，缺少實事求是的、直接的、深入的了解，只依靠極少數人的會報。他們從群眾中來，再不到群眾中去。有時，還打擊和損害群眾。忘本的情況，非常嚴重。他們經常被少數積極分子所包圍，經常處在被蒙蔽的狀態中。因此，在許多工作中，都不能實事求是的做得使群眾口服心服。他們總是覺得高級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來的，帶有不少污穢，忽視黨和政府七八年來對這些知識分子的教育與改造的客觀事實，忽視這些知識分子追求進步爭取自我改造的主觀努力。南京工學院教授劉復光（民進會員）補充說，我們現在已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不少黨員仍把我們看成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這是最使知識分子沉痛的事。在談到改善黨員知識分子關係時，劉復光說，是讓劉備去找諸葛亮，還是叫諸葛亮去找劉備？高級知識分子現在不要三請，只要一請就到了。

應該從制度上求得解決

許多人的發言，從黨群關係談到體制問題。民盟江蘇省委正副主委陳敏之、高一涵認為，在黨與非黨關係不協調，甚至緊張。症結之一，是體制問題。黨委會領導和學校行政領導關係在打架。在大中學都是矛盾焦點。此外，人事制度神秘化。黨外人士無權過問，保密範圍太大，一般方針政策，也是神而秘之。都對非黨行政人員精神上威脅很

大。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主委邓昊明认为，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路线和方针政策上。不一定要派个党员到高等学校去当校长。民盟江苏省委副主委樊光认为，干部提拔、安排、使用，存在不少问题。毕业生分配，乱点鸳鸯谱。希望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对人事工作进行一次检查。民建江苏省委正副主委陈选衡和康永仁，对公私共事中的问题，也发表了意见。社会人士金鸣盛（民革党员）认为，在学校机关和企业中，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的关系，民主党派在学校机关和企业中的作用，以及党员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等问题，主要应该从制度上求得根本解决。

在座谈会上，还有人建议，本报尽量组织争鸣，揭露缺点，坚持原则，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以便帮助共产党开展整风。（5、15、第一版）

推倒牆填平溝改善党群关系

提的意见，能够采纳的马上实行，符合事实的马上改正
大家推诚相见，交知心朋友，互相多联系，多谈知心话

本报上海5日专电 本报5日在上海邀请部分民主党派成员举行座谈会，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言人比较集中地就党群关系发表了意见。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员会、胡次威（社会人士）、张公义（民革上海市劳动局支部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徐中玉（民盟上海市委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潘世兹（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民主建国会史慕康（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公私合营上联电工器材厂经理）、胡世俊（民建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长宁区副区长），孙鼎（上海市工商联常委国营旋转电器制造公司副经理），中国民主促进会李季开（民进上海市委委员、上海体育学院教育学教研组主任）、顾诗灵（上海市十二女中副校长），农工民主党汪育春（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瞿承方（瞿直甫医院院长），九三学社谭其骥（复旦大

学历史系教授)、戴堂心(上海水产学院教授)。

有些共产党员脱离群众的作风相当严重

在座谈会上,大家认为:总的来说,党群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是正常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但是在有些学校、机关和企业中,党群关系不够正常,有一堵或厚或薄的墙存在。有些共产党员脱离群众的作风相当严重。他们把自己看成特殊人物,高人一等,以改造者自居。他们不和群众接触,群众见了他们害怕。他们只听少数人汇报情况,偏听偏信,加深了党与非党之间的隔阂。他们只肯听顺耳的说,不愿听逆耳之言,有人提意见,他们不是套用“成绩是肯定的,基本的,缺点错误是难免的,次要的”公式,便是对缺点错误进行辩解,说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那样做是正确的。好像他们永远是对的。

过去对老教师的看法有三重三轻

会上有人说:某些党员干部,掌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问题,使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了距离。有些老教师,平时爱提意见,于是被煞费猜疑。运动来时,横遭一顿“拳打足踢”。平时不来交朋友,有事来时,吓煞人。或者对老教师敬而远之,在群众中夸大他们的缺点。有人概括某些高等学校领导过去对老教师的看法有“三重三轻”:重视青年而轻视老年,重视主任而轻视教师,重视学生意见而轻视教师的意见。民建会的同志举例说:有一些私方人员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影响了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有的机关领导人对民主党派重视不够

在谈到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的时候,有人说,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人说,在某些单位,不是有职无权的问题而是无职无权的问题。有些政权机关,绝大部分科级干部都是党团员,民主党派成员和党外干部,即使有才干,也不容易被提升。有的说,有的领导人对民主党派在机关中的作用重视不够,甚至有人认为机关中没有建立民主党派组织的必要。

大家认为:有墙要推倒,有沟要填平,这样才能改善党群关系。有的认为,只要大家推诚相见,交知心朋友,互相多联系,多谈知心话,党

群关系就可以得到改善。有的建議，在黨員中大力进行統战政策的教育。有的認為，在党群之間，党与民主党派之間，只有开展正常的批評与自我批評，真正做到互相監督，才能搞好关系。有的認為，最近开了很多会，提的意見要有下落，能够采納的馬上实行，符合事实的馬上改正。这样做，对密切党群关系有很大作用。有人表示：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开展百家爭鳴，調动一切積極因素，眼前有个工作要做好，就是消除肃反运动遺留下的副作用。有反必肃，有錯必糾。有錯應該糾，公开糾，及时糾。

报刊要大力克服宣傳工作中的片面性

在座談会上，还談到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許多其他問題。有的同志認為，报刊是宣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力武器，今后要大力克服宣傳工作中的片面性。

(5、6、第一版)

武汉市教授專家在本报座談会上暢談

填平党群鴻溝时机已屆

希望高教部下决心克服官僚主义

本报武汉9日專电 本报編輯部于5月4日和7日邀請武汉知識界的教授和專家二十余人組織了兩次座談会。会上大家对党群关系問題和高等教育問題發表了許多意見。

大家認為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党群关系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要开展“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应当重視和解决这个問題。他們指出，几年以来不少黨員負責干部，甚至一般黨員都自視為統治者，改造者，把党外知識分子看作被統治者、被改造者，以至在党群之間，挖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鴻溝，現在是填平这条鴻溝的时候了。

有些黨員干部

自視為統治者令人难堪

武汉医学院教授、该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周裕德（九三学社社员）说，党外人士与党员负责干部，一旦在工作上意见不合发生争执就有被指为和党争夺领导权的危险。他说，他自己就被扣上过这顶帽子，以后在工作中每走一步，都不能不思考一番，这是不是与党争夺领导权。而武汉医学院的党员负责干部，又只搞政治运动，不领导业务，使人左右为难。有时在业务上请求支持帮助，便推说不懂，置之不睬。而独立负责又怕有被指为争夺领导权的危险；不负责任得过且过则又觉得对不住党和国家，不知怎样才能使这些党员干部满意。华中农学院教授徐人极（九三学社社员）认为，党员干部常常对党外知识分子摆脸孔，实在难堪。他说，华中农学院的情况，现在有了好转，但在四个月以前，有位党员负责干部开口闭口便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百无一能，只会抄书。有一位教授讲课，他认为在观点上有问题，便用行政手段停止他开课，要他检讨，检讨得好便准他继续开课，检讨不好，便不准开课。徐人极教授说，这种作风，这种方法又怎能改造知识分子，又怎能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

武大党群关系问题更为突出

一堵铜墙铁壁横在中间

武汉大学的党群关系问题更为突出。武大教授袁昌英（民盟盟员）、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韩德培、法律系教授燕树棠（民革党员）都认为武汉大学的党群之间筑起的不是一堵普通的墙，而是铜墙铁壁。他们举出了不少事例，说明该校党员干部自视为特权阶级，而且影响所及一般党员也飞扬跋扈。该校法律系秘书因为自恃为党员，在系内气焰高涨，使得几乎全部职员都受不住、要求辞职，可是学校领导并不予以重视。韩德培先生以教务长和法律系主任的身份，有时学校还指定要他与这个系秘书商量，把这个秘书看成了一个太上系主任。袁昌英先生说，由于这堵铜墙铁壁的存在，有人把武大人员分为三种人，党员是甲方人员，党外知识分子是乙方人员而积极分子是丙方人员。她说这样把人分成几方，不当作一家人，要想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可能的。到会的武大教授一致认为，该校的人事处是一个独立王国，对学生毕业以及留助教问题，不但不征询系主任和教授的意见，提了意见也置诸不理。有的学生，

系里認為不能畢業，但人事處只要那個學生是黨團員便額外照顧，不但准其畢業，還留作助教，而且也不通知一聲。他們認為這是典型的宗派主義作風。到會的教授希望學習了毛主席的講話後，黨員和群眾雙方都動手來打破這堵銅牆鐵壁。

高教部三個壞主義兼而有之

對於高等教育問題，大家也提了不少意見。認為办好高等教育，關鍵在於高教部熟悉業務、了解下情、使作具體工作的人有職有權，教育工作具有很大的靈活性，決不能坐在辦公室下命令發指示，可是過去高教部是三個壞主義都兼而有之，這非得下決心克服不可。

華中工學院副教務長劉穎（民盟盟員）說，高教部把中國教育的傳統一筆勾銷了。解放以前的，不分青紅皂白，一切都要不得，一切重來。這是普天下都沒有的事情，蘇聯也是非常珍視自己的教育傳統的。會上當時有人指出這是高教部三個壞主義兼而有之的具體體現。劉穎先生認為，高教部提倡學習蘇聯經驗時，口喊要結合中國實際，可是結合得多少，是人所見的事實。幾乎全部在盲目抄襲，什麼六節一貫制、五分制、工作量以及課程設置，自己還沒有弄清楚是什麼一回事，就照搬過來了。有人對這種作法，還創造了一套理論，認為我們沒有經驗，只有照搬，教條主義也好，搬過來再說。難道我們沒有經驗，連腦子也沒有。他說高教部這種作法，使老教師一直手足無措。武漢大學教授程千帆（九三學社社員）認為，高教部不熟悉學校和教師的工作情況，教學計劃一年一變，幾年來沒有一個學生是按照一個教學計劃培養的。他們以為修改教學計劃是容易的，不知道每一修改給教師帶來了多少困難。在培養助教、研究生的工作上，教師只有負責培養的義務，沒有參與選擇培養對象的權利。不管是什麼材料，交給你就是要你培養。會上許多教授談到科學研究問題，認為高等學校的教師，為什麼會人心思院，高教部應當反躬自省。幾年來一個口號又一個口號要在課堂解決問題，教學第一，一直只強調教課任務，而且把教課作為一種政治待遇，形成一種壓力，使教師無條件無時間、也無心情進行科學研究，昏頭昏腦狼狽不堪。

現在已是春暖花開時節

到會的專家、教授一致擁護毛主席的講話，認為現在不是早春天氣，

而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他們敢于說話了。他們有靠攏黨的願望，有做好工作的信心。他們希望通過這次學習，搞好團結，做好工作。

出席這兩次座談會的，有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王家楫、伍獻文、武漢大學教授桂質廷、唐長孺、韓德培、程千帆、燕樹棠、袁昌英，華中工學院副院長劉乾才、副教務長劉穎，華中農學院教授傅光培、徐人極，武漢醫學院教授周裕德、劉南山，華中師範學院教授卞彭、嚴士佳，武漢測繪學院院長夏堅白、副院長金通尹，中南財經學院教授張人介，水運工程學院教授胡儒珍，九三學社中央委員薛愚、武漢分社秘書長黃培正等三十餘人。

(5、10、第一版)

注：備安平抓業務的第一步，就是派出記者到九大城市召開座談會，處處点火，打亂濞風步驟。“武漢知識界的‘鳴’，‘放’，密云不雨”、“沈陽文教部門‘鳴’，‘放’，空氣比較稀薄”、“南京的鳴放在下層阻礙不少”、“推倒牆填平溝改善黨群關係”、“武漢教授專家在本報座談會上暢談”等消息，就是派到各地的記者按照備安平的指示，在召開座談會前後拍來的專電。在消息中，把最具有煽動性的詞句集中地突出的摘錄下來；或者以記者自己的口吻加以夸張；或者假用所謂“有人說”把記者與發言人的“共鳴”之點，加以渲染。

北京師大領導不肯大膽的“放” 教授們提出尖銳批評

有人形容：外面雷聲震耳，師大無風無雨

本報訊 北京師範大學昨天舉行座談會，討論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黨員非黨教授在會上，對學校領導不肯大膽“鳴”和“放”，提出批評，有人形容說：外邊是雷聲震耳，北京師大是無風無雨。

政治經濟學教授陶大鏞認為：北京師範大學領導上還未能大膽放手，發動群眾，暢談人民內部矛盾。他說：目前北京師大參加討論內部矛盾問題，還只是極少數人參加，沒有發動廣大教師，特別是老教師參加討

論，事實上，正是廣大教師都發動起來，才能深入談出具體問題；才能真正揭露矛盾。西安離北京那麼遠，都出現了暢談的高潮，到處是雷聲震耳，而我們身在北京，却無風無雨。

陶大鏞教授建議北京師大的領導幹部迅速改變這種情況，集中精力放手發動廣大教師，討論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他說有必要集中幾天開會，討論反官僚主義問題。作為學校中共黨的支部書記、副校長何錫麟同志應該從百忙中，抽出時間，領導好這一工作。

中文系女教授、共產黨員彭慧教授說：從今天的會議就可以看出，我們學校是大大落後於現實了。報紙上所反映的全國各地，特別是上海的暢談內部矛盾問題的情況，和北京師大的現狀有很大的距離。我們還沒有暢所欲言。參加今天會議的有五分之四是黨內同志，只有五分之一是黨外同志，我們沒有更多地邀請教師的，特別是黨外的老教師們，大家一起座談內部矛盾問題。

俄文系教授胡明也認為：要把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討論的好，首先學校領導，特別是學校黨委的負責同志應該心胸更加開闊，讓各方面的同志都把意見說出來，這不但不會妨礙團結，反而會有利於團結。

馮特教授在發言中，批評了領導上過去在學校中不是依靠教師，而是依靠少數的行政人員作好工作的情況。他說：學校工作最重要的是教學工作，而完成這個工作的人是教授。但是，幾年來，我們把學校中的行政人員的地位提到高於教授，於是產生一種風氣，好像行政領導，要比教授榮耀得多。實際上，行政工作人員是應該幫助教授更好的完成教學工作的，而不應高於人上。

他還認為：學校領導對老教授重視很不夠，隨之，對老教授的知識也就重視不夠。往往許多事情不去听取老教授的意見，而輕易地听取年青幹部的意見。

共產黨員、王煥勛教授也用許多事實說明學校領導中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是相當嚴重的。

政治教育系主任，中共師大黨委會委員王文樞在發言中主要談了自己對最近中央號召開展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討論的體會，沒有涉及到具體問題。有位參加座談的人說，他的發言全是人民日報社論中談過了的。

(5、9、第一版)

注：这条消息發表时，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会已經有准备、有步骤地組織教師座談会，听取教師們的意見，因此，所謂“北京师大领导不敢大胆的‘放’”，是与事实有出入的。但是，这篇批評稿助長了該校右派分子穆木天、董渭川等人的气焰打乱了該校的整風步骤，造成党委会工作上的被动。

中共统战部、清华大学党委会、民盟、九三学社等 开座談会

討論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負責制問題

民主党派提出要确定民主党派基層組織在学校的地位和作用

本報記者报道 中共中央统战部昨天（6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談会，研究清华大学的共产党基層組織和民主党派基層組織的关系。在座談会上，提出了有关今后高等学校重大改革的三个問題：（1）改变高等学校的共产党党委負責制度的問題。（2）民主党派的基層組織在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要求参与学校领导工作的問題。（3）教授在高等学校里如何参与领导工作的問題。

在座談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统战部，清华大学共产党党委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和市級組織、九三学社中央和市級組織，以及有关方面，共同組織了一个十个人的檢查組，在清华大学进行約兩周的檢查，广泛地和各方面，特别是和民主党派成員以及無党派的教授們交換了意見。座談会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長李維汉主持。出席的有清华大学校長、党委書記蔣南翔，民盟中央組織委員会副主任委員閔剛侯，九三学社中央委員会副秘書長李翼，民盟清华支部負責人、清华大学副校長陈士驊，九三学社清华支社負責人張守仪，以及中共中央宣傳部、高校党委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員会、高等教育部負責同志和代表等人。

关于改变高等学校共产党党委負責制的問題。参加檢查小組的、九三学社副秘書長李翼，認為清华大学党委会管的事情过多，行政系統沒

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老教授的力量發揮得不够，有“党政不分”的傾向。因此，必需切实加强行政领导。参加检查小组的、民盟中央組織委员会副主任委員閔剛侯除同意李翼的这个意見外，并提出民主党派的基本組織代表要参加校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参加检查小组的、清华大学共产党党委会書記、清华大学校長蔣南翔，則認為最好是在党委制的基础上，加強校务委员会。清华大学副校長、民盟支部負責人陈士驊，認為現在校务委员会並沒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李翼說要改变以党代政的情况

主張加强行政领导系統的职权

李翼首先發言，認為清华大学在党群关系問題上虽然作了許多努力，但是党与民主党派、党与非党之間仍然存在着一座橋。老教授的政治積極性不高，不敢或不願說話。“总起来說，党群关系是緊張的。”

李翼認為：学校的組織领导有五条綫，即是党的系統，行政系統，工会系統，团的系統，民主党派系統。党的这条綫，起了很大作用。今天看来，事情管得多了一点，对行政工作干涉过多，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行政这条綫，因为党委管事过多，因而有人說是“虛綫”。党由党的系統向下布置工作时，系主任都不是黨員，系秘書多是黨員，就只能直接布置到系秘書，实际上有一部分工作，形成了系秘書领导系主任的情况。系主任有不受尊重和未被信任的感觉。因而加强行政这条綫是很有必要。而民主党派这条綫，是“若有若無，若隱若現”。因为民主党派組織在学校领导工作上沒有起作用。他說：团和工会这两条綫的情况，不甚清楚。他認為前三条綫是有問題的。他建議：“今后要安排得恰当，要各得其所：（1）党的这条綫，很重要，是一条粗綫，但要党政分开；（2）行政这条綫要大大加强，應該是一条粗綫；（3）民主党派这条綫，也是办好学校的重要因素，今后應該划上去，适当地参加领导工作”。他并說：“五条綫平行是不对的，党和行政是兩条主綫。”

陈士驊提出兩点尖銳的批評

民盟中央领导工作是“帶病延年”

党外人士对工作只起了“保証作用”

陈士驊接着發言。他婉轉而尖銳地对民盟的中央和市級組織以及学

校領導提出批評，他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后，民盟中央一直沒有具體辦法的指示，中央領導同志的發言，也只是由劉少奇同志報告中摘錄了幾句而已，沒有一點自己的見解，沒有一點具體辦法。基層組織不知如何做，感不到組織領導。盟員們在學校基本上是以個人的地位起作用的。他說：這樣的情況，是帶病延年，焉能“長期共存。”他說：民盟中央必須改進領導工作。

接着，他認為民主黨派基層組織，在學校里只是響應黨的號召，起“保證”作用而已。沒有參與學校的工作。他說：只叫大家起一種“保證作用”，在今天是不夠了。必需擴大民主，使大家知道工作的前因後果。這樣，是會使人們感到他的工作不是盲目的。

陳士驊的第二個意見，顯然是針對着黨的領導而提出的。

張守儀提出：

要依靠教授來辦高等學校

清華教授有被動工作之感

九三學社清華支社負責人張守儀，是一位女教授。她提出“主要依靠什麼人辦好高等學校”的問題。她說：“教好書，首是依靠老教授。但是清華的老教授，有些人有被動之感。近年來被動之感雖然減輕了，但還存在。”

她認為，必須設法改變這種狀態。

閻剛侯提出：

① 民主黨派基層組織應和黨組織地位平等，並參加學校領導工作

② 黨群關係問題多，教授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閻剛侯提出了具體意見。他說：“清華大學四位副校長，有三個盟員，八個系主任有五個盟員、二位九三學社社員，總務長也是盟員，講師以上，盟員占了半數還多。黨與非黨關係，存在的問題是：（1）互相間的感情沒有建立起來，非黨同志感到黨員高不可攀。大家有格格不入之感。（2）黨群之間是顯然存在着的一座牆。（3）學校教授，認為在校務委員會上不好發言，因為拿出來討論的，是黨委認為成熟的意見。系主任有‘只能體會領導意圖辦事’之感。有人說：我們沒有參與

实际的排戏工作，而只是戏上场时，临时被拉来扮一个角色而已。（4）对党外人士的行政职权重视不够，系主任决定的事，若党尚未决定时，就办不通。（5）民盟组织没有地位，没有起作用。”

他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学校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提出的具体意见是：（1）今后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应和党的组织处于平等地位。

（2）任务有三条：对学校工作起保证作用；实行“互相监督”；对高级知识分子起“团结教育”的作用。（3）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参加校务委员会。因为现在校务委员会的条例，只是规定党、政、工、团参加，就是没有民主党派，这是不合理的。”

蒋南翔主张：

在党委领导的基础上，加强校务委员会

蒋南翔发言，说了四个问题：（1）学校统战工作的情况；（2）工作上的缺点；（3）如何解决问题；（4）工作中的体会。

他认为党群关系，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总的情况，几年来是党群的距离缩短了。问题是进度慢了一些。

他说了工作上的缺点之后，着重地谈了学校的领导体制问题。他说：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有五种提法：（1）实行工会委员会的领导制度；（2）党派联席会来领导；（3）教授治校；（4）校长负责制；（5）党委领导制。

他认为，任何片面的提法，都要发生不好的作用。他主张在党委集体领导的基础上，加强校务委员会。并在这个基础上来顾到各方面的要求。后来他又说：“校务委员会是采取多数决定问题的办法。若是不叫党委制，也可以。”

他又说：过去的校务委员会有形式的统一、机械的统一的情况，这是不好的。今后要改变这种情况。

对工作的体会，他提出了三点：（1）今后工作，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青年教师；（2）要加强民主党派的作用，也要加强党的作用；（3）要求领导上对工作的规定，不要强求一律，各校根据不同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有灵活运用余地较好。

最后，清华大学党委副書記刘冰，也就党委制的問題發了言。

(5、7、第一版)

注：章罗联盟中的一项陰謀，是鼓动高等学校的教授起来反对党委負責制。儲安平在光明日报执行了这个陰謀，發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在这条消息中，就強調了对高等学校党委負責制不滿的片面意見。并标出了“討論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負責制問題”的大字标题，做了第一版的头条新聞。人民日报对这个座談会也有报道（人民日报的报道附后），但在编排处理上和整个报道的基本精神上与光明日报完全不同。

研究清华大学中共和民主党派基層組織关系問題的 座談会繼續举行

討論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作用

本報訊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研究清华大学的共产党基層組織和民主党派基層組織关系問題的座談会，昨天繼續举行。在昨天的座談会上，主要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彭友金报告十人小組在清华大学进行調查研究的情况，和所發現的問題，以及解决这些問題的初步意見。

在昨天的座談会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秘書长叶篤义还發表了他个人对于党派是否需要高等学校中进行組織活动的意見。

对于民主党派基層組織的組織作用是什么？表現形式又是些什么？以及如何發揮民主党派基層的組織作用等，也进行了討論。

这个座談会在昨天結束。結束前，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維汉部長，就討論中的問題，也發表了意見。

彭友金說：

民主党派基層組織參加学校管理工作是可以的

現在的問題是还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

昨天的座談会，仍由李維汉部長主持。九三学社中央委員、北京分社組織部長王之相談了希望共产党基層組織和民主党派基層組織双方多加强联系的意見以后，彭友金报告說：我們到清华大学去作調查研究，

主要是为了研究高等学校中民主党派的基础组织同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关系，不是去检查工作。经过两周的调查研究，得到一些情况，也发现一些问题。

彭友金说，在清华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中，民主党派的成员比重很大，约占42%；行政领导人员，民主党派的成员也比较多；民盟支部和九三学社，各还联系了二三十位教学人员。过去，清华大学共产党组织对民主党派组织有很大的帮助，民主党派组织也作了很多工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民主党派成员受到了鼓舞，各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共产党基层组织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关系是正常的。由这些情况看来，第一，民主党派成员在教学人员中比重大，他们具备了高度的现代文化知识，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也是学校应该依靠的力量；第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了一些群众，代表了他们，又团结和教育他们，这也是办好学校的一种力量；第三，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具有监督作用，可以对学校提出意见和批评，使学校考虑问题更加细致，也有利于办好学校；第四，共产党基层组织只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地位平等，同他们采取协商的态度，民主党派成员就会有主人翁的感觉，更能发挥他们的作用。现在的的问题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还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还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因为，（1）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还未解决。个人有地位，有作用，但组织作用看不见。从共产党内部来讲，对民主党派基层作为一个组织来说，认识不够；有的党组织负责人还认为，民主党派的成员都得到安排，也发挥了作用，没有问题了；就很少考虑过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问题。在高等学校中把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摆到一个什么地位，应起些什么作用，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2）监督问题，过去民主党派也提出过一些意见，但未见处理，也无交代，有人说，要我们进行监督就要多拿一些东西出来，才能实现监督。对于监督，还存在一些顾虑和不解；（3）过去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经常要求共产党基层组织多帮助，多批评，多给任务，协助培养干部和发展组织等。但如何进行帮助，尚待解决。

解决存在的这些问题，彭友金认为，可考虑根据清华大学的情况，

首先解决民主党派基層組織在学校的地位問題，这又要先解决它的任务問題。民主党派基層組織的基本任务，与共产党基層組織的任务是一致的，即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社会主义的学校。民主党派基層組織要求参加学校的管理工作，如参加校务委员会，这是可以的。他們参加了学校的管理工作，好处是：（1）参与了决策的机构，地位平等了；（2）加强了政治责任感，消除了“沒有主人翁的身份，就沒有主人翁的感觉”的想法；（3）可以反映群众意見，也可以把决定帶給群众，溝通情况，調协关系；（4）在校务委员会上揭露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能提高民主党派成員的認識。对于系务委员会，根据清华大学的情况，也可以这样办，原有的党派联席會議也应加强。关于监督問題，主要是共产党基層組織如何帮助民主党派基層組織創造条件，对提出的意見和問題要有着落。从共产党組織說来，應該放手放心，欢迎监督。

叶篤义“成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負責制

他認為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的組織活动

叶篤义在会上談了兩点意見，一点是他認為清华大学是党群关系較好的一所学校，尙且問題很多，共产党对知識分子的問題，應該更加重視起来。他認為应把五百万知識分子的問題，摆在一个重要地位，并建議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一个專門机构負責处理知識分子問題。另一点是，他認為在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的組織活动。他十分贊成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負責制。他說，过去党委会管得太多，如果說党与非党之間有一堵牆，牆的來源，主观上有些关系未处理好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因为有了党的組織，無形中就形成了一堵牆呢？他認為一个人多一种关系、多一种身份就多一个矛盾，如校長就是校長，教授就是教授，兩人之間关系就簡單些，如加上一种党派关系，关系就复杂些了。我們如果不以党派成員身份出現，关系就簡單些，矛盾就少了。叶篤义的这一意見，是包括主張共产党员在学校中也不以党员身份进行活动。他說，党派要常开会，起碼对六分之五的时间的保证就有影响。問題是在高等学校中搞这些組織，是起了推动教学的作用呢，还是抵消了教学的作用？七八年来，民主党派組織生活都过得不好，这一問題長期不得解决。除了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每半月或一个月开个会过組織生活，对知識

分子有無必要？他對於民主黨派學共產黨的組織生活那一套，是不是正確的方向，表示懷疑。他對於民盟組織在大學中的活動，究竟對學校有幫助呢，還是添了麻煩？也表示懷疑。

李毅認為民主黨派基層組織作用有兩方面：

(1) 集中成員和所聯繫群眾的意見

(2) 統一行動，貫徹決定

在座談會上，有人提到民主黨派基層組織和組織作用是些什麼的這一問題。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李毅（本報7日所登新聞中誤寫為李翼）認為，組織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基層組織集中成員和聯繫群眾的意見，第二，起統一行動、貫徹決定的作用。但他又說，民主黨派本身是統一戰綫組織，不容易取得統一的意見的，但是可以集中一些意見，作為有關方面的參考。在統一行動、貫徹決定方面也如此，可以統一，可以貫徹，但有一定的限度，因有的成員有時在組織上服從，在思想上還是有保留的。在對外關係上，要求行政領導與群眾承認民主黨派基層組織作為一個組織，不僅有合法的地位，還要做到名符其實，才能起組織作用。

這一問題的提出，是因為有人談到，民主黨派成員的個人作用是很顯著的，但組織作用若有若無。清華大學民盟支部陶作楷教授認為，個人作用同組織作用不能分開來談，個人起了作用，即是發揮了組織作用。他對於民主黨派成員參加校務委員會這一問題，主張不一定以民主黨派成員的身份參加，並且希望擴大校務委員會時，還要吸收青年助教、講師以及學生、職員、工友中的代表人物參加學校的管理工作。

李維漢部長最後發言說，座談會上的意見，都只供清華大學共產黨基層組織和民主黨派基層組織的參考，究竟怎麼辦，由他們自己按清華的情況研究辦法，試行一個時期，如有效，實行下去；如果要修改，也由他們修改。民主黨派基層組織在高等學校中應有它的一定的地位，應起它一定的作用，這是肯定的。（5、8、第一版）

附人民日报的消息：

高等学校中党与民主党派怎样合作共事

——記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研究清华大学中党组织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座谈会

人民日报記者

根据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学校的总前提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和任务应该怎样？根据尊重民主党派独立平等的方针，高等学校中共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and 民主党的基层组织的应该怎样？为了研究这一系列的问题，从4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和市级组织、九三学社中央和市级组织以及其他方面人士共同组成十人调查组，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为时约两周的调查。在这期间，调查组成员曾经广泛地和各方面人士特别是民主党派成员和無党派教授们接触，听取和交换意见。调查结束后，本月6日和7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主持，召集各有关方面举行座谈。参加座谈会的有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党委書記蔣南翔，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員閔剛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秘書長李毅，民主同盟清华支部負責人、清华大学副校長陈士驊，九三学社清华支社負責人張守仪，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高校党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高等教育部負責人和代表等多人。

这次调查结果和座谈会发言证明，在清华大学，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学校中的党派联席会议，在讨论研究学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發揮过一定的作用。在调整院系、教学改革、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民主党派作了一些工作，在群众中逐渐树立威信，组织也有了发展。几年来，党与非党关系有了改进。“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民主党派成员受到很大鼓舞，“民主党派

要取消”的思想得到解除。而且近来，党与各民主党派正进一步向亲密合作共事的关系方面發展。

但是，調查結果和座談會發言同時證明，在清華大學，黨與非黨關係過去以至現在也還有着大大小小許多問題。

五條綫有三條綫擺得不正

有人把學校中的五種組織系統稱作“五綫譜”，比做五條綫。這五條綫是：共產黨，行政，民主黨派，工會和青年團。五條綫，三條擺得不妥當。黨委系統在各項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管得多了些。有些黨員也加粗了這根綫。一位副系主任談到：有些年青的黨員，對別人尊重不夠。系的決定不通過黨的系統布置就行不通。許多事情，黨內研究好，交下來就做，讓着重體會“領導憲圖”，而不是和群眾一起研究。如果許多工作能多同民主黨派商量討論，就能使他們感到是自己的東西，有一種政治責任感，更有利於工作。

行政系統，從校長以下，有人形容為虛綫。過去，許多事情，是由黨委將決定經由黨总支下達到黨支部，黨支部再通過系秘書（多是年青的黨員），向系主任布置，形成系秘書領導系主任。有人覺得，這種工作方法是合適的。有些問題完全可以讓系的負責人先知道一步，多知道一些。

民主黨派系統的情況是：從個人來看，每個成員都起着作用，但從組織作用來看，是若有若無，時隱時現。有人談到在動力系幾年，黑板報上和其他方面，連民主黨派的影子也看不到。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作得不够。如建築系有年長的教師，黨希望民主同盟的組織對這些年長教師做些工作，但很少和盟員研究工作。在系里和教研室里，看不出民主黨派要起甚麼作用。九三學社有的社員說：普通社員，沒有甚麼任務，感到入社和不入社差不多。因此希望大家做好小組工作，和交給一些任務。

在清華大學，工會和青年團系統的工作，有人說他們是比較正常的。

不僅要參加“施工”也應當參加“設計”

問題擺出來了：五條綫的位置不正。怎樣擺正呢？也就是說，怎樣

在工作中既能貫徹黨的領導，又能使行政和民主黨派組織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座談會上，清華大學黨的負責同志出提了一些初步意見。他們引用了一位民主黨派成員的話，這就是：“門戶開放，權利平等，力竟公擇，是有非去”。也就是另一位民主黨派成員所說的“放心”和“放手”。在過去，學校的一些重大問題，都是征求過民主黨派成員的意見的，但是，民主黨派成員只參加“施工”，沒有參加“設計”，只參加“演出”，沒有參加“排練”。這是因為還沒有徹底認識民主黨派工作的重要性，過去曾經有的黨員認為和民主黨派的关系已經沒有問題了，民主黨派的成員已都作了適當安排，卻沒有或很少考慮到，同民主黨派在工作中應該採取甚么樣的共事关系。今後採取一些甚么具體措施改變這種狀況呢？這就是：一、加強黨派聯席會議的作用。學校的重大問題，不是事先由黨討論，而是直接交由黨派聯席會討論，讓每個人都充分發表意見。各系也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和需要，考慮成立系的黨派聯席會。學校的領導體制，今後也可以以黨委領導制為基礎，吸收各个方面共同參加為好。二、加強行政系統作用。學校的重大問題由校務委員會、各系的重大問題，由系務委員會討論決定，並且貫徹執行。三、要求系秘書和做其他行政工作的黨員，克服工作中簡單化的作風。四、在各種工作中，向民主黨派請求支援。

民主黨派如何發揮組織作用？

要想把黨、行政、民主黨派的关系調整好，還必須解決民主黨派基層組織在高等學校中的地位 and 任務的問題。黨和非黨的关系，是獨立、平等的关系呢？還是領導和被領導的关系？在這個問題上，不少人都認為，民主黨派除接受共產黨的思想領導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是與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平等的；它在學校的基本任務，同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是一致的，這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办好學校。但是，這裡就涉及到了這樣一個問題：民主黨派的組織如何發揮它的組織作用？

有人認為必須首先加強民主黨派成員的自我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得好，才能使自己的組織在理論上和思想水平上，同共產黨處於平等的地位，發揮的作用才會更大。比如，有些人一直存在着一種自卑感，認為共產黨員在政治上都比自己強，不相信自己會起什麼作用；有些人怕監

督錯了受批評，不敢監督；有些人習慣于事事依賴共產黨的幫助，缺乏獨立思考和獨立負責的精神，甚至在甚么地方挂一個錦旗的事情，都要向黨委請示。顯然，這些問題都是需要通過思想改造來求得解決。也有人認為，要加強組織作用，就必須加強領導的作用，希望民主黨派的領導機構，能夠根據學校中的中心問題，隨時對自己的成員提出具體要求。還有人認為，要想民主黨派的基層組織發揮作用，必須給黨派的領導人以研究黨務領導工作的時間。現在，民主黨派基層組織的負責人，多半在教育行政、教學研究方面負着很大的責任，他們本來就很少有時時間研究黨務工作，而黨務中的一些事務性的工作，又占去了他們僅有一點可能抽出來的時間。因此，希望學校方面幫助他們解決這些問題，或是考慮減輕擔任黨務工作的同志的其他工作任務。也有人認為，民主黨派的成員，今後應該更多地參加各種行政組織和群眾組織，以便在更多的方面發揮作用，體現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權利和義務。

推心置腹交朋友

關於黨員與非黨同志之間的關係，有人提到，過去在清華大學，是不夠正常的。黨員不去或很少去非黨同志家裏，非黨同志也不去或很少去黨員家裏。彼此都有顧慮。甚么顧慮呢？黨員去非黨同志家裏，怕被懷疑是去檢查他們的行動；而非黨同志去黨員家裏，又怕被別人說是“拍馬屁”。彼此之間，可以說只有政治聯繫沒有感情聯繫。就是非黨同志之間，也多是互不來往。過春節，從來不拜年。學校號召團拜，就有許多人不去，因為覺得平時少聯繫，過年來個大團拜，太形式了。有人談到，有些黨員作風太嚴肅，使人感到格格不入。“黨員來談話，是有事才來”。有的老教授，對曾經是他的學生的黨員，無話不談，而對一般黨員，就不願深談。因此，不少人希望，黨員與非黨同志，要多接觸：“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交情問題”是很重要的，朋友之間要推心置腹講知心話，要有朋友的感情，這樣才能真正做到親密的合作共事。近來，這種情況已有改進。

李維漢同志的一些意見

李維漢部長在座談會上，曾針對調查材料和大家談話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作了發言。他談到，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合作共事關係，是一個

很普遍的关系。民主党派成员应该在工作中有职有权有责。这个问题，很早以前就提了出来。去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各民主党派都要求发挥更多的作用，清华大学这次调查中所提到的“从设计到施工、检查”的问题，就是这个愿望的表现。这是对的，应该肯定。

我们有些党员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还没有正确的估计。民主党派一般都同我们有过很长时间的合作关系，他们走的道路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向前发展的，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中起了带头作用。

民主党派，现在基本上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集团。高级知识分子在我们国家是很重要的，他们对于后代是老师，在现在内各项建设中，是一支强有力的力量。他们应当同工人结合，工人也必须同他们结合。因此，应该重视民主党派，应该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在思想、学术上允许争、放，解除某些压力，克服党内的宗派主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掉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鸿沟。

为了贯彻这个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应该服从它的要求。机关学校中党组与行政的关系以及保密制度、人事制度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考虑的问题的。

现在谈的清华的问题，只是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一个方面的问题。校务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可以同党委的意见不一致。共产党可以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方案，民主党派也可以提出方案，个人也可以提出，总之要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这样是不是会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呢？我以为相反，更多地听取群众意见，领导作用就会更充实。

单是在校务委员会作工作还是不够的，共产党还要作统战工作，通过各种接触，沟通各方面的关系，解决合作共事中的障碍。这些问题解决了，还要解决共产党员的态度问题。清华大学教职员中的共产党员有很多青年人，他们对老教授们，应该“拜老师，交朋友，开诚相见，虚心学习”。

李维汉同志最后谈到，他的意见是提出供大家参考的，不是定论。他还建议清华大学领导上和各个方面共同研究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订出些制度，逐步解决现存的问题。（人民日报5、8、第二版）

北京航空学院官气十足 在党群之間有一座“万里長城”

連日舉行座談不少教授尚有顧慮

本報訊 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于5月16日起連續开了三次座談会，帮助共产党整風。虽然有些教师对該院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評，但有些教师認為还放得不够。有署名“三教师”的貼出了一張大字报，批評該院党委会沒有做到大胆放手，以致群众对“鳴放”还有顧慮。該院党委会第一書記武光同志在18日的座談会上，也承認該院党群之間不仅有一座牆，而且这座牆是一座“万里長城”，甚至比万里長城还厚。

在座談会上，教师們指出官气十足是該院的特点之一。学校的布告上，前面大大的写着“北京航空学院命令”，后面也大大的写着“此令”。該院领导習慣于用治軍的办法来办学校。而且领导同志只是坐在三樓的办公室里，很少与群众接触。林士謬教授說：领导同志好像有意避开群众，很少下来看看。对群众情况一点不了解，只会下命令。程本蕃教授則認為該院领导有特权思想，他举例說，医务室規定体温不到三十八度以上的病人，医生不出診，但是院長的小孩病了，不管体温高低，通知一声，大夫就去看病了。

許多教师指出，該院领导平日不接近群众，只找積極分子，偏听偏信，許多系主任有职無权，大权掌握在系秘書的手里。一位系主任几年来只主持过一次清潔衛生工作的會議，所有的工作都是系秘書包办。饒子范教授說，领导上从来只知注意積極分子，却不重視群众。但是積極分子並沒有起到联系群众的作用，而是起了反作用。宁棧教授更說，由于培养和使用積極分子不恰当，許多人一当上積極分子便变坏了。这是拮生于准則为桔，逾准則为枳的問題。看見有些青年在这种風气中变

坏，是使人痛心的。

教師們談得最多的是保密問題，認為保密問題處理不得當。給學校帶來了很大的損失。凌雲沛副教授說，保密是應該的，但要看保的是什麼密。把世界上都已知道的东西還要保密，則大可不必。常榮福副教授說，許多寶貴的資料，由於保密，不讓人看，可是時間過了，這些資料成為廢品，也沒人要看了。林士驊教授說，保密制度也是一座牆，不把人民內部的保密和對外的保密區別開來，就會產生很壞的副作用。例如有一本蘇聯自動駕駛儀說明書，該院把它當作絕密資料，不許出借。實際上，這類駕駛儀美國早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使用了，而且我們也有英文的說明書。但是後來又來了一本更新的自動駕駛儀說明書，反而當作一般機密看待，卻可以借出來看了。他說，照這樣下去，學生問到的問題我們不知道的時候，也可以拿保密來搪塞了。

教師們指出，由於保密，許多專門人材不敢應聘，在校的教師有的也不安心；由於保密，許多青年也不敢來投考，在校的學生有時也碰到很難想通的問題。徐鑫福教授說，有的教師下廠，系主任不敢問上哪去了，這是保密。有時分配學生下廠，實習的題目都已發下去了，可是幹部科不同意對某些學生的安排，卻又不說出原因，這也是保密。余德星副教授說，新助教反映在做學生時，黨員學生光下機密廠，但馬副院長說這是“奧巧”。

目前該院教師還顧慮重重，在座談會上，也表現出了這種氣氛，有些教師只談瑣屑問題，不談主要問題。崔濟亞教授就承認自己還沒有完全解除顧慮。他說，肅反運動中搞出了一個“自發的反革命分子”，這個名詞的定義很不明白，誰要是不滿意領導就可能被扣上這頂帽子。這是教師們還有顧慮的根源。他認為憲法當中應當明文規定，保證一個公民在沒有證明有罪以前，不能採用任何群眾形式的鬥爭。宇槐教授則認為人們所以有顧慮，是該院幾年來的作風所造成。他說，該院幾年來的風氣是要求大家盲目服從領導；如果不盲目服從而提出意見，就會遭到兩種待遇：一是在運動當中把你當作重點，二是把你調走。

原任體育教研室主任的曾緝盛先生在座談會上說：近來報上所提到的人民內部矛盾，我都有切身之感。他用他自己的遭遇來說明北京航空

学院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说：“我们体育教研室有二十多个专搞体育的人，订出来的体育活动计划，却要送给一个不懂体育的年青干部批准，而他又故意为难，故意打击。”他指出很多人都是有职无权，领导上对知识分子不信任是最令人痛心的。他说：“马副院长要我下台的四条理由，我一条也不承认。他还向人说曾某人五十多岁了，不能改造了。我要问，五十三岁的人就不能要求进步吗？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里有这项规定吗？”

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希望该院大胆放手，用事实解除人们的顾虑，使大家能够把心里的话倾吐出来，使该院的作风能够彻底改变。

(5、21、第一版)

注：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的领导，特别抓住了宗派主义这一“要害”，许多消息，都选用了极其夸大的词藻，来攻击所谓党群关系，甚至在发言人的发言里加添添醋。在这条消息里就篡改了发言人的原话，文中“……党群之间不仅有一座墙，而且这座墙是座‘万里长城’，甚至比‘万里长城’还厚。”等词句，是配音和编辑先生“艺术加工”加上去的。

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

加强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领导机构

本报讯 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晚上举行的座谈会上，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说，复旦大学已取消了党委负责制，加强校务委员会，以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他认为这样容易发挥老教师的作用，使党与非党干部打成一片，把学校办好。陈望道校长并说，因为复旦大学在这方面比较有条件，中共上海市委也认为这个办法将在复旦实行得好。(6、2、第一版)

注：为了执行章罗联盟的反对党领导高等教育的阴谋，光明日报就篡改了这条“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这是一个完全失实的错误报道，造成了恶劣的

政治影响。处理这条消息的是光明日报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右派分子），他在思想上早就认为高等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毛病”很多，迟早要取消。因而，他对这一稿件，不管是否可靠，不加核对，当作好新闻要记者立即写出。这条消息发表后，各地读者纷纷来信反映，有些学校已经因这条消息的煽动，引起了混乱现象。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复旦大学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人民日报的消息附后）。这时，储安平不肯发表承认错误的更正消息，一再和有关同志推诿人民日报为什么要发表这条消息，要和人民日报对抗，并在光明日报部主任会议上说什么“人民日报硬说我们错了”的话，要大家回到各部去传达，以挑拨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和人民日报的关系。并布置记者去访问陈望道先生，6月5日刊出了那个似更正非更正、实质上是和人民日报对抗的消息（消息附后），这更加混淆了是非。

附人民日报的消息：

陈望道和楊西光說：

复旦大学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

本报讯 昨日，正在北京开会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就2日光明日报刊登复旦大学已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对本报记者说，光明日报的记载与我的发言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上并不是“复旦大学已取消了党委负责制”。我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谈的是复旦大学加强校务委员会的问题。复旦大学的党、政领导人员为了加强团结和增进学校领导工作，经过党和非党的一些同志的商量，提出了关于加强校务委员会的作用的一些办法。这些办法正送请高等教育部研究，要经过慎重的讨论以后才能做出最后决定，实行这些加强校务委员会领导的办法以后，学校还是要由党委来积极领导的，怎么能说是已取消了学校党委负责制呢？

本报上海3日电 2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一则消息说：上海复旦大学已取消了党委负责制。这里教育界人士对这件事很关心，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书记楊西光就这件事对记者说：复旦大学并没有取消党委负责

制，最近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問題的討論中，本校負責人員曾經提出加強校務委員會作用的意見，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党在学校各方面工作的領導作用，發揮全体教职員的積極性。我們目前正在研究今后如何进一步改善党的工作，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以便更好地團結大家，把学校办好。光明日报所載复旦大学已取消了党委負責制的消息是完全沒有根据的。

(人民日报 6、4、第一版)

附光明日报似更正非更正的消息：

陈望道談加强校務委員會問題

复旦大学党委制并未取消

本报 6 月 2 日刊載了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長談的該校取消党委負責制、加强校務委員會的消息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本报記者于昨(4)日晚上八点多鐘訪問了陈望道校長，請他再談一談这方面的情况。他說：本报所刊新聞与他的談話有些出入，复旦大学加强了校務委員會，但党委制并未取消。

陈望道校長說：我們學習毛主席的報告时，大家就提出了加强校務委員會的方案，起初由学校的党、政負責人討論，接着又交給各民主党派負責人討論，經過反复討論后，对这个方案作了一些修改。后来，我們学校各系也討論过这个方案，并且已經把这个方案送給高等教育部。这个方案規定，校務委員會是学校的权力机构，学校的很多重要問題都要經過这个委员会討論，做出决定。現在我們学校的很多重要問題都已經交到校務委员会討論，我們已經这样做了。不过，这是一个制度問題，关系很大，还要請领导上来做結論，不是某一两个学校可以单独决定的。

(6、5、第一版)

清华大学教授尚未做到开怀暢談

有些教授的發言中漏出清华大学存在不少問題

本報訊 清华大学教授連日以來仍在繼續座談“鳴放”問題，雖然有些教授在發言中指出，清华大学是三害俱全，特別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相當嚴重；但很多教授還沒有做到开怀暢談，有些座談會還常常出現冷場現象，經主席点名，才有人發言。而這些教授的發言又多是停留在一般的議論上。對於這種情況，該校不少教師很不滿意，電機系王遵華教授就說：大家的發言還沒有接觸到具體問題。而公共教研組孫念增教授則認為，這是因為“清华大學的領導陶醉於對自己的成績的歌頌。他說：“最近”北大、科學院、地質學院很多同志都在報上發表了意見，假如他們在清華，一定意見更多。清華在別的問題上都能帶頭，而這次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不能帶頭。”

在記者接觸到的一些教授中，他們對清华大學的“鳴”“放”不開的情況，心裡有不少意見。有人說，有些先生在會上發言只說了三分，還有七分留在心裡。有人說，很多人發言還是要穿靴戴帽，在發言之前，要說明黨內偉大、正確；發言之後，要表示“意見不一定正確，僅供參考”，他們認為，這種情況，表明了很多人思想上還沒有真正“放”開，還存在一定的顧慮。

記者為此，特地訪問了錢偉長副校長和常迴教授。錢偉長副校長認為，清華是剛開始在“放”，就他幾天來參加一些座談會來看，情況是一次比一次好。但是，他認為：目前有些教授還不同程度地存在顧慮，有些人在家隨便談心，可以談出許多意見，但是到座談會上發言就打了折扣。他說，清華長期以來的情況，使大家缺乏這種大胆暢談的習慣。他認為：學校黨委應該進一步鼓勵大家大膽地把意見“放”出來。

常迴教授提出：清華大學對內部矛盾的討論是走慢了一步。到目

前，有些座談会上所談的意見不尖銳，接觸到學校的實際問題時，往往談的不深。

就目前有些教授所已談出來的，清華大學確是存在有不少問題。機械系的副主任董樹屏教授說，清華大學是通過黨組織來拘束一切。教研組主任說了不算，教研組秘書說了才算，教研組主任受秘書的限制。他說：“我到現場聯繫生產實習，系秘書天天跟着，恐怕我說錯了話。在工廠看資料，必須系秘書去聯繫，因為看資料的證件由系秘書帶着的。這種做法，是不是學校領導上的意圖呢？這很值得懷疑。”

何成鈞副教授也談到系秘書專政的問題。他說：長期以來，我對秘書專政的問題有意見。有一次，我有機會對蔣南翔校長說到，我對秘書專政很不滿意。蔣校長回答說：並沒有此事。把事情一口否認了，蔣校長工作不深入，光靠聽彙報辦事，這必然會產生嚴重的片面性。

李歐副教授則說，蔣南翔校長在最近一次報告中談到，習慣的勢力能使人僵化。李歐教授認為，清華大學習慣勢力的特點是三多三少：搞運動多，做細致工作少；貫徹多，商量少；關心青年多，尊重老年人少。這種習慣勢力就是蔣校長照搬過去領導青年運動的方法所造成的。他說：蔣校長是從團中央調來的，長期做青年工作，他來時又帶來了一批青年團的幹部，這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清華年輕的幹部多，也使搞青年運動的工作作風容易發展。但是辦學校是個很細致的工作，用搞青年運動的方法是辦不好的。

無線電系系主任孟昭英教授在發言中，以他自己的感受，談到非黨人員在學校中有職無權的問題。他提到：學校作出的很多決議，並不是通過教授或作行政工作的領導人，因此，大家對這些決議並不親切，只是蓋個橡皮章就是了。他說：我系設立計算技術專業的決定，我根本不知道。直到系里的教師都被調走了，我才從校外的人得知。設置這個專業，是國家需要的，但是我們學校有沒有條件，設備能否及時解決，教師能否很快地培養好，這些問題校長是不是可以問問系主任呢？我總是需要的。最近學校交給我系三個新的專業，也是經過黨總支同志通知我一聲就算了。校長不親身和系主任談談這些問題，能說這是正常的領導嗎？

有的教授認為，清华大学的鳴放要真正开展起来，必須由瑣屑的問題轉到重大的具体的問題上。必須針對三害大力进攻。而參加該校座談会的高等教育部工業司唐守愚司長，也認為清华大学的“鳴放”還沒有好好开展起来，对清华大学的三害還沒有大举进攻。

(5、19, 第一版)

注：右派分子要把光明日报办成一张反对派的報紙，和党报“唱对台戏”的報紙。在5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题为“清华园教授开怀暢談”的消息后四天，光明日报就發表了这条挑釁性的消息，說“清华大学教授尙未开怀暢談”，企圖抵消人民日报的正确报道。貫徹了儲安平的和党报“唱对台戏”的办报方針。

附人民日报的消息：

清华园里百余教授开怀暢談 不該用搞运动的方法办教育

本报訊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昨天晚上，邀請全校一百多位教授副教授举行了座談。許多教授、副教授提供宝贵意見，帮助学校党組織进行整風。

欢迎党的整風

清华大学整風已經开始了。全校教授都表示欢迎，并願意積極帮助党組織进行整風。何成鈞副教授說，作为一个非党的知識分子，对于党的整風，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又怀着感激之情。我們知道，沒有党的領導，什么也不会有，这是很清楚的事情。但是，我們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党的整風，就是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將使党更加堅强有力。党同知識分子的关系，是整風的重要課題。我希望党委对整風要求放高些，不要满足于已有的成就。

用青年运动的方法搞教育

習慣势力，有时使人思想僵化，一时扭轉不过来。建筑系張守仪副教授說，学校領導方面，只会用搞运动和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問題。她

梁生副教授說，學校教育工作方法應該是和風細雨，不是狂風暴雨。例如修改教學計劃，不是一個運動能解決了的，對某一個問題需要仔細的具體工作。

李歐副教授這樣說，什麼習慣勢力是清華的特點呢？用搞青年運動的方法來搞學校教育，這就成了清華的特點。這個特點有三多三少。三多三少是：搞運動多，細緻工作少；任務貫徹多，商量少；關心青年多，關心中年以上的人少。學校搞運動，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然，有中心是必要的，但是不能把經常工作沖破了。所謂貫徹多，也就是指搞運動的手法，上面布置，下面貫徹，沒有什麼商量。學校考慮學生的問題是對的，而對教師的問題考慮得就太少了。

電機系教授章名濤也說，清華目前學術空氣還不夠，這是否和黨的領導作風有關係呢？過去黨習慣於搞運動的作風，習慣於用這一套辦法，現在值得考慮。

連吃飯都不願坐在一桌上

黨同群眾之間是有一道牆的，應該拆牆。有的黨員負責同志，脫離群眾，走在路上，見到其他同志却不大理。這是為什麼呢？方嘉璜副教授說，有的年青的黨員，還為這個事情作解釋。他說：“因為負責同志很忙，在走路時也思考問題，所以沒有看到你！”這樣，就只能造成隔閡。還有，在吃飯的時候，黨員和非黨員在一起，正是黨員接近群眾的好機會。可是，却不是這樣。黨員吃飯在一個桌子，非黨員在一個桌子，好像連吃飯都有階級性似的，影響很不好。自然，也有些黨員同志很好，碰見面能好好談談。張堅教授說，黨對非黨群眾關心少，商量少，只要求工作。

李篤云教授說，有的黨員同志眼睛望空中看，有時甚至在樓梯上碰面也不打招呼。過去是師生關係，但今天也冷淡了。是否入了黨就比別人高了一級？有的本來是我的學生，現在也不理我了，真是六親不認了。有些後起的黨員比老的架子還大。機械製造系教授金希武說：我覺得學校新老教師之間的關係還不夠親密，不夠誠懇，不夠尊重。有些年輕教師對老教師還存在着敬而遠之的情況。同時因為學校對教師們照顧的情況不一樣，也影響了教師之間的團結。有些教師一入黨後，路上碰

見也不再點頭了。

水利系陳梁生教授說，沒有看見過黨員在公開場合大膽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有些黨員只談原則，但不願做具體工作，我們系里就有這樣的黨員。建築系莫宗江副教授說，有人對黨員或對某草案提出意見時，黨員不是听別人說，而是向別人解釋一番，後來大家就不提意見了。黨員和非黨群眾日常生活中不在一起談心，只有在討論問題才在一起，都是很嚴肅。我們系的黨員，不是在群眾之上，也不是在群眾之中，而是在群眾一邊。建築系辜傳誨教授說，學校對非黨的領導幹部關心和照顧不夠，有些處於三不管的狀態。參加社會政治活動，過去還注意了一下，也像曇花一現過去了。馬約翰老教授和陶保楷教授都認為黨和非黨同志都要主動接觸，對團結才更有幫助。許多教授都提出了改進黨群關係的意見。

黨外幹部有職無權

水利系黃萬里教授說，有職無權，是個普遍現象，像不成文法一樣，大家習慣了，也不感覺什麼，更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張任教授說，有職無權可以這樣來比喻，參加施工的多，參加設計的少。例如送到國外去深造的名單，不是由教研室主任簽名推薦的，而是由上面提出來的，不能說上面沒有調查研究，但總不如教研室主任知道的詳細具體。這些名單提出來以後，也沒有很好討論，教研室成員提級問題也是如此。充分發揮各教研室成員的積極性，需要使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有職有權，不僅讓他們參加施工，而且也要他們多多參加設計。

李禱祥教授說：我覺得清華黨群關係雖然不像銅牆鐵壁，但問題還是有。例如在有職有權這點上就還做得不夠，黨有的事管得太多了。如教研組是個教學工作單位，但是工作權限就不夠。

董樹屏說，我認為清華的黨和行政之間的工作關係還沒配合得好，還有一定的距離，有些事情只通過黨委，沒有通過行政，缺乏研究，缺乏討論。

多商量、多信任、多幫助

動力機械系副教授方崇智說：我認為黨對高級知識分子主要應多和他們商量并信任他們。目前清華黨群關係一般還融洽，但黨對教授們多

少还有点看成外人。我举几个小例子来说，例如有外宾来清华参观时，学校限制教授们不许用外文直接和外宾交谈。又如教授们给苏联专家送些礼物时，也一定要经过系秘书，这实际上使教授和苏联专家不能够更亲密一些。例如高等教育部曾再三声明，限制教授们不能直接和外国直接联系，这也值得考虑。

机械制造系教授王遵明说：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觉得清华大学领导上虽然辛辛苦苦，但对某些方面开展还很不够。如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首先学校领导上对青年教师和老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就都重视得很不够。清华在院系调整的时候，有60%的教师被抽调出去了，现在教师们的教学任务很重，领导上应该替教师们很好地打算，值他们再提高一步。

教条主义还很严重

清华大学的教条主义是很严重的。何成钧副教授说，在第一次口试的时候，有的同学反映，班上许多同学要争五分，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同团的干部谈这个问题，应当很好解决。团的干部却说，“苏联也是的”！这就搁下来了。有的事是很令人伤心的事。有一次，我同系里的秘书谈教学工作中的问题。我讲了应该怎么办，可是系秘书说，不能照你的办，不行！后来，我发现他又按照我的意见布置工作。我问，为什么这样？他说，已经问过专家了。有的党员甚至说，你们不要听党外人话，听我们党员的。

形式主义的思想工作

许多教授都说，学校的思想工作，有些形式主义。大家在政治学习讨论时，先找结论，然后向结论迈进。但是，这样不能解决问题，人不说真心话，问题讨论得也就会不彻底。还有，政治学习也分甲组、乙组，也分了个等级，不知道分开学的目的是什么。党培养了一些积极分子，可是，有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的影响却不太好。这种积极分子是怎样产生的，值得研究。水利系黄万里教授说，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枯燥无味，不能把思想工作融化在学生日常生活中去。我们既反对公式化的电影，也反对枯燥无味的思想工作。我们希望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富有韵味，富有

詩境才好。

不該有“全國第一”的看法

清華大學中，有些人有全國第一的看法。何增霖教授說，其實，清華大學有些也不一定第一。我們應該好好去學學別的学校，要學的還很多。比如圖書館工作，現在就沒有分類目，書借出去也不曉得。提出了改進圖書館工作的建議，有的領導同志也听不進去，認為清華什麼都好，圖書館還能不好嗎！王遵華說，清華開展“百家爭鳴”慢了，搞得比別的学校又差，希望領導方面檢查一下。現在，領導方面好像沒有什麼，有些自滿。有的教授說，清華大學推行先進集體，有什麼好處呢？別的且不說，先進集體評選的經過，就是最大的官僚主義，因為領導方面只靠彙報，而沒有深入實際了解情況。

教授們對加強學生思想政治工作、學校行政領導工作，以及學校黨委制和教授治校問題，等等，也都提了很寶貴的意見。

清華大學昨天的座談會，是一個良好的開始。教授們還有許多寶貴的意見，將在以後繼續提供出來，幫助清華大學黨組織的整風更深入一步，提高一步。

（人民日報 5、15、第二版）

北京大學學生开辟“民主牆”

一邊努力學習，一邊提出不少意見，幫助整風

本報訊 首都各高等學校的“鳴放”，北京大學一直走在前面。在5月19日以前，“鳴放”還只是在教師之中開展，至5月19日起，學生也參加進來了。他們在大飯廳前的廣場上，开辟了“民主牆”，通過大字報的方式，針對“三害”提出了不少意見。截至目前為止，除了大飯廳前的廣場上琳瑯滿目外，各系和一些宿舍內，也張貼了不少大字報。

5月19日，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些署名為“一群團員和青年”的學生，在大飯廳前的牆壁上，張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內容是向北大團委

会提意見，問北大是不是有出席青年團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如果有，又是如何產生的希望團委會回答。接着，又貼出了第二張大字報，要求開辟民主園地，給學校領導提意見，幫助整風。於是，大字報便一張接着一張在大飯廳前的各處牆壁上出現了。這些大字報，大多是對北京大學的領導和高等教育部在工作中的缺點以及應當如何改進，提出批評和建議。

在開初時，有的學生提出建議，希望停課幫助學校整風。但這張大字報貼出後，絕大多數學生認為停課整風不符合中共中央所發整風指示的精神，表示不贊成。而原建議的學生也就收回了他的建議。一周以來，學生照常緊張地學習。但在下課後，大飯廳前，則川流不息地有許多學生在張貼或閱讀大字報。有的系還出版了油印的除三害專刊，要求同學們大家積極行動起來，維護黨的利益，與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作鬥爭。他們對開辟“民主牆”的熱情，充分地顯示了北大學生對整風的擁護和幫助學校黨組織作好整風工作的決心。

這一週間，在北京大學的“民主牆”上，對北大和高教部的工作提出了許多尖銳的意見。不少大字報認為，北京大學存在着嚴重的宗派主義。有的大字報指出選拔留學生由黨團員包辦，非黨團員不能入選，便是宗派主義的表現。其中一張大字報舉出，有一個留蘇學生，學習成績很差，多次補考不及格，但因為他是一個黨員，還是選拔留蘇了。有的大字報還舉出，在畢業生分配工作的時候，也有黨員分配好的崗位，非黨團員分配偏遠地區的崗位的情況。許多大字報對高等教育工作提出了他們的建議，如有的主張把政治課改為選修；有的主張取消禁書，讓同學自由借閱；有的建議開放學校中的黨委負責制，加強校務委員會來領導學校工作；有的主張學生可以自由聽課，建議學校採用學分制；有的要求取消“以官風代學風”的作法，要求黨團員與群眾待遇平等。對留學生的選拔，則要求通過嚴格的公開的國家考試，並希望允許出國工讀和自費留學。今年應屆畢業生還專設了“畢業生論壇”，對以往畢業生分配工作不合理情況，提出了批評，希望今後畢業生可以自由選擇工作，可以自己找工作。

北京大學學生的大字報，形式多樣，琳瑯滿目。其中有長篇大論

的文章，有小品文，有杂文，有詩、圖、新乐府和漫画，还有章回小說。有些大字报張貼后，接二連三地貼出了贊成和反对的意見，展开辯論；有的并在大字报上注明，可以約期当面辯論。有些問題，因为出現了分歧的看法，还在晚飯后，組織了辯論会。这样的辯論会，已經出現多次，經常有几个学生圍立听講。

在民主牆上，还有学生訪問該校教授翦伯贊、馮友蘭、侯仁之等先生發表的意見。他們对于学生开辟民主牆，热情帮助共产党整風，認為很好，認為学校整風，应当有学生参加进来。据聞江隆基副校長也表示欢迎，認為学生通过大字报向学校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对整風工作以及今后工作的改进，大有好处。而学生们則認為他們开辟“民主牆”；出版大字报，並沒有耽誤他們的學習，他們認為这是繼承北大在五四时的民主傳統，他們表示，要把火力集中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大害，要做到“整風和學習兩不誤。”

（5、26、第二版）

注：儲安平跑到北大看了大字报，回来就要光明日报学校教育部立即报道。总編字主任一向向儲提出，这样报道一定会起煽动作用，扰乱整風步骤，对人民不利。但是，儲安平完全不理。后来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亲自执笔，写出了煽动大学生鬧事的“北大开辟民主牆”的消息，这条消息發表后，在不少地方的大学里起了煽动作用。

首都各大学大字报的綜合报道

本報訊 近一周来，首都各高等学校的民主空气非常活躍，学生们在不耽誤功課的原則下，以受教育者的亲身的感受，通过各种形式，对学校教育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見，帮助学校党組織进行整風。

北京大学学生开辟“民主牆”，針對“三害”提出尖銳批評的情況，本報已于26日报道了。在最近兩天中，北京大学大飯厅前的“民主牆”，繼續張貼了許多大字报。中文系研究生和学生的“任林內尖”，揭举具体事实，就畢業生分配工作、选派留苏学生等等，对高教

部和學校領導在工作中存在的三個壞主義，提出了尖銳的批評。27日大飯廳前的牆壁上，貼着一幅巨大的標語，上邊寫着毛主席的話：“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

從5月24日起，清華大學學生也貼出了近千張大字報。很多大字報對去年討論教學計劃時，該校領導對錢偉長副校長所提應當加強理論基礎課的態度，提出了批評，認為這是“圍剿”，是該校領導宗派主義情緒的突出表現。許多大字報表示支持錢偉長先生的意見，有的大字報要求重新討論這個問題。有些大字報表示歡迎老教師講課，希望改變過去的作法，使他們學得更多的知識。有些大字報還提出了“理工合校”的問題，贊成華羅庚先生所提出的意見，希望高教部試辦理工大學，有些教授也同意這個意見。對政治輔導員制度，提出的意見更多，很多大字報希望取消這個制度。

表揚“先進集體”的作法，當年在清華大學是搞得最熱火，而且學校一向堅持這種作法的“積極作用”。這次，不少大字報批評了這種作法，連被表揚為先進集體的水利系95班，也提出了反對這種作法的意見。

清華大學學生除了張貼大字報外，還出版了油印的刊物，並且已經開始舉行座談會，給學校領導提意見。（以上為潘文彬執筆）

這幾天，北京師範大學學生的民主空氣空前活躍。大字報像雨後春筍，許多教室的門前和牆壁上都張貼着各種名稱的大字報，課餘時間，前往觀看的人絡繹不絕。25日和26日兩天的晚上，還先後開設了五個“自由論壇”。很多班級的學生則在課餘舉行了座談會，發表意見。

大字報對教育部和學校中的官僚主義提出了批評和指摘。制圖專業四年級學生對教育部盲目開設制圖專業，非常不滿，有一張大字報寫着一首詩：“蘇聯專家一句話，教條主義連聲夸，圍畫制圖便成系，目的不明就起家，誤人子弟知多少，前途渺茫往何方。”另外一張貼在教育樓門前的大字報，揭發了一個平時人們不了解的秘密。教育部某司長的愛人左企鵝是教育系學前教研室副主任，她和另一個姓張的副主任是同職，評薪時，教育系主任彭承說：左不在組內評。發表後左的工資竟比張的高一級，既未開課，又不懂業務，是憑關係和資格來充當副主任

的，而工薪反比懂業務的副主任高，認為這不是‘按勞取酬’而是憑資格吃飯。同時，學生們還訪問了黃藥眠，李長之、蕭璋等教授，用大字報形式發表了他們對學校整風工作的意見。

有的學生在大字報上提出，要求學校停止考試幫助整風。這種意見遭到很多學生的反對。地理系二年級一群學生簽名的大字報上寫出：整風是長期的，爭鳴是黨的政策，這次不是三兩天一股風能突擊成的，我們堅決反對停止考試。現在北京師大的學生都在一邊幫助整風，一邊緊張地學習，準備迎接學年考試。（以上徐穎執筆）

北京航空學院的大字報，表現了眾采紛陳的景象。有的大字報要求學校領導把整風工作好好地領導起來，採取措施，針對該校的具体情况 and 具體問題，解除群眾的顧慮，不要落在群眾的後面。3308班的学生在一張大字報上說，他們听了報告之後，相信黨委會有決心把整風工作做好，但是領導上接受批評、承認錯誤的空氣還不夠，有些青年教師也出了大字報，他們希望大家大膽揭發“三害”在教學工作上所造成的惡果。政治課教研室在一張大字報上，還提出在整風中要及時解決一些具體問題，而為着解除群眾的顧慮，還要注意從思想上來解決問題。

自上周開始，北京石油學院學生也張貼了許多大字報。大字報的名稱有“窗邊草”、“矛盾”等等。有的大字報對學生實習負擔過重提出了意見。學生會也編出大字報“大學生論壇”，並且通知每天下午六點半以後，在學生會辦公室接待學生來訪，以便在“大學生論壇”上把學生的意見發表出去。北京鋼鐵工業學院學生的大字報，比較集中地對學校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作風提出了意見，同時，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也提出了許多意見。北京俄語學院學生的大字報則集中地對該院領導上的宗派主義進行了批評。有的大字報指出，連各班班長都是由人事科指定黨員擔任，而這些班長實際上成了各班的“小皇帝”，他們自視為“上級特派員”，以說明該院的宗派主義情緒已侵蝕到了學生生活中，說明該院缺乏民主空氣。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從25日起，也編出了“野花”、“和風”、“揚聲器”、“鏡子”等四種黑板報和大字報。北京地質勘探學院的黨委會，則已接受建議，對近千張大字報上所提出的一些問題，開始進行檢查。中央民族學院的學生除編出了許多大字報外，許多

班級的学生还开了座谈会。同时，共青团还召开了团员大会，号召大家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帮助学院整风。

根据记者连日的接触，首都的大学生都在努力准备功课，迎接即将来临的学年考试。但是，他们是非常关怀学校的整风工作的。他们希望自己更好地成长起来，希望学校的工作在这次整风中克服缺点，大大地躍进一步。他们怀着这样的心情热烈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希望帮助学校做好整风工作。（以上潘文彬执笔）

注：这篇综合消息，在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同志极力反对下才未发表。

西安各民主党派讨论毛主席讲话

对发挥民主党派作用提出很多意见

本报西安讯 西安各民主党派组织成员，连日来广泛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讲话。对今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两大方针下，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提出了很多意见。

在民盟陕西省委会和西安市委员会召开的扩大委员会的讨论中，民盟的省市委会和一些文教部门的支部负责人，都认为毛主席的讲话，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思想上的解放，学会了怎样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西北大学副教授、民盟西北大学副主任委员王涯佛说：“放”，就是暴露矛盾，就是精神解放，思想解放。过去在三反运动中，有人几夜睡不着觉；肃反以后，更感到说话要小心了。心里有很多矛盾，不敢讲。这些旧账，要不要翻？有些人说，不要翻；但是，不翻，心里的顾虑不会消除，精神就不会解放。西北农学院教授、民盟西北农学院支部主任委员崔志刚说：矛盾揭露了，是不是削弱了领导威信，不是的。解决矛盾，是从团结出发，要克服“左”的情绪。有人认为，只有拍桌子，话说得厉害，才算是批评，合理的说服，就不是批评。知识分子容易片面，不是肯定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尤其是在团结

方面。矛盾来了，往往發癢到三十八度，不是心平气和的談問題。要注意使温度正常，才能达到两个团结。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目前已召开了两次会议。西北农学院副院长、九三学社西北农学院支社主任委员王振华說：学校的党群关系不好，教师最不满意的是党的干涉过多，行政领导的职权不够。党对教师的意見，倾听和重視不够：表面听了，实际沒有听，对不同意見，更沒有支持。有些党员领导干部还偏听偏信。有时一件事情事过境迁，还常常重新提起。因此有的教师就發生这样的疑問：我这人还能不能进步？我这毛病被你抓在手上，这一辈子有沒有完？打消顧虑，光向群众講大道理不行，群众要看行动。王振华对学校民主党派工作提了意見。他認為：民主党派，只站在党的立場，沒有站在群众的立場上。因为只站在一面，就不能很好的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見和要求，脫离了群众。民主党派和群众，也是貌合神离。他認為：民主党派在学校發揮作用，自己要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同时要求党对民主党派正确领导，大胆放手，并对民主党派工作，多給具体支持。王振华說：民主党派工作最感到苦恼的，是群众反映的意見，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要求党今后对民主党派反映出的群众意見，特別重視，做到件件有交代。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九三学社西北大学支社主任委员郝御風說：我們学校民主党派的工作很空虛，西北大学的党委沒有和民主党派共同商量过学校的工作，好像把我們看成是一个單純的学术团体。他指出，党对高級知識分子的特点还没有抓住，如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知識分子可以把自己視为学生，但领导上在組織高級知識分子学习时，不能当小学生来教。自己可以搞懂的东西，却要去听講，但又不敢說。郝御風教授还对西安的党政领导提了意見。他說：西安党政领导对高級知識分子的政策执行如何，应该檢查。在十二年內，我国科学要爭取达到国际水平，而西北地区將采取什么步骤，来提高学术水平，这些都沒有具体安排。在教学工作中，也沒有結合西北的特点，只跟着中央的命令跑，影响教学质量提高。西北大学教授、九三学社社員王成祖說：有人提出：馬克思主义是不是限制了“百家爭鳴”？从过去的情况看，我也有此感觉。一說这是馬克思主义的，就用不着討論了。如果按政治上划分，只有兩家，即馬克思主义与资产

階級。在資產階級思想之下，有百家。為什麼馬克思主義沒有百家呢？他要求給高級知識分子以更多的時間，來從事研究爭鳴。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陝西省委會，近日連續召開了社會成員、各基層組織負責人和所聯繫的社會人士座談。民革黨員、省人民代表李約祉，批評了省文化部門的領導人，對發展秦腔藝術採取的宗派主義和粗暴態度；民革黨員、市政協委員吳雲芳，對及時安置城市中不能升學就業的小學生提出了意見。民革黨員李樹政，對中共西安市委統戰部個別幹部的作風，提出了批評。在中國民主促進會陝西省委員會召開的討論會上，許多中、小學教師中的民主會員，對學校中的一些黨員，不關心群眾，不聯繫群眾，提出了很多批評。西安師範學院附屬小學教師馬啓秀說：我們學校有三個黨員，不關心群眾，也不幫助群眾。個別黨員，遇到開大會的時候，就給平時提意見的人，扣上大帽子，加以批判。對民主黨派也不重視。我們要求黨組織提意見，給我們指出缺點，把工作搞好，但黨組織一直沒有找我們談。好幾個學校的教師反映：他們三番五次，想找黨組織談心，可是一學期過去了，一學年過去了，還是白等。迫切希望改變對教師不關心的現象。

(5、8、第一版)

堅決相信共產黨大膽揭露矛盾

有人怕報復要農工民主黨撐腰

專家教授在農工民主黨座談會上提出很多意見

本報訊 中國農工民主黨北京市委員會，24日舉行科學教育界座談會，到會的有馮友蘭、張申府、宗白華、胡明、周太玄等二十餘人。從一些教授在座談會上反映出的情況看，教授們在“鳴”“放”聲中，還有顧慮：怕挨悶棍，怕挨冷箭。特別是北京師範大學的一些教授，表現出的憂慮更大。中國農工民主黨成員、北京對外貿易學院教師張含清在

会上立即表示說：坚决相信共产党，大胆揭露矛盾；如在坐的有人事后遭到报复，农工民主党要出来替他們撑腰。

教育統計学被一棍子打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友松說，解放之后，搞教育統計的，被人一棍子打死。現在在全国的高等学校里，沒有人学教育統計学，也沒有人教教育統計学了。研究了二十几年教育統計学的人，也放下了。

他說：我們向教育部要材料講課，不給，說是保密。我們教教育学的，对今年中等师范、中等学校等等全面情况不了解，能教好書嗎？学生問到了，自己不知道，像話嗎？我是个大学教授，教育的全貌材料，从教育部里拿不到，最近却从日本的出版物上看到，这像話嗎？我們搞了几十年兒童心理、課程論的人，研究了一輩子語文教学法的人，都一概否定，一棍子打死。我們的教育工作，还没有由內行人来办。

陈友松教授还說：师范教育，是人民教育事業的重工業，百年树人，在此一举。但今天許多学生，都不願做小学教师。如果光用思想动员，来使他們安心，这种做法，是太唯心了。要求领导部門应切实改善对小学教师的待遇。

有的党员既不学业务又不学政治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研究员贺昌群批評党员有既脱离业务，又脱离政治的不正常倾向。他說：党员只是忙于看文件，学习业务的空气非常稀薄。我接触科学院的一些党员就是这样，好像学习业务，就是非党员的事。把自己超乎业务之上。就是学习政治的空气，也不濃厚。好像是党员，天然的就有了政治，用不着学习。这是很不正常的。虚心、謹慎、戒驕、戒躁，是中国优良的传统，沒有很高的修养，做不到。但有些党员，只是把这些話挂在口头上。

贺昌群还着重提出：科学规划，要求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这給我們是很大的鼓舞，但决不能由此而把科学研究，看得太輕易。科学研究，需要时间，是一点一滴的功夫的积累，不能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搞科学研究工作。

名为教授实为汇报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庭杰，就他个人这几年的遭遇，傾訴苦衷。他

說：我是教授，但我在師大不是做的教授事情。我校有一位助教，是黨員，原來是我的學生，很快就升到講師，後來却做了我的領導。

這位助教升講師後，對人態度就不同了。過去叫我老師，後來叫我老何，進而叫我何庭杰。

我是由教育部派到輔仁大學講政治課的，輔大和師大合併後不久，不知何故把我撤職了，把我調到資料室在資料員領導下，當個貼報員，並要我擦桌子、掃地。在資料室病得很重，經醫生證明，請假還不行，還要把資料帶回去貼。去年評級把我降了級。我希望把問題搞清楚。

老教授被整的發抖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朱啓賢說：師大邱椿老教授，這幾年被整的很厲害，患了高血壓，事過過去，但一提到師大，一看到黨員，他就害怕，心就發抖。學校負責人員不止一次的去看過邱椿老教授，向他道歉，但整他是在群眾中整的，現在道歉，誰也不知道，別人看邱椿教授，還以為是“反動的”，連他的女兒，也感到抬不起頭來。應該公開恢復他的名譽。他還舉他自己的事為例說：我剛回國時，聽人說：現在不能自稱“老子天下第一”，只能稱“老子天下第六”。我到學校，將這些話講給同教研組的教師聽。思想改造時，大字報、校刊，就用大字標題，批評我狂妄自稱“老子天下第六”。錢俊瑞副部長在大庭廣眾作報告，也提出批評。實際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外人不知，還真以為我是那樣狂妄的人。事後真相明白，師大黨委向我道歉，但批評我是用的大字報、校刊，道歉却外人不知道，影響還留在群眾中。朱啓賢教授說：我看到報上登出羅隆基的一個建議，要求組織一個有民主黨派參加的委員會，來檢查這几年在各次運動中遺留的問題。我完全同意。

不要只听欢呼声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胡明在發言時，首先表示上次光明日報刊登我的發言，有點申明。我的意思是說，以前沒有唯心主義的爭鳴，現在有了唯心主義的爭鳴，但不是用唯心主義來代替唯物主義。不能把唯物主義預先貼上標籤，必須經過反復爭論，才能弄清真理。

接着他談他解放後的觀感。他說：在大革命後，我脫離了黨的組織，但在宣傳馬列主義上還是盡了自己的力量，這是有書為證。這也說

明我对社会主义事业是热爱的。解放后我自己也作了批判。但我还是遭到无情的打击，令人寒心。关于知识分子，我认为基本上只有两种，任何朝代都是如此。一种是表面拥护，崇拜个人，实则有损于党。但容易取得某些爱好个人崇拜者的信任。一种为耿直之士，所谓有“棱角”的人，敢于提意见，表面上好像对党有距离，实则是真诚拥护。对这两种人要有正确的评价。否则养成歪风，只爱听一片欢呼声。

人事干部是个娃娃班

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叶子刚说：现在许多业务部门，不管有無需要，都设立了科学研究所，研究所的牌子满天飞。有的挂了牌子，沒有人；有的只好拿行政人员，去做研究工作。这是浪费人民的小米。

谈到铁道科学研究所的问题，他说：铁道科学研究所的内部矛盾很多，开了几天会，揭出的矛盾就有二千多条。我是研究员，我的助手是一位留苏副博士、中共党员。实际上是他领导我。他出差了，工作才叫我代理。他说：这位副博士，年轻、党员、留苏，我呢？年老、非党员、留美，就是总务科，也是照顾他，不照顾我。在这种情况下，党群关系，可想而知。做人事工作的，是个娃娃班，这些娃娃，根本不懂得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成就和专长，我们的成就、专长，实际是被一笔勾销，我们只成了废物利用。他说：这几年我们看到新建铁路很多，但运输堵塞问题越来越多。我是研究铁道运输的，但这几年的铁道运输的研究，却置之一旁，不去研究。

搞科学不是搞运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菊农说：年青教师和老教师之间的鸿沟，就是年青人不知道做学问的甘苦，因之不理解老教师。表面客气：“你有几十年的经验”，心里却想：“有什么了不起？用处不大。”应该提倡切实诚朴的学风，研究工作，搞四、五年也许一事无成，但要看到这“无成”当中，就是“有成”。不要成天忙着填计划，画表格，当运动来搞。允许研究三、五年没有成绩。要踏踏实实，不要形式主义。

高教部调动不了清华的书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鍾功甫说：清华大学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买有大批哲学书籍，并校后，清华改为工业大学，却把这些哲学书籍封存起

来，不向外借。北京大学要翻譯黑格尔哲学，急需原文書籍，才到清华去借，一年以后一定要收回，使应该用書的人得不到書用，不用的把它放在冷宮。高教部历次开会也未解决。为什么高教部能調教授而不能調動書籍？

北京大学馮友蘭、宗白华，也都發表了意見。馮友蘭說：清华大学現在的書只准借看还不讓抄写。清华在1928年后，每年买十万元，哲学書籍是相当丰富的。

評級評薪不合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邵爽秋說：評級評薪，破坏了教授的團結，过去很好的朋友，評級評薪后，覺得你高他低，弄得很有隔閡。甚至教授看病，也分等級。我了解在师范大学有許多教授，对此非常苦悶，但都不肯講。

他說：評薪的标准是什么？說是根据学术水平，教授和科学研究的水平。但学术水平能憑群众反映和民主党派、工会的負責人的意見評定嗎？我們有些教授的学术論文，評薪的人，看都不會看过，甚至連他的專長都不知道，从何知道他的学术水平，从何評起？有几位專家，就被評为五級。这是十足的主观主义。对学术的評价，要細致的研究，不能也走群众路綫。听说师大教授評薪时，一、二級教授，都是教育部事先指定的，既指定，何須評？是否确实，不得而知。我要求把評級評薪的内情，全部公开，有錯的，作公开檢討，看看哪些是官僚主义，哪些是宗派主义。把不合理的“級”去掉。

在会上發言的还有北京师大教授俞敏，北京对外貿易学院教授武增干等。會議將繼續举行。

(5、27、第二版)

注：章伯鈞販賣他的资产階級民主的同时，提出什么“兩院制”“民主党派大有可为”的荒謬主張。儲安平到光明日报后，更把章伯鈞的陰謀在宣傳工作中具体化。企圖把知識分子抓到自己手里，把民主党派由党的助手变为党的对手和敵手。在儲安平的宣傳方針指导下，对民主党派性質、任务的宣傳，出現了一系列的严重的政治錯誤。“坚决相信共产党，大胆揭露矛盾，有人怕报复，要农工民主党撑腰”“对發揮民主党派作用提出很多意見”这两条消息，就是按照儲安平的“宣傳方針”进行宣傳的。

武汉知識界談党群关系問題

本报編輯部邀請武汉地区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部分教授、專家，就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开展“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問題，組織了兩次座談会——5月4日在东湖招待所举行一次，5月7日在武汉大学举行一次。出席这两次座談会的有：

- | | | |
|-----|--------------|----------------|
| 王家楫 | 九三学社武汉分社主任委員 |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 |
| 伍献文 | 九三学社社員 |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 |
| 程千帆 | 九三学社社員 | 武汉大学教授 |
| 唐長孺 | 九三学社社員 | 武汉大学教授 |
| 桂質廷 | 九三学社社員 | 武汉大学教授 |
| 袁昌英 | 中国民主同盟盟員 | 武汉大学教授 |
| 韓德培 | 無党派人士 | 武汉大学副教务長兼法律系主任 |
| 燕树棠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黨員 | 武汉大学教授 |
| 刘乾才 | 無党派人士 | 华中工学院副院長 |
| 刘 穎 | 民盟湖北省委员会委員 | 华中工学院副教务長 |
| 徐人極 | 九三学社社員 | 华中农学院教授 |
| 傅光培 | 中国民主同盟盟員 | 华中农学院教授 |
| 周裕德 | 九三学社社員 | 武汉医学院副院長 |
| 刘南山 | 九三学社社員 | 武汉医学院教授 |
| 張人价 | 九三学社社員 |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 |
| 卞 彭 | 九三学社社員 | 华中师范学院教务長 |
| 严士佳 | 中国民主同盟盟員 | 华中师范学院教授 |
| 夏坚白 | 九三学社社員 | 武汉測繪制圖学院副院長 |
| 金通尹 |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員 | 武汉測繪制圖学院副院長 |
| 胡佩珍 | 九三学社社員 |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教授 |
| 薛 愚 | 九三学社中央委員 | |
| 黃培正 | 九三学社武汉分社秘書長 | |

在座談會上，大家結合具體事實，集中地而且尖銳地談到了兩個問題：黨群關係問題和高等教育問題。許多教授認為，自解放起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前，在知識分子的感受中，那才是乍暖乍寒的初春天氣。知識分子一方面私心感到無限歡喜，一方面又時時有怯寒之感。自從听了毛主席的講話以後，這才感到是春暖花開的季節了，真正信任自己的力量存在，從做好工作、建設社會主義出發，對不滿意現象敢於指摘、敢於批評，敢於說話了。這裡，我們將一些先生所談的關於黨群關係問題的意見彙集如次。至於對高等教育問題的意見，準備另行整理發表。

希望總結馮乃超和徐懋庸的經驗

關於思想改造，聽說馮乃超在中山大學，作得很好，有口皆碑，這個好經驗值得總結一下。而徐懋庸在武漢大學的壞經驗，也是有口皆碑，也可以總結一下。

武漢大學教授程千帆先生說：

目前高等教育中的問題，首先是黨怎樣領導知識分子办好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這個工作，過去是有成績的，但是問題也不少。最值得注意的是黨群關係問題。

首先，在黨員和群眾之間，政治待遇很不公平，黨員享有許多特權，表現為他們不同於一般人，常常以領導者、教育者、改造者自居，這樣，就在黨群之間人為地劃了許多令人頗不愉快的格格。比如傳達一個平常的報告，本來向大伙兒做一次傳達就可以的了，可是，却總要先在黨內傳達，再到團內，再及於一般群眾。如果這個報告的內容有其機密的部分，對一般群眾不能說的，這樣傳達倒也應該，但往往并非如此。就算這樣做是必要的吧，可是在黨內傳達時，卻又吸收一些積極分子參加，這樣，在黨群之間划一條鴻溝還好像不夠，還要在群眾之間界限分明地划成先進部分和落后部分，使人受不了，造成許多隔離。

又如留助教，留研究生，選拔留蘇預備生等等，也莫不有問題，據我所知，這類名額，不是憑學業成績，而是黨團員有優先權，特別是留蘇預備生，幾乎全數由黨團員包下來了，群眾沒有一點兒的分。人的

成長是漸進的，在政治上也是如此。那麼，對於非黨的青年羣衆，對於這些尚在成長中的青年，為什麼竟用這種固執的眼光來看待，不給他們以同等深造的機會。再如，選積極分子，選先進工作者，並不是從羣衆中來，而是由領導上“欽定”的，確定了某人為積極分子，為先進工作者，再發動羣衆去捧他，去選他。不久，這個人也就入黨了。有人說這是為他人為地在羣衆中提高威信，人為地給他創造入黨條件，是黨的“培養”。其實，這種作法，羣衆是早就看穿了的，口里不說，心裏是極為不滿。這種作法，在羣衆中間是半點好作用也沒有的，有的善良的人被選上這樣的積極分子，私心也未嘗不慚愧的。請問，為什麼要這樣作，除了在黨羣之間造成隔閡以外有什麼好處。

有些說法，聽來是很刺耳的。比如說“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看他的共產主義覺悟和品質究竟如何，以及他起了什麼作用而定。入黨與否不是一個絕對的標準。要知道，黨外也有像魯迅這樣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而黨內也出過叛徒，有品質極端惡劣的人。這本是一句鼓勵的話，結果變成了刺耳的話，使不少黨員自高自大，自視為“特殊材料”，瞧不起非特殊材料制成的羣衆。又如常說“紅色專家”。所謂“紅色”，大家知道，這不是一個美學上的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所謂“紅色專家”，就是指的入了黨的專家。我們沒有入黨，難道我們就是粉紅色的、白色的、黑色的、或者是黃色的、無色透明體的專家？問題是我們不願做這些專家。我所以提這些似乎是不相干的事，是因為從這類事里，也可以看出宗派主義的蛛絲馬迹。

在高等學校正確地處理黨羣關係，首先要總結一下從思想改造以來的經驗。思想改造工作，有些地方做得很好，和風細雨；有的地方搞得很是粗暴，帶來很多問題。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什麼“成績是基本的，缺點也是難免的”，這是一套敷衍話，一點也不能解決問題。應當根據具體事實，老老實實來總結一下，有多少成績，便肯定多少成績，有多少錯誤，便承認多少錯誤。聽說馮乃超先生在中山大學作得很好，有口皆碑，他的經驗就可以總結一下。而徐懋庸在武漢大學的胡作非為，也是有口皆碑的，這個壞經驗也可以總結一下。這可以作為在高等學校正確處理黨羣關係的經驗與教訓。

学校人事处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王国

学校人事处是一个特殊組織，充滿着宗派主义情緒。只要这个学生是党团员，虽然教研组提意見不能畢業，人事处連理也不理，偏偏准他畢業，甚至把他留作助教。令人憤慨。

武汉医学院副院長周裕德先生說

有些党员負責干部，与党外人員共事，往往因工作上意見不合，便用大帽子压在人的头上。我亲自經歷过一件这样的事，因为和一位党员领导同志在工作上發生过爭執，其中各有是非，但是在三反中，这位同志說我是和党爭夺領導权。这个問題太严重了。以后在工作中，我每行一步，都不能不考虑一番，这是不是与党爭夺領導权，想到不負責，做一日得一日吧，自己在業務上又負着領導任务，于心不安，負責吧，又不知負到什么程度，才算不是爭夺領導权。虽然自己觉得还是應該負責，却不敢大胆放手，心里总有个疙瘩。这种情况，說明了有些党员，总以为自己一切都是对的，自己就是党的化身，与他意見不合，便是反党。这样，在党群之間，当然会有一道鴻溝。这类情况，影响了不少知識分子靠近党、爭取入党的心情。

在武汉医学院，在党群关系上，还有两个問題。

一个是，学校党組織沒有很好地来領導業務，把百分之百的时间放在搞政治运动上。好象搞業務是党外人員的事，而搞政治运动才是党組織的事，互不通气。当我們在業務上主动地請求支持帮助，希望靠近党組織，盼望党組織来領導，从来得不到答复，他們总是說他們是外行，不懂。这也影响了党群关系。还有一个是，学校里的党組織宗派主义气味相当濃厚，这特別表現在人事处的工作上。在学校里的人事处，是一个特殊組織，是一个独立王国，好像不在行政系統之內，只听党员負責干部的意見，对于党外人員是根本不理不睬的。往往教研组認為某一个学生成績很差，提出意見不能畢業，而人事处只要这个学生是党团员，連理也不理，就讓 him 畢業了。（座中几位武汉大学的教授插入說，这种情况，武大也是一样，人事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機構。唐長孺先生說，有一个学生，沒有参加大考，平时成績也很差，我們不准他畢業，可是

人事处不但准他畢業，还留他当助教。）有些業務不好調皮搗蛋的學生，我們提出意見不要留作助教，可是我們的話剛完，人事处好像在故意給我們为难，便决定把他們留作助教，分配到教研組来了。使非党人員說話不起，实在令人憤慨。还有，我虽然負有行政責任，可是学校里今天添了几十个干部，明天又添來几十个干部，我是長期根本無法知道。当然也不便去打听。因为在人事处看来，对党外干部，这些事是不必讓你知道的。学校里的人事处这种宗派主义情緒，这种独立王国故意与非党人員为难的作風，如不改变，党群关系是改善不了的。

要改变驕傲自大盛气凌人的作風

教師講課观点被指为不正确，便停止開課，要作檢討，上課迟到五分鐘也要作檢討，还發通报，故意給人难堪。这种驕傲自大、盛气凌人的作風，是伤知識分子的心的。

华中农学院教授徐人極先生說：

能不能鳴起来，与領導放不放大有关系。从我們学校情况看（我說的是四個月以前的事實），領導作風是很不民主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談不上什么鳴放。我院过去那位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我們把它歸結为八个字：“驕傲自大，盛气凌人”。他把知識分子看作唯一的改造对象，而以改造者、教育者、統治者自居。同时，他把知識分子的覺悟看得太低了，因此發生了許多不应發生的事情。比如有的先生上課迟到了五分鐘，就要他檢討，还把这件事發通报，故意給人难堪。像这种事發生过不止一次，弄得很不好。有的先生教課在观点上有一点小問題，也被勒令停課檢討，如果檢討得較好，才准許上課，檢討得不好，就不許上課。然而，却一点也沒有帮助过人家。其他如講話过分刺激，更是尋常事了。他开口閉口說“你們这些知識分子”，說“你們教書，只会抄，能抄得出什么名堂來？”做报告时，总要責罵一頓知識分子，說什么“知識分子总是把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放在口袋里死也不拿出来，看得很宝贝”，如此等等。像这类事，都是很伤知識分子的心的。

黨員領導人員的驕傲自大，与群众覺悟不高也有关系，可以說，在

某种程度上，这是群众造成的。有些群众专爱捧党员的场，只说好话，不说坏话，久而久之，自然就促成了共产党员和领导的骄傲，并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了。

有些领导人作风不民主，不但对党外是如此，对党内，据我的观察也是如此。比如年青的党员对学校工作就很少提意见，甚至根本不提意见。这种情况，影响了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心情。我也在申请入党，但一想到入了党更不好讲话，有意见更不好提，只能跟着领导的屁股后面跑，倒不如不入党好些。

民主党派在学校应很好地起监督作用，帮助党进行工作。有些人说民主党派的成员理论水平低，认识问题的能力不强，在学校里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不同意。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共产党员所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是无疑的。但这不等于一鼻孔出气，对什么事情的看法都一样。不，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对学校的各种重大问题，根据我们的看法，提出我们的意见。并且，还要很好地联系群众，从锻炼中不断地提高自己。

武汉大学的党员有特权阶级作风

武汉大学的党群之间有一座铜墙铁壁，这是有些党员的特权阶级作风筑成的。这座铜墙铁壁把人分成了三个方面，党员是甲方人员，党外知识分子是乙方人员，而一些积极分子是丙方人员。

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先生说：

别的学校的先生说，在他们那里，党群之间有一堵墙，在武汉大学，就不是一堵普通的墙，而是铜墙铁壁。有人说，这座铜墙铁壁是以前徐懋庸在这里筑起的，可是徐懋庸离开武大已经四年，而这座铜墙铁壁依然屹立不动，原因何在。

我感觉到，武大党群之间的铜墙铁壁，徐懋庸，有“功劳”，但总的说来，是有些党员的特权阶级的作风筑成的。比如平日在我们非党的先生之间，见了面总是点头招呼，话家常，谈谈工作，人情味很重。可是党员见了我们，便正襟危坐，两眼朝天，显出一付党员样子。见了面有时还略一点头，有时连头也不点。根本不同我们接近，大约是怕与

我們這些“落后”的人接近，失掉“党性”吧。他們既然以冷臉對人，知識分子也有知識分子的性格，也難熱臉相向。這樣，在黨群之間怎能不有一座銅牆鐵壁。

有人說，武大這座銅牆鐵壁，把人分作三個方面了：黨員是甲方人員，黨外的知識分子是乙方人員，還有一些積極分子是丙方人員。這些積極分子是鑄牆的積極分子，因為黨員從來不與黨外的知識分子接近，只是依靠這些積極分子來了解黨外知識分子的思想情況，而這些積極分子彙報的，又不是真實情況，而是為着表示自己積極的情況，這樣一來，這堵牆壁自然是愈來愈是加深加厚了。

在武大，黨員的特權階級作風，隨處可以看到，隨便舉一個小例子，有一次，家屬委員會檢查各住宅的防火工作，檢查到人事處一位黨員家里，這位黨員却大聲叫罵，把那位負檢查責任的女同志罵得哭着出來了。大家只好搖頭嘆息，有什麼辦法。又如各家有客人留宿，必須到保衛委員會去報告一下。可是有的黨員家里來了客人，要他去報告，便說他不必報告，說他們黨員家里來的客人，沒有什麼靠不住的人。這當然難怪人家把黨員看作特權階級了。

我覺得，在武大，民主空氣非常不夠，誰提意見，便會被扣上一頂大帽子。有一次，我們住宅區的合作社要撤銷，大家感到買菜等等要上坡下坡，非常不便，請求不要撤銷，沒有允許，於是大家便簽名上書再一次要求考慮不要撤銷，可是結果不但事情沒有辦到，還扣上了一頂大帽子，說這是請願，是“反黨、反領導”。這真是把大學教授當作小孩子來吓唬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來以後，學校黨的領導叫大家提意見，我當時心里有顧慮，但覺得不提又不好，就提了些小意見，不敢提大意見。後來又怎樣呢？有些黨員不高興了，“袁昌英意見可多哪！”

我認為，解放起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來以前，那才是初春天氣，乍暖乍寒，正合着“四月八，凍煞鴨”的一句俗話，知識分子一方面心里非常歡喜，一方面又有些畏寒，自從听了毛主席的講話。這才感到是春暖花開的時季了。要把武大搞好，必須打破這堵銅牆鐵壁，黨員有責任，群眾也有責任。黨團領導不能自視為特殊人物，應

当把群众，把党外知识分子看作一家。不过，现在离这个要求还远得很，还是希望而已。

应当把老干部和新干部的界线撤销

解放已七八年，为什么还把我們看作新干部。有些党员貫徹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面貫徹，一面罵知识分子。現在貫是貫完了，罵还没有罵完。这样是貫徹不好的。

华中工学院副教务長刘頌先生說：

在党群关系問題中間，还有一个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問題。在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間，也划有一条界线。这条界线，是一条妨碍团結的界线。最近有一位在大連工作的党员校長对我說：“我到解放区只呆过兩年，全国解放，大家都把我算作老干部。現在解放七八年了，你們参加工作七八年了，干么还老說你們是旧知识分子呢，怎样你們不能称为老干部呢。”是的，这个新老的界线是应当撤消了，我們工作了七八年，也应当算得上是老干部了。如果参加工作七八年，还是新干部，还是旧知识分子，那么，什么时候，才算是老干部，才不是旧知识分子，是不是要把这个头衔一直戴着到坟墓里去。

事实上，有些党员不以發展的眼光来看我們，認為我們是停滞不前的，直到現在，还是停止在1949年那个地方。所以貫徹知识分子政策，有些地方仅仅是表面貫徹一番，并没有真正貫徹。在武汉地区，也只注意形式，如給教授优先排队坐汽車、买东西等等，没有真正做到对他們信任和尊重。因为党员拿1949年的眼光看知识分子，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思想上沒有搞通，而且愈是下面的同志愈是思想不通，不过由于这是中央的政策，不能不貫徹，可是背地里却是在罵知识分子的。有一位教授說，这些党员同志是一面貫一面罵，現在貫是貫完了，但是罵还没有罵完。像这样貫徹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又怎能改进党群关系，怎样能使党群一家呢。

我認为，要改进党群关系，在党來說，首先要对党员加强思想教育，对知识分子有正确的認識，不要帶着成見来看知识分子，才能談得上貫徹这个政策。現在的高級知识分子要求的，首先是真正的而不是

之而心非之的信任和尊重。全国解放已經八年了，不应当再把我們当新干部看待，不应当老把我們看作旧知識分子。

有职無权是最使知識分子难堪的

以副教务長的身份，連一个党員工友也指揮不动，以一个系主任，有事必須請示系秘書；屬於行政範圍內的事，根本不讓預聞。这是助長党員的宗派主义情緒，把党外人士不看在眼裡。

武汉大学副教务長兼法律系主任韓德培先生說

武汉大学的党群关系長期極不正常，近兩年來更加惡化了。党員缺乏和党外人士共同工作、尊重他們的取权的平等精神和習慣。有职無权，是最使知識分子难堪的。比如說，前年更換俄文系系主任的事，我事先就一点也不知道。按道理，我是副教务長，又負責处理俄文系等系的行政事务，对这事应当預聞。又如去年全国第三次司法會議，不仅系里究竟誰去参加我毫無所知，就連召开这次會議的通知，我也沒有看到，而第一、二次全国司法會議都是我出席的，作为高等学校的法律系主任，难道我竟沒有資格出席这个會議，并且連預聞这事的資格也被取消了？（华中工学院副院長刘乾才先生說：这类事我們学校也有，机械系副系主任外出各个有关学校參觀很久，我竟一点也不知道；）像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留助教，系主任和教授都無置喙的余地，决定权操在人事处，而留的助教又往往业务水平不高，只是因为他是党团员就留下来。法律系評薪工作是怎样做的，我也一点不知道。更有这样的例子：有一門基础課，一位老教师本来教得很好，但因为从人民大学来了一位年青的教师，这位老教师就被拉下来了，改由年青人去教。但这位年青人又教不好，以致学生意見很多，不得不中途換人，弄得很不好。

我是副教务長，但是我指揮不动工友，因为他是党員。这种事說來似乎令人不敢相信。有一次，一位苏联專家第二天要到武大演講，要求在当天下午把一些材料翻成俄文交給他，事情很急。我赶忙翻好之后，便亲自交給傳達室一位党員工友，請他派人送去，可是他理也不理，又去請行政組的另一位党員干部來处理这事，同样的，也只說一声“不行”，就不再理睬。这不是特殊的例子，党員干部是不容易指揮的，他

要怎样便怎样。

这些事，反映了武汉大学的党员对非党员是极不信任，极不尊重的，不把党外的人士当做一家人，不看在眼里。分析原因，一般党员思想水平低是事实，可是党的领导同志要负责，党对一般党员的教育太不够了，甚至在种种方面，助长了他们的宗派主义情绪，煽动了他们的粗暴的作风。比如我有一件事去找党委书记张希光同志商量，他竟对我说：“这事你去和系秘书商量吧！”这实在不像话，难道我不是副教授，不是系主任，我不敢决定的事情，却要请求系秘书来解决，所以我觉得就武汉大学来说，党群关系的主要矛盾方面在党。

要改善党群关系，第一，党员要以平等态度对待非党人士。现在有些党员是以统治者甚至是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的，好像把我们当作专政的对象。假如是这样，党群关系一定搞不好。党的领导是作为一个组织来体现的，而不是只要是党员，他就能在任何场合，领导一切人，领导任何事。把党和党员划一个等号，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其次，党员应该更虚心些，不要骄傲自大，以为自己的话都是金口玉言，对不同的意见，要有雅量容纳。而现在，我们往往是只要多提了一点意见，就会被扣上和党对抗的大帽子，这谁也受不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也喜欢人家盲目地服从他，即使他明知自己也是不对的时候。有人说：“和党员在一起，自己最好不带脑袋。”果真如此，那太危险了！

第三，在生活各方面，党员和非党群众要打成一片，不要像现在这样，好像和非党群众谈谈话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就降低了身分。大家可以在一起谈谈生活，不要一开口，就是政治、思想，要有一点人情味，老是板起脸孔，是叫人受不了的。

希望真正做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在提拔上，如果是一个党员，一个是群众，应当首先提拔群众，才能表现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可是现在并不是如此。

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先生说：

在所里，党不很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所里有些事情党也不征求我

的同意就做了。水生生物所曾派一个人到苏联去留学，可是这人去苏联是誰决定的，誰批准的，他和伍献文所長都不知道。

过去党是走群众路綫的，因为那时党是在游击战争环境中，不走群众路綫，就要吃眼前亏。现在胜利了，有些党员的老爷架子也就摆出来了。

关于对党员和一般群众的待遇問題，我認为，在提拔上，如果一个党员，一个是群众，应当首先提拔群众，这才表现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但我看，现在并不是如此。

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伍献文先生說

說到百家爭鳴，可鳴之处很多，但怕的是扣帽子。特別是一人独鳴，不但不易受到重視，更容易被扣上一頂帽子。去年华东水产會議，我曾提出捕魚要有适当的节制，否則，將来的产量就可能發生問題。可是会后有的干部就說我這話“有問題”。現在我們看到，水产上的危机已開始出現了，不过有很多人还不曉得，而你呢，不管对不对，却已被扣上了一頂帽子：“这家伙有問題”！

中南財經学院教授張人价先生說：

有些党员以領導者、改造者自居，愈是年青的党员，这种姿态也愈加严重，使得一些知識分子，感觉得受不了。

党对高級知識分子事实上是不重視的。我們学校有許多高級知識分子申請入党，但接受入党的只有一个。高等学校是以教授 副教授为主的，那么，为什么只吸收学生、助教入党，却不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呢？这是不是保守思想？像这样，党和学校高級知識分子的关系很难搞好。

武汉大学教授唐長孺先生說：

說知識分子害怕批評，不敢爭鳴，这不是事实。不仅現在，即是过去，在学术上大家也是互相批評，并且往往批評得很激烈的。現在大家害怕的批評，是一种特殊的批評，即有領導的、有組織的批評，亦即所謂圍剿。这种批評大有問題。另外，有些人一看到党報上發表文章批評了誰，就認为这一定是党的决定，也聞風而起，奋力圍攻，这种情况，更是要不得的。这也是党群关系中的問題。

华中师范学院教務長卞彭先生說：

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雖然說基本上是生產力趕不上需要的矛盾，但阻礙着更快的、更合理的調動積極因素的，却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就以學校來說，有一部分教師和黨保持着相當大的距離。所謂拆牆的工作，民主黨派有責任盡力協助去做。我以為這個牆就是拆了也還有砌起的可能。而要保證拆了不再砌起，需要靠黨和民主黨派共同努力，相互監督。

有位教授說，他不怕同黨支部書記談，兩人對坐，可以說的一清二楚，可是却怕幹部會報。幹部會報中更怕斷章取義。斷章取義的會報，往往是牆被高築起來的原因。一個非黨同志的話斷章取義一下，可真有被認為思想反動的危險。我不是說不要幹部會報，同時黨也要依靠民主黨派充分反映情況，多條綫才是真正的群眾路綫，也是全面了解的辦法。只有這樣，才能克服官僚主義。

勞動的組織性紀律性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發揚民主的極端也可能大大產生自由主義。這個分野我想仍是必要的。如果黨在“放”的情況下提出組織紀律問題，就馬上有未放先收的嫌疑，牆也不可能拆掉。在這個工作上，我以為民主黨派在成員中既要帶頭的“鳴”，而在具體工作中也要帶頭的注意組織紀律性。搞好黨群關係，民主黨派負有很大責任。

武漢測繪制圖學院副院長金通尹先生說：

大家在爭鳴中，不要怕片面性，講話的人怕片面，要求所講的話一定要全面，就難有話講；聽話的人，也不要以為別人的話有片面性就不接受。要解決黨群關係問題，黨員負責幹部對非黨人員更不要強調那些話是“片面性”。要有雅量。從片面中去求全面。

武漢大學教授燕樹棠先生說：

有人說，黨群之間隔了一道牆，但我認為在武漢大學是隔了一條鴻溝，牆尚可逾越，跳過鴻溝就有淹死的危險。

這條鴻溝我認為，主要是黨的宗派主義，不信任老知識分子造成的。武漢大學的黨對一些老知識分子，安排得非常不得當。

舉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一個例子。

去年春節以後，即在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發表之後的几

个月，武汉大学法律系新設了一个編譯室（經濟系也設了一个），有人說，所謂編譯室，實質上就是思想改造室。在这里工作的是八个教授，其中除一个人年紀較輕之外，其余的都在五十以上了。我被指定担任編譯室的主任，我們的工作，是翻譯和編輯一些教学資料，沒有教学任务——被取消了教学的資格了。

我們八个人全为此感觉得非常难过，我們难过的是，我們不能像別人一样对社会主义建設使尽一切力量。

在討論知識分子政策的时候，我們兴奋極了，便打算大胆地提出要求：要参加教学工作和进行一些科学研究。大家一討論，覺得这样的要求可能和領導的意圖不合，便改变了提法說，我們有参加科学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希望，如果不可能，也不堅持。但是，未想到就是这样，也遭到了一位黨員副系主任的斥責：他說，我有些話，比如“只要編譯室存在，有些老先生也就是候补編譯員”的說法，就說得很不好，結果我只得做了檢討。

这还不算数，这位副系主任以后又曾在編譯室召开的一次会上，質問每一个老先生：是不是有参加教学的要求，是不是因为未参加教学情緒就有波动？于是有的先生說，他既無这个要求，情緒也不波动。有些先生說：我們是有这个願望，也有这个要求，而且很強烈。但是現在知道这是錯了，我們决心打消这个願望，收回这个要求，情緒也不再波动。而当临到一位才三十七岁的年青的教授回答时，他一句話也說不出，哽住了，接着失声痛哭。我想：“我老了，埋沒了也不算什么，可是，这样一位年輕有为的先生，却不能發揮他的有用的才能和旺盛的精力，甚至要他連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願望也不应有，这是多么可惜！”于是我也伤心起来。

但是，是不是我們沒有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能力呢？不是的，我們都积累了比較丰富的教学經驗，都掌握好几国外國語的工具，而且即在解放以后，有些人开課的教学效果也很好。是不是我們非常落后呢？也不見得。我們都热情地参加了各种學習和各种社会运动，我六十多岁了，这几年也刻苦用功学会了俄文，我們贊成走社会主义的路，拥护共产党，可是，我們就是受不到重視。以后虽然这几位教师有的調走了，

有的回到教研組了，但問題也還沒有很好的解決。現在，黨提出了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口號，要我們大膽鳴放，我把這些心中話都說出來，希望造成這些問題的宗派主義早日打破，希望黨對一些老知識分子做較好的安排。

(光明日報 5 月 17 日第 3 版)

武漢地區一部分教授在光明日報座談會上說：

請高等教育部听听我們的聲音

在本報于武漢舉行的座談會上，到有武漢地區八所高等學校一部分的教授，他們談到了高等教育工作。他們對報紙提出了一些批評性的意見。他們說，過去報紙在高等教育問題的報道上，只是幫助高等教育部貫徹“政令”，只是按照高等教育部的意圖進行宣傳。比如高等教育部要實行教師的工作量制度，報紙便宣傳工作量制度，只組織刊登說工作量制度的“優越性”的文章，很少甚至可以說是沒有反映教師與高等教育部的意圖不同的意見。他們說，高等教育部幾年來領導辦理高等教育，當然有成績，可是缺點也是不少的，可以說是很嚴重的。但高等教育部每次總結工作，總是一般地強調成績，說成績是很大的，是基本的，這就掩蓋了、沖淡了自己在領導工作中的嚴重缺點。他們說，高等教育部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三者兼而有之，而且是嚴重地兼而有之，可是高等教育部並沒有好自省察，這就是缺點產生而且是嚴重地產生的根源。他們說：希望通過報紙，請高等教育部听听我們的聲音。他們希望高等教育部實事求是地看看過去的工作，有些地方要下決心改絃更張，不要一味強調自己的成績，不要以“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樣作是對的”那樣的話來掩飾自己的缺點。他們認為，高等教育部的幹部並不是萬能幹部，應當廣泛地虛心地听听教師們的意見，因為教師是實際工作者。

下面整理發表的，是出席本報座談會的教授們所談的一些具體的意

見。

凡是对高教部的作法持不同意見，就是思想問題

有些教授談到，高等教育部永远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凡是对他們的作法持有不同見解，不是被指为“左傾”思想便是被指为右傾思想。可是高等教育部过不了多久又是一个主意，以致使人剛剛批判过“左傾”思想，又要跟着来一个反批判——批判右傾思想了。弄得教師們啼笑皆非。武汉大学教授桂質廷先生举出湖南大学的事作为例子。他說，高等教育部办事，是坐在办公室下命令多，同学校和教師們商量少。不論什公事，高教部的指示一来，学校也就习惯于組織大家学习，大家来談体会，談認識，很少有机会讓人談談不同的見解。如果有人有不同的見解，那就是不正常的現象。其实这种只能談体会談認識的現象，才是不正常的現象。

当年撤銷湖南大学，命令一下，把些教师拆散分到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等校，也是組織教师談認識談体会。当时有些教师不贊成撤銷，被指为是多摆攤子的“左傾”思想，于是便来了一次思想动员，批判这种“左傾”思想。去年，却又計劃要恢复湖南大学了。按照計劃，武汉大学要“下蛋”，去支援建立湖南大学。这种做法，明明是不行的。要在短時間內培养一批研究生去開課，教学質量一定不会高，而且在数量上也培养不出那么多的研究生来——这是明明办不到的。但是，大家却为着这件事花了許多時間来做計劃，發生了許多糾紛。有人不贊成这种做法，这一回是批判右傾保守思想了。現在，湖南大学建校的事一点影子也沒有了。如果現在高等教育部打算不办湖南大学了，而有人主張要办，大約又会被指为“左傾”思想了。

有位教授笑着說：“左傾”思想和右傾思想，在高等教育部手里，是非常灵活的，是非常辯証的。这大約是“時間、地点、条件”的問題。

談到“以時間、地点、条件为轉移”的問題，武汉大学教授程于帆先生認為它已成了高等教育部在工作缺点上的遁詞。他說，几年来照搬苏联經驗，弄得百病叢生，而高教部的辯解也是“一切以时空条件为轉移。”一切以時間条件为轉移這話是不錯的，可是总要以对社会主义建設是否有利为先决条件。否則，在資本主义国家，他們的工作也一样是

以时空条件为轉移的。所以，这种話只是搖箭牌而已，教条而已。用这种話，是辯不掉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辯不掉几年来机械地学习苏联方面所犯的种种錯誤。

有些教授希望，高教部凡办一事，凡下达一件命令，要多研究研究，不要在命令中画許多圈圈，这是“左傾”思想，要克服；那是右傾思想，要克服；只有机械地按着命令行事的，才是不“左”不右的思想。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法。

对自己的教育傳統全盤否定，举世沒有先例

在座談会上，有些教授深致慨嘆地談到，中国办了几十年的高等教育，也有自己的好的东西，可是这几年来，高教部几乎把它全盤否定了，这是举世沒有先例的事情。任何民族都有它的优秀的傳統，任何民族都珍愛自己的优秀的傳統，可是我們呢，在教育工作上，一切都是1952年重来。座上有人說这是高等教育部三个坏主义兼而有之的結果。而华中工学院副教务長刘頴先生則認為是学习苏联忘記了自己的結果。

刘頴先生說：教学改革确实有成績，也确实有問題。問題是：“学习苏联經驗，結合中国实际”貫徹执行起来却只抓了上半截，忘記了下半截。所謂学习苏联經驗，几乎就是盲目抄襲。“六节一貫制”搬来了，“五分制”搬来了，“工作量制度”搬来了，“理工分家”搬来了。听到一样搬一样。有人辯解說，我們沒有經驗，怎么不先搬过来再說呢？但是，我們沒有經驗，我們有沒有腦子呢？我們为什么不先思考思考，研究研究呢？大家都說，現在的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其实，自高教部到校院長、教务長、教师，又何嘗有独立思考能力。說起来是应当慚愧的。

教学改革應該在旧的基础上进行，应当批判地吸收过去的經驗，应当繼承自己的优良的傳統。苏联就是这样。他們的講課，習題課，畢業設計口試，五分制等等，都是沙俄时代留下來的。他們改了几十年，实际上只改了几点：加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領導，把过去不固定的考試、實習固定下來了，还有，加了一些專門化課程，如此而已。可是我們呢，几乎把过去自己的一切全盤否定了，一刀兩斷，一切从头搞起。說到过去的，不分清紅皂白，一切都是落后的，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

就以学校的历史來說，世界各国的学校都以自己的悠久的历史傳統为光荣，苏联也是一样。莫斯科大学的人說：我們学校有二百年的历史傳統；莫洛托夫动力学院的人說：我們学校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傳統。可是我們的高等学校，差不多一律是从1952年开始的，都只有几年的“光荣历史傳統”。这种作法，造成的損失是不小的。許多有本領的老教师本領發揮不出來，不得不把自己的一套否定，不得不跟在高教部的口号后面現学現卖。而新老教师的不正常現象，也是由此而來的，因为年青教师以为老教师的一套，都是資產階級的，都是过时的否定了的东西，自然談不上要向老教师學習，談不上尊敬老教师。而有些老教师也确实由此有自卑感。

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先生說，她是講授西洋文学的，有时候在講課中引用一句英文或法文的句子，就被学生批評这是資產階級的。华中工学院副院長刘乾才先生也說，有的青年教师說某位老教师沒有學問，因为他不懂外文，其实这位老教师懂得英、德、法好几国文字，因为不懂俄文，便被看作不懂外文。他說，从这中間，可以領会許多道理。

有一位教授說，要是給高等教育部的这种作法扣一頂帽子的話，說是“民族虛無主义”也可以。不过，应当說是幼稚，只有說是幼稚而又自以为是，才能辯解。希望高等教育部在这方面能够改弦更張，重視自己的教育方面的优良傳統，多研究研究，多和一些老教授商量商量，不要再自以为是，盲目而行。一句話，要結合实际來學習。

为什么自己还没有弄清楚，就搬来要人學習

談到學習苏联先进經驗时，大家都認為应当好好學習。問題是，依照常理，首先自己要弄清楚這項經驗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先进經驗；是先进經驗，也要看看是否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合，决定如何进行學習，然后再行貫徹下去。可是高等教育部对有些东西，自己还莫名其妙，便拿来往下貫徹了。有些东西，簡直是道听途說，捕風捉影，也在拿来貫徹。虽然有人指出分明不是先进經驗，也硬說是先进經驗；貫徹不下去，还是要貫徹。

有一位教授提到“六节一貫制”。他說，在苏联，实行“六节一貫制”，是因为苏联处在我国的北边，在那里，白天的時間較短，夜晚的

時間較長，實行“六節一貫制”有它的好處。可是，高等教育部也把这个“六節一貫制”当作先进經驗搬来了，也是这样那样有“优越性”，硬要在我国的学校中貫徹。后来到底貫徹不通，自己知道錯了，才羞羞答答地不提了。这件事情，可以說是高教部閉着眼睛，自己根本沒有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就硬搬硬買的典例。

为什么高等教育部会这样：关于這個問題，华中工学院副院長刘乾才先生說得透徹。他認為，这是高等教育部手里有着三个主义的緣故。他說：在學習苏联的問題上，高等教育部是主观主义加教条主义，再加宗派主义，三样俱全，而不是只有一样或兩样，問題的严重便出在这里。

他說：我們學習苏联，許多是生搬硬套，甚至只憑想像，結果优点学了一点，也弄来不少缺点。有一个时候，曾經这样強調：“百分之百學習苏联”、“不折不扣學習苏联”。殊不知苏联的許多措施也在發展着，它的經驗也是結合它的实际得来的，而我們却不結合实际，閉着眼睛乱搬乱学。例如蒸汽活塞机專業，苏联早已不設立了，这是一个落后的專業，我們也把它当作先进的东西搬来了。又如发电站的燃料与水專業，專材的需要量很少，苏联在十年內只培养了一百多人，我們一个学校一个学年便招生七十人。这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又是什么。

至于宗派主义情緒，那就更是严重。自然科学本身，本沒有階級性，只要是好的技术，好的理論，不管是哪一国的，照理說，都應該学。可是过去高教部为着強調學習苏联，对于資本主义国家的東西，一概加以否定，好像只要是苏联的，就是好的，就是先进的；只要是資本主义国家的，就都是不好的，都不能学，而且除了信口批判外，就最好不談。这样把政治和科学混为一談，鬧了不少笑話。比如有些东西苏联沒有的，而資本主义国家却有的，我們就閉着眼睛加以批判，結果現在苏联也有了，我們就只好自我解嘲一番。这是什么东西在作怪，不是別的，是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緒。

有一位教授問到：現在工作量制度到底怎样了？另一位教授說：現在工作量制度是不声不响若有若無。他說，据他想，高教部明知这个工作量制度是有問題，行不通的，可是話說出去了，收回来怕損威信，所以只好羞羞答答，不声不响，問起来还羞羞答答說它有“优越性”，行

不行由各校根据具体情况自己去决定，想用这种办法挽救回来。其实这种羞羞答答，明知错了不肯认错，任其自行消灭以求保持自己的威信的办法，其结果，正是有损高教部的威信。如果高教部肯对这些問題深入检查一下，挖掘一下自己的思想根源，把它公布出来，不但可以大大地提高高教部的威信，不但可以鼓舞发挥老教师的力量，而且对于青年的思想水平的提高，有莫大的教育作用。問題是不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检查，不要找什么遁词来掩盖自己的缺点。要有勇气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特别是宗派主义情绪加以暴露，才能克服。

为什么“人心思院”，希望高教部反躬自求一下

在座谈会上，有几位教授谈到高等学校教师的科学研究問題。說現在大家都說高等学校的人是“人心思院”，只想进科学院去。但是为什么会“人心思院”呢？高等教育部曾經作为思想問題提出来批判过，后来又說其原因在于科学院的拉人“人心思院”是事实，因为高等学校留不住人，这件事值得高等教育部反躬自省一下。

武汉大学教授唐長孺先生說，他就是“思院”的一个，其所以“思院”，一是高等教育部对高等学校教师的科学研究重視不够，几年来，提法就一变再变，可是变来变去，仍然是“教学第一”“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科学研究始終摆在次要的地位。以致教师要想进行科学研究，条件没有条件，气氛没有气氛。最近高等教育部赴苏考察团考察归来，傳來苏联高等学校重視科学研究的消息，高等教育部又叫起来了，可能会出现新的提法了。可是提法是提法，提法之后还要有办法。二是高等学校的教师工作太忙乱，头緒太多，弄得个个六神無主，安不下心。一会儿教研組开会，一会儿通知来了要听报告，各种教学規章太多，把教师們的时间和精力弄得支离破碎。这就是高等教育部过去不重視科学研究的結果，也就是高等教育部要拿办法的地方。

唐長孺先生說：我們这些人，最不習慣于一会搞那样，一会儿又搞这样，只希望有一段安安静静的时间来做学问。說到时间，如果精打細算的話，时间还是有的，可是就是沒有整段的时间，而支离破碎的时间是无法做科学研究的。前天听侯宝林說相声，他先来一段說白，說大家的腦子現在想的还是上一个节目，还不能安下心来听相声。娱乐尙且如

此，何况科学研究工作。

由于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特别是工作量制度一来，大家忙于教课，科学研究更不受重视了。工作量制度的提出与雷厉风行，就是高等教育部不重视科学研究的很好的说明。更可怕的，是把教学任务当作一种对教师的政治待遇，担任教学的人似乎就是政治上进步的，不担任教学的人似乎就是有了问题了，甚至拿开课不开课作为惩罚，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教师都希望多教点课，满足工作量。要是谁不教课，自己心里嘀咕：又有什么问题，而别人也另眼相看。使得教师不是没有时间，就是无心情进行科学研究。这是一种可怕的风气。

直到现在，武汉大学的领导上在谈到科学研究时，还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不敢明言科学研究在高等学校中摆在什么地位。这样，想做一点学问的人，“思院”，是毫不足怪的。希望高教部不要责怪“人心思院”，不要对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到底占什么地位再吞吞吐吐，要为学校的科学研究创造条件，创造气氛。座中有一位教授说：光明日报发表了各地一些教授关于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看法的新闻以后，为什么高等教育部连气也不吭一声，好像没有看到这条新闻一样，至少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这是教授们最关心的。希望高等教育部改变这种对教师们的意见不理不睬的态度。

主张选拔留学生采用公开考选的方法

有几位教授谈到选拔留学生、研究生和留助教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选拔留学生问题，认为全部由党团员包办，非党团员不能入选，是把人的进步固定起来了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思想和宗派主义情绪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出国留学的人，现在不是都在为社会主义服务！有许多科学家不是加入了共产党么！为什么对于青年一代，不是党团员，而有天才，也剥夺他的出国留学的机会。安知他今日不是党团员，明日后日也不能入党，他们主张公开考选，只要政治上可靠，都可报考。他们说，学生也有这种要求，学生对现在这种由党团员包办的办法，非常不满。

问题还在于这种由党团员包办而不重知识质量的办法所造成的可怕的损失，没有才能的留学去了，有才能的却不能留学深造。武汉大学

副教務長韓德培先生談到他自己當年出國留學，說就是憑考選的。他說，解放已經八年，學生都有了一定的政治思想水平，都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事業的，現在是應當改變選拔留學生的辦法的時候了。

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伍獻文先生也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我在武漢大學也教點書，據我看，在派遣留學生上是有許多問題的。過去派高中畢業生到蘇聯留學，以後一看不行了，改為派大學剛畢業的學生。其實，剛畢業的學生就派出去也是有問題的，他們由於基礎的限制，短期內不容易學得很好。這裡不說，派出去的往往不是業務很好的學生，而是政治強的黨團員，其中有些人可能很有社會活動的才能，但在業務上卻極不適宜於出國留學。

他說：派遣留學生的問題關係國家科學的發展，不能不慎重。一個留蘇學生，一個月花費七百個盧布，合人民幣三百五十元（當時廬上有人說，是一個一級教授的薪水），即從這一方面看，也須權衡得失才好。所以我認為，要派一些較有科學根基的教師和科學家出國留學比較好些，他們能夠在較短的期間內，真正學到一些東西回來，更有助於我國科學的發展。

對於培養研究生，唐長孺先生認為高等教育部我的看法有問題。高教部希望剛畢業的青年能夠在兩三年內開出課來。規定第一年學哲學，第二年掌握一本大型的教科書，第三年做論文，其次這是理想，在文科根本就沒有這樣一本萬能的教科書，掌握了它就可以開課。他說：顯然的，要這些剛畢業的青年人在兩三年內開出一門課來，那他們就只能看看交流講義和教科書，要想深入專業便不可能。然而深入專業卻非常重要。拿我們搞中古史的來說，如果不看原始資料，就不能提高。這且不說，助教升級，主要也是決定於開課不開課，去年評級時，凡是開課的都升為講師了，使得許多青年人認為，只有開課，才有前途，從而專心致志去啃一本教學書，急於求成，這無異拔苗助長，毫無好處。這種做法，都是從速成思想來的，不能不注意。

桂質廷先生也認為高等教育部的這種速成思想很是嚴重。他說，高等教育問題，許多發生僅只求速成，不顧質量。高教部在辦公室命令一

下，計劃一擬，任務一分配，就要限期完成。可是培養人的事却不那麼簡單，是不能來這一套“趕任務”的作風的。他認為培養研究生，不要貪多，要少一點，質量要好一點。這樣，研究生訓練完成之後，又能帶研究生，從長遠看來，速度比這種急於求成的辦法可能還要快。他主張，研究生要經過公開考試，要有研究生制度，他認為這幾年提倡教學法研究，對青年教師是一個大損失，他們的寶貴時間全花在這上面去了。也是高教部閉着眼睛搬蘇聯經驗的結果。

希望高等教育部“慢慢兒地快走”

在座談會上，還有下述一些意見。

武漢大學教授袁昌英先生希望報紙替她叫一叫，問一問高教部。她說：高等教育部在院系調整的時候，隨隨便便把武漢大學的外文系取消了，當時對外文系的先生和學生來說，是一個莫大的打擊。有一位老先生聽到這個消息，當場就氣得吐了血。去年說要恢復英文專業，大家很高興，叫我做計劃，很快便做好了。可是送上去，卻石沉大海。問學校，學校也說不知道。希望高教部給一個明確的指示，到底辦不辦？不辦，又是什麼理由？

華中農學院教授傅光培先生說：高教部規定農學院的農場要企業化。既然要企業化，那就要有投資，沒有投資，為什麼要提企業化的口號呢？

華中師範學院教授嚴士佳先生說：高等教育工作這幾年發生了一些偏差，很多是因為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提的口號以及作法上不明確、甚至有問題引起的。1952年，提出“課堂上解決問題”，不恰當地要求教師在課堂上把一切教學內容使學生徹底弄懂，並且記住。結果先生忙死了，而學生還是懂不透，記不住，效果很不好。以後又提出“學校以教學為中心”的口號，這個口號也發生了流弊，科學研究好久展不開，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在這裏。有些人由此只注重教學，認為搞好教學就是一切，政治活動也不願參加了。去年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這件事當然是很好。可惜又弄得太偏了，以致教師轉而強調科學研究，卻忽視了教學，連畢業生也不願留做助教，只要求到科學院去，留校的助教也很不安心。又如“臨時措施”精減課內學時，原是做得對的，可是應

早一学期安排，給学校一个从容妥善准备的时间。但偏不这样，一但临时制訂一些措施，便雷厉风行，弄得大家忙乱狼狽不堪，發生了一些問題。

在座談会上，桂質廷先生說：英国人有一句成語：“慢慢兒地快走”。高教部应当用这句话来克服他的一切唯求速成的思想。有一位教授說：高教部对宅兼而有之的三个坏主义，应当快一些下决心克服。可是在工作上，則不能閉着眼睛不看中国实际，乱搬乱搞，这句成語很有意思，还是慢慢兒地快走为佳。

附給衛生部的几点意見

在座談会上，武汉医学院副院長周裕德先生談到医学教育的問題。他說，医学院的学制是一个大問題。解放初期，医学院的学制是四年制，还有兩年的專修科制。后来，經過大家反对，改为五年了。可是我們的教學計劃是照着苏联的医学院的教學計劃擬定的，苏联医学院是六年制。要在五年内安排六年的課程，已有困难了，可是，还有四門政治課，还要多学一門俄文（占270小时），还增加了一些新課如學習中医等等。这样四方一加，学生負担当然很重，每周上課时数曾經达到三十六个小时。高等教育部叫要減輕学生負担，叫是一回事，減又是一回事，試問到底应当怎样減輕？現在減是減到三十二小时了，一方面是学生的負担仍然太重，一方面減的却又是一些基础課程的学时。同时，还产生了一种奇形怪狀的現象，有些規定在一学年开完的課程，因为不好安排，被拉开在兩個年級一即跨学年開設，决定升級的問題，便發生困难了。

中央衛生部工作布置不够細致，看得不远。比如医学院学生畢業分配下乡之后，他們的进修，就沒有人再去过問，这是不对的，應該有一个制度，即使他們能够安心在乡下工作，將來又有获得提高的机会，能够向專科化的路上走。还有，过去我們把最好的学生放在專修科，許諾他們畢業后工作兩年再回学校学完以后的課程。好几年过去了，这件事却一直沒有下文，这些畢業生很不滿，对国家來說，也是損失。但是，問到衛生部，却說这是賀誠副部長在位时搞的。現在賀誠副部長不在位了，好像衛生部就可不管了。底下是認部不認人的。到底怎么办，衛生部应当有一个答复。

武汉医学院教授兼附属结核病院院长刘南山先生认为，中央卫生部有时是只提口号，不做事情，提了口号以后便不管了。比如提出以预防为主为主的口号，也只是提了这个口号，没有做工作。在教学上，在实习上，都没有重视以预防为主。

两位先生认为，卫生部也和高教部一样，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如果不克服官僚主义，医学教育是会不断地发生问题的。

(光明日报 5 月 19 日) 第三版

貫徹“鳴”和“放”的方針，反对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光明日报编者按：本报编辑部于 5 月 8 日在沈阳邀请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里发表的是座谈会的发言纪录。以发言先后为序。

郭厚德 中学教师进修学院研究员 民主促进会会员

薛其猛 沈阳农学院教授 九三学社社员

李贤俊 东北财经学院讲师 民主同盟盟员

陈建侯 沈阳化工研究院工程师 九三学社社员

顾学蕤 沈阳医学院教授 民主同盟盟员

左耀先 东北工学院教授 无党派人士

彭清源 东北财经学院副教授 民革党员

时昭涵 沈阳化工研究院工程师 九三学社社员

赵鸿翥 东北财经学院教授 民革党员

万籁天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导演 无党派人士

徐公振 沈阳师范学院讲师 民主同盟盟员

陈彦之 民盟沈阳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郭厚德

有些党员有一种三段论法：“你们既然接受党的领导，我是党员，你就得受我的领导。”

一、党与非党的关系

中國人民革命勝利以來，有良心的人，都能認識到黨的政策是正確的。大多數黨員是能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但是也有少數黨員在執行政策時發生了偏差和錯誤。發生了偏差或錯誤後，基層幹部往往不作解釋，更不肯認錯，過去對，現在也對，以致造成了黨群間的隔閡。

這種隔閡，在群眾方面的表現是：作工中老是怕犯錯誤，因為錯了一點，就有被扣大帽子的可能。以致顧慮重重，失掉了主人翁態度，產生了作客思想。於是沉默寡言，學“金人三緘其口”生活上寡交遊，少來往，以致“六親不認”，如有些人對客來不敢留飯，怕人說在搞小集團。在黨員方面的情況是：以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態度矜持，謙虛不夠，喜歡恭維，厭惡批評。高視闊步，見人似睥非睥，氣勢逼人。還有些新入黨的黨員，入黨前，尚能和群眾有說有笑，入黨后就拿起架子來，前後判若兩人。群眾說，“究竟黨員不同於凡人”！

知識分子的特点是窮酸，碰到有些黨員的高傲自大，於是來一個“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黨員的想法是，知識分子應該向黨員靠攏，不靠攏是落后。這樣，彼此的距離，只有越來越遠。

二、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

有的黨員把黨和黨員的關係搞不清楚，往往把自己代替了黨。他們有一種三段論法：“你們既然是接受黨的領導，我是黨員，你就得受我的領導。”邏輯的推論無疑是“你不服從我，就是不服從黨。”在這種宗派主義的思想支配下，在某些基層單位變成了“獨立王國”。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十分不正常。如某些領導，對不能“體會領導意圖”的幹部，往往以“異己分子”的態度對待，對善于阿諛的幹部則加以提拔。

三、新老教師間的矛盾

老教師，一般是喜歡別人對他謙虛、和藹，也希望別人尊敬他。張良圮橋三納履，才博得一句“孺子可教”。青年教師如能對老教師誠誠懇懇，虛心學習，老教師是願意把自己的本事傳授給青年的。老教師沒有一個願意把自己的學識、技能帶到墳墓中去殉葬的。可是有些青年教師不肯虛心求教。他們說這些“老古董”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知道的那些舊東西沒有什麼用了。還有一種想法是，向老教師求教未免貶低自己的威信，於是強不知為知，“胡弄”學生。學校號召老師要“帶徒

譚其鏜

高教部对学校政治理論教育，和选送留苏学生問題上，
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

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得先解决领导与被领导之間的矛盾。

我首先对高教部提些意見。高教部修改教学計划时，強調政治理論課要占总学时的10%。但是对于政治理論課的教学質量和教学效果却很少考虑。几年来政治理論課的教学質量和教学效果是非常差的。从学生的思想情况可以看得出来。許多学生在背后談論的淨是什么职位、名义、工分和爱情問題，最严重的是灰色情緒。他們問“人生究竟为了什么？”他們說：“集体利益我体会不了，个人利益呢，在从前教授的地位是很高的，可是現在和一个普通職員差不多了，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青年学生中間的灰色情緒正在滋長着。这种不健康的青緒我們的政治理論教育却看不見，只是干“經典注釋”的玩意兒。理論學習的實驗室就是学生的思想工作；理論教員就是輔導員。高教部对这些問題不注意，單純強調应占总学时百分之几。教职員的政治理論學習，也是何此。解放初期，大家沒听过政治課，觉得新鲜。后来觉得总是那一套，沒有新东西，等于照本宣讀，許多人没兴趣，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这种形式主义的政治理論學習呢？

有人問：“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放’嗎”？这个問題提的很可笑，說明是有顧慮的，怕扣帽子。我举一个例子：李森科自以为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硬把量变到質变的公式往生物發展上套。可是过去几年来成为生物科学中的經典。当然，把李森科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对的。問題在于如何看待馬克思列宁主义，合乎实际的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

还有高教部在指定研究生不和有关部门商量，选送留苏学生不按照專長，这都說明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是非常严重的。

弟”，可是“徒弟不認老师”，誰又肯“強为人师，自討沒趣”呢？

克服这些矛盾，双方都有責任。党中央最近提出了整風运动，是最及时的。它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好办法。

李賢瑛

“你捏了一个泥菩薩，自己把它打碎了，与我何干！”大家对不从实际出發的批評有反感。

党与非党知識分子之間所以有隔閡，兩方面都有問題。知識分子主要是有顧慮，肅反的副作用还未消除，大家有戒心，就怕有朝一日又被拿出来整，算笔总賬。从党方面說，主要由于許多小問題的累积从而影响了党群关系的正常化，真可說是“冰生于水，非一日之寒”。我个人回顧了一下，問題确实不少。比如有一次我們系討論教师安排問題，有一位助教大多数与会的人認為留在教研組合适，認為他适宜于作教学工作，只因为这个助教在大学畢業那学期曾参加过“青年軍”（肅反的結論并不是反革命）。当时院的一位領導就不同意，認為应当調到圖書館去工作，但其他教师仍然坚持称此人有培养前途、应留在教研組。一位院領導乃說：国家培养的人才乃是德才兼备的。他不具备这条件。这一棍子打下来，沒人敢說話了。这件事傳出后，影响很不好，大家都認為“只要历史有問題的，就不培养”。

最近学校选先进工作者，有人反对由上面提出候选人，主張由基層組織提出。据說院長說：“这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結果，大家按上面提出的名單投票了，投票后当然就意見紛紛。

房子問題，有少数教师的居住条件太差，有一講師祖孙三代、六口人，才住十五平方米的房子；教务長夫妇二人却住三間房子，据說教务長本人曾表示願意讓出一間，但总务科不同意“讓”。

党员領導干部和群众接触不够，教师们反映說：“只有开会、个别談話才能見到面。”領導上在进行批評时，有时也不够慎重，未調查清楚事实就乱批評、乱戴帽子。大家对这种批評很反感，有人冷冷地說：“你捏了一个泥菩薩，你自己又把它打碎了，与我何干！”

就是由于上而这一系列的情况，于是造成了党群之間的隔閡，亟須进一步改善。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問題，我認為一方面要在学术上爭鳴，一方面要尽量“放”。但要做到这点，还需要創造条件，需要耐

心等待一个时期。因为财经学院的教师们都是解放后才开始向苏联学习，要想一下子就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还不容易，所以要耐心等待。此外，对若干值得争鸣的问题，领导上应当善于抓，及时提出来，组织大家讨论、争鸣。

财经这门科学没有实验室，研究的对象是数字。今天，一牵涉到数字，就往往牵涉到“机密”。这个问题在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有很大改善，但也还有不少问题亟须解决。比如有些企业单位不把全套材料给你，把生产实习当作“负担”，有些文件就不给你看等。希望光明日报能代我们作进一步的呼吁。

陈建侯

科学院不要将院墙筑得太高了，产业部门也不要将自己的科学研究压得太低了。

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目前分在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三个系统中进行。过去几年，它们对国民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各自为政，互不相关，也抵消了不少力量。郭院长在全国政协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协调工作，我觉得这样做很对，希望快做。否则像今天大家争着挂牌子的作风，要想达到国际水平，恐怕有点“痴人说梦”。

“科学奖金”本意很好，不过科学进军的高潮没有掀起，倒掀起了“人心向党”的高潮。科学研究必须理论结合实际，大家都知道这样说，究竟如何结合，恐怕还值得考虑。有人说，做理论题目，可能得到科学奖金，名利双收；有人说，复制国外配方，可以结合新产品试制，虽无名，利还不少。我不反对奖励，不过我认为一个真正对人民，对国家有点用处的科学研究，还是理论结合实际，实际结合理论的好。

我觉得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报告水平，须要多多提高。为此，应把科学研究看作是全国人民的公事，不是那个单位的“私事”。科学院不要将院墙修筑得太高了，产业部门也不要将自己研究所压得太低了。我非常拥护袁翰青先生“科学基金”的倡议，科学院应当是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各方面在科学基金补助下，可以结合生产、结合教学，展开研究

工作，自成一家之言，真正做到百家爭鳴。

其次，我想談談高等院校培養人才的問題。幾年來，在這方面也取得了成績。不過，在“專業培養”、“學用一致”問題上，我認為大家還可以商討。目前，專業是否分得過細了一些，忽視了基礎課程；過去訓練通才不好，因為太通了，一無所長；現在訓練專才好，這又覺得太專，只知道一點兒，也不見得好。比如桐油罐子，裝桐油當然很好，但是有時沒有桐油裝，裝香油就用不上了。現在，年年都在鬧畢業同學改行問題，真是公私交困，各有苦處。我覺得太專學校應當減少院系，集中教學力量教好基礎課程。例如，化學方面，教好普通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物理化學等就算培養到70%的程度。至於什麼工藝專業，造紙、制革、橡皮、油漆、塑料等等，放在四年級教。這樣，國家建設什麼，在四年級就多開什麼；國家不要什麼，就少開什麼。既靈活，又方便，學生無改行之憂，國家有得人之實。橘逾淮為枳，在國外先進的，在國內不一定先進，不能生搬硬套的學習。

還有，選送青年出國培養是國家的大事，既然肅反運動已基本完成，不應當再由內部決定，選拔人員就不能限於黨員團員，只要成績達到標準，就有被選送資格。選拔應舉行公開考試，宗派主義是阻塞賢路的。

顧學裘

中央衛生部重醫輕藥的宗派主義思想很嚴重；藥學人員所處地位，像“董弄媳”一樣；沈陽藥學院院長，掛名六年不到職

我們藥學專業的問題很大。在醫藥衛生部門，藥工人員不安心工作，學生不安心學習，覺得沒有什麼前途。其實，中國的藥學在古代就很繁榮，李時珍（明朝）集藥學之大成，當時中國藥學超過了世界水平。但是到現在為什麼這樣落后呢？我認為這與中央衛生部領導上的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分不開的。希望光明日報替我們呼喚一下，我對健康報的希望不大。在健康報上，一年也看不到幾篇有關藥學問題的文章。

我現在對中央衛生部提幾點意見：

1、重醫輕藥的思想很嚴重。這種思想，可以說是從中央一直貫串

到各个基层单位（医院）。药学人员在这些单位所处的地位像“童养媳”一样。过去卫生部门曾批判过王斌、贺诚的宗派主义思想，但重医轻药的宗派主义在目前仍严重存在。现在，对中医与护士工作比较重视了。但是对药学工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某地有一个新建医院，在将要开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安置药房，草草地找了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对付了事。至于药房设备简陋、技术低下，药工人员没有得到像同级医务人员的待遇等情况，在各地医疗单位中普遍存在。我们教学部门也不例外。在沈阳医学院，院长挂名六年不到职，可是学校出布告，却总是由此院长具名。

2、1954年的医学院校调整，原来是要达到集中力量办好学校的目的，可是结果不是这样。沈阳药学院是由东北、浙江药学院和山东医学院的药学系合并起来的，合并起来，招生数量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学生的质量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有的院校还因调整而积压了人力。这些问题希望卫生部研究，到底毛病在什么地方。

3、在全国医学教育会议中，讨论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时，卫生部门领导上不能倾听大家的意见，摆了许多大框框、小框框：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总之限制重重。使许多参加会议的老教师不能充分发挥意见，因此，这些计划和大纲不能不脱离实际，在具体执行中发生了很多困难，各校不能不加修改，造成了现在一班一个计划、一个大纲的混乱现象。

左耀先

· 一个专业分设三处没有必要：工业学校应特别重视理论结合实际

· 设新专业应该统筹兼顾。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在东北工学院、中南矿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都有。一个专业分设在三处有没有必要，很值得研究。如果放在一个学校里，人力物力都可以节省。如一个专业分设三校，招生数与国家需要数不相适应，对毕业生的分配也有问题。

· 工业学校应特别重视理论结合实际，可是在这方面却有些问题：
1、学校与科学研究机关的关系不明确。我认为学校与研究所不仅是配合的关系，根本就应当把研究所设到学校里去。研究员可以教课，教

師可以做研究工作。2、學校與工廠的關係問題。冶金工業部給學校和工廠都有通知，要求學校與工廠共同負責培養學生。可是一到實習的時候，工廠就覺得麻煩，認為照顧學生實習是個負擔。屬於第二機械工業部的帶番號的廠子，根本不許可學生去實習，畢業生却要分配到那裏去工作。學生對這些廠的實際知識缺乏，分配到那裏去是否能適合生產上的需要，我們就完全不了解。

彭清源

民主黨派組織，在高等學校里像“花瓶”，是擺樣子的。

開大會掛着紅條條，在實際工作上起不了作用。

財經學院向科學進軍的最大困難是得不到實際資料。我們會和中央財政部聯繫，要求把我校作為一個發文單位，給一些資料，始終沒有結果。在沈陽，財務工作做得較好的廠礦，不歡迎我們去，怕我們打擾他們的工作。財務工作有問題的廠礦歡迎我們去，為的是要我們幫他們解決困難，但我們在那裏不可能獲得先進的資料。最可笑的是，連本校財務科都拒絕供給資料。我校有位教師準備研究高等學校的財務工作，向財務科索取資料，財務科答稱如果不是檢查工作，我們沒有時間提供資料，之後又說賬目不能看。

有人說：“向科學進軍，不要光吹號，不上馬。”這話對的。但是，資料問題解決不了，叫我們怎麼“上馬”；有的教師反映：財經科學的研究已面臨嚴重的危機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建議：高教部應支持學校和更多的有關業務部門跟它建立關係。

其次我想談一談民主黨派組織在高等學校里的地位和工作關係問題。有人說：“民主黨派組織在高等學校里像‘花瓶’，是擺樣子的。每逢開什麼大會，總看見民主黨派的人掛着紅條條，坐在主席台上，可是在實際工作上却起不了作用。”我看這種反映是符合實際的。拿我們學校說，一些場面上都少不了我們，就是實際工作插不上手。例如評薪定級，領導上都最後確定了，才召集民主黨派的負責人開會，名為討論，實際上是走形式。

有些民主黨派成員已經有這樣呼聲：我們不願意當花瓶了！

怎样真正發揮民主黨派的作使，怎样在基層里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我認为这是很值得加以考慮的問題。

关于工作職权，目前有一些不協調的現象。我是做系的領導工作的，系內決定一個問題，常常因干部科不同意，行不通。例如系資料室有位留學生，能够做研究工作，系里決定把他調出來，教務長也同意了，但干部科通不過。現在肅反已經結束，問題基本搞清，再單純的从“政治”出發，不僅不能使人信服，恐怕也不符合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

时昭涵

**人事調配不當，有如“乔太守乱点鴛鴦譜”；把人事科室
当作安置老干部的爱人眷屬的場所，恐不恰当。**

目前人事工作方面存在着一些混亂現象，而且相当普遍。我建議中央加強全國的人事工作。

拿我們單位說，人事科的干部文化水平很低，有的还是半文盲，勉强能閱讀人事材料，对科学技术更是一竅不通，可是他們做的却是調配技術人員的工作。調配不得当的当然就不会少。有人諷喻这是“乔太守乱点鴛鴦譜”。例如我們單位是搞化学工程研究的，可是分配来的大学畢業生却是学肥料的，学藥物的。

人事工作干部不了解干部情况，但又掌握着分配、使用的大权，这是一个矛盾。因此，我希望中央考慮：究竟應該選擇什么样的干部来做人事工作？目前有些單位把人事科室当作安置老干部的爱人、眷屬的場所，恐怕是不恰当的。

我还想談这么一个問題：科学研究工作依靠外行来搞，还是依靠內行来搞？我是研究化学工程的。据我知道，“化工”作为專門的学系，最早是在美国發展起来的，苏联近年来才在大学里設化工系。当初我們學習苏联，一些行政領導同志自己不懂業務，又不接受內行的意見，簡單地認在苏联化工不成爲獨立系統，我們也應該学样。于是大批的化工研究人員改行了。現在發現这样做不对，才开始在大学里設化工系，可

是已經走了几年冤枉路。其實，當初能聽一聽內行的意見，這種損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再說我們單位的化工研究室，工作方向一直不能確定下來。這倒不是我們研究人員不知道化工應該研究什麼，而是行政領導上不採納內行的意見。他們只知道科學研究要配合生產，但不知道化工研究應該配合什麼生產，於是各種任務都下來了，至於這些是否屬於化工研究的範圍，或是否是化工研究中的中心問題，却不予考慮。其結果，當然研究方向就確定不了。

再舉一例子：我們單位早前修建一間試驗室，正趕上增產節約運動，領導上要削減修建費用以貫徹節約精神。當時內行人提出意見，認為實驗室要求有一定規格和標準，不然要出毛病。領導上不聽。後來房子草草蓋好，外邊火車經過時震動，使精密儀器受到損失。於是又加固修補，所耗費用竟比節約的錢大得多。

趙鴻翦

有事向領導上接頭還得先掛號。領導脫離群眾是嚴重的。

關於“團結、批評、團結”的問題。這個公式始於團結，終於團結。但是團結總要有一個過程，至少也得先認識，才能團結。我們學校的教師們彼此不認識，老大貴姓不知道，歷史情況不知道，團結何從談起。我聯想到舊社會的學校有職員錄，印着各人的職務、簡歷。新社會的學校沒有這東西，可能是保密，只有領導幹部才能知道。肅反運動時，又要我們對不相識的人進行鬥爭，實在令人為難。

關於領導與群眾的關係問題。領導同志日理萬機，很忙。只有少數人因工作關係才能接觸；大多數人只有在聽報告的時候才與領導同志發生關係。在舊社會學校負責人與教師常常接觸；新社會，即使在路上遇見，彼此也不打招呼。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一點感情也沒有。有事想和領導上接頭，還得先掛號，甚至等多少天談不上話。領導脫離群眾是嚴重的。

万籟天

要使戏剧繁荣，非打倒教条主义不可。

目前文艺创作赶不上建设高潮的发展。就剧本说，不是写不出来，就是写出来不上座，好的极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教条主义则是其中主要的。按教条主义要求，这个写不得，那个写不得，写得便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我们过去搞戏，有“没有斗争，没有戏剧”的说法，用现在的话说便是“生活就是斗争”，可是教条主义者硬是回避斗争，不正视生活。

最近上演的“洞箫横吹”是一个较好的剧本，但教条主义的批评家却左一鞭、右一鞭的打它。说什么“党委书记和群众打扑克，是不对的”；“军属有困难是不符合实际”等等。这种教条主义不打倒，戏剧能繁荣吗？

从今年起，作家要靠写作以维持生活了，这是推动创作的好办法。但是，要做起来，恐怕也不容易。辽宁有的作家怕饿饭，改行了。写一部作品不容易，不是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成的。特别是话剧剧本，写出来，上演税制度不健全，作家生活仍不能保证。如“双婚记”，现在全国都在演，作者到今天为止才拿到四百元上演税。

这几年话剧演出质量老提不高。有些好京剧观众百看不厌；话剧演过一次，再演就没有观众了。原因何在？据我看，台上台下生活一样，观众又何必花钱进剧院呢？现在演员的基本训练太缺乏了，说话听不见，咬字不清楚，形象不鲜明，性格不突出。听说北京戏剧界已经开始注意基本训练，这是很好的。过去，我在鲁艺教演员基本训练，有人给我扣了一顶“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弄得几年不敢出声。现在看来，当一个演员，基本技术还是非常重要的。

徐公振

沈阳师范学院领导用人只凭个人好恶，把尚未学俄文的党员，

硬派他作俄文系主任；叫不懂历史的人作历史系主任。

我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就是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我觉得在患难时期，党与非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抗战时以至于解放战争的年代，

特別是東北在解放初期正處於尖銳的對敵鬥爭的環境中，真能同甘共苦，團結合作，體現了毛主席的統戰政策的實質。

全國勝利後，情況就有了改變。好像有人在高高的拆牆，使多年的患難老友，也在宮牆外望，於是造成了嚴重的隔閡。這次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後，這一牆將開始拆撤。我們希望黨員同志們要拆就把它拆到底吧；恢復大平原，恢復過去的眞摯友誼吧；共同的建設我們美麗的庭園。

我過去曾聽到一個舊及門說，他說：“老師：我看黨與非黨之間，好像是少東家之與權伙。”當時被我批判了，其後我也覺得有些值得尋味。

沈陽師範學院的矛盾，基本上也是黨和非黨間的矛盾。突出的表現在領導與被領導間的關係上。拿對知識分子的安排使用來說，領導上是我行我素，既不採納比較負責人的意見，甚至黨委書記都不共作商量。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報告後，仍舊沒有變化，領導上的用人仍只憑個人的好惡和馴順與否為標準。過去並不考慮其政治文化的修養和專業與學識的成就，常提拔一些不懂學術的黨員為領導。有人反映尚未學俄文的黨員，領導上硬派他作俄文系主任；自己的老婆並不懂歷史，叫她作歷史系主任，甚至兩年不檢查她的工作，儘管搞的亂七八糟，他還嘖嘖稱贊；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至於對喪品敗德的親近，他武斷的替他掩護，毫不考慮問題已經昭昭在人耳目的；對於有建議和反對的表示的，領導上則大肆打擊，突出的表現在肅反運動和每次講話中。壓迫教師與學生的氣焰，和權威自居的思想作風，使科學研究，受到一定影響。這還和領導上本身的好大喜功思想存在着矛盾哪。當然黨外人士也有嚴重的缺點，作為揭發主要矛盾來看，茲只談其一而。

陳彥之

為什麼有些黨員和知識分子團結得不好，
建議黨在整風中從思想上進行檢查。

為什麼有些黨員和知識分子團結得不好？為什麼這些矛盾長期未得解決？我建議黨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徹底檢查一下，特別應該從思想上來

动，这进行检查。

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所以造成隔阂，原因很多，从思想上说，还有一个对知识问题的看法问题。那就是有些党员认为：“知识分子的知識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們只要突击一下就能掌握了。”他们完全不了解知識积累之不易和学习过程中的艰辛。

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就生产了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教学设置上的速成思想。过去曾出现过许多速成教学，如識字速成法、数学速成法、俄文速成法等等。尽管这些速成法曾風行一时，結果都行不通，还带来一些副作用。如有些人原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进了夜大学以求速成。在学习中跟不上去，他却不想到自己的文化基础差，反怪老师不照顾工农子弟，还给老师扣帽子。可是在夜大学耽了几个月回机关后，在填学历表时，却把原来的“小学程度”改填成“大学程度”了。这是一种不朴实的作风。从这里也说明，学习是没有什么捷徑可寻的。苏联有些工人出身的科学家，并不是速成或突击而来的，仍然是經過多年的辛勤学习，多年的苦苦鑽研才得来的。

另一种情况是不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做事情就不是从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利益出发，当然就不能够很好的团结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下才获得解放的。解放之后，党中央仍然是重视知识分子，团结知识分子的。可是有些党员不能体会党的政策，他们搞宗派，排斥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大学里，校长对教授都是十分恭敬，罗致教授，或是重金礼聘，或是登門邀请。今天有些大学里，甚至总务科科員也可以申斥教授。知识分子就不免有今昔之感。

希望通过这次整風，能引起全党从思想上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光明日报 5 月 14 日第 3 版）

加强互相监督 开展民主生活 改进

党群关系

光明日报编者按：本报编辑部5月4日在西安邀请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無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里发表的发言记录，以发言先后为序。

- 王捷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西安师范学院教授
- 李述礼** 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西北大学教授
- 刘不同** 政协西安市委员会委员 西北大学教授
- 張錫华** 九三学社社员 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 張世恩**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交通大学讲师
- 梁仲翰** 九三学社社员 西安动力学院副院长
- 李萃麟** 民盟西安市委员会委员 西北俄文专科学校教授
- 刘蔚同**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西安医学院教授
- 王子云**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西安美术专科学校教授
- 錢祝鈞** 九三学社社员 西北大学副教授

認真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

王捷三 人民内部矛盾發生的根源，毛主席指示的很明确。怎样处理呢？我想似乎非認真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不可。我认为，民主集中制在各个机构中还没有制度化和具体化，大家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也不够，似乎是群众要求民主，领导则爱集中，因此，应该沒有矛盾的事情有了矛盾，小矛盾变成了大矛盾。最近，党的整风运动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劳

个办法太偉大了。解决矛盾莫善于此。我希望定为制度，不分党与非党成员，普遍实行。

目前，較突出的矛盾的表现是官僚主义，在文教机关則是教条主义。

官僚主义者的思想方法不对头，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它將矛盾绝对化了。我觉得这几年有些领导干部，动辄把自己的威信同共产党的威信等同起来，这样就不能虚心。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还由于偏听偏信。偏听偏信那些接近自己或恭维自己的人，因而发生偏差，造成自己不知道的一些矛盾。

在我们机关中，民主生活是有的，但我觉得有些流于形式，甚至在学术研究机构中也是如此。拿我参加的教研组就是这样。有些民主党派召开的会议也是这样。在学校中，领导与群众有些隔阂。我觉得历史上有“学东”尊重“西席”的好习惯，应该吸取，然而今天校院长访问教员的事很少见了，

我奇怪的是，党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原应将官僚主义看成是大问题是莫大的耻辱；但是有些人看的很轻松，还爱戴官僚主义的帽子，在报告和谈话中，往往说自己有官僚主义。我觉得把这个严厉谴责的名词庸俗化了很不好，满不在乎，如何反对。因此，反对官僚主义应先端正这个认识。

文教界在业务上提出过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不见得不好，教条“主义”就要不得。不克服教条主义就“放”、“鸣”不起来。有人担心大放大喊会妨碍马列主义的领导地位，主张还是在马列主义范围内“放”“鸣”吧！我认为这些人忘记了马列主义之所以取得领导地位，正是由于斗争的胜利。传播马列主义用不着左手执资本论，右手执宝剑，而且辩证法正是反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的。教条主义者把思想工作看成土木建筑，筑墙垒砖一样，按时计工，照图式办事，课堂授业，只是照本宣读，不许多说一点，也不许多发挥几句。不许说教本上或权威者没说过的话。你如果作个比喻，说个新见解，他们就大惊小怪，乱扣帽子。高等校院中的学术研究空气就这样被窒息了。

教条主义者有时还杜撰教条，强人遵守。这样就在科学研究上、教

等上造出不少的清規戒律，也就难免枯燥無味、千篇一律了。

生搬硬套的作風，在各級學校中都有。譬如：口試制度使師生痛苦不堪；工作量制將腦力勞動當成車間生產。不管科目和工作性質，死板地照抄，結果如何，值得研究了。

在戲劇界，教條主義也很嚴重。就西安來講，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以後，劇種劇目都挖掘了很多，這是好的一面。但是，截至現在，在秦腔改革上，教條主義的流弊還很大。如“易俗社”是西安的一個大劇社，歷史較久，辛亥時有不少愛國的老先生創作了三百多個劇目，當然其中有些是需要修改的，但教條主義者，却將三百多個劇目在解放後只留下三種。他們原先認為神話戲是迷信，後來聽說高爾基說神話不算作迷信，於是又形成只演“張羽煮海”“劈山救母”之類的戲。他們固執地想拿新教條打倒舊傳統，拿洋規矩否定民族形式，把許多人民所喜聞樂見的劇目都“一言以斃之”。現在雖有改善，但據說仍不讓老藝人擔任實際的導演工作。

我希望以上所提到的“窺豹一斑”的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在學習討論毛主席的指示後，有所改變。

再談“互相監督”問題。西安的共產黨領導上，幾年來帶動民主人士參加革命工作、改造自己思想，已取得顯著成績。民主黨派之所以能有今天，都是共產黨扶植的結果。今後應在這個基礎上，多多展開同志式的批評。但從檢查統戰工作會議上看，提出批評的還很少。我認為，既是朋友就要“勸善規過”，但認真規勸惟有好朋友才能做到。目前共產黨和非共產黨人士的關係，應改善“敬而遠之”的現狀。我建議，在不妨礙工作的情況下，在不流於庸俗應酬的情況下做兩件事：（1）個人往還；（2）社會活動。聯繫親密了，情感就融洽了，批評監督也就容易了。本來，生活在社會主義大家庭內，應該是生動活潑，喜氣洋洋的。這樣一來，假使說有宗派主義的牆壁，便也不推自而倒了。

四大黨委怕放，大家自然不敢放

系主任有職無權很難做人

李逸札 現在大家都說要“放”，但我的印象，還有些領導人是想“收”，或者不敢“放”。就在中共中央提出“放”的政策之後，今年4月1日，

西安市高等教育局曾召集各高等院校政治課教研組主任的座談會，在會上，有的人是主張“放”的，以“放”來克服教條主義，可是這個座談會的主持人在開場白和總結發言里居然說，由於政治課教師90%以上是年青同志，他們的毛病是鑽研經典著作不夠，生活鍛煉不夠，意思是說，不是教條主義太多了，而是教條主義太少了。這個座談會的主持人的思想意識上，實際就是一個“怕”字。其實，現階段的政治課教學，例如政治經濟學的總危機與社會主義部分，由於長期養成的教條主義習慣，已使教師在學生中失去信用，不論新考教師都要在克服教條主義與“爭鳴”中找出路。

我們西北大學呢，也曾經召開過兩次有系主任參加的行政擴大會議，但在大會上誰也不敢講話，很少有人對中共黨委領導提意見，即使提了意見，也是不痛不癢的，根本沒有敢接觸到痛處，對中共黨委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碰都不敢碰。這是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西北大學中共黨委怕放，大家自然就不敢放了。

我認為，要“放”，就要有具體的措施，我們老教師們，老實說，由於積了幾年的經驗，現在是害怕得很，有“驚弓之鳥，漏網之魚”之感。老教師們在學校里威信一時還恢復不起來，這樣的處境，要想開那麼兩次會，就妄言“放”和“鳴”，那當然是辦不到的事。

老教師們為什麼這麼消沉？這和以往各次運動中留下的問題沒有很好解決有關。有些問題沒有及時解決，有些問題的解決方式不對。過去各項運動里有沒有錯打了人呢，肯定是有的，但打錯了卻沒有看見領導者作公開檢討，或者在檢討時躲躲閃閃，企圖以全國的成績來掩蓋自己的錯誤，說什麼“成績是很大的，錯誤是不免的……”等等，一點也不具體更不聯繫自己的實際，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種檢討，對於錯打擊了人的所謂“積極分子”有什麼教育意義？這樣一來，共產黨的領導的威信，自然而然在群眾里受到損害，至少在老教師里受到損害。照這樣下去，共產黨的威信不會給個別黨的領導與個別黨員蝕光嗎？每一個對共產黨愛護的人都是很耽心的！

這次中共中央號召大家“放”，但是人們累積了數年的經驗，顧慮重重，實在有點不敢放，怕的是別人把材料收集起來，到時來一個“整”。

所以，應該以事實來證明，“放”決不是為了“整”，那麼，大家才能暢所欲言，從各方面提供意見，幫助共產黨把整風運動搞好。

大家不敢說話，或者不說真話，是一個十分令人憂慮的事情。我這些話，在這個座談會上敢說，回到西北大學，我就不敢說。有一股無形的壓力，迫得人們不願說話。民主黨派中，據我所知道的，現在也已經很難了解群眾的真實思想情況了。每逢我們去搜集反映的時候，被訪問者要嗎就是點頭說：“好！好！好！”，要嗎就搖頭不則聲。

人與人之間也少來往了，“六親不認”的感覺，人皆有之。因為根據過去的經驗，凡是幾個人常常在一起的，往往被目為是搞小集團，誰還敢接近呢？

西北大學里共產黨和群眾的關係是不好的。我們學校有一批所謂積極分子，專門偷聽別人的話，記在小本本上，作為將來“整”人的材料，經濟系秘書就是這樣的人，他偷聽了某教授說了“這個年頭說話要當心。這麼一句話，就在運動中大加渲染，問某教授是不是要造反？我們學校里有些追求入共產黨的人，為了表現“黨”性，就向党奉承阿諛，並且專門以打擊“落后”分子作為他個人表現“黨”性的機會。共產黨與“落后”分子之間的這堵摸不到的牆就是這些積極分子造成的。現在的問題是教育這些積極分子，使他們變成群眾中的一個分子。反映情況要真實，不要專門反映某人的缺點，以造成群眾與共產黨的隔閡。

照理說，要搞好學校工作，應該發動老教師的積極性；可是過去每次運動里，打擊的盡是老教師，傷了自尊心，大家意態消沉，所以無論中共黨委如何號召加強領導，大家都鼓不起勁來，因為系主任、教研組主任都是老教師。西大中共黨委某些領導人對教授的態度是十分粗暴的，像業餘政治學校，應該是自願參加的，但黨委親自点名，說今天有幾個人未到，有時表揚某些人時，同時也傷害了另些人的自尊心，有點像對待小學生的派頭。西大中共黨委向群眾報告關於匈牙利事件時，說到中共也有叛黨分子的時候特別強調說，他認識某一個叛黨分子，現在却變為民主人士了。這些話使到場聽講的某些民主人士寒心。

關於有職有權問題，我認為，西北大學有些系的領導等於傀儡，有職無權。取權都操之於教務處的某些共產黨員以及系秘書或秘書助理的

手上，系主任不过画押而已。系主任很难做人，責任上不得不管，管起来，又無实权。这种情况平常是“搜集”不到的，只有在熟人聊天的时候，才露出来。我認为，檢查工作时，應該檢查那些有职有权的人，檢查尸位素餐的人，是沒有用处的。加之，过去教务处的的工作是形式主义，是个制造表格和收集表格的机关，使得西大流傳着“临表涕泣，不知所云”的話。1955年春召开教学會議，在教务处做的总結报告中，列举了十四大項，每項又分为若干点，共有問題不下二三百个，听起来，就像开中藥鋪一样。及到这种形式主义的办办法行不通，問題轉到提高教学质量时，形式主义表面上是垮台了，但教务处的领导也跟着垮了台，变为無领导。現在西大的教学领导是三不管，系主任是無权管，系秘書無能管，教务处高高在上無法管。

至于怎样改变这种情况，我認为，現阶段是“放”揭露矛盾；下阶段是群众与领导相結合，逐渐想办法，改进工作。

为什么会有两种改造思想方式

学生教导先生，先生处境也就苦了

刘不同 我談一下个人的感想，古人告訴我們，处世之道“話到舌尖留三分”；又說：“禍从口里出”。可是由于我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經濟制度，热爱中国共产党，实在是沒有力量克制住这已到舌尖的話，說些某些朋友不願听的話罢。

1951年8月間，我进了西大，現計之，快六年了，在这六年中在经历了許多的狂風暴雨。在狂風暴雨中脑子里积累了許多問題，有的竟在大腦皮質上形成了頑固的条件，每一提起，神經就为之緊張，因而血压日高，神經日衰弱，去年几乎离开了这个可爱的祖国，进了鬼門关。从那里說起呢？好罢，先从思想改造說起。

一、馬克思說，教育者本身必須先受教育，我为了繼續我的教育工作，1949年我进了革大。在革大，我看見共产党员是那樣的朴素，誠懇、亲切，实事求是，那樣的不自驕，不居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感动得我五体投地，使我想到过去就漸愧，瞻望将来就愉快。这是我畢生不能忘的一段珍贵生活。

1951年到西北，作为一个干部参加土改，和共产党同志接触中，他

們那種親切和藹的態度，使我感得離開他們，就會孤寂。他們一切事和群眾商量，與群眾共甘苦。他們親切地告訴我，對農民間的問題，要說服教育，調解；對敵人才進行無情的打擊。這些給我印象太深了。我學習、做着、我交了若干農民朋友，直到現在他們遇見我，還叫我“老劉”。我感到共產黨太偉大了，我欽佩共產黨人萬分，我自己想，我雖不是共產黨人，作個共產黨的朋友也光榮。這是我永久不忘的一段珍貴經歷。

1951年進到了西大，首先遇着的狂風暴雨是“三反”。我看見某先生在工作組和學生面前跪着，更有的被打了耳光子，並且一味的追逼。我心里想：文化教育機關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為什麼這樣的粗暴，為什麼對自己人這樣凶狠。事後又聽人說打錯了。我又想，他們為什麼不先調查然後再干。為什麼和我在上改中共事的共產黨員的做法不同呢？為什麼也和北京我所接觸的共產黨員的做法不同呢？

接着就是思想改造。改造的方式是：喊，叫，斗，與革大太不同了。學生在共產黨、青年團組織領導下來改造人的，而我是被改造的。我感到不是革大那個情況了，不是分析說理而是申斥了。我當時想這又是怎麼一會事，為什麼在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下，會有兩種改造思想的方式？據說不如此，不能表現出黨性強，立場穩，我想那麼革大的那些共產黨同志為什麼不這樣對待我呢？我可不承認他們黨性不強，立場不穩。

有的先生過了關，可是仍未脫却落后的帽子；有的未過關也當了“長”。這使我更迷惘了。啊！經過這一個風暴後，師生關係變了。

二、學生成了先生的先生，並且是個嚴師，當然不願接近先生了。可是其中也有的學生知道他們不是先生的先生，也想和先生來往。有一個學生說：“老師我想到你家來玩，別人不叫我去。”我問誰，他四顧一下說：“有個團員不叫我去。”據說從舊社會來的先生有一種魔力，他們能把舊社會的壞東西在最短時間傳染給學生。

學生既然是改造先生的先生，在堂上就專注意先生的立場、觀點。可是學生究竟也是從舊社會來的，他們自己也未必把立場、觀點搞好，甚或比先生更糟。因此他們的一副好心腸也就在客觀上變成了有意為難。然而，學校某些領導人每每將他們反映的一些錯誤意見，作為考核

先生进步与落后的标准，教学好坏的标准。师生关系反过来了，是学生教导先生。于是先生的处境也就苦了。

三、有一个时期，講稿中堆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詞句。以后有了人民大学的翻譯教材，先生感到如获至宝，即从人大教材上抄到自己講稿上，又从講稿上抄到黑板上，学生再从黑板上抄到自己的筆記上。有个先生说：这是“三抄教学法”。我也認为这个名詞是恰当的。在1955年以前，人大教材翻譯的質量并不高，再加上先生对苏联經濟情况并不很熟悉，因此也有些看不懂。但没有关系。学生若提出疑問时，先生就当头一棒：这是人大的教材。有一位教了二十余年會計的老教授，認为这样做对不起国家，根据自己教学的經驗，自編了講稿講。这就受到了打击，在每次运动中都把他作为“进步的絆脚石”。教条主义也影响了新老教师的关系。新教师往往把教書看得很容易，認为拿一本教材照本宣讀就可以了。因此，他們看不起老教师，說老教师没有什么不得了。

四、我再談談党群关系問題。思想改造后，冷冰沉默代替了活潑热烈。这大概就是“进步”。有一个先生说，某人进步，我說，为什么？他說，因为不講話了。六年来，我也曾主动去靠攏领导同志，但沒有人来和我談心，解决我的思想問題。这好比剃头匠的担子，一头热。

狂風暴雨过去了，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我是惊弓之鳥，我热烈希望上面所說的都随着春風而逝。

三个大老虎变成大妖魔

奇特邏輯給人打上烙印

張錫华 解放几年来，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經濟文化建設以及各方面都取得了偉大惊人的成就，使每一个有知觉的人都感到無比的兴奋。这說明在我們革命事業中成績是主要的，也是巨大的。今天是要大家談一下人民内部的矛盾，所以关于成就方面，个人的感受就不多費時間。这不等于說我对它沒有認識。

自从各地傳達了毛主席的講話以后，大家对于“鳴”和“放”都有了初步的体会，但是應該承認，大家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顧慮，或者說有些“怕”的心理。在这同时，人們也激于对共产党和人民事業的热爱，

又想响应大胆“放”和“鳴”的号召，因此在不少人的内心产生了矛盾。

“齐放”与“爭鳴”既是国家長期的政策方针，那么为什么人們还要有顧慮呢？这是因为过去几年，有些人在为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爭鳴的过程中，遇受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打击和报复，至今沒有合理的解决，因此不能不自己問自己，再一次的“鳴”和“放”会收到怎样的后果，对人民事業会不会起点好的作用。

回忆过去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运动，如土改、鎮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等等，我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都取得了肯定而又巨大的成就，但是对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但沒有發生什么大影响，个别领导人反而因为职权过大，民主不够，加上执行过火的保密制度等因素而更滋長起来，这三个为害的大老虎，現在变成一个三头六臂的大妖魔了。以反官僚主义为例，在三反和新三反中都是主要的題目，以后在党和报纸的文件中也不止一次对它开过火，結果对它一無损伤或者效果不大。敢直言的人，每經過一次运动就少一批，因而官僚主义者越来越气焰万丈。本来，作为一个人民的勤务員，若犯了害人的官僚主义是十分可耻的事，但是常常見到一些领导人把“官僚主义”等名詞变成了一种庸俗的口头禪，在群众面前常常輕松愉快的嘻皮笑臉的說：“嚶，我是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似乎心里在說，誰敢把我怎么样呢？”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虽是中央提出的新政策，可是过去，像“知無不言，言無不尽，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詞句，大家都很熟悉。我覺得，毛主席對我們的这些教导，都是十分正确的，也是永久的至理名言。不过在个别基層單位领导的执行中确有偏差，甚至造成不良的後果。他們常把有些刺痛自己毛病的正确批評和意見，积存起来，借下一次运动，来一个大报复，像銀行存款一样，零存整付。因此不少平时敢于向不合理的事發言的人，被扣上犯了反领导或反革命罪行的帽子，他們的邏輯是，“不同意我的意見，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对领导不滿，不滿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种奇特的邏輯不光是在个别機構中存在，而且据一位老同志說，有过这样一回

事，一个老同志的外甥，因为别的孩子，不願同他一起玩，就很不高兴地說，“你不跟我玩，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反对我舅（他的舅舅是党员），反对我舅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个别有执法之权的人利用这一邏輯，會給人們心理上打下了不易磨滅的烙印。而且在一些机关里，应用这种“幼稚邏輯”的例子并不少見，因此不首先揭發和根除它和它所造成的影响，就会給“鳴”与“放”的前途上，留下很大阻碍。

上述由个人好与惡出發，利用“幼稚邏輯”違犯中央政策的事例，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个别或少見的。人們鑒于“是非皆因多开口”，于是，有人矢志把嘴上加个無形的封条，来个“守口如瓶”，甚至来个“六亲不認”，免得找麻煩。也有些所謂“腦筋灵活”的人，体会到別人由于“歌功頌德”而“获益不淺”，于是想到“不識时务”、不具体考虑“上者所好”而冒昧發言，是不好的，所以索性倒向只有歌頌的一面，作一个“順風倒”。我觉得这股歪風的滋長，对于社会主义建設，是危害很大的。

1956年，毛主席指示在肃反斗争中应“有反必肃，有錯必糾”。这說明共产党和国家对于糾正缺点和錯誤的严肃态度。但是某些部門糾正錯誤的行動却有些不严肃，某些领导人不但沒有承認錯誤，还对斗錯了的人說“这是党給你一个考驗”，或者說“你总有点缺点吧，至少态度方式方法不能令人滿意。”就这样来一个“平分秋色”。在这些情形影响下，不少的人不敢說話，也不願意說話，因为說了沒有用。

其次，犯过錯誤的个别领导的思想中，还可能有“怕放”的意識。但是大势所趨，不放吧又怕受中央批評，于是来个“旁移重心”的作法。尽量避开不談由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造成的重要事件，把本單位許多类似婆婆大娘互相說閑話的矛盾拉出来，“从長討論”，以此作护身盔甲，掩盖自己的过失。倘若“不得已”涉及自己，就用些口头技巧，庸俗的自我檢討（当面檢討事后不改），当作过关护照。据群众們談西安市上有的医院就是这样在肃反和八大文件學習以后，群众們提出相当严重的問題，领导上只是輕描淡写的、膚淺的檢討一下，然后就被調換一个工作岗位。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宗派主义和

官僚主义在作祟，这样的作法，会不会叫群众觉得，上级的处理脱离实际？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而且主要在领导方面。谈到领导又主要是个别党员，领导作风问题。这些个别的党员忘记了党和毛主席的谆谆告诫，他们在工作中产生了特权思想。例如一位专职干部曾叫公家的裁缝，给他私人加工作一条裤叉，作好之后，他不满意，怒责裁缝说：“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为什么不作好？”在评工资的时候，党员之间也有互相抬高的现象：在调干升大学时，不但有优先报名之权，有位同志考试时并不懂得题目的意思，结果也保送入了学。医院是不许随便加添职工的，可是院长的爱人，只要一纸条子就上了班，当时骗群众说是“自费学习”，后来证明每月照领薪金。

有一位高级医务人员几年来作了很多种科学性的研究工作，因为得不到本单位领导的支持，曾提过尖锐的意见。于是在肃反中，这个单位专门组织了大会斗争他。肃反以后，这位医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不久以前被作为罪状的许多行为，却一变而为工作成绩，总结为先进事迹。此外有些领导者对某些平常印象不好的人，常夸大其缺点，利用幼稚的逻辑，借运动的机会，大事斗争。

总之，从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看，主要的还是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三种主义，一般说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个别地方则发展到极严重的程度。我建议主要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但是对有特别严重的情节者，应当予以特别处理或法律制裁，有的朋友警告我：“不应当这样提法，以免将来遇受报复”。我觉得只要谈出来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而且合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大家应当把个人得失问题置之不顾。

我建议，在这次整风运动中，（1）对于一般的和严重的情节，应分别对待。（2）设立接待室，使群众能尽其所言。（3）不给官僚、宗派和主观主义者以领导运动之权。（4）为了彻底作好这一工作，应当特别着重群众路线的作法。

交大迁西安是草率从事 利弊问题应交群众讨论

張世恩 交大（西安部分）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問題的講話已經开始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交大应不应该从上海搬西安这一問題上。有位教师說：“交大搬来西安是錯了”，他提出很多具有說服力的理由，大家認為，言之有理，把我們心中的話都說出了。”交大搬来西安究竟对与不对，大家應該尽可能的把利弊得失的因素全部“放”出来，最后綜合所有的因素，看看交大迁西安究竟利多弊少，还是利少弊多，这样才可找出一个較合理的結論。

关于这次迁校，領導上是草率从事的。記得前年在上海交大校务會議扩大會議上，校長根据高教部的迁校意見，曾征求大家意見。当时除了三位或四位教师同意迁校，發表了一些意見之外，其他几十位教师都沒有表示，在这个扩大會議上既未詳細討論和研究，后来也沒有在会外征求群众的意見，可是就决定了迁校。

交大在上海部分也在討論这个迁校問題，据說很大部分的人都反对迁校，装箱工作也已經停止了。这更引起我們先来西安的一些人的思想动荡。是不是就把我們这些先来西安的一些人丢在西安了呢，“一刀兩段”了呢，抑或是交大上海部分迁来，或者是我們回去，大家思想上乱得很。教学工作不免要受影响，假如不迅速的解决，不好好的解决，可能影响更要扩大了。

目前，有些人对“放”还有顧虑，怕“記賬”，这是很自然的。我过去在另外一个学校工作的时候，是亲身体驗到的。我曾看到把某人的一言一語記下来，把某人的行为記下来，而且居然記賬記錯了，記到別人的戶头上，結果弄得別人莫名其妙，認為是“天落棒”来了，真是吃不消。因此，一下子“放”是不容易的。希望領導上采取具体措施，解除群众的顧慮。

为了正确彻底解决人民內部矛盾要采取具体措施和办法解除顧慮

畢仲翰 高等学校存在着很多矛盾。但从表面上看起来又發現不了有什么了不起的突出的矛盾，特別是在解放的三五年来，在这个时期假使你有机会到一个高等学校中去看一看，你很可能会感觉到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滿意。因为你会看到全校教职員工都在那緊張的工作着，按时上班按时下班，領導上的意圖，随时获得貫徹，領導的号召到处得到影响，一切都很順利。当然例外是有的，但这种例外总是很个别的。

当然领导者的正确领导博得群众的一致拥护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 無論何时何地领导者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因此，上述现象，~~就认为~~ 是不太健康、不正常的。

当然最近两年来，由于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布以后，群众那种只有拥护，没有批评，只有附和没有争辩的现象，是有了一些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还依然停留在初春萌芽时期，要大放，要成长茁壮乃至满园春色，恐怕须经历今后的除草施肥灌溉等一系列的培养过程。

造成群众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只知歌功颂德，不知争辩批评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共产党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威信，群众对共产党的个别成员，认为他们就是代表共产党而执行共产党的政策的，由于相信共产党，因而就相信每一具体共产党员，这样就使得每一共产党员在群众中享有无比的威望，由于信仰太深，就模糊了他的缺点，纵令偶而感到一些不尽满意的地方，总以为自己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这样就加紧了对自己的约束，不敢多提意见，怕自己提错了不好。

2、在共产党员中一般都经过长期的革命锻炼，掌握了阶级斗争经验，习惯于敌我斗争的方式方法。胜利后部分同志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淆起来，这样就使他们在处理问题时，易于用敌我斗争方式来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就造成了态度粗暴，不肯虚心分析问题，不愿倾听他人意见，动辄就会替你扣上一顶不尽合套的帽子，什么唯心主义啦，思想反动啦，破坏政策啦等等。这样就使得群众提高了“多言必祸”的警惕。

3、几年来全国规模的大运动对转变社会风气，提高群众觉悟确有不可比拟的重大成就。但在另一方面也起了一些副作用，对知识分子来说特别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因而遇事多自甘缄默。有一位老教授患严重神经衰弱症，却把自己关在房里，每天感到苦闷，我曾劝他无事时可各处跑跑，同别人聊聊天，他回答说聊天是愿意的，要聊也得聊个痛快，但谁能保证聊天不聊出问题因而在未来一次运动中不算总账。

4、我们都是旧社会出身，理论水平低，看问题不全面。这种自卑

心理也造成很多人不願多說話。

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很多人不願多說話，不願多提意見。這樣就隱蔽了很多的內在矛盾，使得有些領導人就看不出自己單位所存在的問題，長此下去，就會滋長了某些領導人員的驕傲自滿情緒，滋長了他們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滋長了他們濫用共產黨的威信的作風。中共中央提出了整風的指示，是及時的，是必要的。

廣開言路，打破沉默，從而揭露矛盾，解決矛盾，最後改進領導作風，改善共產黨和群眾關係，加強團結，齊一步伐，共同肩起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任務，在今天說起來應該是沒比它再重要的工作了。

要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首先要揭露矛盾，使得大家能看到矛盾所在。然後根據毛主席指示正確的予以處理。問題在於如何能使群眾敢於揭露矛盾。揭露說起來簡單，但做起來却真不容易。從最近幾天學習看來，群眾有了一些揭露，但究竟還是不深不透，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為什麼是這樣呢？主要是大家有顧慮這道關沒有打破的關係。站在領導地位的，怕放了不好收拾，怕打到自己的疼處，喪失了領導的威信。這樣就使得他們對於放雖然不公開反對，但不熱心提倡，雖然在今天大勢所趨不得不放的情況下，不放吧怕中央批評，放吧內心顧慮重重，這也影響了群眾的放。在群眾方面也有顧慮，深恐放了以後，不利於自己的前途。有的人認為放多了，縱不會給你弄個政治問題，但最低限度對於自己的評定工資、評定級別、安排工作也會發生不良影響。領導人的報復一個人是很容易的。這樣就使得群眾不敢放，或不敢大放，有的還懷疑到放了是不是能解決問題。不解決問題，既得罪領導又于己不利，那又何必呢？這些問題如不解決，是很難放的。因為有些人還會懷疑到現在不報復，將來遇到別的問題，是不是就能避免報復呢？

在這些情況下，站在領導地位的不敢提倡；站在被領導地位的，怕報復，最後結果，就形成今天的也放也不放放的不深不透的局面，所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必須先揭發矛盾，但揭發矛盾就要研究如何打破領導和群眾雙方面的顧慮。怎樣解除這些顧慮，恐怕需要採取一些具體措施和辦法來，必須解除顧慮，人民內部矛盾才能被認識，才能正確而徹底地獲得解決。

官僚主义者是教学工作的“絆脚石”

李萃麟 我想集中談一談关于我校第二副校長兼教务处主任、兼前统战委員王敦瑛作風粗暴的問題。近兩年多來，他經常開病住醫院，進疗养院休養。但他給學校工作所留下的損失和人們對他的印象，却並沒有被忘記。而且，這一問題一直到今天未得解決。

人們為什麼認為他對學校工作有損失，給人以極不良的印象呢？

首先是缺乏民主作風，他不僅保有一種森嚴的面孔，“衙門作風”的架子，而且他最不受聽反面意見。有一次民盟支部給中共黨委匯報了一份教師對學校工作的意見，其中有關於對教學領導的意見，他卻要一條一條地追問。在學校會議上，如果有人意見與他不同，會後他就來一個批評，以壓制別人的發言；有一次教务处和校長辦公室的秘書一起向領導上寫了一份匯報，他立即把教务处秘書訓了一頓，認為未經他申閱，不應隨便寫材料。有關教學法問題，不管教師的不同意見，他有時就行政命令式地決定如何改進。他對學校統一設置群眾意見箱這一民主措施不同意，認為教务处應有自己的意見箱，口頭上說是為了處理方便及時，實質上他認為有關教學意見只歸他管，不許別人管。由於他缺乏民主作風，群眾關係當然就談不上了。在幹部政策上，更嚴重的是他對一些人的成見很深，有些教師在教學上或在對人態度有某些缺點，有的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但他死抱住這些不放，安排工作或者研究課程時，只要一提起這幾位教師的名字，他就說不行。對教師們眼前的進步，他很少考慮，有幾位教師還因此調出去了。王敦瑛一貫的作風，是坐辦公室，不到下層去，根本不與教師和學生群眾接近，教師也很少主動與他接近，結果上下不通氣，處理問題那有不犯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因此，有教師說，這是教學工作上的“絆脚石”。

最近兩年來西北俄專進步很大，這是有來由的，坦率地說，是因為王敦瑛休養去了。但這件事到底怎麼辦，現在還不知道，反正還未解決。我建議有關部門應儘快地解決這一問題。

師資水平和教學要求不相適應教學計劃教學大綱也有矛盾

劉蔚岡 西安醫學院在解放以來，無論在思想認識、醫療教學、科學研究和培養幹部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績，應當肯定成績是主要的。但

假如說不存在什麼矛盾，那就錯了。

首先，科學研究現狀和國家在這方面的要求就存在着矛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來，在我們西北的科學園地上顯得格外荒涼，不用說“百家”，就是一家也鳴的不多，真是文風不盛。以西安醫學院來說，老教師有三十多人，整天忙碌，但在中華醫學雜誌很少發表他們的論著。在學習蘇聯方面，往往人云亦云，生搬硬套“唯神經論”，把什麼病源都歸納為中樞神經有問題。這是教條主義的典型。

為什麼鳴不起來呢？不可否認許多科學工作者有思想顧慮。他們不敢發表自己的見解，怕“犯錯誤”。但這裡也不能不涉及向科學進軍的條件問題。周總理會說，要保證知識分子六分之五從事業務的時間。但事實上，西安醫學院1958年的會議，反比1955年多。西安醫學院一向把各科病歷混在一起編號。二年來我們要求實行分科病歷制度，始終沒有引起領導上的重視。因為管理不善，病歷經常遺失。這就大大阻礙了科學研究工作的進行。我們為了統計濕疹、化膿性皮膚性、寄生蟲性皮膚病、皮膚結核、性病、麻風等等疾病的發病率，就花了兩年半的時間整理病歷，假如實行分科病歷制度，我想用不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可以完成這一工作。

在教學質量方面，主要矛盾是師資水平和教學要求不相適應。解放以來，青年師資成長很快是事實，可是水平不高也是事實。在青年師資中，絕大部分有工作熱情，對新鮮事物敏感，可是他們的基礎還不結實，特別是外文基礎知識很差，不能看原文書籍。我們可以說，外文水平高的不都是科學專家，但是一個科學家必須精通一種或幾種外文，否則就會和歐美文化隔絕。

在教學工作中還有一個突出的矛盾是現行教學計劃、教學大綱的不合適。高教部、衛生部一方面要求減輕學生負擔，要求教師提高質量；可是另一方面，以我們的五年學制，卻搬用了蘇聯的六年制的教學計劃，還加了其它課程。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又年年變更，使學校和教師無所適從，形成一片忙亂，也就無法積累經驗。目前招收的學生中，外文的水平低，也給教學工作帶來許多困難。這樣學生的負擔如何能不重呢？但領導機關只看到學生負擔重，豈不知教師在這種情況下，負擔也

不輕。

衛生部不考慮西安醫學院的各種條件，年年增加學生，年年增加教學任務。因而產生了實習場地不足的矛盾。教務處每年忙於接洽實習基地，教研組每年要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抽人帶領實習。甚至像我院耳鼻喉教研組主任也不能不親自領導實習。

現在，我建議：第一，我們知識分子要認識“教育者必須先受教育”的深刻意義，要更好地鑽研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自我改造。這也是一個盟員應有的要求。第二，我們要打消顧慮，大膽的“放”，大膽的“鳴”，在此基礎上努力提高業務。第三，在爭鳴過程中，必須堅持真理。我們今後不僅要學習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也要學習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有益的科學文化成果。並且要注意密切結合我國實際。第四，建議衛生部按學校的發展給任務，並通令省市立人民醫院，有義務作為當地醫學院的實習基地。

陝西有些單位互相監督還是一片空白

王子云 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和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分不開的。那裏有這些落後思想和不良傾向，那裏就有矛盾。因此，共產黨所提出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中國目前來說，是完全必要的措施。在陝西省，據我所知，有些機關、學校，對這一方面的工作就做的很不夠，有的學校甚至到今天還是一片空白。我想陝西省中共和行政領導上對於這種情況並不是不知道，但知道而不加以重視與糾正，這就令人很遺憾了。比如在西安美專，由於沒有建立民主黨派組織，談不到互相監督，因而內部矛盾，特別是領導與被領導間的矛盾很大，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都相當嚴重，共產黨和群眾間的關係搞得很不好。這樣就枯萎了“花”的成長，更難以望它“盛開”。

西安美專的前身是西北藝專，藝專的民主生活很不夠，黨組織包辦一切。藝專有一個“共產黨、青年團、工會聯合辦公室”，但實際上工會主席沒有權，由共產黨、青年團里的幾個年青小伙子壟斷代替所有的
工作。西安美專所以陷於這種地步，我認為這與輕視、排除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互相監督的作用是有直接關係的。

有許多人說：有些機關、學校，在共產黨與群眾之間，好像築了

堵很厚的牆。現在要把牆拆除，得先由共产党黨員动手，因为很多旧的知識分子，还受到不应有的歧視，共产党对他們信任不够。而且，过去往往是这样，对共产党員提意見就是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人民，就是反革命。这样，誰还敢提意見？！如能把这堵牆很快的拆掉，使得大家能互相了解并开誠布公的相处，則共产党与群众間的关系就会好轉，工作也就会很快的能做得出色。

对于“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在陕西省或西安市來說，更有着極为重大的意义。首先，大家知道，目前西北是全国文化較落后的地区，学术文化，亟待提高。其次，西北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中心地，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別丰富，对于“放”和“鳴”——特別在艺术方面，有着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原料。可是西北的領導部門，对这些瑰宝重視不够，放松了这一方面的領導工作，或者是輕估了这一方面的潜在力量，以致仅仅止于作大会号召，而不作深入調查，对于有研究能力和热情的人，却不給以实际的支持，（这也可能是由于对旧知識分子信任不够）。这样就大大阻碍了西北地区的“百花齐放”和“百家爭鳴”，同时也就阻碍了西北地区古代文化艺术的發揚和新的学术文化的成長、提高。

举例來說，我于一年前曾將西北地区較为突出的美术遗产——古代石刻綉画彙成專集，交美术出版社出版。为了編写这本專集，曾向陕西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索取一張唐代石棺的拓片，以丰富該書的内容，可是索取了一年，公私信件写了很多，迄今一無結果，想到領導上热情的号召和看看这不可理解的现实只有悶坐嘆气。像这样号召进行科学研究，号召“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連一張拓片都不肯給，岂不是一个空口号么？

最后，我还要揭發一件事，这是我数年来一直压在心里的沉痛心事。我于解放前在西北大学任教期間，曾陸續收集了几百件文物小品，这些东西都是我最近正在进行編写“中国美术史”和“中国雕塑史”的重要材料，却早在1952年“三反”时期，被“大胆怀疑”为公物。后来“三反”結束，照說提不出証据来的仅屬“怀疑”的案子应当可以搞清楚了，但被前西北文化部用不合法的手段，騙我爱人在捐献册上

簽了字。我完全同意將文物捐獻國家，但簽字後却不承認是捐獻的，却如同沒收似的拿走。令我們幾年來在精神上異常痛苦。這本來是一件可以按照情理辦好的事，然而被層層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所壓制、所歪曲。使我心情沉郁，一度並曾為此喪失工作能力。雖然因為自己熱愛新社會，近年來埋頭寫作，想把一切力量貢獻出來。可是，為什麼要我在抑鬱的心情下來工作呢？為什麼不可以把事情弄明白，使我精神愉快的更積極的工作呢？我誠懇地希望有關領導部門，能本着毛主席的指示，為我解除這一痛苦，從此消除我與共產黨之間的隔閡，並進一步發揮我在教學工作和研究工作上更大的積極性。

民主黨派在西大的情況和問題

錢就鈞 關於毛主席的講話的重要意義，我不多談了，今天主要談一些民主黨派在西大的情況，幾年來，民主黨派在西大有它一定的成績，今天不談成績，只提一些問題，不談成績不等於全盤否定論者。

民盟方面，有一個小組，聽說長時期不開會。領導上問這個組開過會沒有，組長不好意思說沒開，只說開過了。

我對民盟了解的少，這個組的情況當然不能代表民盟。

我是九三學社社員，對九三知道得多一些，開會的情況是這樣：參開會的人，並不踴躍。據我估計平時參加開會的人約占60%。但可肯所定的，有一部分同志長期不參加組織生活。組織生活的內容是空泛的，加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句話：一是談計劃，二是談總結，三是響應號召。以使人感到空泛無味干巴巴的，既不能提高思想，也無補於業務。這樣一來使得許多人覺得社的組織生活與自己的精力與時間有矛盾，成了精神上的負擔。

總的情況是，社員的向心力不強，組織渙散。

1、缺乏強有力的骨幹領導；領導人必須是在學術上有地位的，在學校中是有威信的。西大九三領導人不能說沒有威信的，但不很理想。一位領導同志說：上級叫咱干，是贖得起，不干是不行的。叫干就努力去干，不叫就不勉強，這說明他是被動的。另一個民主黨派負責人之一告我，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是領導人，直到肅反時才知道。民主黨派的司令部是如此，怎能搞好？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与中共西大党组织的领导为关系的，委员、干部、是上级决定好的，别人问为什么预先不经社员提名呢？答以：这些人都是和统战部几经研究好的。这样一来，群众就只好画圈圈了。不圈也不好意思。对于干部来说，他们也觉得组织下叫干，不干不行，处于被动地位。

2、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工作不协调；（1）西大中共组织是“壟斷”一切，“包办”一切，民主党派没有活动阵地，如在学习上、教学上、科研上等等。他们是能够做些工作的，但却无用武之地。这样，不仅共产党内部份人看不起，连民主党派成员也难以看得起自己。（2）1953年以来，西大党组织一直没请民主党派提过一次意见。平时不必谈，共产党在西大开党员大会以前也没有普遍征集大家意见，也没有请较多的人去参加旁听。所谓研究问题只是找民主党派负责人去听一下。共产党包办了学校一切工作，事先既不见充分协商与讨论，事后也不向大家报告请求批评。

3、共产党员与社员不能促膝谈心或交朋友，个人之间的关系冷冰冰的。过去见面点头都有困难，自从周总理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稍有改变。有不少人很愿与共产党员交朋友，但无从交起。共产党员找上门来，不是谈安排功课就是调动工作。

4、共产党员在民主党派中，不是向心力而是离心力；有些共产党员在民主党派中，似乎享有某种特殊地位，他的话要比一般成员“吃香”些。社员参加共产党后，也就成为“优秀”分子，在社内形成了特殊身份。他们经常不参加组织生活，好像不是社的普通成员。这种情况对大家的影响是不好的。有人认为：共产党员都不重视我们的组织生活，我们还参加它干什么呢？

5、统上不统下，统少数不统多数；据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说：听大报告没有他，到宝鸡工地慰问没有他，有什么戏票没有他，挨到批评却有他。

6、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成员不信任，积极性何从谈起。

我的意见：

1、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必须是有威信的同志来担任，同时还要培养

新生力量。否則老是几个人“爬在”上边也不大合适，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产生不应由统战部决定。应讓他們自己成員去选择。

2、將学校一部分工作交与民主党派来执行，党組織不要包办一切。号召领导同志將社的工作与自己的業務結合起来。

3、發动共产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員和广大群众交朋友，平时多联系談心。

4、共产党的某些會議可邀請民主党派成員和民主人士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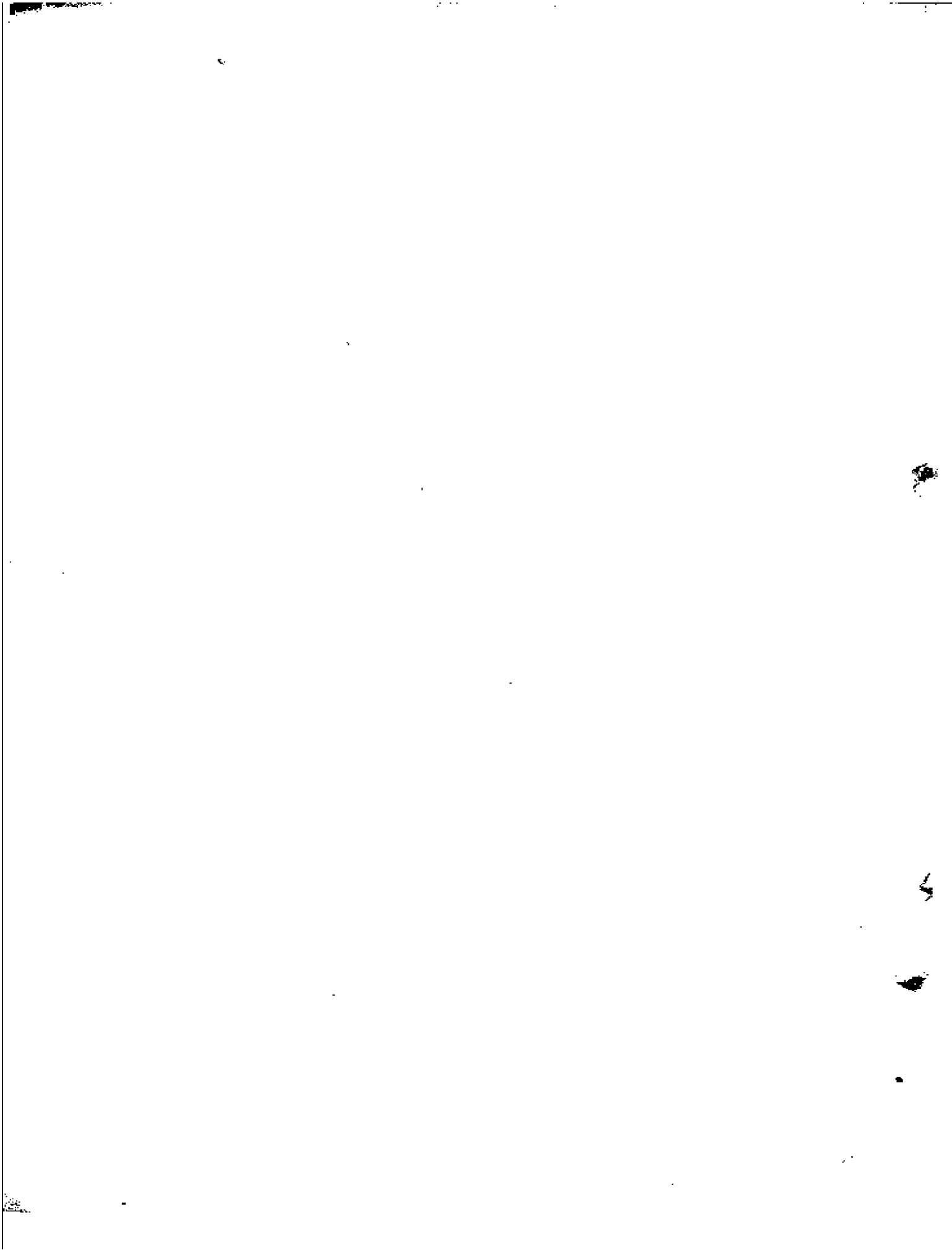
5、中共市委统战部成立一个高級知識分子统战工作指导委员会，具体地总结这方面的經驗，指导工作。

6、学校应成立教工代表大会。行政每年向該会报告工作。听取批評与意見，受它的监督。

／教工代表大会要有广泛的民主、应尽量征求民主党派成員与职工群众参加，共产党员不能占比例太大。

总之，民主党派在学校工作能否开展，关键在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光明日报5月11日12日第2、3版)



一、許多標題都是採用極其誇張的詞彙。什麼言論最反動，什麼話最難听，什麼話最難听，就用它來作標題。例：

清除宗派主義填平黨群鴻溝

蘭州的民主黨派和文教界人士在本報座談會上發表意見

(5月18日第一版，主題原是特號宋守，副題原是二號宋守。)

北京農大的黨群之間有一堵厚牆 教授們要和黨員一起把它拆掉

(5月15日第一版)

南京的鳴放在下層阻得不少 轟開局面還看領導

民主黨派人士在本報座談會上熱烈發言

(5月15日第一版)

蘭州許多高等學校教師 有話要講 苦無機會

蘭大等院校並沒有認真討論毛主席講話

(6月13日第一版。)

北京各高等學校的政治理論課教師連日座談

搜索政治課中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

教師們大聲疾呼他們已被教条主义压得抬不起头来了

文中小標題：

教条主义的根源何在

巧妇难为無米之炊

談不到提高水平

老爷式的領導方法

(6月7日第一版。肩題原是二号宋字，主題原是特号宋字，副題原是二号楷字。)

协和医学院看不到鳴放

羣众反映，领导还在筑牆，要求“扶植微言，結束协和的晚冬季”。

(5月20日第1版)

地質学家批評“大地質部主义”

地質部想壟斷全国地質事業反而阻碍了科学發展

(6月3日第一版头条。主題原是特号宋字，副題原是二号宋字。)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提出批評

教育部领导不懂業務主觀自信

董純才副部长昨到北京师大傾听教师意見

(5月31日第二版)

社会主义学院繼續舉行座談会

楊兆鈞批評干部子弟學校的“特權教育”

(5月23日第二版)

衛生部分別舉行有關中醫問題座談会

廿多位中西醫兩不見面地爭鳴

(5月21日第一版)

“中国人民大学

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

(5月25日第3版)

党中央的政策是一本好經，好經到了

歪嘴和尚的嘴里，却給念歪。

(5月26日第三版。光明日报在蘭州召开民主党派座談会报道中的第一个小标题。文内是水掉肉發

言。)

三个大老虎变成大妖魔 奇特邏輯給人打上烙印

(5月11日第三版。光明日报在西安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报道中的小标题。文内是張錫华的發言。)

二、許多標題與本文的中心意思不一致。這類標題多是从本文中挑選个别右派分子的反動論點，或是摘取發言中比較偏激的言詞作成的。例：

無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談會上

批評“三大主義”和“四大偏差”

本文中又另外突出地標出小題：

張奚若：批評工作中的“四大偏差”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

(5月16日第一版头条。主題原是特号宋字，标题原是一号楷字。注：在这个座谈会上提到所謂“四大偏差”的只有二人。)

广州群众对鸣放躍躍思动

有些领导方面依然存有怕“乱”怕“放”的思想

(5月20日第一版。主题原是特号宋字，副题原是一号楷字)

坚决相信共产党大胆揭露矛盾 有人怕报复要农工民主党撑腰

專家教授在农工民主党座談会上提出很多意見

(5月27日第二版。注：这个标题是引一个教师的發言。)

科学院学部會議开始大会發言

黃鳴龙痛砭“以長为貴”風气

(5月28日第一版)

三、許多標題採用輕重倒置的方式。有的將適合右派口味的言論作主題，而且明確、肯定，用的字也特別大；將不適合右派口味的言論作副題，並且抽象、模糊，用的字就特別小。有的只挑起反動的言論作標題，而且用大字標出；對正面的意見，就用輕描淡寫的標題，甚至在標題上一字不提。例：

山東文教界認為領導對鳴放支持不夠

彭真應邀在省政協講話闡明“鳴”“放”方針

(5月3日第二版)

统战部座談會昨結束發言

先後有八十多人講話對中共整風和改進工作有幫助

文中小標題：

章伯鈞：應為非黨幹部和負責人員創造工作條件，國家機關中的行政和黨組織職權需要劃分。

陳銘樞：主張取消學校中的黨委制，在機關中要吸收黨外人士參加重大問題的討論。

章乃器：共产党內有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宣传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5月9日第1版)

罗隆基：

民主党派应有名有实参加协商

長期共存应加强一些共存条件

(5月11日第1版)

黄绍竑：

許多法律制度必須早日制定出来

工作报告強調成績掩盖錯誤有危險

(5月14日第1版)

何香凝的書面發言

(6月2日第2版。)

(注：从以上统战部座談会消息的大小標題中，可以看出，他們把“一些右派分子發言中的最反动的部分，都被概括出来放在標題上，独有对革命前輩何香凝忠告右派分子的正面意見，却采取了迴避态度，只是作了一个‘何香凝書面發言’这样輕描淡写的標題。)

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談会热烈爭鳴

畢鳴岐对千家駒的意見展开論爭

刘永業对这次座談会提出了他的看法

小標題：

畢鳴岐再談工人階級怎样看民族資產階級

(5月30日第2版)

認為給二十年定息才是贖買到底

(5月14日第1版)

一封上海來信

支持李康年的建議

(6月5日第1版)

李康年：

并非主張“定息二十年”或“延緩贖買二十年”，而是不同意定息這個制度和發付定息的方式方法。建議取消定息，由中央換發總值二十二億元的“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使資本家有早日摘去資產階級帽子的可能。

(6月6日第1版)

關於“撤出公方代表”建議 董少臣重新加以解釋

全國工商界人士座談會昨繼續舉行

文中小标题：

董少臣說：撤出公方代表的标题应该改正为我說的一个不成文的意見

章元善說：希望党和政府不要輕視缺點。“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另个别的”这句话有副作用

陈述曾說：要求解决資方代理人的酬劳金問題

（注：5月31日第2版。在处理工商界座談会的报道上，对李康年所謂“定息二十年”的建議，版面上一再出現，并且在一版还报道了一个上海居民支持李康年的建議的来信。其他右派分子，如董少臣、畢鳴歧等也被当作正面人物处理。

四、有些是在本文中找不到最反动的言詞，但为了聳人所聞，突出反动論点，就篡改發言人的原話，然后用来作为标题。例：

北京航空学院官气十足

在党群之間有一座“万里長城”

連日舉行座談不少教授尚有顧慮

6月21日第1版。注：光明日報編輯部的檢查中寫到：“5月21日發表北京航空學院鳴放座談會的新聞，竟篡改了發言人言的原話，標上了‘在黨群眾之間有一座‘萬里長城’的標題。”

• 226 •

有些黨員幹部

自視為統治者令人難堪

（5月10日第1版“武漢市教授專家在本報座談會暢談……”一文中的小標題注：在光明日報編輯部的檢查中寫到：“我們這次檢查武漢座談會的發言紀錄，並沒有所謂‘統治者、被統治者’字樣。”）

五、在本文中挑不出合適黨人所聞的反動言詞，又沒法篡改，這時就採用概括的方式，標出標題。
例：

很多教授主張“民主辦校”

九三學社繼續座談高等學校的領導體制問題

（5月16日第二版）

本报在武汉邀請艺术界人士座談

揭發党群划分界限的現象

認為文化部、教育部的官僚主义相当严重

(5月13日第一版。肩題原是一号宋字，主題原是初号宋字，副題原是一号楷字。)

武汉高等学校統战工作流于形式

学校党委不重視民主党派

中共湖北省委統战部邀請各校民主党派負責人座談

(5月29日第三版)

首都法学界人士初谈内部矛盾

批評宗派主义和違反法制現象

对中央領導机关仍有不严格遵守法制情形提出意見

(5月29日第二版)

